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JUSTICE IN PRISONS AROUND THE WORLD

Baz Dreisinger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九个国家监狱的人性记录
重思公平正义与规训惩戒

[美] 贝兹·卓辛格 / 著
陈岳辰 / 译

评判一个国家
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尊贵的公民
而是看它怎样对待最卑微的那群人

INCARCERATION NATIONS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作者:[美]贝兹・卓辛格

译者:陈岳辰

ISBN:978750867128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简介

司法正义本就无尽繁复，必须无穷尽提高自我标准，

所以需要更多投入、更多社会运动，

经过更多努力和更多失败，换来更多成功。

完成使命、探求意义的航程，动力来自我从不离身的救身衣，它可保心灵永不陷溺。

它名叫，希望。

题词

有时候，我觉得世界是一所监狱。

我们有人是囚徒，有人是狱卒。

——鲍勃·迪伦

献给

此书献给参与“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同学们，你们是我的老师，我的灵感来源，我的家人——

Anthony，Carl B，Carl L，Craig，Dale，

Devon，Domingo，Gerrard，Johnny，Joseph C，

Joseph T，Juan，Justin，Kenneth，Kevin，

Korey，Lenny，Lumumba，Marcus，Matthew，

Melvin，Rasheen，Richard，Robert，Robert T，

Rory，Rowland，Sean，Shawnon，Theron，

Tomas，Vinicio，Will

前言

此地遗世独立，风俗特异，律法、衣着、礼仪皆自成一格，是活死人居住之处。他们与外界隔绝，生命截然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

“姆藏古！”警卫操着斯瓦希里语[注]咆哮，意思是“白人”。去你的。

我想保持低调，但白人女性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贫民区，要不被发现难如登天。穿过这道侧门就是卢济拉（Luzira）最高戒备监狱，里头环境混乱不堪，原始收容上限是600名囚犯，但据统计目前人数已达5000，男女老幼皆有，也包括死刑犯。系好藏在外衣下的防弹背心，我朝乌兹冲锋枪接近。

“你要干吗？”对方又嚷嚷。

我堆起一脸假笑，嘴里说着“志愿者”“拜托”“先生”“谢谢”。对方还没听完就不耐烦地甩甩手，好像遇上恼人的蚊虫。

五分钟后，我带着另一位志愿者走回来。她已经在当地待了四个月，取得管理机关核发的正式文件，可以合法进入卢济拉监狱，尚未取得正式批准的我只能偷渡。上星期执勤的组长说：“教课啊，那就进去吧。”却什么证件也没给我。

人多好办事。经过不断鞠躬哈腰、不停说拜托和对不起，我们总算低头经过冲锋枪，踏进监狱。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管理人员宿舍，外

观就是铁皮屋，后面有武警营房。来到中央大门时，狱警挥手催促我们进去，一群群穿着鲜黄色制服的男囚与我们擦身而过。通过一扇混凝土门，面前竟出现一座小图书馆。

“午安，贝兹教授。”

一整天，或者应该说一整个礼拜以来，首次有人对我这么客气。乌干达有许多特色，可惜人情味不在其中，旅馆的柜台人员肯礼貌性地点点头我都要谢天谢地了，面露愠色似乎是当地专业表现的一环。愿意亲切接待我的人反而是一名囚犯，名字叫做巴法基·威尔逊，他有很多外号，“威尔逊校长”“波玛区长”等等，源于他是同侪推选的管理员，负责卢济拉监狱的图书馆以及代号“波玛”的牢区。图书馆是由非政府组织“非洲监狱计划”（African Prisons Project）所成立，伦敦和坎帕拉都有该单位的办公室。

“今天过得如何？”威尔逊一如往常露齿而笑，热切地看着我。他有双全乌干达最和善的眼睛，今年30岁，集孱弱老人和活泼男孩两种极端于一身：个头矮小，笑容爽朗，眼神充满朝气，常戴着一顶过大的鲜黄色软帽，活脱像个大男孩；然而，他的动作略显迟缓，尤其说话方式特殊，抑扬顿挫像是在不断朗诵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

“还可以，威尔逊。”回答时我不禁嘴角上扬，这是我今天第二次对人笑，但这次是发自内心。与他握手之后，我逐一与另外十几个学生握手问好。图书馆的格局方正，学生围着中间的木桌而坐，有的在活页笔记本上涂鸦，有的随意翻书，像是《挪威语入门》《哈姆雷特》《英国乡村导览》等等，不过没认真读。

这堂课的主题是文学创作，威尔逊坐在我左手边朗诵诗词，咬字十分清晰。我昨天先发了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注的作品讲义下去。

历史任你书写篡改，
污蔑扭曲我的模样，
随你践踏我于脚下，
但如尘土我将飞扬。

第一堂课我就请学生写自传，于是知道了威尔逊的故事。他出生于乌干达乡下，当地一夫多妻制依旧盛行，家中孩子多达60多个。威尔逊尚在襁褓时母亲便过世，他因为遭继母们虐待而逃家。后来犯了罪，由于没钱缴罚金或行贿，只好乖乖坐牢，沦为3.5万名乌干达囚犯之一，乌干达的监狱系统超收人数已达上限6倍。近百年前的殖民者兴建了这些监狱，原始目的是恫吓人民达成社会控制；但威尔逊入监超过一年，至今尚未接受审判，这情况在此见怪不怪，因为乌干达过半的囚犯都是未审先关。威尔逊算是适应良好，在监狱里面建立了信心，自我改造后成为波玛区长。

想看我绝望崩溃？
想看我垂头丧气？
肩膀似泪滴垂落。
恸哭至声嘶力竭。

学生拍手。“贝兹，我不得不说，”威尔逊感叹，“这首诗除了优美，的确道出我们在狱里的心声。”其他人也沉重地点头。

后来两小时的时间，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中，大家分享自己写的诗，气氛很愉悦。威尔逊写了一首《解放者》，感叹东非各国落入独裁者手里，结尾是期许乌干达能有灿烂的明日。另一个学生的作品开头就是：“艾滋，噢，艾滋，为何要夺走我的家人？”

下了课，我收拾好教材，和威尔逊握手道别，祝他今晚能有个好梦。

“我在这里没有一天睡得好，应该说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睡。”他这么说的时候，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才能跨出图书馆回到外面的世界。坎帕拉的犯罪率很高，但真正使我不安的却是维安系统无所不在。恐怖组织肆虐东非，2010年的大爆炸案造成76人死亡，类似攻击事件层出不穷，于是他们将自己国家看作定时炸弹，无处不设保全警卫，甚至军事岗哨。这里的生活犹如大型障碍赛：第一关是狱警；第二关是一个白人女性走在贫民区；第三关则是出租车失约，留我一个人想办法。就算出租车来了，还得和司机讨价还价，即便早上明明才谈判过两轮。坎帕拉的交通、社会氛围，坎帕拉人的那副愠容，还有炸弹检查哨加上金属探测器，以及更多板着脸的警卫，更多冲锋枪和安检程序……我唯有回到饭店才能勉强呼吸。

确实没人说过这趟环球旅程会轻松写意。

是矫治，还是惩罚？

我将展开为期两年的全球监狱之旅。

提起这计划时，大部分人都很好奇。而我早已习惯别人对我的各式身份感到好奇：白人、教授，但专门从事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研究，喜爱加勒比海嘉年华，又在监狱授课、推动司法正义，还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兼职节目制作人，雷鬼音乐迷，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却还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以前做过记者、乐评人，当然也是学者，甚至拍过两部纪录片，主题分别是嘻哈文化及司法体系。

挑起别人的好奇，是因为我自己的好奇心永不满足，于是游走于诸多不同领域。每回迷上某样东西，我就一头栽进去，譬如爱上牙买加雷鬼乐以后，我无法甘于当个小乐迷，非要钻研到学术研究，为此

常常亲自拜访当地。同样狂热的好奇心指引我带着马娅·安杰卢的诗作，来到乌干达监狱。

就我个人成长历程而言，监狱不带浪漫色彩，也不是家常便饭。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居民多半会接触嘻哈与雷鬼文化。成年后我进入纽约市立大学（CUNY），虽是公立学校但规模大且极为多元，光是分校就有来自160国、使用127种不同语言的学生。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市一样，用丰富的文化将我熏陶为国际公民。

进修英语博士学位时，我专攻非裔美国人研究，主题是美国文化中的种族隔阂：界线如何生成，由谁界定，又有谁大胆跨越？为何我有志于此？因为在我看来，种族之见毫无道理。我无法理解为何人类在社会政治诸多层面始终受到这种概念宰制，种族分明是主观认定，而非生物学事实。若就基因来看，不同人种的相同处远多过不同处，但为何大家将这种人为的区别视作理所当然？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心得，成就了我的首部著作，内容为社会史上真实和虚构的黑白融合案例。

书中大量提及跨越人种隔阂、嘻哈文化、文化拥有权及超越学术定义的身份认同，并结合了流行音乐界在新千年初期，也就是埃米纳姆（Eminem）时期的种族和音乐时代思潮。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博士后研究，某一年我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封面故事，在此过程中几乎见了所有想见的饶舌歌手，还和音乐人“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一起巡回。后来我说服一位《洛杉矶时报》的编辑，纵使他认为雷鬼音乐已随鲍勃·马利（Bob Marley）死去，仍旧给我机会发表一篇当代牙买加乐手的专题报道。

因此我访问到贾·库尔（Jah Cure），他是拉斯塔法里风潮[注]下的雷鬼明星，因强奸罪名被判刑八年，走红期间本人尚在监狱里服

刑。我飞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与官员协调，希望得到入监采访许可，但功败垂成。出于不舍，我依旧将故事放进报道内容中，也主动搜集强奸案的资料细节。库尔声称清白，遭到司法歧视，因为拉斯塔法里教徒在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上流社会仍是一种文化烙印——我个人也无法接受，这个唱出我觉得最动听、最有灵性的情歌的男人，会犯下强奸罪。倘若他真的犯了罪，为何有权利在狱中发表音乐？反复播放着他的歌曲，我心中对人性、对监狱制度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监狱的存在是要矫治，还是惩罚？假如监狱的意义只是剥夺人身自由，库尔的音乐是否可以流出？我更进一步思考，假设库尔真的有罪，那么他创作出的令人屏息的情歌，是否可视为一种对社会致歉，甚至是补偿的行为?

这样的疑惑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也出现在我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其一针对纽约市警局某位探员成立专门小组监控饶舌歌手，他们被戏称为“嘻哈警察”；另一则是《洛杉矶时报》的头条报道，主题是饶舌歌手在狱中发表作品成为新趋势。之后我与洛杉矶一位制片人合作，将这两篇故事转化为纪录片，并在各大有线电视台播出。虽然两部影片都针对主流观众，我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司法本质的困惑，所以我继续研究，也促成了《禁锢与节奏》（*Rhyme & Punishment*）这部监狱研究和嘻哈研究相结合的纪录片。而我对此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深入。

探究之后，我发现极其骇人的数据。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狱卒，监控着230万名囚犯，比例上每百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在坐牢。虽然国家人口数只占全球5%，囚犯人数却占了全球25%；每31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名正在接受某种惩教管制，总数达700万人；成年受刑人之中，有25%罹患精神疾病。美国有大量囚犯是因为药物滥用而长期服刑；在联邦监狱（federal prison）中，这样的比例高达51%，抢劫犯仅4%，杀人犯仅1%；在州政府体系中，药物犯罪比例是20%，同样高于其他类别；3700名美国人从未有过暴力犯罪记录，却在

加州坐了25年牢。政府认为青少年尚未成熟，不得购买酒类商品和参与选举投票，却又认为他们成熟到能住进成人监狱，无视监狱受刑人遭性侵害的比例有一成之高。这种情况尚有14个州未立法禁止。

我也见证了惊心动魄的种族不平等。现在被刑事监督的非裔美国人人数比1850年的黑奴还多，相较于白人，黑人因药物而入狱的概率高出6倍，这数字也稍微解释了为何每14名黑人男性就有一位正在坐牢。若以18岁为基准，四分之一的黑人在成年前面对过父母坐牢的困境；美国家事法庭内出席的儿童，有94%为黑人或拉丁裔。许多研究显示，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从裁判羁押、检察官态度，以至于判决采取社区服务刑或者监禁，黑人始终没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纽约时报》于2015年报道，美国有“150万黑人失踪”——背后的真实含义是24～54岁的黑人男性，有1/6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因为早逝，或者进了监狱。

刑期长短也是族群不平等的一环。世界上有20%左右的国家采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而美国不只保留该制度，竟还适用于单一的非暴力犯罪。目前美国约有16万人受无期徒刑，对照组澳大利亚是59人，英国是41人，荷兰为37人。2005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统计发现，逾2000美国人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美国之外，全球仅对12名儿童做过同样处罚。世界上只有九个国家同时实施无期徒刑和死刑，美国是其一。

我无法忘记这些数据。回到纽约以后，我进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该院为纽约市立大学分部，学生多半有志于法律、社会服务及其他司法相关领域，而既然我的授课内容是跨学科的种族、犯罪与文化，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辨就融入了课堂中。

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仿佛就“文明”了起来

同时，不少信件从监狱来到我办公室，寄件人多半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影片。他们亲笔写信，篇幅很长，狱中生活跃然纸上，自发地向我告解，有时候还制作精致手工卡片当礼物。其中一封信是来自拉丁裔发展会（Latino en Progresso），这是沙瓦岗克监狱（Shawangunk Correctional Facility）内囚犯自发成立的团体，他们邀请我去年度餐会演讲，而我欣然应允。

我去过监狱的会客室，但以志愿者身份与身陷囹圄的人进行知识层面的交流，则是头一遭。当天谈话的内容是种族的社会建构，我引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的著作。放下资料、开放现场提问时，他们蜂拥而来，引经据典提出许多意见。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他们就得回牢房去，我也要离开监狱重返自由世界。

从监狱回到纽约上州㊟冰凉的空气，我心头沉重。对于美国有部分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被关进监牢，其实我并不吃惊，可是那天我第一次对现实深感悲哀。我不天真，能想象那些穿着绿色囚服的人当中有很多真的犯下重罪，只不过我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巨大的可能性，这是一群有潜力对社会作出伟大贡献的人。为什么我们竟容许社会最棒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优秀公民，被困在监狱虚掷光阴？

大约同一时期，我定期前往另一间矫治机构探望朋友，他20到30岁的大半岁月都在狱中度过。入狱以后他信奉犹太教，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时间说服管理人员：没错，“准许物件”的清单中真的可以有祈祷披肩这一项。会客室成为我对监狱甩不开的印象。铁丝网和煤渣砖组合的丑陋建筑矗立在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风格的乡间风景上，亲友们机械化地排队、亮出证件，换取时间与父亲或丈夫玩几场拼字游戏。室内气味（贩卖机的火腿三明治和墨西哥玉米

片经过老旧微波炉加热）、声音（硬币投入机器中，汽水瓶盖被打开），还有几近超现实的景象：会客室像是一口锁起人性和情绪的箱子，不可思议地混合了被揭开的疮疤和最压抑的深情。那气氛太过冲突诡异，想忘也忘不掉。

我最初的好奇心，以及怀疑整个系统出了大差错的直觉，经历一切之后，全部得证，于是不由得对监狱制度本身做出一番长考。

学院学生多半觉得天经地义，“犯罪就坐牢”是一贯回答。大家认为做错事就该去监牢待一阵子，与时常大喊大叫就会失声同样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监狱是相对新颖的发明。技术上而言，或许可以说监狱存在几百年了，不过直至19世纪为止，监狱都以短期拘禁为主，犯人在里面等待开庭审判，或犯下小错关个几天就完成惩戒。换言之，监禁是通过司法之道，而非司法本身。大规模监禁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形。

任教于约翰·杰伊学院期间，我利用图书馆资源重启了几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就开始的研究，但每个结论都使我摇头摇得更用力。对于一项重要社会制度的演变，还有前监狱时代的司法模式，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少？

以色列人设立了“枷锁屋”（beth ha-asourlm）来拘留欠债者和候审犯人。古希腊罗马的类似建筑称为“carcer privitus”，到了中世纪“carcer”一词还代表修道院内处罚修士的禁闭室。监狱，或者说矫治机构，这个概念真正在欧洲落实，是以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的矫治所、巴黎的巴士底监狱及伦敦的布莱威监狱为起始，即便如此，它们的设计也以拘留为主，就结构上与现今认知的监狱有重大差异。古代司法制度有其他实现正义的手段，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而雅典人则用财产充公、公众砸石、捆绑于木桩、通过仪式降下天神诅咒，或者切断社会关系等方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处理破坏社会秩序者，有鞭打、放逐、服毒或者从事修缮工作等方式，主要

着重在受害者是否得到补偿，而不是一味要惩罚犯人。以东非基库尤（Kikuyu）人为例，通奸、强奸的代价是9只山羊或绵羊，杀人的代价是100只羊或10头乳牛。流放也是历史悠久的刑罚，许多非洲民族驱逐危害社群的人，比方大家认定的女巫或者惯犯。以前欧洲各国也采取将犯人送往各殖民地的做法，殖民时代的北美常见的刑罚有足枷、颈手枷、浸刑、公开鞭刑等等。从这些刑罚的执行方式来判断，重点在于当众羞辱，类似的思想可以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看见。中国直到公元3世纪还以鞭打为主要刑罚，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仍使用断头台将死刑变成盛大的街头庆典。

18世纪末，各社会经历重大转变。资本主义诞生，工业化与随之而起的城市化进一步导致贫困和犯罪率提高。美国革命成功，于是英国失去一大片流放刑场。当时律师、作家和自由思想派对于时代演进和人性充满信心，期盼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刑罚手段，更精致、更利落，尤其更理性——毕竟那段时期称为“理性时代”。他们讨论相关议题时追随当代流行加入了医学词汇，认为犯罪如同传染病，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治愈。18世纪50年代，英国法官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提出“矫治心灵”而非肉体，主张“最放纵堕落的人”也可以通过独处和禁食重拾理性秩序。18世纪90年代，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英国国会提出建议，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牢房呈现分层环形蜂巢状结构，围绕着中央高塔，囚犯时时刻刻受到监视，也必须持续进行体力劳动。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巨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所言，自从犯罪者不再承受肉体折磨，改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世界起了重大转变，仿佛一瞬间“文明”起来。

我们现在称为监狱的机构，其实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如同资本主义的圣殿，也就是工厂，是建立在特殊结构上。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

源自其弟为俄国凯瑟琳大帝设计的厂房。监狱系统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维系于控制肉体劳动和时间分配；资本主义将这两个要素转化为金钱，监狱系统则将其对应于罪行的轻重。

甫独立成功的美国服膺贪婪至上的资本主义，却急于证明自己比起欧洲殖民者更为进步，所以摒弃这种极端手段。此时出现了最讽刺的现象：民主的诞生和监狱的诞生竟是一体两面——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的图腾，却也是不自由的烙印。正是托马斯·杰斐逊本人描绘出了最初的监狱设计图。

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理论很快化为现实。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监狱问世，而且一次有两家美式监狱开张竞争。费城的东州教养所（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实现了边沁的圆形监狱理念，也就是人犯时时刻刻处于隔离。纽约州奥本监狱（Auburn Prison）实行另一种“静默制度”，囚犯在类似工厂环境中劳动，只要开口出声就会遭到鞭笞，和奴隶没两样。另外一大讽刺：监狱内犯人沦为奴工；而内战时北方却致力结束南方的奴隶制。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并未宣布奴役非法，而只是说，除作为犯罪惩罚之外的奴役是非法的。

不断制造对立，却期待社会更安全！

国内监狱运作完美，美国便将监狱出口到国外。

19世纪欧洲学者越过大西洋进行参访，必到的一站就是监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曾经参观监狱，后来萨克森自由邦、俄国、尼德兰的君主，还有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的官员都去过。见识过美国监狱的名人之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两人都认为里面的景象太过骇人。狄更斯称美国囚犯几如“遭到活埋，花上

好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挖出，过程中对一切麻木，受到无尽的焦虑绝望摧残”。

但美式监狱仍然渗透全球文化，不仅限于欧洲，也进入各国殖民地，还经由西班牙到了哥伦比亚，经由中国进入日本与印度。全球各地开始模仿美国监狱的设计并传承至今，其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规模监禁”。

1990～2005年间，美国平均每10天就成立一所新监狱。数字相当戏剧化，但来龙去脉很清楚：社会学家一路追溯到对毒品宣战的20世纪70年代，然后发现1980年因毒品被捕的每千人中有19人入狱，1992年提高到104人。犯罪学家托德·克莱尔（Todd Clear）分析后，总结出三个导致20世纪80年代监狱数量增长的趋势：非监禁的替代手段使用率下滑、刑期增加、受到社区监控的犯人返回监狱比例提高。监狱数量的增长原因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将更多人送进去；其二是让他们在里面待更久；其三是所谓的精确量刑（truth-in-sentencing）法案确保囚犯不能提早离开。克莱尔进一步指出，年龄、性别、种族、地区都是关键因素，打击毒品政策将焦点放在贫穷的少数族裔地区，特别是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年轻黑人男性身上；相较之下，白人使用药物如可卡因则不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该政策本质并非针对用药本身，而是猛烈打击民权运动时期取得的种族进步，还能有效转移大众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均的注意。1979～1996年间，全社会95%的财富集中到最富有的5%的公民手中。

追溯监狱史使我胆战心惊，怀疑自己揭发了用心歹毒又所费不赀的全球大阴谋。美国在矫治机构上已经花费超过500亿美元，过去20年里监狱预算的增长幅度是高等教育的6倍，每年花费8.8万美元来囚禁一个年轻人，却只花费10653元提供教育。州政府亦然，某些城市里特定区域犯罪率太高，单单针对这种地区就拨出百万以上的监狱经费，也因此被戏称是“百万街区”（milliondollar blocks）。更可怕的

是，美国花在矫治机构的金钱已经超过地球上一百四十个国家的GDP，并持续拖垮数个州政府而导致破产，所以政府不得不设法降低囚犯人数。

知道了这么多，让人很难不想做点什么，无论多渺小的努力也罢。我怎能眼睁睁看着状况恶化？于是请我演讲过的监狱再度邀约，我也一直答应，并因缘际会就在狱里开了非正式课程，有空就去上一堂课，之后还邀请有兴趣的同侪加入。过程中我与狱内拉丁人社团负责人拉蒙熟悉起来，某次餐会上他提到自己16岁就入狱，当时还不会说英语。我听了一愣，因为不久前我才看过他站上讲台，拿着切·格瓦拉的海报滔滔不绝针对改变、成长和革命发表20分钟的演说。拉蒙又提到自己有三年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我完全无法想象。

与拉蒙聊天时，我内心依旧感慨，眼前又是一个天赋异禀却被社会否定的人才。这时候，欧提斯维尔监狱（Otisville Correctional Facility）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攀谈。

“约翰·杰伊学院为什么没在监狱开课？”他问。

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家，向院长杰若米·崔维斯（Jeremy Travis）提起。

“我想开课，”我告诉他。院长答应了，所以在2011年，约翰·杰伊学院的“监狱直升班”（Prison-to-College Pipeline）项目正式成立，除了提供学院课程，也协助出狱不满五年的犯人复归。入学者在监狱内开始上课，出狱回家之后能立刻获得纽约市立大学学生身份，因此取得学位并融入新社群。计划目的在于使大专院校成为刑满释放人员新生活的重心，受益于校园资源，如课程、人际网络，以及免费的医疗、心理、学术咨询。

在监狱直升班项目中，我除了教授英文课程，也身兼教务长。起初我不明白自己即将接触到什么，在监狱内开班就很多层面来看并不难，学生们求知若渴，对教授来说，这是教学天堂。我没料到的是，坐在这位置就仿佛经历心理上的过山车，巨大的情绪起伏有时令人难以招架。学生假释失败，或者回家后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又被逮捕甚至中弹伤亡，这种种都成为我的心头创伤。不过看到在监狱里教过的学生出现在校园，看着他们急急忙忙找教室的模样，又令我宽慰下来。

监狱渐渐成为我情感和思考的重心，然而身边多数人依旧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那就是监狱根本无效。事实上，自1973年来，美国服刑人数稳定成长，但是从未看到对应的犯罪率下降。为什么监狱没效果？概率论和心理学研究都证实监狱的威慑作用是假象，因为害怕监狱而放弃犯罪的人少之又少，犯罪的时候，监狱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思考。更糟糕的是，监狱具有反效果，将犯人与社会大众隔绝，成为犯罪训练中心。囚犯最终必须回到社会，到时他们的犯罪手段更上层楼，人际和财务又更加边缘化。换言之，监狱系统是促进犯罪的。这解释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14年的一则头条新闻，听起来反而令人莞尔：“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美国监禁人数下降的同时，犯罪率也下降了。”数据显示，2007～2012年间，入狱比例下降最多的几州，犯罪率平均降低12%。

托德·克莱尔与其他研究者将这个现象称为都市监狱的“副作用”。克莱尔解释：“监狱造成家人离散，削弱家长提供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囚犯的经济能力，并造成他们敌视社会，曲解政治主张。”研究也发现，曾入狱者若有小孩，孩子入狱率较高，而刑期也严重损害受刑人的社会资本及人际关系。我们怎能一再制造这样的公民，却期盼社会变得更安全？

为何我们应该关心做错事的人？

有许多人认同监狱存在的第三个理由注是矫治。然而那是否真的有效？1954年，原美国监狱协会（American Prison Association）更名为美国犯罪矫治协会（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但真正致力于“矫治”的方案却屈指可数。矫治经费只有6%投入监狱内，而明明六成到八成的囚犯有药物滥用前科，相关治疗计划自1993年以来却减少一半，于是2012年监狱内等待毒瘾戒断协助的人数已经累计到5.1万人。2004～2005年，州立监狱内仅四分之一的囚犯参与教育项目，接受职业训练者低于三分之一，但有约三分之二在狱内从事劳动工作。研究显示，如我所开设的高等教育项目，是降低累犯比例的关键，但是自1994年以来类似计划大幅减少，因为被监禁的学生被排除在联邦或州政府的教育奖助外。监狱系统内一度曾有350个教育项目进行，仅一年之内直坠到剩下7个。

我了解这样的状况以后唏嘘不已，不过我也明白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衰退。对我而言，有关监狱的光怪陆离慢慢显得没那么有冲击力了。由于太常出入监狱，脑袋做过太多分析，我不禁担心自己最后会思考僵化，失去洞察。有一回我和计划赞助人聊天，居然下意识描述在欧提斯维尔监狱的经验“就像在家”。我自己听了吓一大跳，身处以前全然陌生的环境，我真的觉得就像在家？

于是我决定撞开制度的大门，挖掘最深层的真相，解答挥之不去的疑惑，这样才能召集到具有同样理念和热血的人。

计划在我脑海里逐渐成型。为何我们应该关心所谓做错事的人？我要在全球找出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亲眼见识世界各地的监狱究竟是什么模样，通过监狱来了解各个国家。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经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一句名言：“据说没有进过一个国家的

监狱，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国家。评判一个国家，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尊贵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样对待最卑微的那群人。”

这趟旅程也让我可以好好审视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实验和出口产品。2008～2011年间，全球各国的监禁人口提高了78%，换算起来已经有1030万人住进监狱，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尚未被定罪，必须苦等数年才有机会接受审判，但又缺乏足够的法律援助。舆论很少将目光从美国的监禁危机转向全球的监狱问题——这是美国建立并传播到各地的。

司法应当崇高且公开，由所有公民背书认可。然而，监狱作为今日司法体制的核心，最缺乏的就是透明。它们仿佛从未存在，多数人一生没有看见和接触过，隐隐约约将之视为正确和正义的象征。问题是，既然看不到，为什么你愿意背书？所以我想从最基础的层面揭开这隐秘空间的面纱，寻回几乎被每个国家、整个地球遗忘的那群人。我希望自身以及读者都能担任见证人，因而这趟旅程对于我，还有我的读者，都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

而我在路程起点，就已经预期到这是一趟人性故事之旅。

人性。我们以各种辞藻美化监狱，仿佛那和医院一样是个纯净无菌的空间：“隔离”“矫正”“治疗”“行为管理”，住进监狱的人叫做“狱友”，他们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员”协助。经过美化，很容易忽视监狱的实际环境，忘记在里头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乃至于度过数十年或后半生的，是活生生仍会呼吸的人类。我想强迫自己和其他人一起注视囚犯，别转开眼睛，就像我们不能不看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和关塔那摩湾事件（Guantánamo）一样；那些丑闻是极其难得的机会，美国建立的“土牢”（oubliette）——在此借用14世纪的法文词汇，其原始含义是“被遗忘”——终于忠实呈现在大众眼前，司法体系毕竟源于人性，所以同样有瑕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点。

为了避免陷入只观望不动手的窘境，我开始自发去监狱做志愿者，不限于研究和写作，而是实地接触。大学提供12个月的休假研究，我申请了学术补助并结合媒体工作机会；这类媒体报道归在文化和旅游类别下，除了提供资金，也容许我探索监狱高墙外面的世界。由于司法制度和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我必须理解文化背景才能观察得更深入。监狱就像一面丑陋的镜子，是社会的黑暗面，也是最清晰的缩影，在监狱的日子好比是经过提炼浓缩、充满讽刺的人生。

针对要探讨的主题，我挑选了九个国家来说明。许多关于司法和监狱的基本概念，我们以往视为理所当然，实际接触以后却又觉得陌生困惑。在各种论坛或造势大会及报章媒体等等，我看到太多改革的呼声，出发点是基于经济压力或公共安全。的确，这些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因素。然而，关于监狱最基础的道德和伦理层面，社会是否有讨论过？这时候，我们应该退后一步，回到理论的草图上。我要再次质疑刑罚、救赎、宽恕、第二次机会这些概念，因为我是从那里起步而成为监狱改革运动者，所以希望能有更多人，更多民主制度下具备投票权和思考能力的公民，不只是关切这些问题，也挺身而出激发真正的改变。

也许我能将热情和好奇传染出去，大家一起成就更好的社会。

第一站，卢旺达。

---

1. 斯瓦希里语（Swahili）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为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编者注
2. 非裔美籍作家、诗人、舞者、演员及歌手。——编者注
3. 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anism）也译为拉斯塔法里教，因其主轴为黑人的基督信仰，主张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是上帝的转世。拉斯塔法里运动带动了雷鬼音乐的发展。——编者注
4. 口语中，“纽约上州”泛指除纽约市和长岛地区之外的纽约州。——编者注

5. 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画家、插画家，作品风格大半甜美乐观，呈现理想美国。——编者注

6. 第一理由为隔离犯人维护社会秩序，第二理由为惩罚犯错者。——编者注

1　报复与和解

卢旺达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杀人犯做朋友，就别与我们有牵连。

——受害人对修女海伦·培贞所言，出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致何等苦难，上天竟以爱情断除喜乐。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布鲁塞尔航空1027号班机在夜色中缓缓降落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国际机场，入境队伍短，美国籍旅客无须签证，出去后立刻看见我的行李箱安稳地躺在那里。佩戴高尔夫山丘饭店识别证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进车子以后，车子驶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的道路，朝市区前进。

饭店如其名位于山丘。涅卢提拉玛（Nyarutirama）区内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属高级地段。饭店的住房外观颇具郊区公寓风味，以黄褐色系为主调，但不知是否为了弥补过分单调的景观，许多地方都加上了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长颈鹿和部落传统壁画，房间钥匙绑在非洲大陆形状的皮革上。我要在这里度过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之所以挑选卢旺达作为监狱之旅的第一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狱政特别糟：27个国家平均之后，超过收容量达141%，全非洲大陆超过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至少100万人）尚未受审，换言之，某些国家牢狱内的人可能九成根本无罪。非洲各国政府不够重视司法，贿赂、吸毒、卖淫、强奸十分泛滥。1996年，各国代表团曾在乌干达集会，起草非洲监狱报告书，内容指出监狱对于遏制犯罪几无功效，其后又发表针对监狱环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监狱“不人道”、“管理人员行径恶劣”，结论指出，过度依赖监狱“对司法无正面意义，未保护公众，稀少的公共资源没有好好利用”。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要继续感伤，而是希望找到能透进曙光的裂缝。正因为非洲各国司法系统问题严重，所以存在积极改革的空间。危机就是转机。

而我选择卢旺达，其实是因为其他国家听见卢旺达三个字，脑袋里就联想到：种族屠杀。

被害者的国度

1994年卢旺达发生百日大屠杀，胡图族杀害约100万名图西族，手段多为利刃或钝器，这小小东非国家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卢旺达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会及经济繁荣收获声誉，但人们想起卢旺达，脑子里还是大屠杀。其实事件过后20年，卢旺达已是非洲新生的模范，在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下，商业竞争力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连续六年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长都达7个百分点，识字率飞跃提升，国民卫生每人每年负担低于100美元。

卢旺达之所以成绩斐然，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种族和解。文献指出，该国在屠杀事件后设立了“盖卡卡法庭”（gacaca）[注]，属传统聚落的司法制度，由小区居民集结并整理加害与受害者名单，但最终目的并非施以惩罚，而是裁决如何补偿。我也听说卢旺达的司法途径大概是回归了文化根源，鼓励的不是惩罚，而是宽恕与补偿。屠杀事件促使这个国家思考其社会支柱，审视监狱系统，甚至司法本质。

这里有几十万、几百万彼此存在弑亲之仇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但他们比邻而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相互体谅。以卢旺达为旅程的起点深具意义，因为关于犯罪的对话不应从犯下罪恶行径的人开始，虽然我们总是这样谈论刑事司法：是谁犯案？如何惩治？却忘记将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无论如何关切加害者，都不该淹没我们对于受害者的重视。因此，踏入监狱这个犯罪者的领域前，我必须先浸淫于被害者的国度，踏上其中巅峰，也因此首选卢旺达。

决定以后，第一步是调查卢旺达有哪些非政府组织与我目的一致，能够带我进入监狱。可以寻求的合作对象很多，因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该国当前的精神指标，许多非营利活动以此为主要诉求。浏览过诸多使命宣言后，我锁定其中一个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设定为大学学龄的屠杀幸存者，年纪在25岁以下，很多是孤儿。通过网络与该组织创办人联系后，我很快得知这些幸存者也想探访监狱，因为狱内八成囚犯的罪名与屠杀事件相关。年轻人原本就想发起探视活动，不过迟迟没有实现，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欢迎。

前来基加利，我的动机是与年轻幸存者合作，一同进入都是屠杀者的监狱一探究竟。探访行程为何，能有什么作为，甚至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等等问题，在旅程之初毫无头绪，但我还是来了，因为首次读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Never Again Rwanda，NAR）。

若说有一句话像咒语般贯穿我的童年，贯穿经历大屠杀的犹太人社群，就是这同样一句话：噩梦到此为止。我的族谱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战屠杀中丧生，或许这是个适合的切入点。

为仇恨埋下和平的种子

“在卡西卢大楼，美国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上，一个路口右转。”

为我说明地址的詹姆斯是当地人，身材矮壮，英文说得和卢旺达语一样好，因此成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出租车司机。

出门之前，旅馆经理塞了一把伞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头明明晴空万里。“相信我。”她这么说。

詹姆斯播放着牙买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专辑，他在牙买加的舞厅很红，歌词走粗鄙路线。

“卢旺达人喜欢情歌喜欢得过头了，”詹姆斯笑道，“太多爱来爱去，打开电台我就受不了。”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对面有间挂着红色灯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箱以蕾丝布做门面，旁边墙壁上用喷漆喷了些图案。我找到NAR组织的招牌，穿过光亮铁栅门走进去。办公室里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黄壁纸，只有一两张木桌子和几台过时的计算机，不见任何人影，“良知”的歌声从美容院那头传来。直到走进后面房间，我才找到执行总监艾瑞克·马荷罗，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系上领带，窝在座位上。见我进来，他腼腆地握了手并开口欢迎。

“要不要见一下计划负责人？”艾瑞克带我回到前面办公室，阿尔伯特·杜库祖穆瑞米已经站在那里。他的外号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岁，体型瘦长，动作显得慵懒，与那双锐利的眼睛不相衬。

我们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后，立刻切入正题，不过讨论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灵光，勉强能沟通。卢旺达在1994年以后才将英文课程纳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杀后的世代英文能力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卢旺达本身为非洲大陆上少数语言统一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同种语言，不像邻国肯尼亚数十民族语言各异。

桑托斯和我聊到卢旺达监狱的源流。当年德国殖民者引进监禁制度，1916年比利时接管后拘留所数量大增，形态则有所不同，当地称为单人囚室：非正式但用于拘留的小屋，里头有客厅、客房，甚至厨房，颇具隐私。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族政权以流氓或游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图西族后，将之关进囚室。

换言之，大屠杀事件以后，卢旺达没有足够的基础建设能安置超量的杀人犯，全得将他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到了1995年，囚犯人数超出容纳量5倍，拥挤的环境带来可怕的结果，数千人感染肺结核与痢疾，犯人真的必须一个叠一个，堆起好几层，他们又渴又饿只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后六周，基加利中央监狱死了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卢旺达中部大城吉塔拉马（Gitarama）监狱也在八个月之内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须睡厕所，还出现所谓“僵尸”（komeza，原意为“持续”）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入夜后只能走来走去的囚犯。

危机重大，卡加梅总统展现惊人气魄。“让犯人出去。”他直接这么下令。1998年，首先释放年迈的囚犯。2003年，一口气释放了2.4万人，包括重症者、参与政府推动认罪计划者、屠杀事件时未满14岁者。2005年，第二拨释放2.2万人。释放以后，人犯不拘禁在监狱，仍

旧要面对控诉，法律依据为1996年针对屠杀行为进行分级认定的立法。

面对惨况，司法正义如何实现？联合国安理会设置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找出要为事件背负最多责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诉，程序直到2014年才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卢旺达的法院系统也起诉逾万人，尽管2007年废除死刑，但之前已处决22人。

其余多数人则进入了卢旺达的伟大实验，也就是回归当地传统的司法模式。“盖卡卡”原意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进行审判和公听，过程完全公开，由社区选出的法官进行审查。听桑托斯描述时我还是难以想象：2006～2012年间，1.2万个“盖卡卡法庭”审判超过120万个案件，除了做出判决，更可以对悔意充分、想复归社会的人提供减刑。

殖民时代之前，“盖卡卡”裁决的多半就是补偿方案，补偿形式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肉体惩罚或死亡。屠杀事件之后，“盖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将犯人纳入2005年成立的40个巡回式“公共服务营”（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TIG）。大约有5.3万人被送入TIG成为公共服务人员（tigiste），他们以劳动服务作为弥补，造桥铺路、兴建校舍、盖房给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屠杀的幸存者。公共服务人员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须从家中往返，也必须读书识字，接受建筑技能训练、公民教育、认字学习卢旺达历史，并了解政府政策。TIG为卢旺达政府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又减少监狱人口达53%，囚犯人数减少到5.8万人左右，相较之前已经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数在全球依旧排名第七。卢旺达矫治署继续努力，并大胆提出将监狱由14座减少到9座。

通过与桑托斯深入对谈，我了解到这么多背景信息。他还表示NAR组织中的年轻人一年前曾经拜访公共服务营，可惜没有成为固定行

程，希望他和我合作的监狱探访计划这次能够持续下去。我打量着他那副坚定神情，脱口而出：“桑托斯，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

“我想，”他轻声以法语回应，不过很快又改成英语：“你们怎么说的？为卢旺达埋下和平种子。”

若非亲眼见证那诚恳至极的态度，我一定会以为是在演戏。

那天回饭店前，我请詹姆斯带我到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坚强些，”他笑着送我下车，“别哭哦。”这么说的同时他似乎笑了起来。

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

我确实哭得好惨。“卢旺达是个湖光山色、绿意盎然，又充满孩童笑靥的国度。市集里除了熙来攘往的客人，还有鼓手与舞者表演，工匠们手艺精湛。”导览的开场介绍完以后，就进入1994年惨绝人寰大悲剧的细节。虽然不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那样揪心，但同样精准到位。大屠杀之前已有许多小规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连串针对图西族的攻击，迫使数千人迁居邻国布隆迪、刚果、乌干达；35年后妇孺也成为目标，母亲们遭到强暴，还被强迫杀害亲生骨肉，或恶意传染艾滋病毒，也有铁链捆绑和活埋等等。走进儿童室，里面纪念“本该成就未来”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肠胃翻腾，例如“在母亲怀中被刀砍死”。

走出博物馆，饭店经理预言成真，艳阳高照的天气转为倾盆大雨。路旁牌子写着“请勿踩踏坟墓”，我看了又一阵啜泣。有个十几岁男孩面带笑容，正在为坟墓上铺盖的蓝色帆布清除积水。

“哈啰！你结婚了吗？”他竟然这么大声问。我不知所措，摇了摇头。“从哪里来的呢？”他继续笑着问，心不在焉地继续清理坟墓。

“纽约。”我嗫嚅回答。

“美国人啊！那你应该蛮有钱的。”男孩这么叫道，掀开帆布一角：“你是来看坟墓的吧！”

我耗尽全力忍着没呕吐。底下是个坑洞，里面塞满颅骨，几乎要满出来了。数万颗骷髅头像棒球一样堆在里面，一个个人头，一条条生命。

茫然离开以后，我心绪混乱。刚才的少年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如果我要对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猜测其种族，这公平吗？桑托斯忍受的是什么处境？

我究竟该如何面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

也许该让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发霉腐烂才对。

我晃进纪念品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卢旺达文和斯瓦希里文三语对照的语言学习书，另一本是《我们幸存于卢旺达大屠杀：28位见证者》。

“你穿黑色！”为我包装书本的男店员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欢粉红色。”

走出大门，詹姆斯看见我买的书，叫道：“选得好！”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双亲，然后逃到南非，进入肯尼亚医学院，到银行上班，但觉得上班族生活无趣，于是回到卢旺达做出

租车司机。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没想到看上去这么乐天的人也是大屠杀受难者，我暗忖哪里还需要手上这本书，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过纽约的人脉认识艾迪，他是演员也是社会运动人士，穿着剪裁合身的黑色牛仔裤、皮夹克，戴了墨镜，来到高尔夫山丘饭店。“欢迎，”他立刻伸手，“你应该认得我吧？”

“认得你？”

“电影啊！”艾迪摆了姿势，双臂交叉，一脸剽悍，之后忽然爆笑。

啊，没错，他在我朋友拍摄的电影《所有卢旺达人》（*Kinyarwanda*，肯亚旺达，卢旺达的旧名）中饰演狱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杀所拍摄的纪录片。

我们开车绕进市区，周边风景有三个主色调：橙红大地，翠绿山峦，奶油色房屋。下过小雨，空气清新，路面还很粗糙，没有多少汽车，只有计程摩托车来回穿梭，险象环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办，我就一路跟着，拜访了一个促进和平的社运组织，一个标志上写着“和平、善行、爱国”的年轻人社团和一所学校。他搬了些捐赠书籍进入校园。

“贝兹，你有没有领薪水？”回程时他问起。艾迪有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习惯，就是思绪变换太快，前一分钟嘻嘻哈哈，突然间就神情凝重态度严肃。我回答有。

“我没有，每天就是奉献与捐献。我本职是作家，但是也挺爱演戏的，除了我老婆，我就最爱这两件事。”艾迪写了一本书，是诗

集，书名叫做《他们的罪行是我的耻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胡图族。

“很多人为屠杀幸存者写书。”他解释，“不过迟迟没人为犯罪者发声，为没有杀人但因此染上污点的人发声。我们活在耻辱中。”

这番话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上课时也会给学生看一部名为《判决之后》（*Beyond Conviction*）的纪录片，剧情讲述三个犯罪受害者选择与犯人对话。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药的兄长强暴，两人会晤过程令人纠结。她逐步揭开心上疮疤，哥哥也惭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无法直视妹妹。最后，在妹妹请求下，他终于抬起头。妹妹过去给他一个拥抱。我视线被泪水模糊，画面上那难以想象的大和解太过震撼。妹妹说她已经原谅哥哥，只有宽恕能够治愈伤口，帮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学着原谅自己。

我向学生提出一个残忍但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如果必须选择，你希望是这案子里的哪一边，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大家直觉表示，当然是加害者，谁愿意被害？我追问，大家真的确定吗？愿意一辈子背着那个十字架，永远记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呕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以余生来背负，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义，不假人手的监狱。被害人经历梦魇，但在梦魇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较之下，有自觉的犯人要终生面对耻辱。

我来卢旺达的时候也带上了一本《判决之后》，以及许多关于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书籍，原本以为参访监狱时能派上用场，却决定下车以后全部送给艾迪。

给他们重生的机会

“你愿意谈谈大屠杀吗？”

今天与监狱参访团体会晤，问题清单上，第一条就列着这个问题。其他包括：“为什么参与？”“对于刑罚有何见解？”我很紧张，当然紧张，因为自己是个白人。尽管以前的工作接触过监狱或年轻族群，但毕竟局限在美国。这里是卢旺达，一个经历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

我抵达NAR组织办公室时，学生们尚未露面，柜台有位秘书叫格蕾丝，20岁，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显然YouTube比较有吸引力，还好我说出关键词。

“你是作家啊。我也好想当作家。”

很快就敲定了由她为我写几篇短文，一方面她要练习英语写作，另一方面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世代。

“这个世代？”她反问，几秒钟后反应过来，“喔，你是说大屠杀对不对？”格蕾丝的语气像是没当成一回事：“我父母也死了。”

即使语气如此平淡，那句话仍可谓掷地有声。后来我从团体里15个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样回答，父母双亡这几个字不断翻搅我的思绪。

开始自我介绍。有位NAR人员协助翻译，但听起来五个字变一个字，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大半内容。我交代了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和“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工作历程，也提到每个月带一批大学生进入监狱里面，与受刑人共处一室上课。这种学习交流活动对双方都造成很大冲击，受刑人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普通”学生，而普通学生则讶异于受刑人与自己比想象的更相似。卢旺达青年听完后竖起耳朵，我们也想见见受刑人，他们说，干脆申请一个Facebook账户好了。

我接着询问学生，进入监狱以后打算做什么。他们望着我，忽然沉默了。桑托斯跳出来，表示他不打算讨论大屠杀，所有人对这话题已感到疲惫。他们不想停留在罪行上，而是希望释出善意，达到和平与谅解。这个意见在学生间发酵，可是当我进一步询问：那么到底打算做些什么？他们还是沉默。

我说，写下来吧。什么语言都没关系。

这招见效。大家马上动笔列出建议：足球、唱歌、跳舞、辩论会、电影欣赏、短剧表演。我们下一次开会时投票表决，挑选每月一次的参访行程适合安排什么活动。之后也为这个计划取名：“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的监狱访问计划（Never Again Rwanda's Prison Visiting Project），英文缩写NAR's PVP。青年团体与和平组织最喜欢很酷的代号。

星期天，桑托斯刚从教堂走出来，服装相当体面，而我只有牛仔裤和球鞋。与学生团体见面前，我们两个坐下来讨论如何遴选参与活动的囚犯。我写下“回归”（reentry）一词，在监狱里面常常有人提，意思是服刑结束，准备回家。桑托斯用力点头。

“对，贝兹，我们应该挑那些要回家的人。”他看着我，眼神有点羞赧：“我可以问一件事吗？‘贝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这只是外号，是小时候姐姐们取的，其实我的本名是出自《圣经》的“芭丝谢芭”（Bathsheba）[注]。

“是个女王！”他叫道。

我开玩笑说那女王的风头总是被大卫王抢走。大家记得大卫，却不记得大卫的妻子、所罗门王的母亲。“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七的女儿’或者‘好运的女儿’的含义。”我又说。

桑托斯听了很高兴，拿了我的笔记本，用大写慢慢拼出一个词：“UMUNYAMAHIRWE”。

“这是你的卢旺达文名字，”他说，“好运的女儿。”

后来学生慢慢到了，也是进教堂的装扮。里头英文说得最好、个性最大方的尤金凑近，他说他母亲在距离基加利市两小时车程的沙隆村一间孤儿院工作。琼与娜塔莉两个人坐在角落有说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许多成员目前都就读于基加利大学，主修商管和经济。

开会了，学生又开始怯场，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译也显得零零落落。我们还卡在探访行程要搭配什么余兴节目之中，不久后我完全置身事外；进入民主程序，每个人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桑托斯只能偶尔抽空告知我共识是什么。访视有一部分是座谈，以小组形式讨论时事，他们挺喜欢我的建议，也就是缩小小组规模，确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合。这是我在美国实行的技巧。

气氛活络起来，学生开始为小组讨论设定主题，桑托斯提议“如何维持本国和平”，去年参观过公共服务营的领队马修听了却眯起眼睛。马修之前没空来开会，这天第一次出席，直至此刻发言不多，却忽然吐出一串英文，而且冲着我来：“哪有办法和这些罪犯、这些种族屠杀刽子手探讨如何维持国家和平？”

仿佛有只大象迎面撞来！

“罪犯”。“种族屠杀刽子手”。这些字眼至今都掩埋在漂亮的场面话底下。“和平”。“宽恕”。

所幸桑托斯出声，接着他们继续讨论，也起草一份企划书。事后，桑托斯告诉我他如何一席话镇住冲突。

“我跟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去监狱探视，是因为我们希望放下恩怨，给他们重生的机会。’他们总有一天会出狱，难道我们希望这些人依旧愤怒、充满仇恨？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村子里。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是回归。”

我不禁自问：像桑托斯这样的人，只是我想象的幻觉吗？

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

之后几天，我越来越习惯基加利的生活。“世界迎接基加利”，高尔夫山丘饭店出去的路上有块海尼根广告招牌，广告牌上写着这句标语。没错，世界各地都有人来这里，大半是志愿者，在饭店和市区店家都能遇见。有个医生也是纽约来的，此行目的是要训练卢旺达人使用超音波仪器。荷兰来的新朋友想推动当地女性微型贷款。另一位加拿大籍索马里医师看中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下午我多半待在NAR，晚上则和朋友出门。早上习惯在饭店房间阳台和电脑约会，享用气味醇烈的卢旺达咖啡并阅读当地报纸。每天都有至少一则屠杀事件的相关报道，例如某人提出反屠杀理念的法律修正案，又或者追踪琼·文肯迪案的后续发展。琼·文肯迪（Jean Uwinkindi）原是牧师，却夺走数千人性命。在卢旺达，1994年仿佛只是昨日。

除了NAR组织，我也试着融入当地文化，主动与音乐工作者接触，或者与每个遇见的人聊聊音乐，否则没有材料能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做专题。果不其然，音乐是另一条倡议和平与和解的管道，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歌曲正向积极，不涉及政治、种族屠杀或者类似的沉重议题。

“爱。我们歌唱的是爱。”外貌和言语一样沉静温和的非洲节奏（Afrobeat）音乐人卡米基说，“我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但是该把它放进歌曲里面吗？那样做只会让自己发疯，何况有谁希望动不动就被挑起那段记忆？”

连饶舌歌手也一样。虽说饶舌音乐言人所不敢言，歌手们仍旧表示不希望音乐和政治挂钩。没有任何地方比卢旺达更明白沉默的力量，在这里提及种族议题，说错一句话就是莫大罪过，因为不久以前对其他种族的批判导致了那不可说的惨剧。

“言论自由有可能走火入魔。”卡米基又说，“屠杀事件发生前，大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大约100万人遭到杀害。回顾过去，显然有些话不该挂在嘴边。”

的确，时至今日仍有知名音乐人士因为创作反图西族的歌词而遭到起诉，卢旺达坚持以法律捍卫反种族屠杀的理念。屠杀事件过后，卢旺达成立国家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下设置国家团结教育营（ingando），获释的囚犯在接受“盖卡卡法庭”审判前得先在那里度过几个月，深入理解卢旺达政府宣扬的和平、团结、和解及反报复的理念。直到现在政府依然鼓励各行各业的百姓，无论学生、政治人物、教会领袖、娼妓、退役军警或屠杀事件的加害者以及“盖卡卡法庭”的仲裁员，大家都可以抽空去团结教育营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

有人认为这是洗脑，是政治操弄。我也试着化身怀疑论者，从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来分析，仔细剖析每个人说的话，想找出思想钳制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发现在屠杀这脉络下，“洗脑”未必负面，教育和灌输的分界本就模糊。就卢旺达历史而言，对照眼前的和谐宁静，如果他们借此塑造出和平的国家氛围，对言论自由的少许限制和审查是否罪不可恕？

我们的计划有了重大进展。NAR的艾瑞克和桑托斯明天要带着我起草的提案说明前往矫治署。

“不过你别跟着比较好，”艾瑞克说，“承办人员看见你可能会紧张吧。”他迟疑一下，心里在想这个美国教授是谁，到底要干吗之类的。

我点点头，表示无妨，就留在这里等好消息。

后来在波本咖啡厅，也就是卢旺达的星巴克，我和艾迪的死党伊斯梅尔聊了起来。他和艾迪一样从事艺术工作，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叫做《离异》（*The Divorce*）的影片，内容述说他和他父母那一辈的隔阂。与艾迪不同，伊斯梅尔同时是伊斯兰教徒和屠杀幸存者。

“我挺喜欢你们的计划。”他点点头，长睫毛底下眼神柔和：“假如是我去监狱，也不想看见一群愤怒苦闷的人。他们迟早要回家，带着愤怒苦闷回到社会不是好事。”

伊斯梅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想制作那部影片，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不能像老一辈那样执着于大屠杀。他说了些童年故事，我的脑海里也满是回忆。十一岁那年的“灾难日”（Yom Ha Shoah），也就是犹太屠杀纪念日的前夕，隔天是希伯来学校的大日子，所有人必须穿上一身黑，普通课程全部暂停，每节课都换成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座谈或影片。整点时，各种活动中断，聆听校长通过广播念出一串名字，是死去的学生亲属，以及他们死前所属的集中营。我们家在整理名单时，父母为了谁在哪里被杀还起了争执。

“不对，不对，雷切尔·苏拉是在奥斯维辛，不是布痕瓦尔德。”

“我要留在家里。”我大声说。

父亲转身瞪我。

“我没有黑色衣服。”我继续说。

“你没衣服？”他咆哮，“你知不知道同胞们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结果你在意的是自己没有黑色衣服？”

我很清楚，太清楚了。600万个鬼魂盘踞我家。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我噩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因为我小时候母亲一直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原声带。我祖父也仿佛无所不在，他在大屠杀中失去整个家族，于是训诫我们千万千万别踏上匈牙利，因为匈牙利人比纳粹还要狠。那个国家的土地里全是你们的血，他这么说。我数得出祖父笑过几次、抱过我几次，却数不清他几度在安息日餐桌上操着意第绪语和父亲大吵，或讲过几次一模一样的故事，也就是匈牙利的纳粹同路人将曾祖父拖出犹太学校，在街上活活打死。祖父的表妹是家族中唯一从集中营生还的人，后来住在我父亲那里。她的故事我也听过太多遍：双胞胎兄弟没逃过一劫，她靠脑袋灵光加上运气好保住一命。长大以后我去欧洲，要进德国还得说谎瞒骗父母。列车穿越边境时有股罪恶感哽住喉咙，那种感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对大屠杀，我只觉得疲倦。

“疲倦”不足以形容。应该是“精疲力竭”，“阴魂不散”，“遭到奴役”。理智崩坏的氛围充斥在家族间。我将童年记忆说给伊斯梅尔听。从他眼神里，我发现或许他比我自己还清楚那是什么感受。

“好多次我宁愿自己成为受难者，干脆别活下来。”他老实说，“我知道能活着就很幸运了，但并不希望一辈子以这个身份活下去。我是历史事件的幸存者，却不是人生的幸存者。为什么不让我好好享受生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伊斯梅尔的声音缓慢且颤抖：“亲

人没办法替换。我当然无法找人取代爸爸妈妈，不可能。但事实就是我已经失去父母，所以谁来代替他们照顾我？是国家。那么，让我好好活在这个国家，让我享受还存在的一切。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也不想总是躲在房间里哭哭啼啼。我想好好活。”

刑罚是回头看，而宽恕是向前看

第二天，我系好iPod出去晨跑，外头风景如画。这片橙黄大地如此丰饶，路旁女性兜售陶器与艺品，搭配色彩鲜艳的狮威啤酒（Skol）广告。但伊斯梅尔那番话萦绕我心头。

他和我祖父两个人都是经历苦难活下来的。我跑着跑着泪流满面，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自己多么同情祖父，为他，为我们失去的一切感到悲痛。伊斯梅尔和我祖父同为生还者，却有截然不同的灵魂。

“人对待人是如此不公。”鲍勃·马利的歌声在耳边响起。

我脑袋里又闪过另一段童年记忆，是普珥节（Purim），庆祝古时犹太人逃过亚哈随鲁王（King Ahasuerus）大臣哈曼意图种族屠杀的阴谋。那时家里堆满礼物篮，里面满是食物、红酒、葡萄汁。父亲在客厅读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给大家听，按照犹太传统，每次念到哈曼的名字，我们就要制造噪音盖过去。念到哈曼恶计被揭发，与十个儿子一同被吊死的桥段，父亲得一口气念完，以强调犹太人复仇得胜的光彩。

时至今日，我想问的是：复仇是光彩的事？别人伤害你，于是你伤害回去，这种光彩难道不是伪善、冤冤相报吗？时常有人以“威慑”来诠释司法制度行使暴力，问题是已经将230万人扔进监狱，犯罪问题却迟迟未有改善。司法上的功利观点，以犯行者的人生满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安全），看在犯罪学者戴德丽·格拉什（Deirdre

Golash）眼中，完全违反道德伦理。“可以要求犯行者弥补受害者，”她在著作中说，“但不能声称为避免犯人再度加害，于是反过来先加害他们。”

为了解决惩罚概念造成的困境，我研究格拉什的思想好一阵子。关掉iPod，往路旁一坐，我从脑袋里的数据库提取出许许多多与刑罚争议有关的文字。说是争议，正如社会学家戴维·布宁（David Boonin）的精准描述：“国家机关对某人做出的处置手段原本不符合道德标准，但为何因为此人违反所谓公正合理的法律，就会使得国家机关采取的手段变得符合道德标准？”监狱在多数人眼中是报复。然而，若矫治合理，报复是否也合理？另一位思想家塞内加（Seneca）出来发声。“‘报复’是抽离人性的词，糟糕的是多数人视其为正道。报复的本质与犯罪无异，只是先后顺序不同。”他这么解释，“以暴制暴就是犯罪，但比较容易找到借口。”

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他形容刑罚是“社会定义为合法的集体暴力”，而犯罪则是“被定义为非法的个人暴力”。“刑罚不具预防或抑制的功能，反倒会激发未来的暴力。”

总结而言，刑罚永无止境，只会一再反复。刑罚起源于无力感，目的是角色对调后再现痛苦情境。在刑罚过程中，我们迎接罪恶，并赋予它控制心灵的庞大权力。刑罚是回头看着过去，而宽恕是向前看，消弭暴力循环，帮助我们不再受制于加害者造成的影响。因此有一句谚语说：争端止于宽容。

我起身，转头，朝山丘跑回去。

伊斯梅尔和我祖父。一个人浑身散发出放下之后的自由和平静，另一个执着要全世界陪他一起伤痛。许多研究提及宽恕对人有益，心存仇怨则健康受损，现在我亲眼证实了。

后来几天还是没等到NAR组织取得参观监狱的许可，同时我焦急地观望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一家叫“洗车场”的餐厅里，我和朋友诺琳加入了大选守夜派对。来到卢旺达的第二夜我就与她结识，那天诺琳和一群来协助本地航空公司发展的外籍人士到这儿小聚。才24岁，又是基加利本地人的她，踩着高跟鞋、穿着无袖背心裙在夜色中露面，那模样让人以为自己看见海市蜃楼。

今晚诺琳喝多以后，说起自己的故事：父母信仰基督新教五旬宗，禁止她阅读《圣经》以外的任何书籍，家中也不能有世俗音乐。诺琳一家是图西族人，1994年之前的小规模屠杀事件中就逃往乌干达，还改名换姓假扮胡图族。多年过后，他们与将近50万受迫害的同胞回归，却发现亲族几乎灭绝。

诺琳说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口吻好像在描述刑期：她常常锁在房间里大哭，盼望自己有个正常的人生。好不容易她获得加拿大一所大学奖学金，兴高采烈地过去了，又讶异得知自己是方圆几里内唯一的黑人。她觉得遭到排挤，孤单寂寞，罹患严重忧郁症，沉溺酒精与药物，最后只好回国，可是依旧不肯与双亲同居，选择在国内大学完成学业。

听诺琳敞开心胸，我却暗自沉思所谓“受害者”三个字是不是太过简略，足以误导思考。想到受害者，我们以为罪行是单一的，但事实上，一桩罪的影响会向外扩散，波及周边每个人，乃至于家庭和小区，伤痛在整个网络中流窜。

“有一段时间，我想杀光所有胡图人。”诺琳自白道，也表示自己还是常常觉得愤怒，即便没有明确原因。有几次，晚上喝得太醉，被人踩到脚就会破口大骂对方是“他妈的死胡图人”，然后被店家找人给架出去。疗愈之路还很漫长。

愿大地永远和平

隔天醒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CNN报道美国总统仍是奥巴马，但艾瑞克转述："卢旺达矫治署说不行，这计划不可能核准。"程序使我们精疲力竭，我们的做法使矫治署官员觉得自己被轻视了。我们不应该吩咐他们应该怎么做。这里他们说了算。我们应该求他们，而非吩咐他们。我听了很沮丧，行前艾瑞克还担保没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准。

"让我和玛丽谈谈看？"我拜托道。玛丽是矫治署署长。艾瑞克表示他试着安排双方下午会面。

关上笔记本电脑，我拿了钱包去拜访一位"上帝的琼"（Jean de Dieu），他领导的组织是"平安：和平教育"（Shalom：Educating for Peace）——从人名到组织名，都在暴露希伯来文化背景。我一开始就担心遇上阻碍，所以持续追踪本地从事监狱改造服务的单位。琼与我在卢旺达随处可见的自助餐厅共进早餐，他笑起来露出大大的齿缝，一边笑一边介绍自己的背景。与许多人相同，琼目前靠这市场为生，至少是有此打算。他在南非取得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司法、和平与反贪腐行动之间的关联，于是成立组织针对这些领域给年轻一代提供课程。后来我得知琼是"混血儿"，母亲是图西族，父亲是胡图族。他妻子同样是两族通婚的孩子，在1994年失去母亲，与兄弟们躲在地下室好几周才幸免于难。

"要不要参观和平村？"琼问。我说好，但压根儿不知道和平村是什么地方。

琼开着1981年的丰田汽车载我上路，车子外观和声音不像能熬过山路，而鲁林多省（Rulindo）距离基加利还有两小时车程。路上接了鲁林多的代表塔西斯先生以后，车子走走停停，最后抛锚。两人连声

说无所谓，车子停路边改搭公交车就好。我听了背脊一凉，但他们异口同声表示一定来得及让我回矫治署去见玛丽。

我们上了一辆贴满切·格瓦拉图像的小巴，我差点儿被挤得坐上乘客大腿。路上风景美得令人惊叹，道路往山林高处绵延进入一片碧绿。巴士开进森林空地，周围松木嶙峋，鼓声流泻相迎。

约莫300人聚集于此，他们坐在地上，身着宽大T恤，披着鲜艳布幔。前面几张椅子上坐了三个男人，一身松垮西装，头上却戴着牛仔帽。看来村民们早已等着客人，一看见我们就唱歌鼓掌。我也跟着拍手，然后勉强听得出一个字，“amahoro”，“和平”的意思。琼凑到我耳边翻译：“和平，团结，和解。埋葬种族屠杀思想，将它烧毁。”

“这是村民集会，”他继续耳语，“他们正在计划官方和解周的活动，时间在这个月底，塔西斯过来督导。”我点点头。

“他，”琼指着正在发言的年长村民，“正在说明村子的计划，包括种树、准备食物，还有庆典。”

轮到塔西斯发言，他强调良好治理的价值，讲了很久还没讲完。琼偷偷翻了个白眼：“这些政治人物啊。”

忽然有十几个村民起立，其他人拍手喝彩，之后他们又坐下。

“那些人刚刚正式获得饶恕。”珍解释：“他们已经做完补偿，所以得到原谅，永远受到村子欢迎。”

我听了一愣。19年前这个村子像是屠宰场，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方厮杀。如今通过认罪与补偿，加上众人齐心推广和平理念，竟然就能和谐共存。

“接下来换你哦。”珍提醒。连我也要？“是传统，有外籍人士来村子的话，都得讲讲话。”

对这种活生生的奇迹，要说什么好？先说句murakoze吧，这是感谢的说法。

“这位是琼恩吗？”有个村民大声问。不是，琼代答。

琼恩是另一个白人，上个月来过。

我在心里怀念祖父，真希望他的魂魄可以来这块圣地看看。接着我告诉村民们，从比较遥远的关系来看，我也勉强算是所谓的受难者、幸存者，而来到卢旺达之后，我有许多感悟，因此我对于自己的先人们有了前所未见的同理心。我从小到大的感受都没有此刻这样深刻。宽容、和平、温暖，这才是爱。与我家客厅那种无止境的悲苦哀痛不同。那里传承的伤疤永不能愈合，没有罪人可以像我方才所见，起立接受大家鼓掌。对以前的我来说，那太过奢求。

真希望我自己的国家如这小村子般懂得宽恕之道。美国酷爱刑罚，仇恨心态化作数百万座牢房。监禁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托克维尔及古斯塔夫·博蒙（Gustave Beaumont）1831年到访美国以后，对于监狱人口数大感惊叹，直说监禁已然是美国的国家仪式，被视为“治疗社会败坏的特效药”。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说：“宽恕万能的社会将会冷酷无情。”然而刑罚万能的社会则野蛮残忍。美国文化灌输我们的并非宽恕，而是将报复当作正义。

我感慨自己家乡的社会支柱与此地不同。支柱在这里实实切切：集会结束后，琼和我一起摆姿势，站在村里的和平纪念柱前面拍照。它竖立在集会场中央，上面写着“Amahoro N'aganze Kw'isi Hose”，意思就是“愿大地永远和平”。

傻子才能笑看牢狱

回去的路上尘土漫天。我和塔西斯、琼在公车站附近的自助餐厅用餐，赶回矫治署之前塔西斯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一段话：“Umugabo mbwa aseka umbohe”。

“卢旺达的古谚，”他解释，“意思是‘傻子才能笑看牢狱’。你这段旅途会很辛苦。”

时间有些紧迫，我回到NAR组织与桑托斯会合后，搭乘小巴再度出发。迟到了，所以我们快步登上阶梯冲进混凝土大楼。“正义，矫治，知识，生产”是矫治署门口的题词，我觉得听起来极度先进、追求效率，换句话说就是非常具有当代卢旺达风格。例如BBC曾经报道过，卢旺达有“粪便发电监狱”这类基于创新思维的设计，有些监狱75%的电力依靠人类排泄物。

“没有身份证件不能进去。”门口一位严厉冷漠的女士拦下我。

“拜托通融一下好吗，我们得进去开会。”我哀求道。桑托斯淡淡说了一串卢旺达语，我挤出甜美笑容尽量压低姿态。

那女人终于妥协。又爬了一段楼梯，进入办公室等候。房间里面有一幅大型的卡加梅总统肖像画。

我解释之前通信时就提过的计划动机，可是署长玛丽听完后表示：“这里不是这么做事的。”接着她语气强硬，“这个计划我无法核准。”

桑托斯身子前倾想要讲话，我出面打断。

“没错，您说得对。”我附和。桑托斯看着我，神情不解。“你们有你们的程序，有所逾越是我们的错，很抱歉。”然后我取出约翰

• 杰伊学院的名片，放在双方中间那张咖啡桌上。

“不过若您有机会到纽约，还是希望您能抽空来我们大学看看，向教职同仁说明贵矫治署惊人的成绩，毕竟您已经是这领域的权威。”

玛丽拿起名片仔细看了看。“约翰 • 杰伊，”她喃喃自语后望向我，“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对吧？”

“是美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顶尖，因此很希望您也能到纽约参访。”

“约翰 • 杰伊……”玛丽又自言自语。

其实之前我就说过好几次我的背景，连请求函上也注明了，但显然直到此刻，名片拿在手里，她才真正注意到。玛丽迟疑一会儿，接着奇迹出现。

“让这位教授进去吧。”她对助理说，“无关加害或被害，也不是单一个人的创伤，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也是凝聚社会整体的力量。”玛丽忽然这么说，桑托斯听得瞠目结舌。

“你们的计划也着重在社群重建，十分有意义。好，我们会让教授和学生进去，时间定在星期五。”

“不好意思，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明天？”我恳求说，“因为非常不巧，我星期五就得搭机返国。”

“可以，没问题。”玛丽带着助理出去，进入另一个房间。桑托斯盯着我，神情夹杂着迷惑和敬仰。

“真是太棒了，贝兹。我觉得很……很感动。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做到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虽说很开心事情有所进展，却不免觉得可悲。关于监狱，关于生死，这些决定可以如此任意。在美国，我也亲眼目睹过无数次，假释通过与否决定了学生未来，但是为何通过或不通过，并没有清楚合理的说明。除了学术地位，我在卢旺达没有任何管道或理由能促成这计划；在纽约的学生西奥也一样，服刑22年期间表现良好，已经确认获释之后会有工作，还能以体保身份进入大学，加上他是三个小孩殷切期盼的父亲，除此之外，确实没有任何理由了。但他的假释案没有通过，再犯记录明确的斯蒂芬却能出狱。“罪行性质考虑”，假释审查委员的决议书上只有冷冰冰的这样一句话。

回来时，玛丽手上拿着主管机关的正式授权书：

> 根据NAR组织于2012年11月5日送达卢旺达矫治署之请愿书，于此许可贵单位11人团队参访卡萨博（Gasabo）监狱，以期协助全国监狱狱友复归社会。贵单位之代表团可于一般会客时间进入卡萨博监狱。

将他们视为人，人与人才能和睦共处

隔天到了NAR组织办公室，行程已经规划完毕，桑托斯打印分发。学生们开心谈笑，帮忙将一箱箱饮用水搬到车上。

“就是今天。”他向我打招呼，身上穿着白色POLO衫，背面印了NAR组织的标语：“充实青年成为活跃公民。”

40分钟后，我们抵达目的地。卡萨博监狱的外观是方正砖造建筑，围了刮刀式刺网，有一座类似角楼的哨塔，居高临下看着基加利

郊区的小巷，整体有种中古欧洲风味，与纽约上州的监狱相仿。我想这并非巧合，非洲监狱本就源于西方殖民，16世纪时沿岸地区的碉堡军营中设有拘留所，提供奴隶交易时的禁锢，以及帝国侵略部队的规训惩戒之用，并且维持到18世纪80年代。

20世纪早期，非洲大陆建置监狱时依旧模仿殖民时代的设计，重心放在控制，还有阶级的塑造强化，所以有许多隔离空间极富戏剧氛围，一具具黑色躯体被关在里面遭到践踏羞辱。监狱外观无声中道尽千言万语，西式高楼整齐排列，用意是教化里头的野蛮土著，因此他们必须被塞进拥挤的牢房。我眼前这座监狱是典型西方霸权的象征，即便殖民时代的主子们离去了，却留下伤口持续发炎溃烂。

穿过正门的路途轻松自在，而且狱方准许我们使用摄影机和移动电话，不过要先在办公室等候进一步通知。学生们依旧活泼谈天，情绪平和。墙壁上有一幅裱框的卡加梅肖像、标示监狱所在位置的地图、说明管理层级的表格，以及黑板上列了好几串数字。艾瑞克和桑托斯与官员交谈，我听见几个英文单词："到此为止""种族屠杀"，以及"重建和平"。

一位监狱管理员前来接待，是个很有朝气的女性，进来以后堆满笑脸说："贝兹教授，非常欢迎。"与我握手以后她指着黑板，解释数字4528是当天狱内的囚犯人数。

接着她带我们走出办公室进入监狱，绕到一栋像工厂或者说车库的楼房。路上遇见一群群囚犯看似在散步，但都没有正眼瞧我们。囚犯身上的制服颜色鲜亮，已判刑者是橘色，等候审判者是棉花糖一样的粉红色。气氛平淡，不像美国监狱仿佛时常从暗处透出鬼祟的视线。

有大约100名囚犯安静坐在木头长凳上，有些看起来才20出头，也有一些过了中年。我们在他们正对面就座，艾瑞克拿起麦克风开始介

绍，一直重复“murakozes”（感谢）这个词。

接着是唱歌和鼓掌。一个卷发、英俊、穿着卡其色制服的帅气狱警出面，他先自我介绍叫做罗尔夫，表示今天担任翻译，会一直在我耳边低语。

“我们为爱而来。”桑托斯说完引来一阵拍手：“今天我们想与大家谈谈时事，关于性别这个议题。两性平权究竟是什么意思？”

之后讨论颇为热烈。学生们轮番上阵，但看得出来都在桑托斯指挥之下，而且他表现相当好。我很惊讶原本沉静的他可以变得这样健谈活泼，是个十足的领导者和老师。

“国家可不可以交给女性领导呢？”桑托斯问。

“不行！”有个囚犯大叫，“之前这监狱就是给女人管，换成男人做主以后好多了。”

“女人太情绪化了，怎么治国！”另一个囚犯嚷嚷。

有很多异议。

“胡说八道，男人和女人都会情绪化，”我左边一个囚犯也加入讨论。会场气氛热络，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自在，能在场见证是种荣幸。学生带领囚犯分小组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你的枪呢？”我问一旁的狱警。

“我们不带枪。”罗尔夫这么回答。监狱里几乎从未出过暴力事件，秩序倚赖囚犯自治团体维持，他们选出主任与分区管理的小组长。罗尔夫笑说，其中一区被大家戏称是“得克萨斯区”，因为那边的囚犯比较有钱。负责维护安全的小组长的正式职称是监察员，有了

他们以后，狱警连进入监狱的次数都降低很多。选举定期举行，小组长通常是种族屠杀事件的犯人，教育程度并不低。事实上，种族屠杀罪犯整体的教育水平较高。

老实说，看着这群囚犯的时候，我仍旧下意识回想到那天看到的头骨。有100万这样的人。接着我脑海闪过：尸体、强奸、砍刀。他们杀了人，这些人是凶手。可是眼前所见的事实是，彼此同为人类，而且面对着逃过自己迫害的幸存者也能表现得如此和善合群；幸存者也大方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的脑袋和心灵都困惑了。

“美国的监狱比较严苛？”罗尔夫问。我点点头。“听说那边不给囚犯用网络？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确实如此。他听了很惊讶，接着告诉我在卢旺达这边，存在一种监狱经济，囚犯从事诸如洗衣之类的劳务或生产商品，大半接得到外界提供的工作，可以留下收入的一成自用。

“囚犯可以出去工作？”轮到我大吃一惊。

“当然啊，”罗尔夫那表情就像在说你这傻白人，“我们还和他们一起打球，彼此之间没什么分别。”“最大的区隔，”他指着自己上半身，“就是衣服不一样而已。”

“可是，”我忍不住了，“应该也有狱警是屠杀幸存者？要他们和囚犯平起平坐，不会很煎熬？”

他又瞪着我。“不会啊，”罗尔夫语气肯定，“不就是你们所谓的……宽恕？”我可真是个傻白人。

我哪有这么无知？潜藏心中的那个愤世嫉俗的纽约人浮现，我开始寻找卢旺达这套和平假象的瑕疵，认定底下藏着贪婪与自我中心。我找了又找。宽恕？即便尚未看到卢旺达全貌，也许他们的社会依旧

分裂，“盖卡卡法庭”有问题待解，政府过度干预言论，每个人都被思想改造了才总将宽恕挂在嘴边——但事实上，我目前所见的成果太过惊人，就算只是表面功夫，仍难以否定其价值。行为心理学告诉我们：说了无数次“宽恕”，我们真的就能将宽恕融入生活，一直提倡刑罚反而会陷入混乱深渊。

小组讨论结束，各自发表心得，又是轮番演讲、握手，双方都笑得开心。意犹未尽，但时间很快到了。

“我们还有很多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告别时罗尔夫和我多聊了几句，他觉得美国的高科技安保措施以及官方监禁程序都很棒：“希望你在这里也有收获。”他可真是太妄自菲薄了。

志愿者团队走出监狱，旁边一群群穿着制服的囚犯没有大惊小怪。一个女学生冲过来挽起我的手臂，看起来乐坏了。她说这次体验很好，十分期待下次机会，也希望能与囚犯有更多相处时间，她觉得他们聪明、有趣，提出很多创意想法。

“这一趟真的……嗯，好棒。”回程车上，另一个学生也笑得开心：“看得出来他们同样很雀跃，小组讨论的时候非常有想法，脑筋都很好，我也跟着兴奋起来。其实我们可以从人犯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回到办公室，桑托斯也有所感慨：“我们要更努力创造美好的世界。这也是重建和平的过程，确保监狱里的囚犯就像外界公民一样是人类，这样等到他们回家，人与人才能和睦共处。”

桑托斯是真实的人，这里的学生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是种族屠杀的幸存者，刚刚进监狱探访的是屠杀事件的凶手——说不定杀死学生父母的仇人也在里头。但他们回来以后乐昏头，惊觉“他们”就是

“我们”，犯下兽行不代表沦为禽兽。如罗尔夫所言，双方区隔不过是身上的制服。

我怎么说得出这种话？看过大坑里面的头骨，我怎能认同手段残暴的杀人凶手？可悲的是，单就20世纪来看，地球上有超过5000万人死于所谓“文明”的政府手下，其中包括纳粹德国、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的种族屠杀等等。这些例子说明了良善的老百姓很容易摇身一变成为刽子手。到了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年代，赤裸战俘被迫叠罗汉，只因为美军想要站在人体积木前面拍照留念；又或者逼他们套上狗链，甚至互相口交，士兵在一旁鼓噪欢呼。

真相是——恶存在于人性，普通人和施暴者的区隔并非恶的有无。恰好相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若是机遇不同，双方立场可能就会对调。

我和学生告别时心里满是踏实，知道监狱访问计划交到他们手中一定能够长长久久。毕竟已有基础架构和官方许可，甚至找到赞助单位。后来，桑托斯告知计划扩大到全国各地监狱，时间因此拉长，活动内容加入电影、运动和艺文，相信成果会更加丰硕。

我在基加利国际机场内的波本咖啡厅等候班机时，取出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图图说：“宽恕并非无视已经发生的过去，而是毫无回避认真面对，最后拔除记忆上的刺，防止毒性扩散全身。宽恕代表理解犯行者，发挥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外力、压力迫使他们采取那种行动。”

我见证卢旺达实现图图的理想，实践自己一路上接触到的学者、思想家所提出的见解。我亲眼看见何谓同理心，何谓补偿，还有将和

解这个概念发挥到淋漓尽致。于是我也可以引用那句流行语告诉大家：不必听信我，但应该听信他们。

虽说最后我在卢旺达只去过监狱一天，实际上我时时刻刻看着当地人对牢狱的体悟。这个国家自身正在服刑，受害者是尚未回归自由的人，由外界公民对他们做出补偿。卢旺达也是个巨大的法庭，进行着巨大的司法实验，它完全转变了我们对于监狱的概念。世人大半还相信惩罚随罪行而来，我却在这里看见截然不同的循环，以治愈、弥补及人性中最崇高的宽容为根基。实验之中，我目睹最悲惨的浩劫生出了崭新理念，相信纵使没有监狱，受害者与幸存者的苦痛仍能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得到平复。

卢旺达为这趟监狱之旅提供了坚实的起点。若要重新审视司法制度，必须长时间与幸存者、受害者相处——他们才是思考犯罪问题时的优先。所以接下来我要进入加害者的世界，也就是位于南非的波尔斯穆尔监狱（Pollsmoor Prison）。

---

1. “gacaca”一词源于金亚卢旺达语（Kinyarwanda），意为“草地上的司法正义”，也就是由部落成员充当裁判者，是一种传统式小区审判体系。——编者注

2. 《圣经》中译本译为“拔示巴”或“巴特舍巴”。——译者注

2　对不起

南非

人和人之间的犯罪，受害一方不应怀恨在心却不发一语。他有义务告知犯行者，询问：“你为何如此对我？为何如此伤害我？”因此《圣经》说：“总要指摘你的邻舍。”若犯行者悔悟并祈求宽恕，就应当饶过他，饶恕之后也不应冷酷。

——犹太神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降落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或许因为前一站是卢旺达，所以这种感受更强烈。背景是云雾缭绕的群山，前方排列着18世纪风格的房屋，广阔草坪上还有山鸡漫步。我入住斯蒂伯格酒店，房间像是以前的皇家驿站，有嘎嘎响的红木地板以及四柱大床。连呼吸的空气也特别浓重，斜阳照耀下，环绕着开普敦的一座座平顶山仿佛雄伟堡垒。

这趟旅程的资金来源亦属旅游专栏。康斯坦提亚区（Constantia）是开普敦市郊，以酿酒闻名，而且很巧地与波尔斯穆尔监狱比邻。那是全非洲最大的监狱，里面男女老幼合计约7500人，1982～1988年间，曼德拉也囚禁于此。

换句话说，不进监狱的时候，我处在颇为奢华的环境。或许讽刺，却是个极有效率的体验模式，我不断切换于社会的两极，不仅是

财富差距的黑白对比，也是一般大众和金字塔顶层呈现的扭曲平衡。南非之旅使我摆荡于种族、社会、经济三面向的光谱两端，我预期将面对许多丑恶真相。

两极化来自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几百年的不平等造就难以横越的贫穷和犯罪之海，从数据来看就非常吓人。南非男性死于暴力的比例极高，2012年官方接获大约1.6万个案例，是全球平均的8倍，即便换成女性仍旧是全球平均的6倍。超过四成南非男性曾对伴侣行使暴力，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有强奸前科，犯案当时未满20岁的比例高于四分之三。同样是2012年，警方处理了约6.4万件强奸案，就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也一度被控犯下强奸罪行，而他已经有四位妻子、至少20个儿女。据信与世界各大都会区相比，开普敦也是持刀杀人最盛行的地方。

不过一如卢旺达之旅，我的立足点是前瞻，希望深入研究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这个理念。社会面对犯罪可以有别的模式，不必局限于毁坏秩序就施以刑罚的僵硬规则，或许能够视为一种对人造成损害后进行疗愈重建的过程。如果说卢旺达让我看到何谓大规模宽恕与和解，我来到南非以一周时间观察修复式正义行之有效的波尔斯穆尔监狱，深深领悟到疗愈力量也存在于个人对个人的层级——无须族群呐喊口号，个人口中的那句“对不起”就弥足珍贵。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更近距离观察人性，找到存在于卢旺达人民心底那个奇妙宏伟、名为宽恕的力量。

为了要他们放下暴力，那个地方充满暴力

原本早上计划步行到监狱，因为从酒店前面出去几码就到了。那片土地原本属于富裕的阿非利卡（Afrikaner）农民，后来卖给开普敦

地方政府改建为二次大战军营，慢慢演变成今日所见的监狱。不过酒店接待人员坚持要我搭乘一辆有他们标志的奔驰车过去。

“我猜我是你第一个送到波尔斯穆尔监狱去的客人。”我问酒店安排的司机威尔伯特，他始终不敢放下对待宾客的礼节。

“对，女士，您是第一位。”他回答起来态度沉稳。眼前招牌上写着：“欢迎来到新生之地，波尔斯穆尔监狱。”车子停在大门边，一名狱警满不在乎地朝我瞥了瞥，挥手示意可以进去。因为提早到达，预定要会晤的人都还没来。

“女士，您确定自己留下来没关系吗？”威尔伯特神情有点担忧。波尔斯穆尔监狱里面的重度暴力犯比例很高，主因是囚犯集结成所谓数字帮：代号26的群体掌控赌博、走私之类有收入的工作，代号28则管理帮派成员的性伴侣并负责武力镇压，代号27维持组织秩序和清算行动。我听说波尔斯穆尔监狱内每天都有人被刺杀，数据也显示2011年监狱内至少有47件自杀和他杀案件。狱内的攻击事件或强奸案导致相关单位积欠数十亿该给狱友或前狱友的赔偿金，政府至今仍未提出杜绝狱内性侵事件的政策。据闻传染艾滋病被帮派用作惩戒手段，而肺结核感染风险高达九成，南非还有32%的监狱没有配置医护人员。

我向威尔伯特表示没问题，一个人坐在大门警卫庭旁边的塑料长凳上等候，同时观察环境。这所监狱原始收容目标仅4500人，现在人数已经接近两倍，外观如同军事要塞，除了刮刀刺网还有堡垒模样的建筑。狱方改装一间餐馆让狱友经营，颇为出名，好奇的人可以来品尝蓝带鸡排或者炸牛排。监狱后面山峦层叠，景色优美却也更加震撼，仿佛此处是从伊甸园里丢出的废弃物。

另一位美国籍志愿者抵达，他来自加州，手上拿了一本《圣经》。“上帝召我前来。”他的语气简单得好像熬夜加班就会有黑眼

圈那样自然。我们两个沿铁丝网走了十分钟，前面就是中段B栋，本周工作的据点，入口在一条栅栏走道的尽头。志愿者进入不必通过金属探测器，没有衣着规范，看来他们也不打算收走我的移动电话。里面空间类似体育馆，空气里飘着霉味和淡淡腐臭，我鼻子有点过敏。里面挂着旗帜，上面写着：“修复式正义：朝社会和解、社会复归迈进”。

接着我所见景象与美国监狱相似得令人沮丧：制服衣领上面是一张张黑色或褐色面孔。南非监狱人口中，白人不到一成。囚犯制服是橘色，印有“矫治”（CORRECTIONS）图样。不少人的制服经过修改，剪裁成时髦的背心或夹克，还加上拉链、扣子，甚至有人自己缝上耐克的商标。狱友大半有刺青，不少人缺门牙，这是数字帮喜欢的造型风格。看见我们，囚犯上前用力握手。这场景我同样熟悉，囚犯与志愿者努力打好关系，看似乐观美好的友谊，实则建立在各自不同的想象上，双方都期望从中获益。他们和管理人员之间也有说有笑、互相调侃，我怀疑只是为了粉饰弥漫内心深处的焦虑。

七张桌子铺上花纹桌布，上头分别以英语、阿非利卡语以及非洲南部班图人（Bantu）的语言题字，每桌都取了名：“承担”“诚实”“责任”“悔悟”“革新”“宽恕”“清廉”。

有个非常瘦、看来六十出头、留着杂乱灰胡的囚犯客气地与我寒暄。他说自己几十年前因为争取自由人权而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服刑，种族隔离结束以后回到家乡觉得改变不大，就业率依旧低落，反倒毒品更泛滥。走投无路的他成了真正的罪犯，又被判了15年。

乔纳森·克莱顿牧师走上讲台，其余人就座。我的位置在房间后侧的非狱友专区。

“很抱歉迟到了。”牧师问候大家，声音洪亮：“昨天有一起逃狱事件，所以今天警备比较严格。”“不过，”他伸手拨拨后梳的花白油头，“总之，终于进来了。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他穿着鲜蓝色的衬衫，系了象牙白领带，配上剪裁帅气宽松的裤子，整个人显得十分利落。美国人可能会说他看来带有印度血统，但在开普敦这里化约为“有色人种”，偏偏这个词对来自美国的我极不顺耳。有色人种囊括所有非黑非白的肤色，混血儿以及所有来自印度、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或其他地方的人都算。

“在这里，我们总共有三种语言。”乔纳森继续说，“我会说英语和阿非利卡语。”“然后彼得，”他指向一个留着圣诞老公公胡子的人，坐在写着“承担”二字那一桌，左右都是黑人，“他会为大家翻译成班图语，所以人人都能听懂，而且都是听母语，好吗？还有一些小原则，比方说大家都是自愿过来的，对不对？”

场子安静了一下。

“我们绝不强迫参与修复式正义的活动哦。”

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他进入正题。

“虽然活动是根据基督教理念设计的，不过我们欢迎各宗教的信徒参加。穆斯林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也没关系。各位在这里的发言，原则上不会公开，有什么想法随时提出，好吗？绝对不会传出去。但例外是，如果你坦承杀人，分享的故事里面有犯罪细节，像是尸体藏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找出来，因为这么做你们和受害者才能得到疗愈，对他们、他们的家属而言，那是很难过的经历。了解吗？”乔纳森以阿非利卡语再说明一遍后，才进入下一个主题。

“过程会带来很大的内心煎熬。各位是否有心理准备？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会无法承受？现在提出，我们不过问原因，就送你们回去。请大家记住，这是自愿、自由的选择，绝不强迫。”他看看场内，没有什么回应。

“修复式正义活动周，最后一个规则。”他声音越来越响亮：“大家别把自己看成罪犯、囚犯或者加害人。你们是人，是上帝疼爱的孩子。现在你们不是狱友，而是矫治部咨商服务的当事人。”

活动正式开始。

“那么，修复式正义活动周起跑了！”乔纳森的语气像是要放马出栅。他们开始唱歌。

> 因为你，失明的人会看见，
> 因为你，哑巴会开口唱歌，
> 因为你，死人复活；
> 因为你，万民颂赞；
> 因为你，黑暗遁逃，而我全心呼喊：
> 我自由，是的，我自由。

乔纳森再度站上讲台，发下今天的讲义。上面写道：“发掘你的自我：审视伤害、痛苦、愤怒对你的影响。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是谁伤害了我？谁要为我受到的伤害痛苦负责？”

“有没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乔纳森问。

“已经没和家人联络了。”一个人这么回应，很多人附和点头。

“为什么不联络呢？”

“他们不愿意听我讲话。”有一个人说。

“我没有家人。”还有人这么回答。

“我觉得惭愧。”

“明天开始，我们会打电话到各位家里。”乔纳森说，“有人愿意授权我们这样做吗？明天就可以听到你家人的感受。有没有人愿意？愿意的人请站起来，告诉大家你的名字。”

杰罗姆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穿着棕色靴子，动作像是嘻哈舞者一样灵活。他看上去应该才二十出头，制服是连身裤造型，前襟打开到腰间，露出白色内衣。在贴着“诚实”两字那一桌，格什温也站起来，后脑上的刺青是哥特风字体的“艾尔·卡彭”（Al Capone）。最后是二十几岁的亚希亚，属于“责任”那一桌，他站在椅子上，拉拉白色的南非风衬衫，头上挂着一副雷朋墨镜。

“你们很勇敢。明天就可以听见家人的声音。谢谢你们，请坐。”乔纳森微微鞠躬。

“接着请大家告诉我，”他继续问，“希望这周活动有什么成果？”

很多人回答。“疗愈。”“改变。”“做一个更好的人。”“负起责任。”“和受害者和解。”“重回社会。”

“我想做孩子的父亲。”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瘦小年迈、气质沉稳的老先生，脸上满布皱纹与刺青，眼角沾着一滴泪。

“再来说说你们害怕什么。”乔纳森大声问。

一样回应热烈。“孩子不认得我。”“孩子和我一样坐牢。”

乔纳森从牧师摇身一变成为教授，逐步解释修复式正义的原则，借助PPT幻灯片，引述运动发起人，也就是现居明尼苏达州的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教授的理念。核心概念在于：犯罪是不尊重他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我们需要的并非更多刑罚，而是修补损坏的关系。乔纳森又发下讲义，上面是一首短诗，道尽了司法制度以监禁为主轴有多么不符逻辑。

为了要他们负责，
我们夺走一切职责。
为了要他们正向积极，
我们污蔑轻视、弃如敝屣。
为了要他们放下暴力，
那个地方充满暴力。
为了要他们不再逞强，
那个地方胜者为王。

是阶级不平等引发了犯罪与入狱

传统的司法主要追究违犯什么法条和犯行者的身份，据此施以惩罚。但修复式正义不同，拥戴此理念的美国组织，如得克萨斯州的“生命桥梁”（Bridges to Life）组织和纽约州的“普遍正义”（Common Justice）组织，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谁受了伤？他们需要什么？如何协助？有些修复式正义团体在小区教堂运作，2007年宾州大学研究发现，这种模式比起传统监狱更有效地降低了再犯率。修复式正义机制包含“小圈子”的概念，也就是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就罪行展开对话，参与者很高比例是基督徒。这样的机制最重要目的是给予受害者力量，而传统司法系统十分忽视这点。许多研究显示，

即便审判是公开仪式，受害者得到的疗愈却有限，甚至会增加他们生命的苦痛。

乔纳森问我能否帮个忙，去“诚实”那桌协助格什温填写自我评估量表。有很多人和他一样不识字。

我坐到格什温旁边，先握手问候。他打量着我，我则注意到他两眼间有个星形刺青。

“你是否有过以下经验——”我大声念出问卷内容，“愤怒？”

“有。”他回答。

帮派生活？有。童年遭人施暴？有。毒瘾？有。忧郁？有。多少岁？二十六。认识自己生父吗？

“不认识。十几岁的时候见过一次而已，他喝醉了，我妈要赶他走，他动手打人，场面弄得血淋淋的，后来我还帮我妈擦干净。”我全写下来。

“和生父见面时是什么情况？”

“我，”格什温迟疑了一下，“我想杀了他。其实我差一点就动手了。”我继续把他的回答写在问卷上。

“上一次和家人讲话是什么时候？”

“三年前。”他面无表情，继续解释自己过去只是个普通小鬼，身上三个弹孔可以作证；现在呢？格什温仍旧只是监狱数字帮的普通成员。故事不特别，看得出来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填好表格以后，还得等其他人写完，我们大眼瞪小眼。后来午餐时间，腌腊肠和白面包发下来，我使出一贯的破冰伎俩。

“你听不听嘻哈？”果然换来一个微笑。

“听啊，美国嘻哈也听。”格什温拉起上衣，秀出一个常见刺青，是发行专辑《流氓生涯》（*Thug Life*）那时候的图派克·夏库尔（Tupac Shakur）。我说自己还没机会与图派克见面，但曾经跟着“史努比狗狗”巡回。听到这儿他脸就亮了，粉丝的反应总是像小朋友。

“那你有没有见过李尔·韦恩（Lil Wayne）？”他满口腊肠凑过来问我。

罗恩牧师开口打断我们的对话。他是这桌的辅导员，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下午我得离开，”他忽然说，还直接收拾眼镜和午餐，“不如你接手吧。”

我突如其来接下新任务，在本周活动期间为“诚实”小组提供协助。小组内有格什温、易卜拉欣、安东尼三人，加上心情好就会出现的罗恩牧师和他的助手丹尼斯。丹尼斯老是像块石头不出声，我也不知道他原本的功能是什么。三个狱友都是黑道，正好属于开普敦不同世代。格什温是数字帮28那群。易卜拉欣三十几岁，有双深邃绿眸，脸型狭窄，蓄着短胡，属于27那组。安东尼年过五十，曾经是开普敦大帮派里美国帮的人，后来皈依基督洗心革面。

辅导人员仅有两名非白人，这样的比例反映出一种我很熟悉却让人沮丧的“白人救星挽救黑人灵魂”的文化潜规则，不过这星期我得忍住。

“我有四个小孩，”安东尼念出自己的问卷内容，“几年前亲手为其中一个下葬。然后有个女儿也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她是因为身上带着男友的毒品被逮到。我之前在这里看见她才得知她也进来了。”

接着是一颗震撼弹："我强暴过继女。那时用了药，脑袋不清楚，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没发现眼前是谁。"

那天后来的时间，整个会场充满类似的苦痛回忆。"我还是婴儿时，母亲酗酒用药一直神智不清。""我中弹过七次。""我看着黑道杀死父亲。""我爸死于艾滋。"贫穷、犯罪、枪战、药瘾和暴虐，是他们生命历程的共同点，舞台搬到纽约布鲁克林或芝加哥南区也一样，差别大概只是这里的情节更夸张。美国监狱的故事大同小异，但南非版本更胜一筹：更多暴力，更多毒品，更多虐待，更多伤口。"我杀死自己的继父。他虐待我和我妈太多次了，我不得已只好拿刀捅他。"这是彼得·约翰（Peter John）的故事，大家叫他PJ，虽然现在是辅导员，但以前也蹲过牢。

乔纳森试着让参与者意识到自己也是暴力循环的受害者。这一点很重要，世上很多人忘记所谓加害者多半自身也是受害者。好比说，2015年波士顿社会复归研究访问了出狱者，发现他们极高比例有童年心理创伤，超过四成目睹过他杀案件，半数遭受父母的肉体虐待。不过我仍有些怀疑，比方说有人哭着表示从事钻石走私并非为赚钱，而是渴望父爱。真的吗？

"今天先到此为止，"乔纳森总结说，"相信大家已经明白，自己同样受了伤，不单单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而且伤口很深。"

当天活动告一段落，我和格什温、安东尼、易卜拉欣告别，离开监狱，穿过刮刀式刺网，酒店派来的车已经在外头等着。上车之后我深深惭愧。

这是工作，我这么告诉自己。车子不是我的，而是职务所需。但我处在优势地位才能有这份工作，这事实不因为今天穿过比较多铁丝网或铁闸门就改变。甚至该说，我越想否认，就越显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我重复告诫着自己。

天色渐暗，街道路树、康斯坦提亚区殖民风味的豪宅赏心悦目。晚餐很豪华，但我左顾右盼，除了服务生以外全是白人面孔。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了，有些现象依旧不变，很难想象那个年代是怎样一番光景。白天的体验侵蚀美丽的夜晚，眼前仿佛浮现格什温瞪着鹅肝酱皱眉头的表情。我身处的奢华社会塑造出他们，阶级不平等引发犯罪和入狱。从荷兰殖民时代就是如此，那时监狱用来囚禁违反“证件法”的人，所有人必须出示证明所属种族的护照。19世纪晚期，英国殖民扩张，将囚犯转为劳动力，于是自1916至1986年种族隔离结束，共计1700万名黑人或有色人口被关进监狱，除了接受肉体酷刑，也被迫为大企业如德比尔斯（De Beers）挖掘钻石和黄金。波尔斯穆尔监狱的诞生并非基于司法需求，而是资本主义。二战以后，本地农庄需要劳工，于是顺理成章设置监狱。

其实监狱历史不外如是。几百年来，监狱和资本主义就像是孪生兄弟，一边说需要更多干活的人，另一边就予以回应。做法则是扭曲法条，逼“别人”犯法，最后统统关起来做奴工。以美国而言，囚犯本来为北方的联邦军生产货物，解放黑奴以后却依旧是南方主要的劳动力；针对黑人，法律规定游荡和失业都是犯罪，所以到了1870年，南方黑人入狱比例已是白人3倍。至于欧洲，几世纪以来的趋势是，失业率高峰期的监禁人口也最高，因为就业市场饱和之后，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吸收多余劳力为政府服务。调出过去的监狱数据来看，不难察觉重点放在如何极尽所能腾出空间多塞一些人，设计与贩奴船没两样。奴隶、监狱、资本主义与种族问题，自古以来即混合成剧毒。监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压榨各地原住民或以前为奴的人，一切只是满足白人经济体系的利益。

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工作坊主轴，是面对自身选择，并加以改变。但回顾历史，再看看开普敦现状依旧极端，我不禁觉得所谓选择是个讽刺的概念。在监狱和奴工、种族和社会隔离的脉络下，个人选择是否真实存在？强调自己对自己负责，鼓励开口道歉，是否模糊了真相

是社会制度故意要某些族群失败，以便提高其他阶级的成就？资本主义的根基是个人，社会因素不应掺杂在内；美国梦也一样，重点是“我”而不是“我们”。“自己穿鞋向前走。”（Pull yourself up by the bootstraps.）大家信了这句话，却没想过是否有些人一开始就没领到鞋。许多人呼吁给囚犯新生机会，为何对他们原本的人生视而不见？只看例外当然简单，总有人能跨越种族、阶级的重重困境出人头地，锦上添花总是光鲜亮丽，为困在陋规的人雪中送炭，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脑海闪过“替罪羊”这个词。阅读与监狱有关的文献时，一篇经济学家格伦·劳里（Glenn Loury）的文章令我深深着迷。“我们的社会，大家一起塑造的社会，先容许都市贫民区这类激发犯罪行为的环境存在，接着却又施以刑罚。这就好比活人献祭。”替罪羊最原始的形象浮现：人类以为可以将社会整体的罪恶塞进一头羊的身体里，将羊推下悬崖就能得到赦免。16世纪哲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其著作《乌托邦》里面也提到：“如果你任由别人无法得到良好教育，从孩提时代就学坏，却又因为他从小习得的言行而施惩，结论不就是你在自己创造坏人却又处罚他们？”

“请帮我结账。”我对服务生说。他鞠躬行礼。

“对不起”的力量

“和解是从真相到正义的旅程。”隔天早上，开普敦新闻一篇报道出现了这个标题。报上很多篇幅描述在曼德拉之后，国家沉沦了多少，不过奥尔加·马辛韦恩（Olga Macingwane）还是登上版面。她荣获正义与和解机构（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颁发的奖项，身为1996年种族攻击爆炸案的受害人，马辛韦恩女士公开表示愿意原谅害自己残废的白人凶手。

片刻后我又进入监狱。今天我注意到这里采光良好，因为种族隔离时期波尔斯穆尔监狱将白人也关在这里，因此窗户比起黑人或有色人种的牢房来得多。基于同样理由，走廊分成两条，不同种族不能混杂。换言之，殖民时代就存在的非洲监狱，从建筑结构就能凸显种族优势的问题。

到了体育馆里，安东尼亲切与我握手，咧着缺了门牙的嘴笑，易卜拉欣和格什温朝我点点头，其他辅导员静静坐着读《圣经》。

“目标：理解犯罪导致的危机、伤害、痛苦，”乔纳森发下来的讲义上这么写，“狱友要深入了解自己的错误决定带来什么后果，而其他人因为这个决定面对什么危机。”“我自由。”我随着狱友们轻声哼唱。乔纳森开始今日活动，他非常有经验，很快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25年40天又35分钟之前，我也和各位一样，住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里面，”他说，“今天我开诚布公告诉各位，我也曾经是囚犯，被关了三年。我偷窃，我撒谎，我犯错。可是现在，站在各位面前的是个改头换面的人。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刚进监狱的时候，我完全不会英文，只会说阿非利卡语。进了监狱以后，我下定决心要改变，于是慢慢学习。过程和你们一样，首先要对自己诚实，承认自己的错误，懂吗？唯有这么做，你们才能得到自由。”

他又发下一些纸张。

“每次都有人坦承尚未侦破的罪案。每次都有。”乔纳森趁着囚犯写下自白书时悄悄告诉我：“有一回连狱警都认罪了，说他偷偷经营一个走私集团。”他环视全场，眼神锐利如鹰。

“七年前我开办这个活动。我一个人，没有辅导员，场子里有五六十个囚犯。”他继续说，“那时候的手册才14页，现在增加到85

页。我称呼囚犯‘先生’，头几年管理人员还觉得奇怪，不懂为什么要将他们当成普通人看待。还有你看到的白桌巾，狱方也一样不了解。我告诉他们，只不过是要让囚犯坐在干净的桌子旁，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吃一餐。”他握拳朝桌面敲了一下，接着说明计划的大概流程。六天的工作坊结束以后，每周还要与参与者联络一次，后面几个月设法找到受害者，安排双方对话。

囚犯们不停动笔，乔纳森也打开话匣子，简单介绍工作坊的历史沿革与他成立的“监狱希望牧师团队”（Hope Prison Ministries），目前共在九所监狱举办活动。1994年，曼德拉选上总统，为种族隔离政策正式画下句点。1999年，乔纳森成为监狱特遣牧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在南非起了巨大影响力。“透过种族对话、认罪及和解，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开始了，国家逐渐得到疗愈。”于是乔纳森投入修复式正义，特地到美国佛蒙特州的相关机构取得证照，回来以后积极联络监狱主管机关，提议为波尔斯穆尔引入修复式正义：将最麻烦的囚犯交给我，我来和他们沟通，若有志愿者就请他们一起参与。

他提案的时间很恰当。种族隔离废除后，南非监狱体系进行大幅改革，波尔斯穆尔在1991年取消种族分区。不久之后，监狱法修正案通过，监狱部改制为矫治部，废止所有单人监禁和体罚，矫治部宣誓尊重狱友基本人权。1997年，已有高知名度的典狱长约翰尼·詹森（Johnny Jansen）接管波尔斯穆尔，监狱首次敞开大门接受许多非政府组织入内，在人性化管理上快步前进。目前受害者与加害者双方对话的活动依旧是矫治部网站的重点宣传，内容充斥修复式正义的专门词汇。

根据乔纳森的说法，后来南非政府大量召开假释公听会，鼓励囚犯主动联系受害者。他进一步解释：事实上，不参与对话的囚犯，得到假释的机会少之又少。由于波尔斯穆尔预算不足，始终只有乔纳森

提供修复式正义相关服务，所以他的地位更加吃重。官方立场希望囚犯尽量得到假释，原因并非慈悲为怀，而是监狱系统人满为患。

以波尔斯穆尔来看，大约每300个囚犯只有一个社工辅导，于是管理单位只好大量转介个案给乔纳森。但他并非来者不拒，而且无法保证成果，尤其未必愿意开立提高假释成功率的推荐函。即使如此，乔纳森还是觉得自己常常化身赏金猎人，穿梭于大街小巷，逢人就问：你有没有看过外号叫“北方人”的这位先生？你认不认识两年前这儿一位死者的母亲？七个月之前在外头遭强暴的女孩去哪儿了？他努力搜寻，希望说服被害人出席假释公听会，与加害人对话，参与能证明囚犯真心悔改的活动，如此一来他才相信犯人适合回归社会，不必昧着良心为假释案背书。

问题是如何判断囚犯真心忏悔？开口道歉，这是修复式正义概念中的“bête noire”（字面意义为“黑色野兽”，引申为“棘手的人事物”）。其中存在模糊地带，也就是哲学家约翰·德拉宾斯基（John Drabinski）所谓的“执拗自恋”（obstinate narcissism）：我们匆匆穿越另一人的伤痛，只因为“我们（宣称）从自己造成的伤害中学习成长了，于是积极地，姑且说是想要‘展现’全新的自我”。乔纳森的任务就本质而言几近不可能——他必须扮演上帝，窥探囚犯内心，判断他们的悔改是不是假象。

“很多人跟我说：‘我想告诉对方，我很抱歉，我做错了，真的很对不起。’可是我会回答：‘这跟你没有关系！重点是被害人的需求，不是你的需求。’

“有一次假释委员会要我调解案子，是关于某人杀死黑道大哥的儿子。委员会表示‘要尽快！越快越好！’可是我回答：‘缓一缓！这种事情太敏感，处理不好很危险，我需要半年时间。’后来我和帮派成员聊过，也在那一带调查，最后亲自找上黑道大哥了解——这些

都是必要程序。最后呢，双方终于坐下来握手，那个犯人也取得假释，之后并没有寻仇事件。”乔纳森用力摇头：“办起来很麻烦。”

他回到讲台，收回自白书。

“大家有什么感觉？写下自白是不是很像在餐桌上诉说往事？”

“感觉说出以前没办法说的话。”杰罗姆叫道。他的口吻很像是渴求老师赞赏的学生。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可以跟我聊一聊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受。”亚希亚说，雷朋眼镜仍旧挂在白衣服上：“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生也不只是一团屎。”

乔纳森问：“所以你们知道自己的人生没有那么惨，是吗？”

格什温起身：“我想坦白。我曾对家人发誓绝对不再被关，可是他们让我很难过。我受不了，才故意做坏事，所以又进了监狱。”

杰罗姆也开口：“我也要坦白。我还偷过东西，因为要养女朋友。”

“养女朋友？”乔纳森追问。

“唔，一部分用在她身上，一部分拿去玩了。”杰罗姆老实招认。

“还有没有？”乔纳森似乎看透他心思。

“呃，毒品吧。”安非他命在这里太常见了，与各种犯罪密不可分。

“你现在和当初那个女朋友还在一起吗？”

杰罗姆摇头。

“大家注意一下。”乔纳森隔空指着杰罗姆，杰罗姆神情很尴尬。“这就是我们先前说过的认知谬误。还记得吗？他将责任归咎于别人，可是真正该怪的是谁？是自己。你偷东西是因为要买毒品。那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

接下来是昨天预告过的电话时间。

“杰罗姆，你还希望我打这通电话吗？”乔纳森问，“确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真的准备好了？”

杰罗姆点头，表情明显不自在。乔纳森还是拿出了黑莓手机。

“哈罗！请问是玛莉亚吗？”

“是我妈！”杰罗姆大叫，身子摇来摇去，右腿一直抖动。

乔纳森改用阿非利卡语说了几句话。“好，好。”他点点头，又说了几句话以后挂断。

乔纳森转头说：“她说‘我最近睡得很好’，还有‘他在的时候我反而失眠，一直担心自己的安全。那孩子老是闯祸，爱跟人斗。我想星期六应该不会过去了。他自己明白原因’。杰罗姆，你妈妈还说：‘我爱你，可是不想和你一起生活。’她希望你留在监狱里，因为你出狱了她反而惶恐，害怕全家人跟着丧命。”

母亲的话语冷冷划过全场。杰罗姆将脸埋进手掌。

“有什么感觉？”乔纳森问。

杰罗姆没讲话，脸还是埋在手掌里。他没有抬起头，只是轻声说：“我想放弃。回去以前那种生活，继续干坏事算了。”

乔纳森伸手搭在他肩膀上。

“你并不孤单。”他说，“我们会陪着你，我们相信你可以改变。”改变，需要有面对被害人的勇气。修复式正义活动时常运用替身的概念，以一位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来代表所有受到犯行影响的人。这一天波尔斯穆尔的代言人是罗宾·克劳福德，他身材矮小、头发斑白，看起来是个好爷爷，说起话来声音缥缈。

“‘我们要传染艾滋给你，他妈的死白人’，他们这么对我吼，”罗宾的语气无力，“他们把我的裤子扯到脚踝，强奸我。我尖叫，身上每个有洞的地方都在流血。后来我住进创伤病房四周，脚踝上有个大洞，是他们拿混凝土块凿出来的。原本对准的是脑袋。我一直无法入睡，太恐惧了，身体抖个不停，连排尿或排便都办不到，也不敢照镜子。朋友来探视以后，说我那张脸看起来像是生肝脏。”

众人屏息。

“有人想响应吗？”乔纳森问。罗宾看来依旧凄凉，穿着橘色制服的囚犯们都无言以对。

“我对自己国家发生这种事情感到恶心。”一个辅导员开口。

“假如这位是你们的被害人，你们会说什么呢？”乔纳森又问。大家一动也不动。“没人有勇气说句话吗？”

“对不起。”杰罗姆的声音有点模糊。

“这样不够！”乔纳森中气十足。

终于此起彼落有了响应：“你很勇敢。”“愿上帝保佑你。”“很抱歉，请原谅我，我很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接着大家得写下一封信给罗宾，内容是对他，还有对于自己加害的人想要说什么。我到了“诚实”那一桌，将格什温口述内容化为文字。

“亲爱的罗宾，”格什温准备好以后滔滔不绝，“希望你还愿意通过自己的痛楚给予我们力量。谢谢你愿意分享那段经历。我非常遗憾。”写好以后，信折起来，等待活动下一个阶段。

格什温瞥了我一眼，开口聊起天。起初说到监狱生活，他和多数狱友一样住在30多人共享的牢房，里面当然很拥挤。每天下午四点狱警离开，牢房就无法无天，但直到早上六点都得待在里面。接着又说起在外面的生活，他以前在街上持刀杀人，到底杀过多少人已经记不清楚。再来谈到监狱里的数字帮：“一开始这个帮派还不错，主要是想对抗种族隔离。”根据外传的说法，数字帮的起源是两个祖鲁人，一个叫做“波”（Po），一个叫做“农戈洛萨”（Nongoloza），他们聚众洗劫殖民政府据点，将财富分给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则在监狱内为囚犯权利奋斗，要求每个人都能有床，有基本伙食，并且开放囚犯戴表，否则无法妥善管理时间。

格什温说自己进监狱的次数数不清，他知道外头有人要取自己性命，为此干脆拒绝上次假释机会，免得立刻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

午餐来了，格什温要易卜拉欣帮他拿一份穆斯林餐。“半年前开始信教，”他解释，“有些人觉得我是玩假的。怎么说来着？就演戏，装的。反正我自己知道就好。”他指指自己胸口。

格什温一边啃着火腿三明治，一边说自己打算下个月申请假释。他一度沉迷毒品，彻底受到药物控制。放下三明治以后，他直视我的眼睛，我看见眉心那个星形刺青下面的疤痕，好像化不开的皱纹。“贝兹，我想要毒品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要我直接朝克莱

顿牧师脸上开枪也没问题。”我相信。但这到底算是自白，还是炫耀？

“如果我们打电话给你母亲，你觉得会如何？”

“她的反应会比杰罗姆的妈妈还糟吧。我刚才也这么告诉他，换做我妈肯定会狠狠数落我。”

“但是你有什么感觉？”

他耸耸肩：“习惯了。”

“真的吗？”

他点点头，一脸漠然。

“有时候，”我说，“我们以为自己习惯了，但其实不断受到影响，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他耸耸肩，一直抖脚。

罗宾开始念出收到的信。念了四封以后，他抬起头。

“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他轻声告诉大家。之后继续念完，当天稍晚罗宾表示自己也想参与活动，担任辅导员。霎时我喘不过气，脑袋闪过在卢旺达的所见所闻。这是许多人认为不可能达成的宽恕与和解。

而我很清楚，数据显示这完全有可能，心理学研究也证明了“对不起”的力量有多强大。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被害人的实际需求。修复式正义的文献探讨被害人的四种需求：答案必须真实，必须赋予他们力量（empowerment），通过反复诉说受害故事达成自信重建，借由负起责任或以牙还牙来实践补偿。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最好的做法不是

审判和刑罚，而是双方对话。审判或刑罚里，受害者被边缘化，沦为不相关的旁观者。智利的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1991年做过一份调查，主题是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时期的人权损害，结果几乎没有受害人想报复，他们渴望的是真相和正义，借以悼念死去的亲友，并期望不会再有下次悲剧。受难者参与双边对话之后，心中恐惧一次比一次减轻，后来对司法系统表达了高满意度。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描述宽恕是“唯一一种出乎预料、开创新局的响应方式，因为宽恕不受制于激发它的行动”。宽恕是奇迹，这个奇迹使生命更好。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临床心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就试图了解这个奇迹的运转机制，后来将其定义为受害者不再消极逃避加害者或试图报复，改以更具建设性、有利社会的心理动力为行为准则，并制作出“宽恕量表”（Forgiveness Inventory）、“宽恕他人量表”（Forgiveness of Others scale）来测量慈悲心与报复心。其中一项研究发现自认受害的心态会导致消极，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效率低下和容易放弃。1998年两位心理学家对童年性侵受害人进行调查，结论是宽恕程度高的人后来婚姻较为美满，并据此推论宽恕这种态度可以在不同的生活层面起作用。2008年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则指出，复仇并不会为受害者带来认知闭合（closure），也就是对于外界信息或事件得到可以理解的诠释，反而因为焦点集中在犯行者而导致情绪不稳并表现出侵略性。

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回想自己受害的特定情境，然后进行四种不同想象：聚焦伤痛、心怀怨恨、强调加害者也有人性品质，或者专注于宽恕。而受试者专注于宽恕时，效果反应在生理上，无论收缩压还是舒张压的上升幅度都较低，回想事件经过时脉搏也较慢。2002年，在一组分三次进行的研究中，受试者想象自己遭到抢劫，而事件隔天转折分成四种，分别为获得对方道歉、获得对方补偿、获得对方道歉并补偿，以及什么都没有获得。结论显示，得到诚心道歉者感受

较少的复仇心态、愤怒和恐惧，宽恕的想法强烈，而若同时得到道歉和补偿，效果更是接近两倍。

总结来说，报复对自己造成更多伤害。1999年一项实验引导男性大学生认为自己无意间损坏实验室器材，之后实验员们分别表达宽恕、仇恨，或者两者都有，或者两者都没有四种态度，并要求大学生协助将一些对象送到校园其他地方。得到宽恕的受试者最愿意配合要求，遭到仇视的大学生则最不愿意协助。宽恕本身带有馈赠性质，犯行者感受到的不对等非常明确，于是他们也会积极弥补，使双方关系得以对等。也就是说惩罚罪犯就是增加仇恨，导致他们有更多伤人的行为和犯罪率更高，而宽恕却对社会秩序与和谐具有正面效益。

接着要打电话给格什温的母亲。她有空说话也愿意说话，并激动地说了一串阿非利卡语。挂上电话以后，乔纳森与我们分享。

“那边还有人在找你，”他语气沉重，“你两个妹妹每天提心吊胆，怕你跟黑道的牵连会给她们惹祸上身。不过你妹妹还是叫你大哥。我想这代表她们还是很敬爱你吧？而且她们很想念你。”

格什温脸色一白，腿抖得更厉害。乔纳森继续说下去。

“你表哥被子弹打过10次，你另一个朋友被子弹打过11次，所以你母亲的意思是，她希望你回家，却又觉得你好像不应该回家。她说你妹妹需要人照顾，但是你回去的话她们未必安全。”

“我努力过，”格什温脱口而出，十分焦急，“我试着联络，可是她会找借口不见我，不和我说话。”

“多久？”乔纳森问，“你尝试了多久时间？”

“上次见面到现在三年。”

“明天我会带你母亲和妹妹来。我派车去接她们，让你们在这里面对面。”乔纳森走过去，伸手搭着他的肩膀：“你的内心正在哭泣，为你母亲难过。我明天就带她过来。”

格什温看起来几近崩溃，情绪翻涌。那神情像是拿着工具，却不懂得该怎么做。

“贝兹，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子和人说话的机会。”他不断喘息，好像松了一口气。

“现在是什么感觉？”我问。

“很棒。”他精神一振：“这样子我妈妈就不能躲起来了，她得见我，不能逃避。明天终于可以见到她了。”

每天都是新的机会，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那天离开波尔斯穆尔以后，我沉浸在回忆中。2005年，我二十出头，深陷一段感情中。对方刚从加勒比海地区来到美国一年多，人很好，其实也有很多缺点。他叫乔恩，我们交往原本很开心，直到某一天我接到他太太打来的电话，还谈到他儿子。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妻小，所以受到很大打击。后来我走出情伤，其实只要跳脱全世界都对不起我、都针对我的情绪，每个人都能从伤痛中痊愈。乔恩和我分分合合好几年，他总是将问题归因于乍听合理却又叫人生厌的借口，像是种族问题、学历不高、经济不景气、绿卡很难拿之类。有好几年时间，我心底真正渴望的很简单，就只是乔恩的一句对不起。两人感情随他时好时坏，而我一再容忍，消磨到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为什么我会在波尔斯穆尔监狱这儿想到过去的心碎？或许不该将自己的小情小爱和囚犯的人生相提并论，但格什温使我想起乔恩，他

们两人都是社会制度压迫下的产物，也都不得不慢慢肩负起责任；可惜的是他们振作得了一时，硬撑不了一世，最后结局通常令人气馁。社会赋予他们的生活模式有瑕疵，两人已经融入制度、拥抱缺陷。我很幸运没有成为重案受害者，也无权比较生命经验，但我知道情感上的伤痛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有过同样的体会，都见过活生生的罪人——说不定他们还犯下重罪或者损害你的权益，然后努力想改变。不只是改变，甚至想从头来过，那种自我改造无论多优秀的心理治疗也难以比拟。所以可以称，他们是现代的圣奥古斯丁、马尔科姆·艾克斯，或者抹大拉的玛利亚——不难理解为什么宗教或传奇故事里面会有那么多例子是罪人变圣人，有缺陷的灵魂经过最崇高的奉献后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一个人在现实和心理上与监狱距离多么遥远，都能明白要与自己的错误对抗、得到宽恕与宽恕他人是什么感受。换言之，监狱不如大家以为的那么陌生，所有人理论上都能想象和理解囚犯的生命是什么滋味。

《信实主》这首圣歌在每天早上的歌单上，我压抑着自己的偏见，一方面觉得宗教在监狱里面容易导致囚犯自我满足而变得消极，却也明白信仰可以带来正面力量。美国人很懂这道理，所以2003年佛罗里达州带头推行，将以宗教为基础的运作模型套用在一所矫治机构，并成为现有的四所宗教性人格矫治所的领头羊。四所机构加起来大约3300人每天进行宗教仪式，包括祷告、读经、生命导师的指引，以及接受如亲职教育、愤怒管理之类人格发展课程。管理人员和志愿者认为狱友们的态度和行为大有改善，而狱友也描述在这种机构内压力较小，对于自我成长的帮助比传统监狱来得大。

我收起质疑，看看今日活动目标。“灌输正直、尊重、信任、清廉的核心价值”。罗恩牧师戴着墨镜出现，丹尼斯也在。

格什温和亚希亚一样穿着白色衬衫出现。我过去坐下，他郑重其事与我握手。安东尼露出招牌的无牙笑容，易卜拉欣一样淡淡点头示意。

问到对自己加害过的对象有什么想法，格什温若无其事说：“唉，罗恩牧师，我觉得很糟糕。”我是不是听见一丝嘲讽?

“我不想谈这个。”易卜拉欣回答。

牧师伸手捧着易卜拉欣的脸，叹道：“孩子，你很快就会恢复。”

他又将手轻轻放在格什温心窝：“孩子，你也一样。”

“你们两个是穆斯林？”他问。两人点头。“你们的内心其实是真正的基督徒。”牧师又轻捧两人脸颊：“我看得出来，是基督徒，你们灵魂深处敬爱耶稣基督。”他把手放在脸上，又把手放在胸前。

“我们一起为格什温祈祷。”丹尼斯低头闭眼。我忍住不耐烦照着做，大家为格什温那迷失但并非基督徒的灵魂安静片刻。

接着我们抬起头。“格什温，你准备好放弃数字帮的身份，不再混黑道了吗？”

“还没有，罗恩牧师。”

“还是打算随身带枪？”

“牧师，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不过我并不打算开枪，回去以后会尽力做个好人。”

牧师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易卜拉欣：“你愿意放弃数字帮了吗？”

易卜拉欣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绿色眼珠里有股淘气，但始终没有讲话。罗恩牧师嘀咕说了几句耶稣基督会拯救谁，然后继续："易卜拉欣，你离开这里以后，会不会屈服于同侪压力？"

"不会。"

"格什温，你回去以后，要住在哪里？"

"老家那边，有朋友，不过也有仇家。也好，他们看到我的改变，会明白怎样过日子才对。"

"好主意！"

糟透了。我快要按捺不住。

休息时间，其他人冲进厕所，只有我和格什温留在原位。我单刀直入地问他刚才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故意说牧师想听的话。他用力摇头否认。我们对于他要回老家的计划起了争辩。我告诉他美国监狱里的学生回家以后对旧环境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怕自己陷入同样处境；其中不少人协助即将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分享付出惨痛代价后的过来人智慧，但同时很清楚一定要确定自己先得救，才有余力帮助他人。可是格什温坚持说自己可以抵抗诱惑，能够引导别人走上正途。

我们双方僵持不下，后来他问我愿不愿意留到下午，他要与母亲见面，乔纳森请人接送她，此刻正在路上。于是下午我和乔纳森到入口处迎接格什温的母亲和妹妹。其实他母亲年纪只比我大几岁，见面时生硬地打招呼，然后看似不情愿地在接待室坐下。妹妹19岁，穿着牛仔裤、红上衣，绑了头带，突如其来一阵啜泣。我赶紧坐到她身边。

"其实我不想来。"妹妹涨红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妈妈则一脸茫然盯着墙壁。我拿了面纸给女孩，问她是不是还在上学。没有。有

工作吗？她还是摇头。

“我就……你知道的，到处晃……”她擤着鼻子说。

乔纳森回来带大家去志愿者办公室。女志愿者很客气，蹦出一连串阿非利卡语，身上制服是军装风格，还套着战斗靴，看来跟狱警没两样。今天早上她才听说有这次和解面谈，但表示会尽力协助。

格什温进来时，大家一动不动，看着他走到妈妈和妹妹中间的位置坐下。三年没见了，但他面无表情，直视前方。

“拥抱吧！”社工吩咐，格什温听话地和母亲拥抱，但是动作僵硬。与妹妹拥抱之后，女孩再度啜泣。哥哥跟着情绪激动，所以没放手。母亲还是盯着墙壁，妹妹的眼泪在囚服上留下一大块水渍。格什温握着妹妹的手，妹妹手里握着面纸。志愿者开始引导对话，乔纳森在旁边间断地为我翻译。

这是一场情绪的乒乓球赛。原来有天晚上，母亲在非法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丈夫在一起，然后，她差一点拿刀捅死了自己儿子。儿子10岁就开始为非作歹，将母亲买给他上学要穿的新衣服当掉换毒品。母亲自己也有酒瘾和毒瘾，她15岁就生小孩，让她怀孕的男人连婚礼那天都是醉醺醺出场的。

“可是他都26岁了！”母亲指着他，越说越大声：“还有个8岁的女儿。女儿有危险，我们也有危险！”办公室里怒气冲天，格什温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神情，阴沉、混乱、痛苦、迷惘。

“你带男人回家，让他们毒打我的时候，你出面阻止过吗！”格什温将妹妹的手握得更紧：“你也没有保护过她！”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所以示意乔纳森我要出去，让专业人员和他们自家人私下解决。我对格什温挤出笑容表示

支持，然后窜出大门。

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每时每刻都沉浸在囚犯的故事和哀痛中。后来安东尼说了自己与妻子的过去：“虽然结了婚，但我宁愿去玩橄榄球也懒得出席婚礼或其他聚会。”他不断摇头，慢慢说出更大的过错：我忙着外遇，忙着赚钱。我强暴了继女。

与母亲见面后，格什温的情绪平静了，也吐露心声。“我觉得，怎么说呢？很矛盾。我知道我母亲也是受害者，还有我想见见妹妹，她很在乎我，但是我伤害到了她。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自己犯的罪会起涟漪。”我听了一惊，这是修复式正义用于说明的词汇，看样子活动内容已经渗入他们心中。

“可是，贝兹，我还是很生气。而且我不懂，为什么不准我做那些事情？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原来终究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想要一个爸爸，我很嫉妒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毒品。”

这几天活动结束以后，下午我也会到咖啡店坐坐，有机会就问乔纳森的心路历程，为何他把生命贡献给了修复式正义的领域。

他在开普敦郊外的酒乡地区帕阿尔镇（Paarl）长大，祖父的农地在种族隔离时代被强制征收，乔纳森小时候只有在教会里见得到白人。教会规矩严谨，但始终不愿承认种族隔离政策违背道德良知。大人教他要尊敬白人。“那时假如有个白人对我微笑，我会以为是上帝通过他来赐福。”他自己大笑起来。

乔纳森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邻居也怀孕了——生父居然是同一个。之后爸爸又与管家有染，最后抛下妻子和七个小孩远走高飞。他

才十年级就得去工厂赚钱养母亲，而且乔纳森发现，自己和父亲其实一个样儿。

“我喜欢女人，爱逗她们，和她们腻在一块儿。为了这个目的，我需要钱。”所以乔纳森使尽手段，比如盗刷信用卡、当扒手，或抢劫。

“后来当然就被抓了。我妈到警局的时候说：‘孩子，我会为你祷告。’有个表哥也来了，还带了《圣经》，我差点儿往他脸上吐口水。那时候我没办法接受宗教信仰。”乔纳森被判六年徒刑，送进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最高戒护牢房，因为有色人种区只剩那边有床位。服刑期间，他学会了英文。

由于表现良好，1990年就假释出狱，当天有位女士在大门口等待，是那段时间乔纳森唯一有联络的对象。两人从小认识，她叫做珍妮。“珍妮说，那天有两件事要做。”他笑得很开心，感觉是美好回忆：“第一是因为我母亲每天早上都为我祷告，所以她要我也照做。第二，她要带我去见我父亲。我听了以后说，‘珍妮，你疯了吗！’那时候我对我爸恨之入骨，因为他根本没回家看过我。我是真的恨他，但结果我被珍妮说服，去了我爸家。才刚进去，一个五岁大的小男孩跑过来，搂着我脖子叫大哥。31岁的我抱着他，牵着我爸的手。虽然我不知道，但其实那就是我对修复式正义的第一次体验。”

“大家见见我太太！”有一天我走进监狱后，听到乔纳森这么嚷嚷。珍妮擦了粉红色唇膏，穿着时髦的黑白套装，乌黑秀发扎成利落的马尾。珍妮的正式头衔是克莱顿牧师，她的职业和丈夫一样，而且就在隔壁女子监狱开同样的工作坊。乔纳森将两人交往过程交代得巨细靡遗，他还年少轻狂、风流倜傥的时候就认识珍妮。“我在我女友家遇见她，一直对她抛媚眼，但是她不为所动。幸好我们还是变成朋友。”

两人保持联系，即使乔纳森入狱了关系也没有断过。1989年1月1日，他被关了将近一年，珍妮忽然亲自探视，让人感到惊讶。他们还是继续写着很长的信，乔纳森将珍妮每次的探视都牢牢记在心底。母亲过世后，他每封信开头都变成“我亲爱的珍妮”，可是其实乔纳森始终怀疑自己只是一厢情愿，以为珍妮不会答应，毕竟她将心力都奉献在教会了。之后乔纳森只能一直暗示，出狱以后希望也保持这种关系。他找到了工作，为烘焙坊开卡车，每天工时很长，但两人仍天天见面。渐渐地，乔纳森的手放在珍妮腿上，她也没有抗拒。不过，乔纳森约她晚餐，在点心里面藏好戒指的时候，还是没勇气开口求婚。直到1991年的某天，珍妮望着他说了句：“答案是‘我愿意’，但是你还记得该问什么吗？”

场内，囚犯们目不转睛看着珍妮。她播放幻灯片，主题是克莱顿家族。艾米·乔伊18岁、卡拉·克洛艾15岁。“我没有要女儿跟着信上帝，但她们自己也觉得这样生活比较好。”屏幕上是女孩参加高中舞会的画面，打扮得好像红色天鹅绒蛋糕；然后换成上教堂的正式穿着，一家人堆满笑脸气质优雅。杰罗姆和格什温张大眼睛看着自己未曾有过的完美家庭，事实上在场的囚犯全部与其无缘。

“两个小丫头，”珍妮笑道，“完全不觉得自己爸爸进过监狱是羞于启齿的事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囚犯们看得很着迷，几乎大喊着问。

“因为人的今天比过去重要。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每天都是新的机会，可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每桩罪行都必须通过双方主动对话才能确认意义

矫治的最后一天终于来临，这是期盼已久的时刻，穿着囚服的男人们用一周时间寻找灵魂，最后难关则是面对因自己所作所为受害最深的家人。

安东尼与我寒暄，表示自己假释案再次被驳回。我告诉他美国那边给了同样消息，监狱直升班上最出色、最有前途的学生，从18岁就待在监牢，已经过了23年，结果那些基于政治因素遴选出来的委员竟认为这还不够，要他继续留在里面。“受害者希望你付出更多时间悔改。”委员会这么对我学生说。还好我不在场，否则一定破口大骂：“干脆割他的肉，称斤称两拿去也罢？究竟司法制度出了什么毛病，要持续深化仇恨到这个地步？”

“其实对我这种人来说，”安东尼指着窗外铁丝网和山丘，耸耸肩说，“外头也没什么好奢望的，说不定真的比较适合留在监狱里，反正我都这把岁数了，可能就老死在这儿。”

安东尼的家人今天没有来，其他很多人的亲属都到了现场，妻子、父母，甚至奶奶、长大成人的儿女，鱼贯而入坐在中间长凳上。尽管是大团圆，一开始每个人互相握手打量，气氛依旧尴尬，没有人来个大拥抱。杰罗姆还因为几天前那通电话焦躁不安，一直东张西望，搓着生了浅浅胡须的下巴，他的母亲究竟会不会露脸？

“欢迎！”乔纳森声音洪亮，“你们彼此的关系破裂了，今天就是修补的机会。主角是你们，由你们上台说话，告诉他们自己有什么感受，比方说‘很难过’‘很生气’，又或者你们也许有疑问，‘为什么’ ‘刑期到底多久’等等。这是你们得到答案的机会，不管想知道什么都可以，为的不是互相埋怨，而是重建关系。来吧。”

亲属们反应踊跃。亚希亚的姐姐首先呼应，在她面前，帮派弟弟双手搁在腰后一副局促模样。整个星期下来，亚希亚总说自己与家人

决裂，所有人都讨厌他。他也发表过感触，认为亲属关系造成他内心充满怨怼。

“其实我不认识你，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起长大。以前我也觉得自己根本不想认识你，因为你是个罪犯。”姐姐打量着他，“可是今天我想跟你说，其实还是有人爱你。”

这位黑帮大哥忽然啜泣起来，脸埋进手里哭得不能自已。“你是我弟弟，我们可以想办法重建这个关系，试试看吧。”说到这儿姊弟俩都落泪，经过乔纳森鼓励，他们好好地拥抱了。

有个白人囚犯已经五年没见到母亲。得知母亲几周前成了寡妇，也不禁啜泣。“儿子，看着我的眼睛，”母亲说，“我会无条件地爱你。”孩子泪眼汪汪钻进妈妈怀中。

看着这些故事一幕幕在眼前上演，我几乎没法呼吸。与格什温母子坐下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英语里“道歉”（apology）这个词的语源是希腊文“apologos”，原意就是“故事”。整个星期我一直在听故事，他们的童年、犯下的罪、如何与家人断绝关系。可是加害与受害双方团圆以后，故事忽然进入全新阶段，连亲人也成为主角。班图语、阿非利卡语、英语……囚犯们一个接着一个面对家人的真心话。

“告诉我真相。”

“教不好孩子，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怎么有人会偷自己老婆的钱？”

“憎恨是种讲述故事的激烈情绪。”哲学家查尔斯·格里斯伍德（Charles Griswold）在著作中这么说过。修复式正义就是放大叙事过程，使其更广更深，涵盖犯错那方不再逃避的清楚解释。建立修复

式正义的两大功臣巴布·特福斯与霍华·泽尔提出见解：每桩罪行都必须通过双方主动对话才能确认意义，而司法仅在“被害者和加害者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洒落现场的泪水仿佛都泛红。字字血泪，不断回荡，一声比一声响亮。“对不起。”

看似冷酷的帮派分子一个个卸下心防在母亲怀中号啕大哭，父亲也终于对自己不了解的孩子表达以往说不出口的爱。一张张带着刺青的面孔涨红泪湿，时间在满满的歉意中流逝，家属们却还有好多想说想问。有些性质敏感的对话，例如妻子面对强暴自己的丈夫，就由辅导员带到其他地方私下进行。留在现场的我，体验前所未见的心灵净化。

“老爸，之后买一辆脚踏车给我吧。我们像以前那样一起出去玩？”

乔纳森喊了暂停。“今天我们在这里待一整天，”他说，“我很乐意一辈子看着大家好好团圆，但是我希望每个人能和家人相处一小时，好好彼此陪伴。别再聊天气了！这段时间对你们很重要，请继续加油。”

杰罗姆的母亲终究没有来。事后乔纳森私下告诉我，车子已经到她家门口，但是她醉得乱七八糟没法上车。杰罗姆瘫在桌上，失落不已。我坐在格什温旁边，他开始聊天。

“贝兹，我想清楚了，还是不要假释。”他嚼着肉饼说，“我还没准备好，现在回去会有很糟糕的下场，我得先学会控制脾气，多和家人沟通。太早回去会出乱子。”

我问他有没有听过马尔科姆·艾克斯。

“是饶舌歌手吗？”

我大概告诉了他马尔科姆・艾克斯的生平，解释一个人怎么在美国监狱里面读书学习，从为非作歹变成社会运动领导者。

“贝兹，我向你保证，”他回答，“我会开始念书，去上识字班。我一定会……贝兹，我真的好难过，对不起家人，对不起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道歉都是承诺，是语言，也是行为，其真实意义存在于未来。犹太哲人迈蒙尼德给真正的悔改下了定义：“当罪人再次面对同样的诱惑却不再犯错，可以抗拒，就是真的懂了。”我相信格什温是真心歉疚，会好好履行诺言。我也相信这周从每个囚犯口中听到的道歉。然而，宽恕也不能躁进，一步一步慢慢来。他们能否说到做到，以后见分晓。

活动收尾有个戏剧性的高潮。原来在第一天，乔纳森就请狱警帮忙买了三条巧克力，分别交给格什温、亚希亚、杰罗姆三个人。巧克力在监狱可是很难得的，所以在七天以后，他们是否还得出来？会不会自己吃掉，或者偷偷卖给其他狱友？格什温一脸得意站上椅子，亮出巧克力给大家看，用阿非利卡语沉稳地告诉大家：“以前我没办法让别人信任，但是现在已经知道那种个性会伤害很多人。我手上的东西不只是一条巧克力，它对我而言格外有意义。”之后说了英语：“我终于可以感受自己，看清楚自己，然后相信自己。”全场热烈拍手叫好，他们三个站在椅子上挥舞巧克力棒的样子好像荣获最佳球员奖。

那位曾经被关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辅导员PJ，为大家做了一段阿非利卡语的饶舌演出，接着又冷静地分享了自己以前犯下虐待和谋杀案、被关以后在宗教中得到救赎的心路历程。乔纳森上前拥抱，转身对所有参与的亲属致辞。

“请各位认真看看他，”牧师高声呼吁，“然后再看看你们的孩子。他是个好人。他是你的孩子。”

下午威尔伯特又开车来监狱接我。

“女士，您明天就不会再过来了，对吧？”他问。

“嗯，活动今天结束了。”

“希望您不介意我这么说，不过其实我每天载您过来还挺开心的。”

“谢谢你，威尔伯特。”

“每天看着女士您平安抵达，平安回去，我很欣慰。”他迟疑一阵，轻咳之后解释：“事实上我也只差这么一点就要进监狱了。幸好法官说他愿意给我一次机会，所以我尽力做好。这份工作我才做第二个月，但不会再犯法了，要改头换面。”

两个世界在此刻交会。

工作坊结束之后我没马上走，在开普敦多待了一星期。看过监狱，看过白人都会区康斯坦提亚，却没有走得更远，于是决定到比起波尔斯穆尔还恶名昭彰的罗本岛监狱看看，曼德拉在那里关了18年之久。旅游无法掩盖那地方的历史地位。搭上观光巴士，我还是哼着在波尔斯穆尔听见的歌，旋律缭绕心头。“我自由。主，我自由。”

最后一天我又回到康斯坦提亚区，来到一扇办公室的玻璃门前面轻轻敲了两下。招牌很小，上面写着“非洲监狱牧师：专门服务被遗忘的非洲狱友”。

“好，走吧！”乔纳森冲出来，他想带我看看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全貌，不要局限在工作坊的地点，所以就开了五分钟的车过去绕一整圈。里面的景况依然令人沮丧，虽然修复式正义极具潜力，监狱本身却无法提供救赎。将近1/3的囚犯等待审判，南非再犯率又高达80%。我们经过一个被狱友戏称为“阿富汗”的区块，乔纳森解释说那里斗殴滋事特别频繁。又穿过一条双排走廊后，他告诉我：“之前我就在这里楼下待了九个月。”

行经中段B栋，乔纳森请狱警找安东尼和易卜拉欣出来，他们微笑道谢，我也祝两人平安顺心。格什温呢？

“跟我来。”狱警说。我们缓步穿过气氛苍凉的走廊，脚步声不断回响，拥挤的牢狱里许多眼珠子望过来。下午一点钟，格什温躺在上铺午睡，44个室友之中的某人过去戳醒他。

格什温睁开眼睛之后立刻跳下来，扣好扣子跑到铁栅前面与我握手。“我会记住我说过的话，不会忘记的。也不会忘记你，贝兹。”

回美国途中我就收到乔纳森的电子邮件：星期四出现了令人欣喜、极具意义的后续发展。我们花了两小时的时间重新整理周六的活动心得，亚希亚站起来说：“我跟监狱里面数字帮走得太近了。经过上周六，我开始低调，结果受到很多压力。我很想出狱，可是——”大家都以为他要找借口，没想到亚希亚说，“要是我真的能出去，还需要你们多帮忙，支持我走下去。”哈，所有人都呆了。

隔着飞机窗户，我回忆安东尼、易卜拉欣、亚希亚、杰罗姆、格什温的模样，他们活在一潭死水的南非监狱系统中的某处，从波尔斯穆尔监狱换到可以待更久的地方，可能调动不止一次。随着每次转移，岁月如梭，他们那几周的修复式正义成果和情感进步会逐渐消散。被卢旺达和南非鼓舞之后，我问自己，同时也是静默祈祷：倘若

修复式正义并不只是司法系统的辅助工具，而是司法系统的核心，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3 牢笼里的艺术

乌干达与牙买加

悲伤是必然，但人造的地狱不然。

——尼尔斯·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

人类天性不是在沉默之中体现，而是表现在，语言、文字、行动与反思中。

——保罗·弗里尔（Paolo Frere）

非洲行程结束，我回到纽约以后先去探视“监狱直升班”，我不在期间，一个叫作“雷”的学生出狱了。虽然先前我听到语音留言“我回家了！”便立刻致电问候，但能面对面来个接风大拥抱，开心不在话下。直升班的学生都一样，离开监狱后没几天就去学校报到；而雷的反应也和前辈们相同，站在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前面瞪大眼睛，情绪激动。尽管名义上他早已是学院的一分子，但毕竟之前上课地点是在监狱内，如今才回到外面展开新生活。雷设定的目标是六个月内开始到学校上课，截至目前进度平稳，他也以平常心应对繁文缛节，例如定期与假释官会谈、参加愤怒控制和职业训练课程等等。

隐患在于，雷才27岁，而且依旧住在布鲁克林区，当初就是在那里耳濡目染才混帮派，涉入贩毒。经过七年，布鲁克林区比起当初看来是往上靠拢一些。“贝兹，以前我在杂货店可没看过什么有机农产

品呀。”他笑得灿烂。问题是时髦酒吧和手工奶酪店家底下，本质依旧是将雷推进监狱的贝德史督[注]地带，而我也不确定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他摆脱过去。唯一能做的是尽量鼓励，要他专注未来，学历是人生蓝图里重要的一环。

“身为你的教授，”离开学院送他去搭地铁的路上，我说，“我看得出来你有才华，那是你更高层次的一面。”我教他写作，发挥创意，在纽约的监狱教室里，我见证了语言艺术的魔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监狱写作计划等活动有所成效，美国社会形成共识，相信语言和艺术的表达过程极具认知治疗作用，尤其在监狱环境下功效卓著。后来许多组织如密歇根监狱艺术协会（Michigan's Arts in Prison）不只为狱友举办写作团体，还有音乐、园艺、瑜伽、视觉与表演艺术各种项目，并且持续推动数十年，价值深获学术认可。

但我想要更专注探讨艺术究竟具备何种改造效果。如果是在监狱内，而不是在大学课堂上，又如何？我去过卢旺达和南非，重新思考司法的基础是什么，也观察过报复和宽恕的过程，我也看见许多可能性，那是截然不同的改造方式。而才回到美国，我又满怀期待想要了解另一个改造工具，也就是艺术，是否同样能在刑罚的环境中提供疗愈。为此，我又得回到非洲去——这次目的地是乌干达。

乌干达约有3.5万名囚犯，其中半数尚未定谳，而监狱系统原始目标容量仅1.5万人。2004年，乌干达监狱署进行评估，结果却是一幅地狱景象：设计供23人使用的牢房住了265人，半数囚犯没有干净水源。政府着手改革，可是2011年人权观察组织认为改进幅度有限。根据报告，有41%的囚犯遭殴打，有时还是管理人员授意其他狱友动手；不愿意粗重劳动的人，即便是老人、身障者或孕妇，都会遭到杖打、掷石、被铐在树上，甚至焚烧；有人曾经被扒光衣服赶进水淹至脚踝的房间。乌干达监狱里，艾滋病与肺结核比例近外界两倍，但直到2011

年，相关医疗仍局限在单一监狱，事实上223座监狱中只有63座有医疗人员常驻。

倒是有个开心的发现：非洲监狱计划这个组织在伦敦与坎帕拉设有办公室，为监狱系统提供教育、辅导及医疗服务，并开放志愿者加入。他们对我提出的新方案有兴趣，打算在乌干达开设创意写作课程。

监狱是社会控制工具，和体罚互为表里

抵达恩德培国际机场之后，我花了三小时车程才找到公寓。这里要付押金，而内部阴暗脏乱，老旧不堪，外头还围着铁丝网，有个一脸剽悍拿着乌兹冲锋枪的警卫镇守。第一晚我真的太累，放下行李箱就呼呼大睡。隔天我到喜来登酒店要到了一个不太贵的价钱。酒店所在位置曾经是乌干达前独裁者伊迪·阿明的宫殿，广阔草地上发生过多次血腥处决。后来我还得找地方换钱。

“抱歉，小姐，这张20美元的钞票我们没办法收，年份不好。”

“年份？”我问。

“是。”对方没有多做解释。

我还买了一张移动电话卡，储值50美元，拨打以后系统却说没有余额。

“小姐，你这个号码是以前别家公司用过的。”

“怎么可能，我才刚买的？所以那50美元就飞了？”

“对。”回答干净利落。

回到旅馆，大门有炸弹检查哨。2010年，坎帕拉发生一起杀死74人的自杀炸弹攻击，与基地组织互通声息的索马里民兵团自称为幕后主使，后来乌干达在各要地设置岗哨检查爆炸物。他们手上有枪、态度凶狠，后车厢与仪表板旁边的柜子都得打开，等警卫挥手我们才能通行。其实搜查过程令人不解这样怎能预防爆炸案，但就制造持续的恐慌不安倒是成效卓著。

“明天8点45来接你。”出租车司机说。

“我11点到就好了，不是才半小时的路程？”

“会堵车。”他回答。

星期一，早晨晴朗，去办公室的路上堵车，车子走走停停，热得我满身大汗。2月的坎帕拉阳光依旧炽烈，车窗外人群熙来攘往，有些穿着军装，路面很多坑洞，飞过天空的秃鹳像是无人机。我拿出手机要拍照，司机忽然关上车窗。

“会有贼，”他提醒，“他们装成路人，一溜烟跑过来直接把你手机抢走。”

非洲监狱计划的办公室是山丘上一栋小屋，警卫在访客簿上注记我们的名字，里面有五个人，大家与我握手问候。墙上有幅乌干达地图，以图钉标示出223个监狱位置。我为写作课编排了讲义，内容包括：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创意？喜不喜欢故事或诗歌？是否想通过写作表达自我？涵盖的文类很多，有自传写作、戏剧、小说和诗词，作业则尽量通俗，而且选用非裔美籍文学的经典，以及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当地的作品，是我周末特地去书店搜集来的。会面结束后等出租车来接我时，我的电话响了。

“小姐你好，我是戴维。”是出租车司机，“我有点事情没办法过去，但是我找了别人帮忙，名字也叫戴维。听他说还在堵车，不过应该待会儿就到。”

所谓待会儿其实是一小时。回程堵车，又一小时。进了喜来登，穿过金属探测器和一堆检查，我心里实在烦躁，直接绕到旁边的“天堂烧烤店”，享受一筒水烟和一罐尼罗河特调啤酒。走在尼罗河大道上，有家酒吧播放着牙买加电子舞曲，路上的应召女郎长得漂亮，衣着华丽且熟门熟路，在每张桌子附近找客人。

翌日早晨我下楼到大厅时，也有应召女子同电梯。我出门前在旅馆内的商店晃晃，看到一些书籍打折促销，但内容不太搭调：《乌干达鸟类百科》《终结乌干达枪支暴力》《16种女人要你命：教你辨认和回避》。

“很多人觉得进监狱就代表有错，”出租车司机戴维如是说，他才刚闪过与一群当地的摩托出租车相撞的惨剧，“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吧？又不是没有冤狱。”

到了加油站，监狱计划的成员琼过来迎接。我尚未取得在卢济拉监狱担任志愿者的文件，所以得由她带进去，希望能一路过关斩将。我们从大路转进小巷，小路两旁是坍塌砖屋和生锈的铁皮屋顶，一片狼藉。泥地上轮胎痕很深，泥水简直成了小河。途中经过破破烂烂的屋子，冲出一群鸡，外头的招牌“好生活医疗中心”还没有拆掉，油炸面包树果实和咖喱饺的香气非常诱人。

琼停车跟摊贩买了一些印度薄饼。虽然年纪比我还小几岁，她看上去却几乎像年长一辈，不知是不是身上那袭粉蓝色套装的缘故。朝监狱走去的路上，她提起自己在坎帕拉长大、取得大学学历，以前是中学教师。

“现在呢，以监狱为家。”

我点点头。“偶尔会有这种感触？”

“不，我是真的住在里面。”

原来琼的丈夫是狱警，夫妻与两个小孩就住在监狱土地上的一栋单房小屋。而所谓大门，事实上是铁丝网开洞。琼指着狱警宿舍给我看。之后我们沿着石头路往里面走去。囚犯穿着阳光黄制服，像是土地上的雏菊，他们正在翻土。

“典狱长要囚犯整理花园。”琼解释。

卢济拉监狱以不同区块区隔不同群体，例如定罪、候审、女性、死刑犯。监狱于1927年落成，是殖民时代主要的监禁场所。那时期这种监狱主要服膺于白人国家利益，囚犯是棉业免费的劳动力，商人为了不被关就花钱贿赂官员。乌干达也一样，殖民政府熟练地制造出许多囚禁人民的理由。历史上，非洲监狱就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和体罚互为表里。如乌干达这种英国殖民地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废止体罚，那年代有六成囚犯被以逃漏税或通奸罪名关起来。

靠近大门处，穿着黄色衣服和拖鞋的老囚犯拿着凑合的扫帚清扫。狱警挥手要我和琼进去，他穿着军装、卡其衬衫和短袜，并戴着红色贝雷帽。

“包包可以放这里。”琼指着充当入口哨塔的小屋。我将皮包挂在生锈墙钩上，旁边堆着用过的手写识别证。

外面花园打理得很好，同样黄色制服的人来回整顿青葱灌木。这画面不禁让我想起课堂上介绍过的美国经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奴隶自述中的一幕：他描绘了他主人那伊

甸园般的丰美花园，对于饥饿的奴隶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诱惑，由此导致了许多违规行为和可怕的鞭打。

负责的狱警先和我握手，然后出示徽章并放在桌上，打量我一阵以后低声说了几句话，意思大概是正式许可下来之前先提供工作证之类。再一次握手，大功告成。

又穿过几道门和卵石小径，就是监狱深处乱七八糟的宿舍区。太阳下黄色制服四处堆放，长裤披在灌木丛上，枯树枝吊着上衣乍看像是开满花。混凝土小屋的窗户后面有眼睛在窥探着，琼告诉我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4点，囚犯可以自由活动。后来我们跟着几个男的走向像是箱子的水泥建筑，那就是目的地。囚犯们脱了鞋，好像要进入圣殿似的。

“欢迎来到非洲监狱计划设立的图书馆。”琼说。

屋内中央有张木桌，周边有三台旧计算机，10多人坐在长凳上，制服背面印着个人信息，例如“候审，23号房，债务问题，清洁工”。有些人静静地走来走去整理书籍，我瞥见有阿瑟·米勒的《熔炉》、星舰迷航记系列、《数学方法》和《希腊旅馆导览》。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婚姻的缺点：造成贫穷。”今天是成人应用识字班的最后一堂课，被大家戏称为“校长”的威尔逊正在作总结。之后他还和另外9人取得授权，开课传授金融、社交、家庭计划方面的知识给同为狱友的弟兄。从他耐心却也威严的态度来看，教学经验应该十分丰富，而且不难察觉其领袖地位。威尔逊与他的“教师教育班”成员们都会参与我的创意写作课。

“对，汤姆，说得很对。”威尔逊讲课生动活泼：“婚姻其实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在找对象以及决定是否结婚之前要三思。”

琼要大家注意，然后介绍我是美国来的教授，也是之后写作课的讲师。其中一个人目光锐利，举手发问。

“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也诚心欢迎你。我自己很喜欢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不过，”他问，“教授，为什么只能一星期？不能是完整的大学课程吗？”

“他的意思是，”威尔逊出面解释，“很多像你一样的好心人来开课，但是来来去去，课程结束就离开。不知道你能不能设计可以延续的课程？”

“我是这么希望的，”我回答道，“你们所有人经过训练以后都能够成为写作老师，在我离开以后可以接棒讲师的位置。”汤姆听了若有所思点点头，接着有个粗壮囚犯进来，他有双红色小眼，蓄着胡子，肚子颇大。

“这位是主席。”威尔逊为我介绍。卢济拉监狱采取犯人自治制度，所以课程也需要负责人背书授权。

“没问题，可以开课，”他用力和我握手，“创意写作？我也来旁听。”

学生们还有一连串的问题，想知道证书门槛、给分标准之类。到了点名时间，大家鱼贯而出，我通过金属探测器回到喜来登酒店。

痛苦是疗愈的过程

第一堂课早上，我还在旅馆喝黑咖啡时，电话忽然响了。

“小姐，我今天不能过去，”司机戴维说，“有事情得去医院，但是我请哈金代班。”

于是哈金载我过去，堆着笑脸跟我多要些小费。

平安抵达监狱图书馆之后，我等学生进来。狱警每天浪费很多时间点名，占用了宝贵的上课时间，学生们也都一个一个慢慢到齐。哈桑曾经在建筑公司上班，有商科学位。尼古拉斯是布干达（Buganda）族后裔，以前从军。神情严肃的汤姆喜欢高尔夫球，有法学院预科证书，狱友们叫他大法官。资深的监狱福利官也来上课，她一副慵懒的样子，令人怀疑也许她连自己的福利都不在乎，怎么替别人争取福利。穆罕默德身高2.1米，但年纪不到21岁。他说自己写了些音乐，现场还演出一段雷鬼歌曲，副歌有一句是：“噢，女性受了多大的苦。”

“曾经有一个叫做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人说，‘心灵因文字而生出翅膀。’”威尔逊大声念出课程纲要，然后抬起头：“这句名言背后的概念是，即使一个人遭到囚禁，他的文字依旧自由，就像心灵一样，永远不受拘束。”

“有没有人读过奴隶自述文学？”我问，但是他们一脸茫然。

“美国一开始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我解释，“奴隶们书写自己的经验，出版以后获得很大的回响。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揭发社会不公！”穆罕默德叫道，伸手指向半空。

汤姆声音洪亮念诵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45年出版的作品，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奴隶自述经典。“我无法确认自己的年龄，从来没有看过正式文件记录。大部分奴隶都一样，就像马儿不知道自己几岁。做主子的大半希望奴隶一无所知下去。”

“他连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威尔逊说。

“很悲哀吧。”我问。大家都点头。

“值得注意的是，”汤姆说，“他不以自己已经确定的事情来展开故事，而是从确实不知道的部分开始。很特别。”

我们又念了另一段，作者道格拉斯目睹血淋淋的鞭刑。

“很残酷。”威尔逊直接道出心声，也说道格拉斯文笔很好，表现出压抑、富有韵律的节奏起伏，并且援引《圣经》。学生们很认真，但气氛不热烈。我要求他们动笔，书写自传第一页。远方响起鼓声，他们随着节奏振笔疾书，我也趁机读了他们的课前期望：“我希望充实知识。”“我希望保持想法新颖有创意。”“我期待在写作中体验团队精神并激发、唤醒自己的创意。”

过了半小时，学生们开始分享成果。

其中一个人写到索马里第一大城摩加迪沙发生战乱，回家以后得知自己父母儿子都死于艾滋。

“生活不易。”这是他下的结语，但若要以这句话贯穿现场每个人的生活，还嫌力道薄弱。威尔逊给自传下了标题叫做“从垃圾堆里站起来”，并亲自朗读内容：“我还没出生就不被看好，因为这是一夫多妻家庭，父亲巴法基先生有另外7个太太。兄弟姊妹太多，大约60人，排名落到第37的我却是母亲唯一的一个。”

他五岁丧母，后来受到继母们虐待“她们都相信巫术”。为了赚学费，他去邻村替一个有钱人做工，没想到才开始没多久就被同事诬陷，要为公司损失负责。开庭之前他被关了一年半，结果被判处13个月徒刑并要赔偿600美元。无论威尔逊有没有责任，不难理解他的人生充斥贫困、虐待及伤痛。

这里每个人都一样。他们之所以对奴隶自述没有多大反应，是因为内容不算新鲜事。有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却始终遭受虐待；有人从小就得乞讨食物，他们对抗贫穷，在外流浪，和病魔战斗——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一群人。就连非洲监狱计划来的琼，明明只是陪着大家一起练习，结果说出的故事也同样凄凉。

“我以前的生命里，唯一的体验就是虐待、殴打和不幸。”她大声朗读，“也因此我一直情绪不稳定，只要想起过去受到的折磨就不由自主落泪。”

最后一个发表的是汤姆。他之前开口就提起狄更斯与哈代，可见受过正式教育，这一点在他流畅的文笔中也得到印证。汤姆就在恩德培市长大，环境并不差，入狱原因是白领犯罪，过去以为是朋友的人全部与他断绝往来。

“我只能向前看，积极改善自身处境，心态正向。至于当初弃我于不顾的人也不必放在心上，因为我没有多余心力用在记仇这种小事上。我想成为更好的人，在这条路上我不会回头。”

下课以后我依然深受感动，而且很意外学生都接纳这次的随堂活动，愿意好好诉说自己的故事。同时我也心情沉重，为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感到哀伤。面对作弄人的造化，只靠文字能起什么转变？

周末的时候，朋友的朋友，才20多岁的阿尔来找我，我们两人都喜欢雷鬼音乐，而且没想到雷鬼在这边很受欢迎。乌干达人口有四分之三未满30岁，大半是1986年选出新总统以后才出生的，因此音乐文化显得特别年轻。在此之前，一开始有伊迪·阿明的暴政，后来又经历几次军变政变，直到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上台以后，局势才得以稳定并发展文化。乌干达音乐节还在自我追寻的道路上，过程中必然要大量参考外来刺激。阿尔带我一晚上跑了好几间相当厉害的夜店，我的感想是乌干达人可能比牙买加人还要牙买加。

或许因为我是外地人，带着我也新鲜，于是阿尔自愿兼任导游，让我看看这里的日常生活。星期六早上他开着银色奔驰过来，但挡风玻璃裂了，还少了一侧后视镜。

“上个月被一辆摩的撞的，”他解释，“所以路上要避开警察，没有后视镜不能上路。你懂吗？”他继续说：“有没有去贫民区看过？白人好像都喜欢看贫民区，在那里做了不少善事。”

于是我们前往坎帕拉旧城区，位于以前高角羚栖息的山丘地带。讨价还价以后，我们买票进入卢布利（Luburi），也就是以前布干达王国(注)的宫殿，导览涵盖参观阿明的拷问室及劳斯莱斯轿车。由于偷窃和抢劫在乌干达是家常便饭，我来这里以后老是提高警觉，幸好阿尔为人亲切，这天我终于能放松些。他问了很多美国的生活，尤其是开销部分，顺便告诉我乌干达的社会现况，批评当地的排外风气，也解释其实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居民是卢旺达移民后裔，阿尔的家族在早期小规模种族迫害时代就逃出来。后来他一直想要说服我：乌干达人其实比卢旺达人好相处。

“卢旺达人就算表面上笑嘻嘻，到时候还是会动手杀人。在这里至少死得明白啊，对不对？”

后来开车的时候，他突然在驾驶座上慌张大叫：“快点，给我一点现金！”

“啊？”我下意识掏了钱。

阿尔将汽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警官您好！”那笑容真是可掬。

“你好。妇女节过得还顺心吗？”

“好极了，警官先生！我待会儿还要为旁边这位女士下厨呢！”阿尔伸手，对方也笑着握住了。

“一路顺风。”警察对我说：“妇女节快乐！”

我们赶紧继续前进，免得因为缺了一边后视镜还要缴罚款。刚才那一幕应该算是最友善的贿赂吧。

“我啊，很高兴不是住在卢旺达。要是换成基加利，没办法像刚才那样吧？活在什么都要规规矩矩的地方也很烦。”

隔天早上看报纸时，一篇报道谈论穆塞韦尼总统和政府弊案，另一篇是距离坎帕拉两小时的郊区发生爆炸案，再来则是有个20岁、感染艾滋的女性和一岁大儿子住在卢济拉监狱，已经长达三年，一直在等候重审。罪名是什么？偷了一部移动电话。我去监狱之后将这件事情说给学生听，他们没什么反应。

“有多少人是付不出罚金或者没钱贿赂，所以才被关？”我问他们，并提起周末路上的遭遇。有九个人举手。

贪腐渗入这个国家的骨子里。2012年，“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起“东非贿赂调查”（East African Bribery Report），结果乌干达的案件数名列第一，指数高达40.7%。同年有1270万美元的捐款提供给乌干达总理办公室，指定用于重建该国饱受20年战乱蹂躏的北部以及最贫穷的卡拉莫贾地区——然而，那笔钱最后却进入好几个私人账户，导致欧盟暂停援助。

其实不仅乌干达如此，观察全球各地的监禁制度，会发现金钱和司法两者存有太多不堪的连结。即使在美国，大家也明白花多少钱请律师，赢面就有多大，更不用说保释也要钱，所以有钱人鲜少接受认罪协商。但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贿赂？真相令人沮丧，可是各国司

法真的有价，且异常昂贵。有个案子是密歇根青少年在禁止捕鱼的季节捕鱼，于是进监狱蹲了三天；还有伊拉克战争退役的老兵无家可归又喝多了，闯入别人弃置的房子，下场是被关22天。这两个案例中，监禁的用意甚至不在于惩罚，而是被告负担不起日益飙升的刑法罚金。还有，逮捕令、法院指示的药物和酒精检测、DNA鉴定、陪审团费用，这一切不就是于法有据的勒索？

我们开始对威尔逊发表的自传内容进行讨论。

“牧师，”汤姆先开口。通常都是汤姆带头，因为他的文学底子较好，但态度总是严肃，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他的笑脸，“你字里行间透露出讯息，认为一夫多妻制给你和家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应该不是我会错意吧？”

“没错。”

“那么你如何将这个讯息展现给读者呢？”通过这个问题，大家意识到写作上的重点：意义是不用说的，必须具体展现。威尔逊深呼吸一口气。

“经济压力，手足之间的纷争，被继母们排挤的痛苦。当然也会被她们打，而且是每天，有时候拿皮带打，有时候拿木棍打。久而久之我就意志消沉。”他叹口气。

“你还提到自己曾经为有钱人做事吧？那是什么感觉？”汤姆几乎成了我的助教，我乐见其成。

“我已经长大了，回想时尽量不哭。但说真的，那段日子很难熬，比在家还要辛苦，而且年复一年受委屈，最后只能跟上帝哭诉，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祂遗弃了。”

威尔逊停下来摇摇头：“写自传很难受，因为得回忆那些事情，一想到就不舒服。”

“那种痛苦是疗愈的过程。”汤姆苦口婆心，威尔逊耸耸肩，手指在黄色软帽上磨蹭。后来几天，我进一步理解了威尔逊的痛苦，也看见他的伤口虽缓慢但确实逐渐愈合。一天早上，上课时间还没到，他和我坐在长凳上，聊到了之后的生涯规划。威尔逊打算出狱以后成立服务监狱的教会，协助出狱人员进入农场工作，之后他以布道般的口吻为我说明这里囚犯的处境。

“空间太挤，我每天只能侧睡，被子上满是虱子和疥虫。伙食不够，没有干净水源，很多人出卖肉体是为了喝口水。”

“这儿的环境连我妈那种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穆罕默德在一旁听见我们的对话跟着加入：“一开始我哭天喊地觉得自己明明没犯罪为什么会被关进来，不过久而久之也学会怎么生存了。”

外头有人大声嚷嚷，一个学生读《美国奴隶》（*Slavery in America*）读到一半抬起头：“我们还是去点名好了，免得他们拿棍子进来。”

听到棍子我打了个寒颤，或许也是因为点名搞得人心惶惶，这天上课气氛比较沉闷。我节录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可是没人有空预习，也因为还不懂练习重点，所以没有人写得出戏剧性对白。他们第三次点名回来，我索性开始随堂活动。

“我很快乐。”我在黑板上写下这句话，然后请学生接手，用句子展现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只说出快乐两个字。

罗德里克举手说：“我很高兴终于等到开庭的日期。”

“但那是怎样的一种快乐？”

“那干脆说‘我出狱了好开心’？”希拉吉指着空气说。

“终于不用乞讨食物，我好开心。”主席大声道。

最后威尔逊也站起来说：“我开心得跳起来了。”

“对！”我叫道：“这样就展现了画面和情绪。”

他们纷纷点头。

接着换一句：“我很惊讶。”

穆罕默德：“我爸打我妈，所以她离家出走，我很惊讶。”

哈桑：“我得当军人，拿的枪很重，我好惊讶。”

从这些鲜明的伤痛记忆中提取情绪，对囚犯而言是很大的考验。

又要点名了，学生们赶紧收拾。

“我们要回‘病房’了。”威尔逊嘀咕说：“贝兹，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吗？因为医院这么说。对那些人而言，我们有病，而他们正在施予治疗。”

写作可以使我们的心思离开监狱

我在坎帕拉找到一些乐趣。在外国人常去的地区能看见当地艺术蓬勃发展，傍晚开始酒吧有水烟，维多利亚湖畔的沙子很白。可惜每天依旧要面对被偷被抢、乌兹冲锋枪和炸弹检查哨，再加上无论见过的还是没见过的许多人，目光都带有敌意，氛围使我精神疲惫。进入卢济拉监狱所见并无法提振士气，学生都很优秀，但距离他们实现梦

想遥遥无期。每天下车之后走去监狱的路上经过贫民区，景象叫人非常心痛，也助长我心里那股愤世嫉俗的情绪让我感到越来越陌生，仿佛我在卢旺达、在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假象。我自以为追寻的可能性真的存在吗？尤其身在乌干达，反而听到卢旺达的黑暗面，有人认为那里军警协助政治清算，锁定批判政府人士加以监禁，甚至灭口。我听了以后很伤心，怀疑自己那些美好期待是不是幻梦。

然而，进了监狱我就看见学生们在桌子前面埋头动笔，忙得连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尽管卢济拉内部环境和制度缺失一再泼我冷水，只要一上课我就会稍稍舒坦。他们写作的内容深刻又生动，某一天主题是短篇故事，威尔逊又虏获众人的心，他说到蛇和毛毛虫参加宴会，最后却被打一顿赶出来。

“后来蛇怪蝴蝶不该骗他，说他能够得到大家的接纳。”他念诵：“但他们都忘记了，蛇只是将旧的皮褪下来，本质没有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寓言。”我说：“故事应该有个启发。”

汤姆举手，这次他脸上终于有了浅浅笑意。今早我进监狱大门时就遇见他，他说会稍微迟到，狱方管理人员找他谈话。

“汤姆，一定有人告诉过你，你文笔真的很好。”我说。

“怎么敢当。”他微微鞠躬，那时还没有笑意：“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开设大学程度的班级。”

结果我只能支支吾吾，说我会看看能不能为他发表作品，暗忖以他的才华而言，自己能做的实在有限。

“如果我真的听懂了，”汤姆朝着威尔逊说：“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改变太肤浅的话就没有意义。”

“还有，”威尔逊插话，“我们可以像蝴蝶一样，经过蜕变、成长，改造自己，然后生出翅膀。这座监狱里面有很多人正在努力。”

下一个自愿发表的人是主席。他的故事是星期天和家人去维多利亚湖畔休憩，乘坐摩的“跟在豪华轿车组成的舰队后面，吸着它们排放的废气，看车主们在湖畔享用大餐，好像一口一口吞下钞票”。他笔下的渔船和水面波光好像有了生命，一只只脏脚放进湖里的画面活灵活现：“漂亮姑娘们来回逡巡，请客人点杯饮料、来盘烤鱼，不知不觉中取走大家身上的现金”。

念到这里他忽然停下来，将作业摊在桌上。“我只写了这些，”主席说，“再回想下去很痛苦。”

“痛苦？”威尔逊问：“你才刚刚带着我们一起去度假，让我们都忘记痛苦啊。写得很美！”

“我听得都想吃鱼了。”穆罕默德叹口气。

“要搭配尼罗河特调。”哈桑跟着说。主席听了大家的赞美似乎心情好了些，表示自己晚上会完成文章。

“就算只是暂时，写作可以使我们的心思离开监狱。”威尔逊说：“有文字，就有翅膀。”

这周之后某一天，阿尔找朋友带我去坎帕拉市高级地段科洛洛（Kololo）区金合欢大道用晚餐，三人一下子就熟悉了。阿尔心思敏锐也不厌其烦地一再解释当地风俗，加上他真的很清楚什么地方有上等雷鬼音乐，而且是少数不会让我时时意识到自己白人身份的真正朋友，但对他而言，我也还是很新奇的存在：怎么会有个女人跑来整天蹲在监狱里呢？

“你真的在监狱里面工作？”阿尔的朋友从副驾驶座转头问我。他解释自己去加州念大学，所以讲话带着美国腔调，后来又说：“你应该见一下我爸。”

车子回转，好像进入坎帕拉的平行宇宙，道路两旁有树木，路面上不再坑坑洼洼，房屋风格很美式。车子停在一道铁门前，有两名武装警卫驻守，进门之后还要拉起围栏才会看到户外用餐区，已经有五六人坐在红木椅子上。

阿尔向朋友的父亲打招呼，对方穿着条纹衬衫，器宇不凡，身旁的女性头发盘得十分高雅。他打量了我一会儿。

“这美国人是？”

“我是纽约来的大学教授……”

“坐吧。”他吩咐完就拉出一张包着塑料膜的椅子，也立刻有人送来一盘鸡肉和凉拌菜。

“吃吧！”他举起戴着尾戒的手，取出嘴里吃剩的骨头放在餐盘上。

“今天正好庆祝他出狱。”夫人解释。

原来我有幸和穆库拉上尉同桌用餐，他曾经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内做研究，还担任过卫生部长，不过涉嫌侵占一笔8.4万美元的疾病防治捐款被判处四年徒刑，入狱两个半月以后上诉成功才获释。盘子收掉以后，他抬头和我聊了起来。

“所以你在卢济拉做志愿者？”

我点点头。

“那里环境真是糟糕，一定要好好改善，得有人想点办法。”他握拳往桌子一敲：“关在里面的人其实都很聪明，可以学点技能，就算养鸡也好！能做点有用的事情吧，不然就去社区服务啊。关在监狱做什么，真是浪费。”

他开了一瓶可乐。我看着他，想起纽约市前警察局长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Kerik）也曾因为逃漏税问题入狱三年，后来他大声疾呼监狱系统必须改革，不但写书还上媒体，一直呼吁强制性的最低刑度设计会害惨犯人。

“以前从来没看他那么激动过。”餐后穆库拉的儿子这么告诉我，而我已经将名片交给前部长先生，还表示会请同事与他联系，研拟大规模改革计划的合作可能。“入狱之前他大概从没在意过里面如何，结果现在成天想着这件事。”

我只怀疑冲击感褪去以后，他是否还会继续思考下去。

还好这也是我在卢济拉的最后一天了，反正我根本没申请到正式通行证，还与一个态度很差的警卫起了言语冲突，之后恐怕没机会从侧门偷溜进去了。好不容易好说歹说通过乌兹枪口，我走进图书馆，原本读着《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威尔逊抬起头。

“贝兹教授，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问。

“没有喔。”

琼吃了一惊跟着抬头：“纽约那边对没信教的人不会排斥吗？”

“我的信仰就是做善事、追求正义啊。”我知道这答案太过牵强，但也只能尽力避开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题。威尔逊识相地笑一笑，搭着我肩膀。

“就算没有耶稣指引，贝兹你也一直都在行正道了。”就极度传统保守的国家而言，他这番话已经展现出高度宽容，但也很符合我认识的威尔逊。

那天上课主题是论说文，我们讨论婚姻法案，罗德里克坚持那是可怕的立法概念。

“不就是贬低婚姻的价值吗？《圣经》上可没有说过同居这种事情，只有婚姻。”

“但是如果同居或相伴很多年，其实就和结婚没有两样啊。”汤姆也不退让：“所以英语有一句俗话说‘看起来像鸭子的话就是鸭子’。”

“不对！”威尔逊叫道：“婚姻是神圣的，我们不应该随意改动。”

“我很清楚这种文化僵化状态，”汤姆跟着激动了，“但这个国家在蜕变，我们不应该墨守成规，必须挣脱旧思想。”

他说话平稳却强硬，有点像是国会议事。

“我们不能以过时的习俗将女性视为禁脔。”汤姆继续解释：“乌干达需要改善家庭环境，但买新娘的文化风气却将女性看成了财产，我们不应该倒退回20世纪20年代。”

“问题就是如果连嫁妆都不用付，”威尔逊不同意，“对男人来说反而像是免费。要花钱至少还会珍惜一点！”

时间不多，本来计划是以非裔美国人的诗词作为课程收尾的，但我不得已中断他们的辩论。

“诗，”威尔逊好像品尝着这个字，“是思想融合了节拍韵律。”

尼古拉斯为全班朗诵马娅·安杰卢的作品：

> 囚鸟鸣叫，唧唧啾啾，忧惧未知，仍旧渴求
> 声音遍布，远方山丘，只因囚鸟，歌颂自由

威尔逊的脸几乎贴在讲义上，简直就要陷进那些字句里。

“在卢济拉的我们就是囚鸟。”他感慨道。

剩下一小时，我们在字里行间的沉思中度过。

威尔逊朗读马娅·安杰卢时那抑扬顿挫十分动听，他那张苍老又年轻的脸上笑意灿烂。

> 是我眼中的火，齿间的光，腰身的摆荡，脚步的飞扬。
> 我是个女人，出色的女人。

“这种力与美属于坚强的女性。也许是人性。”威尔逊神情很快乐。

班上每个人都恍惚了，连我也一样。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沉浸在文字的体验未曾如此深刻。我猜想是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怀抱真切渴望，若我都想离开了，他们怎能待得住。这种强烈渴望可以敞开心灵，接受文学与艺术带来的转化力量，效果极其巨大、刻骨铭心。

我要他们作诗，学生们毫不犹豫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穆罕默德的作品叫做《贫穷》，力道强劲：

> 快点！用力！这里！

放下来！举起来！都打开！搬出去！
贫穷，贫穷，贫穷！为何你还逗留？

吉米的诗结尾很精彩：

大家何时愿意清醒，
别让每个人都成为监狱的主人，
好好想想，逝去的时间永远追不回。

最后是彼得：

噢，艾滋，艾滋，艾滋，多么残忍的疾病。
夺走我的父母与兄妹，为何放我一人
留在人间？
不知你能否理解，独活很累。
艾滋，如果你听见，
带我离开这世界。

一片沉默。

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充分响应这样的文字。而另一方面我内心欣喜，因为学生们竟能在短时间之内掌握一种未曾接触过的文学形式。

“上帝保佑你，”穆罕默德轻声说。告别时间到了，空气中充满感伤。

“记得替我们问候纽约的狱友，”汤姆语气很无奈。

“不能再多留一星期吗？”威尔逊问：“你带我们接触到这种美妙，却又要将它带走。”

我听了很难过、很惭愧，每次在监狱里面开课都这样。对我而言是重返自由，但是学生们要面对的依旧是牢房。今天的状况更糟糕，难过不仅是因为我关心他们却又得离开，还因为我这一走恐怕就不会再回来——我将他们留在这种地方，人间炼狱。而惭愧的是，威尔逊说得对，我在这里埋下人性、创意和思想自由的种子，揭开囚犯的情感疮疤，却好像跳伞那样安安全全回到原本生活。虽然我怀抱一丝希望，但也怀疑课程恐怕无法延续。他们超越了自己，可是才一周，维系不下去的话有什么意义？

“走吧。”汤姆语气沉重，挽起威尔逊的手臂，随着其他人离开图书馆，从学生变回囚犯。

我低头望着桌面，屋内空空荡荡，剩下一张课程大纲，上面引述了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句子：“只有沉迷于写作，才不会被现实击垮。”

一周以来，班上学生确实沉迷于写作之中，但并非逃避现实，过程可以带来情感上的成长。2013年的研究显示，受试者如果阅读文学作品，之后通过照片中演员眼神来判断情绪会较为精准。研究者分析，原因是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帮助人们优化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技能与思考过程，对社会的正常运作有所帮助。1990年也有一项针对阅读疗法的研究，发现：狱友参加写作课程以后，对挫折的容忍度提高了，更愿意披露自己的痛苦、罪恶和悲伤感受；写作过程、事后修改、自我和同侪的评论，也都有助于探索价值观，增加自尊，培养同理心。

这星期我亲眼看着他们做文评、辩论，彼此对话深具启发性，同时囚犯开始挖掘从过去到现在的各种情绪，学会如何倾听他人，理解他人，理解别人的矛盾挣扎——即便他们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可怕残酷。

“阅读帮我学会控制脾气。”在纽约的学生卡尔这么提过：“开始看书，就得看完。有时我读得心浮气躁，不懂到底什么意思，挫折感累积以后很生气。不过为了读到结尾，我必须有耐心，而耐心就是易怒的特效药。”在加州，另一个写作班的狱友学生则将自身体验整理成一句话：“我学到的不只是写作，还有自己可以治疗自己。”

没错，即使人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旦开始接触艺术、美感与思辨，囚犯也能够找回最崇高的自我—— “宛如新生”，这是另一个狱友学生科里所言，他认为在课堂上才能连结到更高层次的自我，若回到永远给他贴上犯人标签的世界就不可能。科里还说过，他觉得我从老师的角度，看得见他人性里面尊贵的一面，其他人则办不到。

巴西哲学家保罗·弗里尔（Paolo Frere）在著作中提到：“人类天性不是在沉默之中体现，而是表现在语言、文字、行动与反思中。”他还认为对话是一种“创造的行为”，需要爱和信念，“对人类的信念，对创造与再造的信念……对自己可以更具人性的信念”。这就是在牢笼、在艰苦环境中也要阅读、讲话和写作的理由：为了唤起人性。为了乘上言语的双翼。为了回到语言。为了找回监狱想磨灭的身份。为了在肉体遭到禁锢时掌握心灵自由。为了不再只是“我”，而是在一个充满文字的教室里，强大的“我们”。

搭机返国之前，阿尔和我去了金贾市（Jinja）一趟，据说尼罗河起源于此。离开坎帕拉大塞车以后我们进入乡村，周围都是松树林或菠萝园，我们打船到河上小岛，住在模仿树屋的特色旅馆。芦荟环绕，水流潺潺，心灵在此沉淀，我开始思考这趟旅程的意义，衡量自己的收获，以及点燃囚犯心中火苗后不得不离去的惆怅。假如发挥的作用如桶子里一滴水那样单薄，改变是不是就没了价值？接着我想起进入卢济拉监狱第一天就浮现的质疑：面对真正的绝望，文字算是什么？没错，将艺术带进监狱对于个体转变有很大作用，可是之于社会

结构，之于司法刑罚制度内巨大的碾压，这种活动似乎只能称为消遣吧？

禁止逃狱

为了脱离思想泥沼，离开乌干达几周以后，我前往牙买加，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就监狱内的艺术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只不过领域不大一样，是音乐。从英国到印度，世界上许多社会都认为音乐可以净化囚犯心灵，而美国也有诸如奴隶歌谣、监狱蓝调这类文化，甚至在安哥拉监狱（Angola Prison）出了一个民歌传奇人物铅肚（Lead Belly）注。

“已经是官方计划之一，因为有欧洲国家出钱赞助。”牙买加当地社会运动和教育人士凯文·瓦伦（Kevin Wallen）解释音乐矫治计划的进展时如此表示。我约他在金斯敦郊外赫夏海滩（Hellshire Beach）注一起午餐，想要了解自己将要参观的这个计划的历史脉络。

1997年，凯文·瓦伦和哈佛教授查尔斯·内森（Charles Nesson）着手改善牙买加监狱环境，设置图书馆、计算机室、广播站、录音室等设施，于是诞生出贾·库尔这位知名雷鬼乐者，可惜几年前我没能得到采访许可见他一面。贾·库尔在这里录制了几首我最爱的情歌，而我终于能进去一窥究竟，了解是什么样的计划造就了他。为我处理手续的意大利人卡拉十分积极，几年前这个计划由凯文交接给她。

翌日我搭出租车出发。新金斯敦像美国大都会一样，摩天大楼和热闹商场处处林立，然而牙买加首都的市中心区年久失修，对旅客而言不大体面。金斯敦的新旧区之分不只是地理，也是社会阶级。这段

车程缓慢平稳，可是路旁风景清楚揭示贫富差距和帮派存在。黑帮暴力犯罪从20世纪70年代起肆虐金斯敦的“战区”（garrison communities），也就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少数民族区，结果是在过去十年间牙买加的命案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虽然岛国人口才270万，却在2004年以后每年超过1000人被杀害，所有刑案中他杀占了5%。但不意外的是，牙买加也有将近半数的囚犯罪名根本与暴力无关。根据2012年该国警方统计研究，“典型囚犯”多半在34岁以下，而且24岁以前就因违反枪械法而遭到逮捕，后来也多半持有枪支却未依法缴交注册费用。

“去GP，”我告诉出租车司机，GP指的是“综合监狱”（General Penitentiary）。“知道吧？”

“你疯了吗？”他以当地腔回我话。

道路对面看起来像堡垒的建筑物就是牙买加最大的监禁机构，目前里面住了大约1700人，可是设计容量只有650人。血红色砖块加上混凝土，优雅的哨亭、20英尺高的围墙，在政府网站上被称作“精致的牙买加乔治亚建筑风格”。历史追溯到1845年，也就是牙买加全面废除奴隶制度的七年后，然而奴役不是唯一的刑罚手段。1865年牙买加通过肉刑法，当地人称作鞭刑法，连窃盗都能判处最高50鞭；刑事奴隶法可谓美国囚犯租借制度的先驱，将之前沦为奴隶的囚犯再度以人头计价交到雇主手中。1841到1861年间，担任牙买加监狱总长的约翰·多特里（John Daughtry）参考费城东区矫治所的方式整顿GP，到了1985年，犯罪矫治法又将“囚犯”正名为“狱友”，“狱卒”更名为“矫治人员”，连机构名称都改为“塔街成人矫治中心”（Tower Street Adult Correctional Centre），只不过大家还是习惯叫它GP。

“我喜欢你的眼睛。”在停车场等卡拉时，一个满口黄牙的年轻人过来搭讪。他来这里接被关了17年的哥哥出狱，但没人告知确实的

出狱时间，所以他只好天一亮就过来等。他说囚犯每个月可以有两次会面探视，不然亲属可以选星期三送食物和日用品进去。等他哥哥出来，今天第一站是去医生那里报到，彻底体检之外还要喝什么净化茶。

“我现在住牙买加，之前在布鲁克林。”年轻人拉了拉头上的洋基队帽子。

“奥蒂斯维尔？”我说出自己任教的纽约监狱。只是个猜测，但他那口吻就是暗示了。

年轻人点点头：“六年。到处换。奥蒂斯维尔、艾尔米拉，瑞克斯岛最糟糕。你该不会看过我吧？以前里面打得很凶。但总之和这里比起来，美国还是像度假啦。看过里面吗？”他往旁边撇撇头。

卡拉到了，她黑白夹杂的头发在脑后绑得像条绳子，非常公事公办的感觉，见了我以后一挥手就快步朝门口走去。

“走吧，已经迟到了。”她说：“动作要快些。”

“帮我看看我哥几点出来？”年轻人露出一口烂牙朝我背影叫道。

我的护照复印件被贴在混凝土墙上，就在服装规定的条例底下。手机得放进大保险箱，里面堆满各式各样的诺基亚手机。检查我随身物品的狱警拿出尺子，在很大一本访客名簿上写下名字。

穿过一直哔哔狂叫的金属探测器，我们走进广场，卡其色囚服一件件挂在晒衣绳上随风摆荡。围篱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新的一天。”

“女王！小个儿！白妞！”

“我挺喜欢你呀！”

“和我说话！”

“女王大人！”

四面八方都有人朝我乱喊。

对我来说这倒是头一遭。一般来说，闯进监狱的外人只会受到注目礼，偶尔可能有人挥挥手，但我们总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毕竟住在这里的人自己也好像被活埋似的。可是在GP不一样，囚犯确确实实注意到我，这现象叫人颇为不安，但我比以往更能直击人间地狱的核心——因为没法躲避，一切就在眼前。这里的囚犯每天离开监禁、死而复生的时间只有四个半小时，而他们显然抓紧机会享受生命，所以广场很嘈杂，每个人忙着自己的事情，几乎可说根本是座大型足球场，只是周围环绕如同中世纪的小型牢房。

后来回到办公室，我见到卡拉的助理乔治，他描述自己在牢房的三年体验。

“至少可以说带来很多启示。”他这么告诉我：“很小很小的空间要挤三到五个人，而且没有马桶，尿尿得找瓶子。大便就更麻烦了，一开始得昭告所有人，再来是去拿报纸。问题是，其实只有大流氓或混出名气了人家才肯容忍你，不然就会说等出牢房的时间再去解决。久而久之，有些人忍不住拉在了裤子里，也有人就生病了。

“地板只够两个人躺，其他人只好搭吊床。‘很贵哦’，我一进去里面，会裁缝的人就告诉我。要是负担不了吊床费用，只好站着睡觉。补充一下，牙买加男人平常不会靠太近躺在一块儿，社会风气非常恐同。”

乔治说得还算委婉。1997年矫治部长有意提供保险套给囚犯使用，此话一出竟导致狱警罢工抗议，监狱内起了暴动，16人死亡，部长因此下台。后来成立特殊囚区，被视为同性恋的囚犯就转移进去。由于牙买加人对同性恋极度恐惧排斥，所以监狱系统无法针对艾滋采取任何防治措施。

“一些囚犯只能每晚站着，直到家人有机会伸出援手。”乔治继续说：“我确实目睹不少拿刀捅人的事情，有时候起因是小事，例如踩到别人脚趾之类。”

“小个儿！女王！”

足球飞过半空，几个穿着卡其色囚服的人跑过来，卡拉开口问候。狱警一边制止其他人喧嚣，一边带我们走进牢房旁边的混凝土小屋，门在我们背后关上。

屋内一片寂静。

眼前环境很像卢济拉的图书馆，不过在这里是计算机室。

约有22人，每周五天、每天在这里待上四小时，他们停下打字的手朝我露出微笑，有几个看起来应该没超过16岁。亮绿色墙壁上贴着海报，标语是“教育是未来之路”。

“来，有东西给你看。”卡拉打开旁边小门。哇噢！是一间超大更衣室，不对，是广播站，牙买加自由之声。房间里面贴满明星海报，有格雷戈里·艾萨克（Gregory Isaacs）、迈克尔·波顿（Michael Bolton）、夏奇（Shaggy）和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现在拿着麦克风的人是瑟拉诺（Serano），我认得这位音乐人，记录牙买加监狱音乐活动的《救赎之歌》（*Songs of Redemption*）介绍过他。看着他，我想起威尔逊，同样是大男孩的身

体里住着老人的灵魂：瑟拉诺个头很矮，洋基队帽子和蜜桃色头巾底下窜出脏辫注，穿着耐克白色“空军一号”运动鞋，手表很大，感觉尺寸大了一倍。他的笑容也一样是两倍大，塞满整个房间。

“你好啊！”

“我是粉丝哦。”我这么说。是真的，看了纪录片以后我十分欣赏他的歌声，就像贾·库尔一样在每个音符里勾勒出灵魂的伤痛。

“大家看看！”他对着麦克风说：“刚刚才提到《秘密》一书，‘我和我’注立刻就做了示范呢？‘我和我’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和世界联结，结果这位美丽小姐立刻出现了。大家要有信念！”

他开始播放纪录片原声带，我们趁机聊聊天，不过我的注意力一直被雷鬼音乐吸引过去，心思暂时离开这个密闭空间。当年多特里设计GP的时候，一定没想过会变成这样，他在1844年留下的文字记录中对于牙买加第一座现代监狱的想象是：“除了槌子、斧头、锯子以外，没有其他的声音”。

接着卡拉又带我到隔壁的“文化中心”，就在计算机室旁边，也是混凝土建筑。舞台上有壁画，画的是鲍勃·马利和当代雷鬼女歌手伊芙莉卡女王（Queen Ifrica）。这里装置了巨大的音响，墙壁上吊着很多吉他，有个男人正在打邦戈鼓。参与音乐计划的囚犯可以录制歌曲发行，卡拉先前提到她很注意创作者有没有收到版税，可惜牙买加音乐产业制度错综复杂，谁能从中获益始终扑朔迷离。看起来多数人赚到的钱只够糊口。

一个狱警带我走进舞台旁边的录音间，老旧混音机上搁着过期的音乐杂志。“希望有机会扩建，”他开口说，“我自己也玩音乐，觉得这个矫治计划很不错，与狱友们合作起来也很愉快。”

我们出去的时候经过教育区。“差不多有一般高中的程度了。”狱警这么形容。教室门上还如同殖民时代挂着一堆规定标语：“禁穿垮裤”“禁说粗话”“注重卫生”“裤头及腰”之类。卡拉领着我回到自由社会之前，我最后看见的是：“禁止逃狱”注。

我们又觉得自己是人了

朋友在停车场等我，开车载我回到新金斯敦。“世界纷纷扰扰……”鲍勃·马利的哼唱声从汽车音响传出，我哼着，得到了一个悲哀结论：监狱音乐计划终究只是止痛药。乌干达的图书馆、牙买加的录音室都是同样的意象，也就是截肢以后贴个创可贴。只有很少数囚犯能够幸运参与。再说，与他们面对的巨大煎熬相比，计划效果微乎其微。

不过再怎么微弱的功效总是有意义，不是吗？创可贴或许称不上治疗，但也能够止血。关于监狱内的文字或音乐创作，研究始终认为能带来正面转变。1983年调查发现，加州囚犯若参与艺术类教育计划，申请假释的成功率会提高74%。南非的数据指出，青年出狱后参加音乐教育活动，前6个月再犯率仅9%，拉长到一年则降为零。纽约艺术矫治方案也有好成果，许多个案展现正面思考，愤怒程度下降，违法频率也低了很多，客观评估也认同他们性格变得可靠，社交能力成熟，愿意为团体福祉牺牲个人需求。音乐教育家威廉·范·德·沃尔（Willem Van de Wall）以音乐帮助囚犯建立归属感和忠诚感为主题发表了许多文章，以色列音乐教授拉雅·希尔博（Laya Silber）也在女性囚犯合唱团员中观察到，音乐帮助她们去倾听，建立新的联系，接受批评。

回想起瑟拉诺那大得不可思议的笑容，我脑海中浮现他在文化中心舞台上表演的片段，精彩极了。然而，他后来在热烈掌声中走下舞

台，将自己锁在录音间无法克制地啜泣。“太激动了，”他哭着说，“贾·库尔早就认识到……音乐会创造灵魂和自我，我们又觉得自己是人了。”

艺术有宣泄情绪、净化心灵的作用，同时也传达了美感。可是监狱本身并不美，无论囚犯写出如何美妙的文字或乐曲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音乐会、写作课结束之后，指导者如我回到了自由世界时，心里想着那些聪明伶俐、心怀感激、活泼可爱的学生们时，他们却仍要回到牢笼，面对各种黑暗。让人活得像人，却只有每周的几小时，是不是太残酷了？这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广，成了讨论监狱艺术活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注)。创可贴使人一时忘记化脓的伤口，更糟的是令人误以为已经妥善处理伤口。若以乌干达和牙买加监狱内的惨况而言，或许不要粉饰太平，该流的血就流出来给大众看见，反而才有机会找出病根，真正着手治疗。毕竟问题累积太久，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像货物一样囤积在狭小空间里，只因为他们没钱贿赂体制。这灾难绝非“矫治”二字能掩盖，贫困与犯罪肇因于腐败的司法系统和骇人的财富差距。

更何况不只是乌干达和牙买加，太多地方陷入同样的困境。乔纳森在南非努力的修复式正义，就很多面向来看依旧只是“创可贴”等级，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许能够将基于报复的司法转变为以修复为导向，但文艺活动作为独立的项目则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离开牙买加时，我的心情和离开乌干达时一样大受挫折。将艺术带进监狱毫无疑问立意良善，可惜对于几近饿死的体制来说，犹如面包屑一般微不足道，还可能成为烟幕弹妨碍我们看清大局，忘记真正症结是在司法系统，在建立安全和人道的收容环境上，而现在的监狱根本不合格。要改变局势，不是拼拼凑凑、修修补补就能有所作为，必须勇于追求愿景。我喜爱艺术，然而在通往愿景的路上，艺术说不

定是绊脚石，因为它恰如其分：美得叫人目眩神迷，一时半会忘却了现实残酷。

---

1. “Bed Stuy”是纽约人对“Bedford-Stuyvesant”（贝德福大道和斯图文森高地）这个区域的称呼。——译者注
2. 布干达是该地古王国，直到1894年才正式由英国殖民并改名为乌干达（以斯瓦希里语发音的布干达）。——译者注
3. 本名为“Huddie William Ledbetter”，外号铅肚的来源众说纷纭，可能与姓氏发音、在监狱中展现过人体魄、南方黑人饮酒习惯等等有关。——译者注
4. 据称原名为“养生”（Healthshire），但因为发音模糊反而成为“地狱”（Hellshire）。——译者注
5. dreadlocks，原为长发长期不清洁保养呈现的状态，后来成为时尚发型。由于“dread”原意为恐惧，在当地方言中有“畏惧上帝”的含义，所以脏辫在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中蔚为风尚。——译者注
6. 原文为“I and I”。由于奴隶制度剥夺个人身份认同，拉斯塔法里运动人士以这个词汇加以重建，含义包括“我和上帝之中的我”、“肉体的我与灵性的我”并扩展到“所有人都是一体”（也就代替了“我们”）。——译者注
7. 原文“None Shall Escape”。就标语意义而言是禁止逃狱，但就英文语意可以解释为“任何人都无法逃离”。——译者注
8. 即“Catch22”。原为小说名称，后引申为“两难”或“自相矛盾”之意。——译者注

4　女性和戏剧

泰国

我们陷入了一个不可逃脱的相互依靠的网络，捆在命运的衣襟中。

——马丁·路德·金

从牙买加回到美国，我马上联系从监狱返家的学生，去奥蒂斯维尔探望还在里面的人。这次有位同事洛兰·莫勒（Lorraine Moller）加入，她的专长是戏剧，也到美国各地监狱取材，多半与女囚合作。今天她是客座讲师，我们在警卫室等待时聊了一会儿，谈到近年来全球女性囚犯大幅增加。“你该去泰国看看他们的公主是怎么做的。”听了我的想法以后她这么回答。

洛兰口中的公主是帕差拉吉帝雅帕（Bajrakitiyabha）殿下，现年35岁[注]，是现任泰皇蒲密蓬与皇后诗丽吉的孙女，曾经担任检察官，泰国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为监狱女性争取权利的先锋。她走上这条路的故事十分戏剧化。公主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法律的时候曾返回祖国参观曼谷一所监狱，途中竟然有个囚犯跪拜乞求道：请回来救救我们。

于是公主在看傻眼的众人面前应允囚犯。经过五年，公主拿了三个学位，回国推动康兰吉计划（Kamlangji Project），从泰语翻译过来是“崇高的意义与行动”，目的是为全国女子监狱建立“典范”。

公主殿下也曾经在约翰·杰伊学院研习了几个月刑法，洛兰就是那时候和她结识，一起去参观过纽约的女子监狱。

“我也想帮助她的子民。”洛兰说。

因此我们取得邀请，成为康兰吉计划团队的正式访客。事前无从得知行程细节，但推敲应当会以参访主要监狱机构并举办戏剧工作坊为主。透过这次机会可以好好了解泰国，乃至于全世界陷入的新三角习题：女性、毒品和监狱。

全球有超过62.5万名女性受到监禁，美国女囚人数从1977年来增加幅度为823%，但目前监狱里约8万名女性，有七成并非暴力犯罪。这现象存在于很多国家，女性的罪名以窃盗、诈欺、药物滥用之类为主，都是与贫穷有关的问题。而泰国25231位受刑女性中，大概21000人的罪名跟毒品相关，暴力犯行才550人左右；更甚者，其中竟有约18000人被判处20年以上刑期，还有41例死刑。数字太离谱可怕，也难怪公主无法忽视。

贫穷本身即牢笼

抵达曼谷隔天早上我在旅馆大厅候车，遇见很多穿着草鞋和袈裟的僧侣在此集会，我被一片橙色大海淹没。接我的人因为迟到匆匆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她叫“帕提亚”，自我介绍以后温柔地与我握手，连声为塞车道歉，并带我走上贴有司法部标志的厢型车。车上有帕提亚的同事潘娜亚等着，阿潘与阿帕[注]这两位刚进入司法部不久的新成员将陪同我见识有名的“微笑国度”。

“素坤逸捷运站离这里有多远？”我还在体会这都市有多宽广。

“很近，”阿帕说，“大概一个多钟头。”

车子在苏阁索（Sukosol）饭店接了洛兰，她是由当地政府安排住宿，开门的女侍身材高挑、一身紫色袍子，她们总是像祈祷般双手合十并深深鞠躬，说起“萨瓦迪卡”（sawadeka，泰语的“你好”）就像唱歌一样悦耳。

今天我们的第一站是司法事务办公室，招牌上斗大字体写着欢迎约翰·杰伊学院代表团。这里是政府智库，每个细节都传达进步和效率。亮黄色椅子和鲜艳塑料花的搭配很有宜家风格，墙上挂着历任矫治部官员和公主的肖像，还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标语，像是“追求司法公正”之类。会议室的光线洁白明亮，整齐的午餐碟子上装了炸鸡、椰子布丁和酸辣虾汤，洛兰与我恶补了一堂泰国司法现况的课程。

目前泰国有114所监狱，分为收容刑期超过15年的中央监狱，以及收容药物相关罪犯的矫治机构，还有一处收容“惯犯”的流放所。囚犯像是犯错孩童一样分为六个等级：极佳、优良、良、普通、差、极差。然而，监狱人口也超收三倍之多，原因和美国一样，就是所谓对毒品宣战。2003年，泰国政府一夜之间改变对于甲基安非他命的政策态度，将其列为一级毒品，于是监狱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导致财政几乎崩溃。政府首先搜集可能的贩毒情报，再通过金钱诱因达到逮捕目的；逮捕成立时，网民可得到充公财物价值的15%作为奖励，主事官员们则能拿到40%。大规模扫荡行动导致数千人丧命，官方表示死因是帮派枪战，但是人权相关组织调查后发现是警方执法过当。

政府后来逐步削减监狱人数，针对表现良好的囚犯提供减刑、提前假释，并借由皇室婚礼、庆生等名义进行特赦。例如有一年泰皇生日就释放了37400人，就连死刑犯也能受惠皇室特赦，至于无期徒刑犯人在泰国则平均受刑10年以上。

信息滚滚而来，我努力跟上，尤其还要对抗政府官员呈现监狱现况时的报告风格：他们的口吻仿佛主题并非活生生的人。但对我而言，看着投影片展示最新的“人道拘禁设备”，我设法随便点头应付

过去。皇室特赦和缩短刑期的关联做成一张张图表并列出算式，这部分更令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找出罪名把人关起来以后，再费尽心思找借口把人放出来？当然，为了不在优雅的接待人员面前失礼，我并没有说出心声。后来一整天，外头下着倾盆大雨，隆重的欢迎仪式持续不断，我也一直鞠躬、收礼、反复念着“萨瓦迪卡”。

政府还雇用摄影师，每一回接待仪式都像记者会。洛兰行前特别读了泰国礼俗，不断提醒我：跷脚很不礼貌，不能让人看见脚底；收名片要用双手，认真读过才收好。回旅馆以后我累得半死，对于今天接收到的信息不知该作何感想，更好奇接下来行程是什么内容。

翌日我们前往曼谷中央女子矫治所，位于高度戒备的孔普雷（Klong Prem）监狱，里面住了22000名囚犯。矫治所是栋巨大的白色建筑物，带有浅黄色泽，像个大到不可思议的结婚蛋糕，上面插着泰国国旗，挂了镶金框的超大型泰皇肖像。

走在康兰吉团队最前方陪同我们的，是娜帕蓬博士（Dr. Napaporn），她态度诚恳、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而且是公主亲自招募的计划主持人。接触不久后我就明白殿下为何选择她。娜帕蓬博士对于有关泰国女性和监狱的一切了如指掌，为人积极又悲天悯人。对照昨天我见识到的政府冷漠真是一剂强心针，在博士这儿，所有数据重获生命。

在车上她简单介绍了公主在全球所做的努力，成果是2010年通过《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规则》，通称为“曼谷规则”。重点之一，是主张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具有独特的需求和需要照顾的地方。以欧洲为例，关在监狱的女性有八成被诊断出精神疾病，每10人中有一人在遭到监禁之前尝试自杀，75%有滥用药物或酒精问题。美国监狱里的女性囚犯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同样高达73%，可见针对女性囚犯的照顾措施应扩及各国，比方针对精神问题、药物使用和性虐待经历都应当进行筛检，还有孕妇应当得到营养、哺乳方

面的咨询建议，监狱管理人员必须具备更高的性别敏感度。曼谷规则呼吁分娩期间不应对女囚上铐（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居然只有七个州愿意响应此点），并且主张量刑时要进行具有性别意识的风险评估，项目包括女性的家暴经验、精神病史、药物滥用状况等等。

进入监狱以后，路旁有个像贫民窟一样的区域，娜帕蓬博士解释说那是矫治人员的住处。卡其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列队欢迎，带我们上楼到了颇为豪华的会议室，有红色鹅绒椅和黄布帘。她们送来芒果汁和香蕉松饼蛋糕，还说面包是由此处的囚犯制作。灯光黯淡，计算机开始播放画面，介绍这座监狱有大图书馆、餐饮职训、运动和美术课程等等，接下来甚至有缝纫、冥想、按摩、瑜伽、美容、烘焙等课程！

不是什么营销广告吧？我们来到度假村？气氛越来越诡异，接着我们穿过金属探测器，但后面还是跟着一堆摄影师。一名狱方人员行礼后开始报告，当天囚犯人数共计4500人，其中53人前往法庭。

又通过一扇金属闸门，终于到了真正的囚区，看起来整齐干净，还有一片碧绿草地和小佛寺，周围几栋楼房老旧了些，一群女人坐在长凳上。

她们穿着宽松上衣和长裙，已被判刑的囚犯穿的是浅蓝色和深蓝色，还在候审的穿的则是褐色。见到我们，女囚们纷纷合掌鞠躬，她们在这里等待会客，因药物而入狱的人每周一次，其余罪名者则每天都能有一次。不过会客时间仅15分钟，多半隔着玻璃讲话。近距离接触一年才一回，而且主要开放给亲子。以全球趋势来说，女性探视丈夫的频率较稳定，男性探望妻子则未必。

再跟着队伍穿过一道门，里面是个有空调的房间，忽然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就被塞到我怀里。纯白育婴室内有20多个小可爱，墙壁上公主照片裱在镀金相框中，角落玩具排列整齐，有三位母亲正在喂奶，

空气里弥漫爽身粉与乳液的香味。裹着毯子的宝宝们躺在颜色鲜艳的枕头上，集中在房间中央的台子上，由几位赤脚的专业保姆看护着。我的心在此刻融化。

“从来没看过小孩子这么乖。”

“因为他们过得好！”娜帕蓬大声回答：“要是在外头，他们家里通常没什么钱。在这里，奶水尿布都免费。”

洛兰轻声哄着并接过我怀中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小约瑟夫被塞进我怀里。

“这孩子具有非洲血统，妈妈来自苏丹。”狱方人员告诉我。小约瑟夫咧嘴笑，还没有牙齿，口水滴在我衣领上。

“真希望我女儿赶快生一个！”洛兰边哄小孩边说。

娜帕蓬博士说狱内约有100位囚犯为人母，集中在同一间宿舍。“婴儿可以待到一岁，”她解释时小约瑟夫离开我怀抱，“但是3岁之前司法部会提供住处，每周都能和母亲见面。之后就要交给其他亲人，否则只好送往孤儿院。”博士特别提到，孩子1岁时的那次分别总是令人揪心。

监狱在全球各地造成的副作用就是家庭破碎，影响及于情感和经济两个层面。在美国，监狱中的女性有75%是母亲，270万儿童的父母遭到监禁。2014年针对这些孩童所做的研究发现，他们常有严重的健康或行为问题，双亲入狱对儿童的影响恐怕比父母离异或亡故还严重，且美国只有10个州容许女囚和新生儿相处2到3天。泰国康兰吉团队追踪后发现：监狱内43%的女性遭到逮捕之前，是家中经济支柱；该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本就属全球顶尖，部分原因在于当地佛教教义认为

男性可以“出世”，但女性只能“入世”，她们无法成为僧侣，也就有赚钱养家的义务。

大雨滂沱，空气闷热。我拿到一把格纹雨伞，囚犯们则拿纸板或垃圾袋挡在头上快步跑进室内。走了一段路，我们进入图书馆，这是由公主在2006年协助成立的，里面空调舒适，气氛平凡得令人安心。不少女士们坐在桌前阅读杂志、窃窃私语又或者正在找书。洛兰问起矫治人员监狱内暴力问题是否严重，对方回答：“少之又少。当然不是没人闹事，主要是嫌地方太小、别人讲话吵闹之类的。女人嘛，怎么说呢？比男人敏感一些吧，有时候会大惊小怪，情绪很多。”

他们说这里是宿舍，但是实在太干净了：铺着油毡地板、洗脸台两旁挂着小熊维尼图样的毛巾；房间角落堆着蓝色床褥，面积与套房式公寓差不多，却得住进45名女性。墙壁上挂着平板电视，仅有两台电扇似乎很难对抗6月曼谷的酷暑。囚犯要在这里度过很多时间，6点钟起床沐浴用餐，8点开始是工作坊或图书馆时间，下午3点第二餐，4点30分回房要到隔天才能出来。

宿舍外面有一块软木板，上面记录了人数、罪名、刑期。我问起娜帕蓬博士名单上刑期最长的人，她瞥了一眼说25年又11个月，罪名则是持有“亚巴”（Yaba，泰语的“疯药”），实际上就是混入古柯碱的冰毒。这种东西在当地盛行，康兰吉研究显示，有九成女性是因为和亚巴相关的案件遭到起诉，里头35%的当事人持有不到14片。博士露出难过的神情解释：若持有15片，就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我又看了看，发现这里的囚犯都是用姓名而非编号。

“怎么能用编号呢，要知道她们的名字和长相啊。”管理人员说：“女性比较敏感，所以要记住她们的名字和脸。”

外头积水快要变成小湖。有人请我们换上雨鞋，穿过蒸腾的雾气后来到工坊。房间里罩着粉红色的蚊帐，远看好像一团棉花糖，制作者趴在裁缝机前面努力。有人拿了一件大花上衣给我们看，笑着鞠躬后又一溜烟跑回去继续做事。

我试着看出微笑底下有些什么，但很困难。尽管得知一些悲惨的数据，但目前我还无法从身而为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女囚。我没有与她们对话，眼神交流也几乎是零，她们太常低头鞠躬了。虽然洛兰与我明天有另一所监狱的行程并安排了访谈，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像以前一样，能与当地人心灵交流。这是皇室安排的访问，加上高耸入云的文化屏障，我对囚犯的反应能有多大期待？缝纫机哒哒响，感觉就像普通工厂。我忽然意识到这情境其实一样悲哀：看看育婴中心，监狱竟比外面世界更好？或者从资本主义角度看是迎头赶上？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指向同一结论，也就是贫穷本身即牢笼，因此我在纽约的学生时常回家几个月以后就会感慨，说每天为生活操劳，感觉和在监狱的日子差别没有想象中大。

参访行程的结尾与开头同样奇妙，出现了食物与纪念品。监狱附设的餐厅就在铁网外，在当地颇负盛名，一方面因为囚犯受职训以后担任服务人员，另一方面餐点质量也不错。今天还遇上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过来拍摄，他们在女厕前面访问狱方人员，或者在用餐区找上大口吃面的客人。桌上的餐垫、以手工棉布装着的菜单、筷子全是粉红色的，女侍们也穿着同颜色衣服，脸上是我一整天下来常看到的淡漠神情，为我们点菜以后送上青木瓜色拉及泰式炒面。

隔壁纪念品商店里面有囚犯制作的产品，兼营按摩。看着架上枕头、杯垫、皮包之类的产品，上面都绣着同样的图案：在游乐园里的小女孩。我正暗忖购买这些东西到底帮到的是监狱体系，还是有助改革方案，马上就看见展示的皇室成员照片了，泰皇的侄子卷起裤腿让监狱训练的按摩师做脚底按摩。

“我知道你会叫我放轻松别担心。但没办法，我就是紧张。”洛兰叹道。我们在饭店顶楼的餐厅用晚餐。一如其他亚洲大都会，天际线满满的后现代建筑群，仿佛曼谷位在云端。

下周洛兰和我要开戏剧工作坊，但是我们尚未找到适合的切入点。出发前几周她一直传电子邮件跟我讨论。这个练习怎么样？你要不要先读读这本书，说的是泰国文化下的性别角色。还有这本，主题是当地的色情业？我则要她静下心，计划过头通常会坏事。

“没事的。”我安抚道，又吞了一大口酒。

用餐完毕，我去考山路（Khao San Road）晃一晃，这边是到曼谷旅游的必去景点，很多卖小玩意儿和串烧的摊贩，酒吧音乐震天价响，里头坐满穿着鲍勃·马利T恤的德国人。有个招牌写着“出售笑气和托福成绩证明”，另一个是“供应烈酒，不检查证件”。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夜生活，背包客喜欢的氛围，而这个情境底下自然少不了另一个元素，那就是毒品。

此处的喧嚣和监狱紧密相连。20世纪90年代早期风行的冰毒与摇头丸在这里一样有市场，主要卖给寻欢取乐的外地旅客，有需求就有供给，而谁是供给的管道？多半就是今天在监狱里看见的那些女人。泰国也是邻国缅甸销售海洛因的中转站，是仅次于阿富汗的鸦片来源。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和山区居民等边境上的少数民族群体是这种复杂交易的首要参与者。1979年通过《迷幻药法案》，将更多药物列为毒品并采取严刑峻法，无论口号或手段都响应着同时期美国对毒品宣战的政策；而且也如同美国，真正用意是提高政府声望，转移人民注意力以免施政不良遭到抨击。

我感到一阵睡眼惺忪，便召了嘟嘟车回饭店。

我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那周后来某天，我进入另一所泰国女子监狱，看见四个短发女性正在做“Hello Kitty”的书架。

娜帕蓬与她们轻声对话并介绍我们。囚犯恭敬合掌。小萍今年19岁，涂了粉红色唇膏，戴着粉红色布发夹，刑期18年，入狱是因为携带男友的毒品。原因为何？只因男友要求。博士向我解释：泰国文化下的性别尊卑明显，多数女性无法质疑男性的主导地位。她做过研究，统计结果是因药物问题入狱的女性之中，过半数有共同被告，而共同被告有44%是她们的丈夫或情人。

在一旁为粉色书架细心上胶的是文妮，她带着微笑说自己已经为人母，有三个小孩，却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实那时候她身上只有两颗“亚巴”（甲基安非他命药丸），但因为她要回去老挝探视家人，穿越国境时被捕，所以就变成无期徒刑。

我努力想要提问些什么，但是眼前沉静的绝望实在叫人痛心，加上女囚被压在礼仪和权力结构的蜘蛛底纹下，回答起来简单扼要、搔不着痒处。厨房里的烹饪团队是15个穿着制服的女囚，她们摆出美人鱼一样的姿态坐在地板上，堆起的农产品上压了几个银色大锅。墙壁上的菜单说明晚餐有鸡汤、小黄瓜炒腊肠、咖喱打抛猪，现场也有办家家酒似的样本给客人看。我们走进气味仿佛天堂的烘焙坊，立刻有许多人异口同声大叫“卡朋卡”（Kapoonka，泰语的“欢迎”或“谢谢”）！

“这么热的天气，做糕点不会很辛苦吗？”洛兰问一名囚犯，她特地蹲下去直视对方的眼睛。

“有一点，但是我喜欢在这里做事，感觉跟在家里一样。”她拿出戚风布朗尼蛋糕。

58岁的格雷丝在这里待了11年，再过2个月就能出狱。她打算到泰北开烘焙坊，这里的训练对她很有帮助。还有另一个人说自己刑期1年，罪名是持有卡痛树叶，一种类似大麻的天然麻醉剂，其实在泰国农村地带都有种植这种树供医疗使用。

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美国也有八成左右药物相关求刑的起因是大麻。到了2013年，美国有3278人（其中65%为黑人）因为非暴力犯罪被求处无期徒刑，其中一人的罪名是中介买卖价值10美元的大麻，还有一人为了两岁大儿子的骨髓移植手术铤而走险在卡车里藏冰毒，结果至今已在牢里蹲了20年。美国、泰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皆然，量刑时将药物本身看得比被告更重要，真正的毒枭携带15公斤海洛因闯关和收下100美元协助运毒的卡车司机，很可能刑期相同。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看，至少也该考虑行动获利的程度——贩毒组织的头目，刑责理当比跑腿的人来得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些女性根本不该坐牢，泰国女囚有79%是警方钓鱼行动中顺便逮到的。

“坐牢之前我就在饭馆当服务员，”格雷丝说：“对出狱后的生活没有太多担忧。”她送上自己做的水果蛋糕。

我们到了另一栋楼，囚犯在课堂上为彼此脚底按摩练习手法，还有十几人在玻璃隔间里学习计算机技术。娜帕蓬博士说阳台那里正在实施“艺术治疗”，五个囚犯正在画画，作品是有漫画风格的日记本、公主与泰皇的肖像，以及巨幅的象神（印度教神话相信象神能带来成就）。之后看到十几位女性在练习插花，有人送上白玫瑰做成的精致花艺品给洛兰。矫治人员指着康乃馨花海中的一个囚犯。

“她们每天睡觉前都要化妆，”矫治官笑着说，“觉得这样子做梦的时候也能美美的。”

洛兰问起狱方对于行为有问题的人如何处理。

“去跑操场，”矫治官回答，“或者去蹲在旁边，和别人分开，可能持续一星期。再不然就去打扫吧。”

我心想还真是对付顽劣儿童的做法。目前参观的两座女子监狱，由于康兰吉计划而成为风格独特的小世界，仿佛一切从母性诞生，介于军营和女性度假村之间，囚犯时时刻刻得参与某个活动。美国也有过类似时期，就是所谓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改革运动，当时诉求社会改变对被告的观念，不再将他们视为堕落者，而是误入歧途者，还可以导回正途，只是要用科学方法，比方说缓刑、假释，还有精确的程度分级、送入对应机构。美国许多女子监狱起初以教化院的形式成立，例如纽约1907年设置的贝德福山丘（Bedford Hills）监狱，以及1887年即有的女子庇护所。相较于男性监狱，这类机构的规定较为宽松，以院长为首的管理团队也全是女性，囚犯多半能通过假释回到外界从事帮佣之类的工作，里面提供体育、阅读、写作、医疗保健、健走、唱诗班等课程。印第安纳州的教化院让女囚穿上格子花纹衣服，在铺上桌巾与鲜花陪衬的餐桌用餐。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风潮式微，原因之一是经济萧条，财源无法负荷。

“我不敢看她们的眼睛。”外交部来的一位官员在出去的路上告诉我：“对我而言很难受，还好我不是每天都得进来。我看得出来，虽然里面有很多活动，也有人照顾她们，但囚犯不快乐，她们想要回去陪孩子，陪母亲。”

泰国人的观念里有一个词汇是“bunkhun”，可以大略翻译为“责任”，意思是女性必须照顾自己的孩子与母亲，这是世代相传的恩惠和义务。换作男性，报答养育之恩最崇高的方式是出家，不能出家的女性就只能从衣食住行这些实际面着手。

后来那天下午我们去参观了华丽梦幻的黎明寺（郑王庙），在市区中宛若仙境一样高高耸立。看着精美的佛陀塑像，同时得闪避游客

的相机，我脑袋思索着关于“bunkhun”的意义，很快思绪飘到与旅馆一位经理的对话。她叫做“阿月”。

“我属虎，”一天晚上我们聊了起来，“你呢？”

我回答自己属龙，处女座。接着阿月说她和母亲、侄女一起住，以前曾经和男人订婚，没想到对方其实是同性恋，最后还做了变性手术。她还当婚纱店的模特儿，却已经不想结婚。

“有佛陀和妈妈就好。男人会伤害你，妈妈可不会。”

我自己没有小孩，几个月才探望母亲一次。洛兰提过她将学校提供的研究休假用在照顾生病的母亲，而我却将时间拿来四处旅游；甚至我心里记挂的、急着联络的、出国之前会通知的，全都是纽约那边刚出狱的学生。

阿潘来接我回饭店，问我晚上要做什么。

“我要回家陪陪父母家人，”她抢在我回答之前就继续说，“你一定觉得很无聊吧。”

我没有讲话。事实上我感受到的是嫉妒。原生家庭已经在我生命中缺席了几十年，目前我心中对“家”的概念是通过朋友、学生，以及内在自我拼凑而成，可惜这不代表对于传统的天伦之乐停止向往。这次旅行带我看见许多破碎的家庭，也逼我面对成长过程的缺憾。

“我妈年纪很大才生下我，”阿潘继续说，“看我出来的时候很健康，她好开心。我跟她一直很亲。”

你很幸运，我这么想着，视线飘到车窗外。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发光

本周的活动有个大方向，标题是“找到回家的路”。用过饭店的早餐，我读起《曼谷邮报》上的建议专栏。

“亲爱的安妮”，我读给洛兰听，因为她又开始慌张不安了。今天和康兰吉团队开会以后，我们要南下叻丕府（Ratchaburi）的监狱展开戏剧工作坊，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课程表。上周末我们两个人分头行动，洛兰留在曼谷，我去清迈一趟，回来以后入住同一家饭店。

“我哥哥刚订婚，”我继续念下去，“可是我发现他未婚妻和以前男友时时发信息联络。我该说吗，还是就装聋作哑下去呢？”

“可真是两难啊。”洛兰心不在焉地回答。

“对啊，”我说，“对家人忠诚，还是依照刻板的性别规范呢？这里的女人觉得自己只要微笑不语就好了。”

洛兰放下咖啡，整个人几乎跳起来。

“就是这个！以这个主题写剧本吧。”她叫道：“角色定位。我们就用这个当作练习题材，她们一定会有共鸣。”

于是我们很快拟妥计划，之后前往一间办公室，再度受人接待，听演讲，拍照，然后才前往监狱。这趟参访在康兰吉计划内部逐渐演变成小型研讨会，许多国家都有代表出席，大家一起讨论监狱里面可以使用的矫治疗法。澳大利亚西部来的布莱恩已经67岁，专长在于原住民研究，针对囚犯提出了“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来自印度的桑亚莎穿着橘色袍子，戴着白色头巾和许多串珠，身为瑜伽治疗师的她木讷寡言，脸上的笑容如同瑜伽一样神秘；还有一位戏剧治疗领域的大师，当地尊称他是昌师傅，他父亲是首位泰籍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也是第一位泰籍哈姆雷特演员——昌师傅完全是大家想象中年高德劭的智者样貌，穿着宽松的民俗风长裤与凉鞋，留着灰色长发和浓密大胡。

“以前我可是泰国的约翰尼·德普。”几天之前我们去昌师傅那儿拜访时，听到他这样打趣说。离开市区之后，外面是运河与田园，钻进灌木林间的一片小空地，就看到莫拉多迈（Moradokmai）学院。这是类似公社的小组织，有40个佛教徒学生就读，大半来自穷困乡村，在这里所有的课程都透过戏剧呈现。我了解以后不禁提出心里的疑问：佛教和戏剧之间有关联吗？

“没有所谓的关联，原本就是一体的。”昌师傅的答案太深奥，我只能继续搔头苦思。

今明两天洛兰将在监狱进行戏剧治疗课程，我则担任助手，顺便推广狱友高等教育、受刑人直升项目。娜帕蓬博士带我们上车，十足VIP地位。南下车程中，博士依旧精神奕奕，后来我们得知公主曾直接前往大学校园面试及招募教授以推动康兰吉计划，而娜帕蓬以前就关怀其他弱势族群，包括少数民族和身心障碍者等等，不过踏进监狱看见女囚的境况以后，她更觉得这不仅是工作，而是使命。我说自己也能理解那种冲击。

“不知道可以持续多久，”她说，“每天我都担心这件事。康兰吉计划没办法永无止境，经费有用完的一天，而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对更多人伸出援手。你们说是不是？”博士介绍了今天要去的监狱，位于泰缅交界，团队触手才刚伸进去。

“里面很黑，很挤。我能怎么办呢？该从哪里下手？先训练管理人员？还是开个瑜伽课程？瑜伽可以减轻焦虑，增进睡眠质量。在牢房里想睡得好不容易。整个计划理想高远，面对巨大的问题却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

我回应时说了马丁的故事。他是我的学生，出狱回家没多久差一点又回牢里。马丁在酒馆和人打架，到我办公室的时候还有一边眼睛瘀青，原本打算不念书了直接工作赚钱，经过我好说歹说、软硬兼施拖着他去注册以后，总算逼他入学。现在马丁在哲学系是个明星学生，同时进了法学院预科，也在顶尖的事务所里实习。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发光。”这是我对她那声叹息的回应。

厢型车继续南下，我和隔壁布莱恩聊了起来。“你怎么会投入监狱工作？”

“因为我进过监狱。”他说。

布莱恩入狱过，不过他坚持自己无罪。出来以后他将生命奉献给伤害自己的体制。由于具备社会学与犯罪学背景，布莱恩成了日益增多的所谓犯过罪的刑事专家中的一员。他们的研究受对刑事司法体制的个人经验启发。我和他聊了在狱中的多年经验以后，轻声问：“那你太太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离婚了。”布莱恩回答：“我也体会到家庭关系的脆弱与相对性。”

我用力点头：“其实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我说出自己的人生观。

“没错。”他附和。

车窗外的画面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翠绿山麓上一层层梯田仿佛张开胸怀迎接永恒。为什么世上通往地狱的路径周围都是美妙风景？烘托之下，水泥建筑和刺网更显得怵目惊心，绝美与绝丑相附相依。

叻丕府中央监狱收容了900名女囚。进入热闹广场，旁边有个推车载着小音响播放音乐，两名穿着白色围裙的囚犯站在摊子后面供应咖啡点心。角落十几位女性埋首手工艺，用纸编出篮子、小动物，还做出一幅典狱长全副武装的大肖像。娜帕蓬博士取了一个纸篮子塞给我。“最新流行！”一名狱警笑着叫道，她的两个同事拿了纸雕的小狗和老鼠放进去。

“快，快，她们正好要开始上瑜伽。”博士催促洛兰和我，众人走进馆内，白色地板十分光亮，数百位女士静静坐着等候。有人送来开水和木薯糕，手巾带着淡雅香气。25个女囚鱼贯而出，一身黑衣黑裤，不少人特别绑起头发，擦上鲜艳的粉红色唇彩。

开始唱歌，旋律像是带着忧愁的摇篮曲，囚犯们嗓音都很高。在我隔壁的昌师傅为我翻译：“生命起起落落，时时保持梦想。生命高高低低，希望永存不灭。信。望。爱。”余韵缭绕，黑衣女子们摆出瑜伽姿势，身子化为圆圈或金字塔，或下犬式优雅地伸展，动作令我啧啧称奇。结尾高潮处，她们排出莲花阵型，而且维持了两分钟之久，我们忍不住大声叫好，然而这么美丽的画面放在铁丝网里头也令我难过得想哭。可惜连落泪的时间也没有，娜帕蓬博士带着昌师傅、洛兰、布莱恩、桑亚莎和我动身，每个小组要去监狱不同地方预备。

我和洛兰有25个学生。她们排成半圆形，模样局促不安。

“这里是戏剧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这里大家是自由的！”洛兰变得活泼，一到教学场合她就能展现自信。“有谁喜欢表演？”

学生迟疑地举手浅笑，让人摸不清是不是真心。幸好经过镜像练习的暖身活动，气氛终于热络起来。学生两两一组，一个人出题，另一个人要模仿，重点是不可以笑场。

洛兰和我陪着一起做，她身子晃来晃去又拼命做鬼脸，我差点失笑。学生们跳来跳去，扭来扭去，不断传出嘻嘻哈哈的笑声，稍远处两名狱警也跟着玩，朝囚犯这里扮疯扮傻，其中一人的那张大圆脸好可爱，我也分了心。

暖身活动结束，开始进入课程前导。洛兰要她们排成半圆形，有些人搂着隔邻的腰，有人肩膀靠在一块儿。接下来，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名字，但要加上一个词形容自己。

“可爱的洛兰。”她先开始。

“忙碌的贝兹。”

“快乐的普萝伊。”

“开心的普蕾姆。”

“爱闹的乔伊。”

“阿南妈妈。”

“女儿小萍。”

“逗趣的旺迪。”

她们越来越自在，也越来越多笑声。

我拿出剪报读给大家听，翻译很厉害，完全跟得上。我告诉学生们，首先有安妮，然后是哥哥约翰、他的未婚妻莉莎，还有莉莎以前的交往对象罗伯特，以及老板汤姆。

有个学生举手。

前。

“这个罗伯特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工作？”

“他工作很好，是个有钱人。”

站在角落观察的娜帕蓬博士忽然招手要我过去。她悄悄说：“不如设定罗伯特是个毒贩，用金钱和奢侈品想要引诱莉莎抛弃脚踏实地的未婚夫。”

“这样一来，”她解释，“对学生也具有启发性，让她们知道遇上不好的男人要果断。很多人已经亲身走了一遭。”

“罗伯特呢，”我回到课堂上说：“是个贩毒的，所以钱多得花不完。”

囚犯们眼睛张大。珊亚莎的进阶瑜伽课程在我们后面的馆里进行，冥想时念诵的梵音成了背景配乐。

“约翰每天工作很久，”我继续。

“他在哪里上班？”

“卖车子的吧！”另一个学生叫道。

“很好，”我说，“他很努力，每天都很晚才回到家，所以莉莎觉得孤单寂寞，心情一直不好。”

全班一起想象接下来可能的情节。

“我们需要演员，”洛兰指示道：“谁要演莉莎？”

一个苗条的年轻女生举手，她留着长马尾，绑了红丝带。约翰呢？大家指着一个短发、块头和脸都较大的同学。她红着脸赤脚上前。

“还需要一个舞台。”

学生们跑来跑去挪开椅子，动作十分利落。于是我们有了办公室和自行想象的计算机，约翰就在这里上班。摆着郁金香的另一端则是莉莎和罗伯特见面的地点。

第一幕：大家即兴演出。

约翰在办公室里敲键盘。老板进来了，丢了更多工作给他，所以又要加班。他不停打字，手指在空气中跳动，神情非常专注。这时候，莉莎转着自己的马尾，望着想象的手机屏幕，拿起想象的镜子开始擦唇膏。约翰还在忙。

“Cut。”洛兰表示时间到了，明天继续。

“噢！”学生们同声埋怨，但只能与我们挥手道别。

“状况还不错吧？”洛兰问。博士帮我提了纸篮子过来。

“很厉害呢。”翻译开口说。她现在是观护人，以前也做过教师。“以前我上课时大家都不吭声，不肯表达意见。泰国女人觉得那样才有气质。今天倒是不一样。”

我想起上周参观昌师傅那所学校时的见闻。大家坐在露天剧场，盘里有荔枝和山竹。“戏剧比现实还真，”外号叫冠军的学生说，“可以帮我们说出不敢说的话。”他隔壁的女孩接口道：“在舞台上我才能告诉大家那些没有人知道的故事。”

洛兰也提过所谓的“角色剥夺”（role deprivation）。一般而言，人类习惯同时扮演多重身份，是母亲，也是女儿，是工作者，也是妻子，还可以一边当学生。然而，在监狱这个环境里，每个人都被化约成唯一的角色，那就是囚犯。而囚犯从事戏剧活动，就得到角色

复苏的机会，能够扮演不同身份的人，感受更多层次的自我，即便只是几小时的时间。

我今天确实看见表演时她们眼中的光彩，从暖身活动开始女囚们就慢慢甩开了“服从的囚犯”这个桎梏。

代表团从监狱各处出来，集合在华美的小佛寺前面，一起穿过安保闸门。厢型车行驶在月光下，我问起布莱恩叙事疗法课程进行得如何，就我了解内容应该是分享人生故事，从中找到正向转化的契机。他说有一个女囚哭个不停，因为她整整七年没见到亲生骨肉。

“那你怎么处理？”

“我说了自己的故事。”布莱恩一派沉稳：“孩子们排斥我，我很痛苦，好多个晚上我一个人喝闷酒，喝太多造成胃食道逆流，后来演变成胃癌。”

我瞠目结舌。

“我第二任妻子也是晚期，已经好几年了。现实残酷，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过我们可以选择走出来，换个角度思考，不要再将自己看成受害者。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赢了。”

车子停在饭店前面，康兰吉团队迎接大家。房间普通，但是供应的泰国料理相当丰盛。戏剧大师昌师傅换上牛仔裤和一件“艾比路”T恤[注]，为我端了一盘酸辣鱼。

“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怎么称呼这个？这里叫白鱼，没有骨头，也不会繁殖后代。”

“听上去好伤感。”洛兰举起汤匙。

晚上团队安排了外出行程，最后我们进入一间带有美国中西部风情的酒馆，甚至还有人拿着吉他自弹自唱《你的爱多深》（*How Deep Is Your Love*）。在大家的鼓噪下，我喝了香槟杯里冒泡的粉红色液体。“教授，别醉倒！”大家笑闹着。我没有倒，但与布莱恩一样沉醉在酒精里，将白天看到的悲惨锁在心底。大家享用当地酿造的朗姆酒，聊着监狱和家庭，有时候话题转向家庭如何变成另一种监狱。就在这些心灵层次的链接、愉快温暖的谈笑中，我仿佛品尝到了家的滋味。

需要治疗的究竟是这些女子，还是陷人入罪的法律？

“她们私底下有练习哦。”杰迪说。隔天早上我和洛兰进监狱教室就看见学生们忙着布置舞台、熟悉角色。

约翰依旧在办公室里辛勤工作，气焰嚣张的老板将权威发挥得淋漓尽致，莉莎在餐厅痴痴等待未婚夫时揪着马尾前后甩动。罗伯特就在隔壁桌，终于对落单的美女采取行动，过没两下就拿出纸篮子名牌包和黄色假花当礼物。约翰望向折起来的拖鞋，不，是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不对劲的讯息。身为观众的我们都屏息以待。

“求婚该怎么呈现？”我们打断问：“地点选在哪里？”

“普吉岛！”她们一起大叫。

两个学生自己跳出来扮演阳光下随风舞动的棕榈树，另外两人帮忙配上背景海浪声。约翰面朝莉莎单膝跪地，但女主角明显内心挣扎。到底应该选择老实勤劳但经济拮据的男人，还是能带来丰硕物质享受的毒贩？我们请学生分成四组，每一组演出属于自己的结局。

第一组：莉莎选择约翰，奔向他的怀抱，后来两人生了小孩，过得幸福美满。罗伯特遭到逮捕，被上了空气手铐嚎啕大哭，黯然退场。

第二组：莉莎拒绝约翰，同时也要罗伯特别再联络。“我有自己就够了。”女主角大声宣布，高举双手得意下台。

第三组：莉莎和罗伯特远走高飞，披上想象的皮草，迷失在花花世界里，后来染上毒瘾，独自瑟缩在角落。女主角的模样很难说是好下场。

最后的第四组：莉莎选择了毒贩罗伯特，两个人一起落网入狱。莉莎的马尾垂得很低，泪眼汪汪地望向监狱窗外，低声呼唤着约翰。

下台一鞠躬，大家掌声不断。

当天最后的活动：赠与。所有人手牵手围成一圈，自行判断隔壁的人需要什么，然后馈赠给她。洛兰带头，她的礼物是“希望”。

“我送给你，可以赶快回家。”一个囚犯说。

“我送给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家人。”

“忘记这些痛苦。”

“能和孩子团圆。”

“回去照顾妈妈。”

圆脸的狱警也加入，与旁边囚犯紧紧握着手。她给的礼物是“爱”。

轮到我身旁的囚犯。“我给你的礼物是，事业成功。”她堆满笑脸。不过我抓着她的手暗忖，有点讽刺呀，怎么别人不是爱就是家庭，我却是工作呢。“还有，很快就能回来看我们。”她又说道。也许，她懂我的心。

接下来的经验我也是第一次。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如同家人一样牢牢地拥抱。以前也有好几次我想要拥抱奥蒂斯维尔监狱的学生，比方说罗恩的假释案第五次被驳回，朱利奥提起12年前自己年轻气盛、一时冲动就杀了人，于是啜泣起来，还有马克看到成绩是A时说起曾以为自己一无是处，直到那一刻。不过女教授在男子监狱里当然没办法随便和囚犯拥抱，得等到他们出狱后才不奇怪。

女囚们一个接着一个紧紧抱住我，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落泪了，无论我、洛兰，还是在场的其他人。其实我并不确定大家为什么哭泣，才经过两天，我连她们的名字都没记熟。感觉起来，与其说是离别的悲伤，更接近于情绪的宣泄。又或者，经过工作坊的各种活动，彼此之间的情感连结在这一刻通过生理反应表现出来。戏剧表演是团队活动，能够建立起非常浓烈的归属感；而当着众人面前演出、接受同侪和外人欣赏，受囚者无形中做出了这样的呐喊：看看我！我仍旧存在！

于是上星期昌师傅充满玄机的那句话，戏剧与佛教本为一体，刹时给了我当头棒喝。演戏是一种反应的过程，诠释人物就是展现自己对其他角色的想法，而佛教教义中也提到众生皆有佛性，人我并无二致。这种思想甚至渗透了泰国人彼此问候的方式：他们不是挥挥手说句“嗨”，因为那只是展示自我；他们的合掌动作象征你我属于整体，他者就是“我们自身的延伸，是真如投射出的不同面貌”，这是佛教学者的说法。

与此相反的场景就像易卜生（Henrik Ibsen）笔下的精神病院：“每个人被困在名为自我的皮囊里，上了名为‘自我’的盖子，沉入

名为‘自我’的水井。”

囚犯仍属于人类网络，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不善待囚犯，就是不善待自己。佛陀说过：“一切皆惧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为譬。”注

离开时洛兰叹了气。

“我可以住下来。”当然，洛兰自己也明白这句话很荒唐，但我懂她的心情。监狱的本质依然恐怖骇人，在这里的女性，无论母亲或者女儿，都被迫骨肉分离。但在这片人伦废墟上，康兰吉计划勉强拼凑出类似公社、社群的姐妹情谊，虽然只是碎片黏贴，裂痕清晰可见，但至少是个家。流行文化为吸引眼球而将监狱囚犯塑造成无人性的暴力禽兽。真相是相反的，即便多数人仍以为他们活该。

“瑜伽治疗还顺利吗？”上车的时候娜帕蓬博士问了桑亚莎，她露出灿烂笑容。

但是我吓了一跳。“治疗”。

这星期我们每个人进监狱的名义都是“治疗”，而监狱也早已声称自己的工作是“矫治”，然而我怎么听怎么不对劲。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班上学生的罪名，也不知道多少人染上毒瘾、携带过丈夫的药物，但从娜帕蓬博士那里听到的数据不会假。没有意外的话，学生里面恐怕有1/4自己就是受害者，因为女性受虐的比例在曼谷是23%，在泰国乡村则是34%，而且其中有39%明确指出是性虐待；她们应该大半来自经济、教育或社会弱势情境，即使犯了法也不清楚，即使明白犯罪和刑罚也依旧感受到法律压迫，因为请不起律师——事实上连美国也一样，有八成遭起诉者根本没钱找人辩护。一项研究发现，泰国女性囚犯有74%在警方讯问时没有律师协助，40%表示受到警方恫吓，12%遭到殴打。

需要治疗的究竟是这些女子，还是支配她们的法律？全球各地皆对毒品采取严刑峻法，结果导致监狱人满为患。美国的联邦监狱和墨西哥的监狱系统里面，过半数是吸毒或贩毒者，西班牙的比例为1/4，日本是1/5；马来西亚的囚犯中有900人遭判死刑，其中超过一半是毒品犯。这些囚犯未必有多大药瘾，全世界因毒品而入狱的人里有83%的罪名只是持有违禁药物。

多少的瑜伽或戏剧都无法治好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想起从南非到美国，监狱墙壁上时常都贴着海报，内容是一些所谓的激励过程（empowerment），有12个步骤的标语要囚犯改变自己的生活、培养正向思考、宽广的未来等着你掌握——让自己的心灵远离监狱！可是这样的标语暗示了责任不在于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全是个人要负责，即便事实是他们必须要有超人的意志力才能克服种种强加的难关。

车子回到曼谷，晚上在酒吧有两个女侍送酒来给我和布莱恩，看起来与才刚道别的女囚像是双胞胎。或许是饭店制服的缘故，那袭紫衣与囚服很神似，不过质料是昂贵的丝绸。我的心思一直没离开坐在“饭店”里、玩着头发的“莉莎”，还有面对着空气打字的“约翰”。我只是通过表演认识了那些女囚，但戏剧演出可以比自我更加真实，特别是自我已经被困在牢笼、埋在监狱里的时候。

几周以后，我回到纽约，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邀请函，问我愿不愿意8月时再回泰国一趟，与公主殿下会晤？离开之前娜帕蓬博士就已经提过，希望到了夏天可以将这个“找到回家的路”的团队重新集合起来，因为那时候公主会到叻丕府视察。我虽然同意，心中却有种愧疚感，暗忖为什么她不联络泰国本土学者？

但答应了就要去，而且我确实很想见见公主本人。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又身处前往叻丕府的路上。到了监狱，一片橘海，旗帜、缎带、桌巾、帐篷都配合公主驾到而随处可见。数百名记者和西装笔挺看似官员的大人物们走来走去，而囚犯们则被边缘化了：她们只能耐着性子坐在场地旁的长凳上。我扫视一圈，想看看能不能找到认识的学生，可惜那些笑脸尽管端庄却都很陌生。圆脸的狱警倒是在场，她和我们都在皇室客人的帐篷里，这儿设了铺有软垫的座位和一个小讲台。

天气炎热潮湿，身子一下子就黏答答，汗珠沿着手臂滑落。我的衣服从浅蓝变成深蓝——皇室礼宾团队特别在邮件中提醒，觐见公主时衣物颜色不可以过深。

我们等着公主殿下，等了好一阵子。

这时一切突然变得精彩了起来，我仿佛要演出一场没有排练过的戏码。舞台指导说的话还听不大明白。“面朝这儿！”“向那边鞠躬！”“沿着走道，右脚先！”“匍匐回座！”没错，公主入座以后，大家上前必须匍匐前进，在泰国，谁也没资格居于比皇室成员更高的位置。然后又有人要我和洛兰练习屈膝礼，站起来一次，公主赠送纪念品时答礼一次。第一次不可以视线接触，但是第二次一定要视线接触。囚犯拿着扫帚清扫地毯，司法部长和一群摄影记者来来去去。

好不容易殿下终于来了。她态度谦恭，笑容羞涩，身上的粉蓝色套装、名牌高跟鞋，以及香奈儿包包衬托出气质。接受她的礼物时，我的屈膝礼不可思议地居然没歪掉，总算安全回到座位。

洛兰和我后来也有机会抓着金色麦克风致辞，她说起戏剧活动对监狱的重要性，我则倡议要提供教育管道给囚犯。娜帕蓬博士也上台，她呼吁社会尊重人性尊严、当局应当改革司法和刑罚体制。后来

桑亚莎的瑜伽学生演出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舞蹈，一样列队接受公主褒扬，也一样轮流屈膝致意。最后，公主殿下离开镀金宝座，走到麦克风前面。

“监狱不应该是人世间的黑暗角落。”她语气沉稳，不过剩下的致词内容我听翻译还是听不大懂，只有直接对着囚犯说的那一句话传进我心里。“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快乐。”致词完毕，公主又离去了。

女囚犯们好像凭空出现似的，唱起缭绕我心头的那首摇篮曲，不过这回昌师傅翻译出的歌词内容却不一样了。“行善，会有好报，”他对我耳语道：“散播希望，要行善，要行善。”

活动结束。

出去的时候娜帕蓬博士看来乐坏了，她说与会的大学教授对于“监狱直升班”项目很有兴趣，公主也相当支持。回国之前，有另一次机会在莲花中餐厅遇见她。“你应该明白，其实这一切都是表演给你们看的？”娜帕蓬博士拿饼皮卷起北京烤鸭时这么说。

“之前三趟监狱行程吗？想象得到。”我也老实回答。

博士解释：康兰吉计划确实改善了监狱环境，成果本身不假。问题是得到计划辅导的监狱成为例外，泰国绝大多数女囚的处境与我们所见的相差太多。接着她又嘴角上扬。

“你有没有看新闻？媒体都在报道哦。”博士拿出手机，屏幕上有我们的画面，底下配了泰语字幕。看起来各大电视台和报纸头版都是这个活动，原来今天算是庆功宴，这周媒体头条是“公主进监狱”。

我顿悟了。戏剧展现不在于工作坊，而在于两次泰国之旅本身。经过康兰吉计划改造的监狱无法代表全部现实，却足以代表现实转变

的可能性。它不是现在，但可以是未来，而计划意义不因此减损，反而更显出戏剧力量有多大。假的笑容有一天能发自内心，模范监狱有一天会是所有监狱的常态。

昨天叻丕府监狱的活动也是一场大戏，目的是在可能性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泰国上下忽然开始关注囚犯的生活，那原本不是一个遭到遗忘的黑暗角落吗？起因就是国人敬爱的公主拿着香奈儿包包直接走进去给大家看。我们的功能也一样，就当地人的角度而言，我们是值得尊敬的外国学者。于是皇室派了人、西方世界派了人，两股力量交织是为了成就一个美好的理念；我在卢旺达表明身份以后，忽然就替桑托斯取得活动许可，其实背后也是同样道理。直至此时，我才清楚理解自己和洛兰来到泰国的真正使命，学术专长是次要，反而外国人身份和白皮肤更有意义，因为这两个公关元素使泰国监狱的改革运动更加引人注目。

所谓公关不就是精心策划的一场好戏？对于监狱和囚犯，最重要的不也就是公关？将妇女逼进监狱的是法条，而法条之所以存在是奠基于民意，若能改变舆论对犯罪和司法的认知，对囚犯和罪犯的想象——让社会大众看见她们并非十恶不赦之人，而是缉毒恶法下的不幸受害者，她们专心练习瑜伽，同样崇敬公主殿下——如此一来，政治人物也得改变立场。美国有过前例：1988年那场总统大选，乔治·布什与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原本僵持不下，但一条带有控诉意味的电视广告指称杜卡基斯“纵放罪犯”，背景是他曾经支持囚犯周末休假的计划，但该计划实行后囚犯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因此逃狱并再度犯下强奸和抢劫案。有人认为这条广告是布什胜选关键，营造后来“纵放罪犯”等同政治死亡的氛围。

反之，假如民众诉求狱政改革，那么政治力量就会转向。既然严刑峻法可以通过营销手段获得支持，反滥刑的理念应该也做得到。换

言之，表演不只是表演，更绝不肤浅。只有打动人心的演出，才能发挥扭转体制的力量。

---

1. 原文出版时间计算。公主出生于1978年12月7日。——译者注
2. 泰国人有以单音节作为外号彼此称呼的习俗。——译者注
3. 印有披头士专辑《艾比路》（*Abbey Road*）封面图像的T恤。——译者注
4. 出自《法句经》。但本句经文的英译版本和中译版本略有差距，英译版直译为“在他人身上看见自己，那么你还能伤害谁，还能造成什么痛苦？”——译者注

5　单人禁闭与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

巴西

为了教化囚犯，便将囚犯置于完全独处的空间。然而，绝对的孤寂若无外力介入，则超越人类所能忍受，不留情面也不留余地摧毁了罪犯的人性。那不是教化，那是杀害。

——托克维尔

那人独居不好。

——　《创世记》2：18

“卡斯卡韦尔”（Cascavel）是葡萄牙语，意思是“响尾蛇”。

“卡斯卡韦尔”也是位于巴西巴拉那州，邻近阿根廷边界的小城市的名字。从圣保罗转搭两趟短程飞机，再从这里的小机场搭一个多小时的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更小的市镇。它叫做“卡坦杜瓦斯”（Catanduvas），周围景色秀丽。晨空中悬挂着半轮残月，丰饶绿意穿插形状古怪的松树，看来像一道道彩虹颠倒串在火柴棒上——达利的作品跃然眼前。

其实我的休假用完了，不过因为监狱直升班多开了一门基础英语，所以又换到几天空档。眼前所见如此熟悉又如此令人不悦，几乎每一趟监狱旅程都免不了：卡坦杜瓦斯监狱（Penitenciaria Federal

de Catanduvas）是巴西第一所联邦层级的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外形像是从美国监狱切了一块运过来。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了解巴西迈开戏剧性步伐走向大规模监禁的背后，那些所谓穷凶极恶的囚犯们究竟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巴西目前有55万监狱人口，是美洲成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20年里膨胀近乎4倍。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在过去25年席卷全球，但在巴西还算是新鲜玩意儿，我对其中单人禁闭的措施特别有感触。美国约有8万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但若将监牢、移民滞留中心、少年感化院和军营这些地方也纳入统计，则总数在10万左右。如果家长将儿女软禁在家中不与外界接触，就叫做虐待儿童，可是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少年明明活在同样条件下却无人闻问。讽刺的现实在我脑海盘旋不去。

陪同我的安德烈是位律师，专长白领犯罪，他在巴西的监狱做志愿者服务。“怪了，”他解开安全带时说，“上回过来时是两个男人拿着大枪迎接我啊。”眼前所见只有金属和铁丝网，整个建筑仿佛被彻底抽除人性。围栏上的红色招牌以葡萄牙语标注了“注意”“警告”之类的句子，安德烈下车以后朝对讲机大声叫了几句。

“早安（Bondia）！”

今晨我在圣保罗第一次和安德烈本人见面。技术上来说，几个月以前我读到当地监狱试行辅导计划以后，就和安德烈搭上线。在“阅读矫治”计划下，囚犯可以申请阅读经过审查的文、哲、科学类书籍，每篇摘要心得可以减刑4天，每年减刑额度为48天。电子邮件往来后，安德烈替我规划了参访行程，并答应担任翻译。这次停留时间不够久，无法为囚犯做些什么，但幸运的是得到两个整天可以在监狱里和囚犯相处，地点不只是教室，还有牢房，过程中能了解他们对于读书计划以及监狱是何感受。

周末我在圣保罗度过，好好感受这城市的三大特色：华丽的街头艺术、动人的桑巴旋律，还有无所不在的军警——他们因杀人闻名。根据巴西公共安全论坛（Brazilian Forum on Public Safety）的资料，2009年至2014年，全国死于警察武力的人数是11197人；可供对比的数据是美国在之前30年里警察杀死了11090人。里约市公共安全署长还曾经将警方执法时误杀无辜路人的案件，比喻为做煎蛋卷必须先将蛋壳打破。

那双眼睛，是通向哀痛灵魂的窗

在卡坦杜瓦斯监狱外面等了许久以后，终于来了一辆厢型车，上面标志写着“DEPEN”，原本我还以为是不是最后少了一个“D”，但当然不是。“DEPEN”是巴西国家狱政部的缩写，厢型车护送一辆黑色福特休旅车出来，车上面载着狱方官员正要去用午餐，暗色玻璃车窗降下，对方邀请我们同行。

我们跟在福特后面，慢慢开到外观破烂老旧的商店街，但这儿已经算是热闹城区。外面太阳很大，店里是美国西部风情的自助餐，我们端着炖肉过去和地主们同桌，典狱长穿着黑色西装，绿色眸子眼光犀利，但隔着镜片显露笑意。教育主任玛拉将金棕色头发往旁边一拨，朝我伸出指甲修剪整齐的手。

“巴拉那州有超过60人受雇于监狱工作。”典狱长神情挺得意地说起历史，安德烈在一旁为我翻译。

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是针对帮派分子而生，也是拉丁美洲人监狱生涯中黑暗的一页。首先是2012年，墨西哥暴力犯罪集团洛斯泽塔斯（Los Zetas）在阿波达卡市（Apodaca）的监狱内残杀了44人；接着委内瑞拉的监狱受到黑帮控制，狱警能够负责的只有看守设施边界、

数人头，以及护送至法庭。到了巴西，时间追溯到1991年圣保罗卡兰迪鲁州立监狱（Carandiru Prison），该机构恶名昭彰，后来已经关闭。那年巴西镇暴部队杀害111名囚犯，其中包含尚未经过审判仅是拘留的被告，而且手段大半是以机枪从牢房门口近距离射杀。即便没死在枪口的人也被扒光衣物，然后遭到受过训练、瞄准生殖器袭击的警犬攻击；还有一些人被利刃刺死，或被强迫目睹处决经过、扛尸体和刷洗血液，因为警察害怕染上艾滋。然而，惨案导致复仇心态，于是出现名为“首都第一司令部”（Primeiro Comandoda Capital，简称为PCC）的犯罪组织。许多人将PCC比作南非数字帮，而巴西全国上下的监狱很快便落入PCC控制，引发数十起监狱暴动事件，夺走数百条人命。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2014年，就在卡坦杜瓦斯监狱内，骚动持续长达30小时，数十名戴着面具的囚犯攻占监狱屋顶，扬起PCC大旗。他们抓了其他囚犯，将俘虏双手捆在背后，之后轮番毒打或吊在屋檐下。

卡坦杜瓦斯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成立于2006年，是巴西政府对于帮派暴力的直接响应。小镇居民都收到矫治部发行的手册，内容指出这是巴西联邦政府第一所专门收容高度暴力犯的监狱，目标是遏制黑道帮派活动。监狱内有四分之一的囚犯是各地落网的PCC领导人物，他们离开一般州立监狱体系以后暂时住进这间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里面有208个单人房，建筑本身就花费1800万美元，是巴西对监禁制度史无前例的大手笔投资，但预计还会有四所类似机构陆续完工。超高级监狱内每位囚犯每年消耗预算12万美元，而州立监狱体系的囚犯平均则是每年36美元，因为一般囚犯多半要自己负担伙食和衣物费用。

午餐以后我们重返监狱，玛拉带我们通过繁琐安检。这里设置了两组精密金属探测器、电子指纹辨识系统、X光输送带、各种手持仪器，还有人工搜身。监视摄影系统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我们的行动，影像同步传送到首都巴西利亚市。

身穿海军蓝制服的干员巡逻各处，其中一人负责护送玛拉、安德烈和我。他身上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作响，我侧面得知原本所有门户设计为电子锁，但某次系统中毒以后大家动弹不得，于是只好回归传统。通过刮刀式刺网，广场上砾石满布，有绿色制服的人挑着水桶或垃圾袋走动，男女都有。起先我以为他们是犯人，没想到只是清洁工。更深入一些，浓浓的消毒水气味钻进鼻孔。

里面一片死寂。

囚犯在哪里？

“你们学校教法律吗？我有法律学位呢。”导游颇自豪，他们是联邦政府的干员，所以薪水福利比一般州立监狱员工好，多数具备大专学历，除了维护监狱安全也要搜集情报，主要目标自然是帮派活动。超高级监狱里，每个犯人由两名干员管理，但在州立监狱体系中，每350个囚犯才由一个人负责。

“穿上，”玛拉递给我一件类似实验室用的白袍，她自己已经套上了。感觉好奇怪，我们是科学家还是医师？不过考虑这里的环境背景几乎毫无生气，似乎也很合适。

沿着走廊前进，一扇门两旁挂着塑料袋，很明显是装垃圾的，里面塞满看来快坏掉的面包。过了那道门是一个让人联想到肉品冷冻库的环境，难道是停尸间？不对，这里的小房间是监狱中的监狱，隔离中的隔离——纪律管理特区（Regime Disciplinar Diferenciado，简称RDD），这种极端隔离手段用在极端纪律问题上。许多巴西公民认为RDD与宪法所谓不得施以不人道处置的精神有冲突，因为被关进这里完完全全无法和其余囚犯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可是每个移送到卡坦杜瓦斯监狱的犯人，最初20天都必须在里面度过。

干员打开房门，里面是空的，乍看就像真人大小的过家家的屋子，只不过是一个噩梦版本。牢房一尘不染，和停车格差不多大，有方形书桌、圆形椅子和长方形的床，但其实只是荧光灯管底下的几个混凝土块罢了。高处有教堂那样的窗户投下柔和阳光，光点在黄色墙壁上舞动，周围笼罩着橘色阴影。顶上是四块正方形的天空，就这么多了。牢房另一头连接“日照区”，内设有淋浴间，但淋浴间内还开了监视窗口方便掌握囚犯状况。牢房里面唯一有人活过的证据，是金属门背后刻着数日子的线条。

另一侧两道紧闭的门后住着活生生的人，但是我看不见也听不到。我能肯定有人，因为门上挂着文件，而且注明入房日期。两人都一样，已经在极端隔离中度过两星期。

“你有很多想法？”干员看着我的笔记本说：“美国人自己有很多超高级监狱啊，当初我们这里一堆人过去取经，现在你们又一堆人过来参观，好好笑。”的确，单人监禁和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都是美国的发明，早在1787年基督教贵格会就在费城胡桃街监狱实验过单人牢房，1829年成立的东州教养所前身是修道院，内部全是单人房，囚犯必须如古时僧人戴上兜帽，随身物品只有《圣经》。直到19世纪末期，纽约州奥本监狱实行白天苦工加上集体行动的管理模式逐渐盛行，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恶魔岛监狱D区、圣昆丁、福尔森、阿提卡这类收容数千人的超大型多层结构监狱出现，囚犯被迫接受每日照表操课的待遇，在这些设施中极端隔离手段如单人房重新复苏。

1983年单人监禁正式回归。伊利诺伊州马里昂市（Marion）一所监狱带头采用每日隔离23小时的制度，之后随着美国监狱人口暴增，舆论主张以暴制暴，其他州也跟进了。今日的加州，囚犯单独监禁的平均值为6.8年；回到1989年，州政府设立了鹈鹕湾监狱（Pelican Bay State Prison），也就是第一所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主要特点就是独囚制度，没有任何活动或交谊设施，加上不接受外界检验或申

诉的强硬管理体系。1994年，科罗拉多州建设了有落基山恶魔岛之称的佛罗伦萨监狱（ADX Florence），最高纪录是一名联邦囚犯因为“不得与人类接触”的命令遭到禁闭32年。1999年，美国在34个州里共有57所超高级监狱，而鹈鹕湾监狱内有227个囚犯已经独处超过10年。

拉丁美洲于1830年到1940年间建设现代化监狱，有些仿照东州监狱、有些效法奥本监狱。历经上百年，官员们考察了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爱尔兰、丹麦、南非，以及俄罗斯，观摩了无数超高度安全级别设施以后，推出了我们眼前的卡坦杜瓦斯监狱。

我们前往干员口中代号为查理的区块，途中我终于听到活人发出的声音：双层密闭门后面传出朦胧呼喊，回荡在迷宫似的走道上。

囚犯被困在迷宫中心——说是迷宫并不为过，因为它的门廊和镜子故意被设计得令人分不清方向。“虽然在同一个房间待了10年，”托克维尔描述美国被禁闭的犯人，“却直到出去那一刻才真正确认牢房在整栋楼的什么位置。”

我被带到牢房前面，小小窗户拉开一线。我试着窥看。

一双眼睛凑上来。我后来得知他叫卡洛斯。

他在狭小干净的牢房里面立正站好，仿佛排队一样。

“你好！”安德烈开口。

那双眼睛……是通向哀痛灵魂的窗。

这次对话，或者说“访谈”，是最诡异、最恐怖的经验。我面对着保险柜那样的门，只透过一个小孔讲话，安德烈在我耳边翻译，速

度很快，周围还有很多人听着我们的交谈内容。

卡洛斯，41岁，来自里约声名狼藉的“法裴拉”（favela，巴西葡语中的贫民区）。20世纪80年代起，都市中贫穷阶级人口越来越庞大，他们找到空地就将之占据形成聚落。这种区域和牙买加金斯敦的战区或南非的情况本质相同，缺乏基础社会建设且受到帮派控制。卡洛斯因为杀人、非法持枪、伪造文书、劫持人质已经坐了16年牢，两年八个月前从州立监狱转到卡坦杜瓦斯。

“可是玛拉，”我转头，“囚犯禁闭不是有360天的上限吗？之后应该就要转回州立监狱才对？”典狱长明明才说过。

“多数案例确实如此，”她回答，“但不一定。看状况，规则会有所变动。”

卡洛斯的天蓝色衬衫上面印有联邦矫治监狱狱友字样。他说自己刑期高达98年，但实际上巴西没有人服刑超过30年。

“还好不是美国。”他脱口而出。

卡洛斯从墙壁上取下三张照片骄傲地展示，照片里面是他的五个小孩，从5岁到23岁，还有一个孙子已经7岁大。如同其他囚犯，自从来到卡坦杜瓦斯以后，他就没有面对面探视。他家人负担不了飞来这里的机票，连搭公交车都是很大开销——而如果搭公交车去里约市的在线探视中心，可以透过类似Skype的视频电话系统与监狱囚犯进行视讯对话。之前有次机会是卡洛斯为整幢监狱刷油漆，典狱长自掏腰包代垫他家人前往探视中心的车费（其实不过20美元），但卡洛斯的家人至今只去过三回。

“没有家人，要我如何改过自新？”他问：“有时我会做噩梦，梦到自己被家人遗弃，惊醒以后非常恐慌害怕。我知道我做错了，也

从自己、从别人的经验里学到教训，但是我没有机会证明啊。我的感想就是，应该要给人第二次机会，至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改变了。”卡洛斯用力咽下口水。

“每天待在这牢房里22小时，是地狱。老实说，我每天都活在地狱里，好像要窒息了，或者说根本已经死了。还能说什么呢，这不就是活埋吗！”

其实他想说的应该还有很多，不过我们转换话题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玛拉说卡洛斯参与了阅读矫治项目，计划是2009年开始的，起因是一个行事作风争议很多的联邦法官对监狱官员说：“反正没有钱开什么矫治计划，不如就让囚犯读书啊！”这一点在美国也早有先例，我们那儿美其名曰通过文学再造生命，最早是马萨诸塞州采用了“读书疗法”，以阅读课程为新的缓刑形式。该计划网站的说法是好故事可以激发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心，并扩展到他人，甚至自己身上，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时，囚犯不必直接面对自己的罪行也能处理情绪挣扎。

卡洛斯从书架上拿起《罪与罚》。他开始报告阅读心得。

“犯罪会对家庭造成影响，所以要三思而后行。故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他偷了东西，杀了人，最后受不了良心煎熬，做了坏事怎么能没有罪恶感。”

“那卡洛斯，你觉得良心不安吗？”我问。

“每天都会。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个错误。你懂这种感受吗？身为活生生的错误，而且生命中除了错误，什么也没有。但是就算活在地狱里，我还是保持希望。虽然42岁了，至少不是人生终点。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大学，有兴趣的科目是神学和心理学。我也试着写

书，取名叫做《深谷行者》。你我关照内心就会发现那个行者，每个人都要抓紧绳子向上攀爬，千万不要注视底下的深渊。”

走廊上出现两名男子和一辆金属推车，车上的小碟子装了几颗药。这里有八成的囚犯需要吃药。

“我是来这里才开始吃药……”卡洛斯说：“不吃药睡不着，太焦虑，太忧郁了，要一个人度过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没办法，我好害怕。”

干员关上门口的小窗。来不及说再见，卡洛斯便从我面前消失。时间到了。

我们跟在另一辆金属推车后面来到图书馆，但其实比较像是塞满书的更衣间。书籍凌乱，特别是标着阅读矫治认可的书更是到处堆，作者有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和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此外也有《圣经》、字典、福音歌本与很多流行杂志。

“好多西德尼·谢尔顿（Sidney Sheldon）的书。”玛拉口吻有点不满。和奥蒂斯维尔的图书馆一样，这里也有一小柜的历史书籍、一些拉丁美洲研究，但奇幻和科幻的藏书特别丰富。

“囚犯想看书，所以向政府提出请求。结果呢，”她翻开光亮的页面，“来了这些愚蠢的杂志。”

走出大门，空气一下子清新起来，地平线一片翠绿。安德烈和我先顺便送玛拉回到她在卡斯卡韦尔的公寓。前面也有道闸门，与她的工作地点一样，这屋子像是美国来的复制品。

“感谢美国，这房子就像是专门为我们准备似的。”安德烈脱口说出我的心声。

旅馆倒是有1952年的迈阿密风格，或者说整个城镇搬到另一个时空也同样合适。大体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路上女性的发型都比较夸张；点心是小起司面包球；路边小酒馆还播放着摇滚乐。安德烈和我找了一间酒吧坐下来，点了炸鱼排和当地的木薯粉料理后聊起感触，他拧着双手表示自己国家如此热爱监禁实在令人悲哀。电视播放世界杯足球赛，四周酒客有说有笑，但安德烈说那些造价高昂的体育场在曲终人散后也会变成监狱。他压着太阳穴叹道："连我家里，我哥、我爸，每个人都觉得把犯人关起来，把钥匙丢掉，最省事。可是这怎么算得上解决问题？"

我相信爱，相信救赎，但这里没有

隔天早上到达监狱，铁丝网彼端出现许许多多女性外形的荧光色块。进入监狱有服装规定，除了黄色和粉红色外一律禁止，目的是让远在首都巴西利亚的"老大哥"们能轻松从监视影像分辨出谁是囚犯，谁是工作人员，谁又是访客，结果造就这幅充满戏剧张力的画面。她们都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些还得到PCC援助，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帮派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少人凌晨就睡在大门外，为的只是排队顺位可以前面一点。无论如何，她们都要忍受漫长等待以及繁琐的安检搜身，身上每个凹洞都要查，换来只是几小时和爱人相伴。最荒诞的大概就是她们居然还不得不打扮成这幅缤纷的模样。

穿过那群妇女并接受安检之后，我们领到一小杯的巴西咖啡，监狱里面沿路都看得见塑料杯到处乱丢。干员必须轮班值夜，所以这一小杯、一小杯又黑又甜的液体，就像润滑油般，维持着机器顺利运转。

下雨了。走在幽暗的混凝土长廊间，寒意渐渐渗进骨子。过了一个转角，看见铁栅后面有比较大的空间，阳光穿透头顶的刮刀刺网，

裂成一丝丝。这里就是先前瞥见的日照区，囚犯必须分批进入，每次上限13名，在日照区禁止三人以上的对话。

一颗足球击上墙壁，接着好几个人影迅速穿梭，一边踢球一边吆喝。他们大口呼吸，扯下上衣，光着脚丫，灿烂地微笑，兴奋地跳跃。这就是生命。

接着传来一声：“停！”

鸦雀无声。

球缓缓停下。囚犯们不能动，必须靠墙低头排好，笑容当然不见了。“1号！”干员大喊。

要做的事情已经熟得不能再熟。犯人低头走向干员，转身，跪下，伸出双手到铁栅外上铐；然后，换个方向，走到另一名干员那里，再转身，门开了，门又关了。他的肉体又遭到活埋，必须再支撑22小时。

“2号！”干员再次喊叫。

这仪式反复操作直到日照区只剩下泄了气的球。干员们还戴上塑料手套四处检查，看看有没有遗留物。

过了几分钟，门又打开。下一批13个囚犯成一路纵队低头沉默走进日照区，面朝墙壁后一个一个暂时除去手铐。

“Liberal！”干员指示。意思是“自由活动”。

囚犯满脸笑容，彼此拥抱，头终于抬起来了，不只互相聊天，也会和警卫交谈。靠近铁栅处准备了电动剃刀，需要理发就直接过去

用，所以地面上散着一撮撮发丝，而半空中则是足球飞来飞去。感觉就好像是看着他们死了以后又重生。

我看见卡洛斯，容貌比起只能注视眼睛的时候还要更像个大男孩。他身上T恤印着监狱的字样，但我一个恍惚看成地狱。

“来吧，带你看看牢房内部。”干员说。

“可以就这样进去看？”我觉得那是私人领域，好像不该如此随便。

“当然可以，监狱是公有的，不是他们的。”干员语气还挺得意的，他径自带我们进入C区的房间。

混凝土造出的书架上搁着一本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的《分手信》，旁边是淋浴间，每天固定时间自动洒水。床上有四张褪色相片，里头都是小孩。书桌上一支笔芯从塑料壳内抽出，这名囚犯的创作走的是板画风格，画面中有大麦町、祈祷的双手和笼中鸟。高处小窗户透进微弱的粉红光线，隐约听得见金属门开启后有人朝彼此高呼的声音。监狱在英文里又被称为“悔罪所”（penitentiary），而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所谓的“悔罪”是什么感受。这个地方笼罩着一股诡异的阴郁，就像古时候的修道院，但前方可能是教堂，也可能是集中营。

干员提到牢房里面没有镜子。曾经有媒体来此拍摄，在牢门的小窗外面留下摄影机一整夜，回来时发现囚犯一直盯着镜头，看自己的倒影入了迷。

“牢房干净，整齐，有效率。”干员的口吻仿佛将这儿当成自己的心血结晶。“和州立监狱不同等级，很安全卫生。”

的确，卡坦杜瓦斯和其他巴西州立监狱有如天壤之别，我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才能够过来参观。巴西政府斥巨资建造监狱，自然想向世界证明其物有所值。2014年流出一部影片，讲的是巴西的囚犯居然斩首另外三个狱友，于是联合国人权组织开始对当地过度拥挤、暴力频传且超过八成囚犯无法负担律师的监狱表达高度关切，并表示“事态严重”。巴西还有很多州无法分开安置男女囚犯，女性监狱内的男性管理人员要求性服务也时有所闻。青少年和成人也会关在一起，而且牢房里面不一定有盥洗设备。2009年，有16466人的监禁违反规定，例如许多人遭到羁押的时间比最后判处的刑期还要久，最夸张的案例是有位男性花了11年时间才等到开庭。此外，从2009年到2011年间，圣埃斯皮里图州（Espirito Santo）已有多方指控狱内虐待的问题，但政府竟然封锁监狱进出，连原本依法具有督导权的单位也被排拒在外。

另一条走廊上又有几辆金属推车出现，推车的干员们都戴着宽边墨镜。这是另一种仪式：饮料倒满塑料杯，从小窗送进去，囚犯们迫不及待接过，然后小窗再度关上。

后来我们与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妇女擦身而过，她们双颊浮肿，泛着泪光。我还听见婴儿的哭声。

“好可怜，”玛拉揉揉眼睛说，“来探视犯人的，一直大叫爸爸！”

剩下的时间我去了卡坦杜瓦斯里面两个“乐园”：资格符合的人犯每天可以离开牢房几小时去上课或工作。工作机会不多，可以说罕见，主要是拿废弃的杂志纸张编织篮子，或以纸张加上棒冰棍制作成小孩玩具，成品则在当地手工艺品市集贩卖。我们进工作室时，十几个男人围着几张小桌子正在工作，他们拿了两种产品样本给我看。玛拉说我手上那个是纸雕小鸭，还有用火柴棒做出来的摩西、耶稣和施洗者约翰。

“和他们聊聊吧。”玛拉鼓励我，然后向囚犯们介绍了女教授。

我再次吞下内心的不安和作呕感，试着不把自己当作人类动物园的游客，转身望进铁栏杆里面。

奥古斯都的黑框眼镜下掩藏了一双疲惫的眼睛。他说希望有一天能进大学攻读生物，并且提到根据巴西的刑罚规定，犯人工作五天就可以减免一天刑期，但也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囚犯可以得到工作机会。

“工作可以镇定情绪，”他说，“其实只要不在牢房里都好。能离开牢房不要一个人关着，我什么都愿意。闷在里面实在太久了。我相信爱，相信救赎，但这里没有爱。”

隔壁两人神情同样凄苦，玛拉告诉我他们是一对父子。我注视着那位父亲，仿佛又看见南非的安东尼——安东尼的女儿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另一边，儿子也向同一个药头买毒品。我也想起一个纽约的学生，即便出狱回家应该欣喜，他却仍以泪洗面，因为他18岁大的儿子还在牢里。眼见一对父子都住进超级监狱，我心痛得红了眼眶。世界各地有许多父亲因为贫穷和牢狱与子女分别，但父子在监狱里并肩坐着又是另一番光景，转头就看见儿子沦入同样处境的挫折，实在太难想象。

我噙着泪与他们闲聊，问起他们最近读什么书。奥古斯都说起《安娜·卡列尼娜》和书里传达的真爱情绪时颇为激动，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他们访问我。美国的再犯率有多高？这个监狱和你教书的那里一样吗？美国是不是也该采用阅读矫治？美国真的还有死刑？真的吗，死刑？无期徒刑呢？这个监狱是学美国的吗？超高度安全是美国传来的？我们蹲在这里这么久都是美国人想出来的制度？我有点头昏脑涨，后来迷迷糊糊地跟着玛拉走出去，然后不由自主问起：“那个21岁抢银行的犯人，真的罪无可赦吗？”

“那算什么呢，”她回答，“上个月有个19岁的犯人进来。我心想，这孩子瘦巴巴的，能犯什么大错？结果居然是因为他朝检察官脸上吐口水，就被送到这儿来。”

就算是美国也一样，囚犯遭到单人禁闭的理由千奇百怪。纽约有84%的单人监禁原因并非暴力行为，而是例如使用淋浴间过久、不遵守命令、不配合送回餐盘、持有太多邮票，甚至眼神挑衅，也就是狱警不爽囚犯的眼神。2013年，南卡罗来纳有个男囚被处以37年半的单人监禁，只因为他上网在Facebook上张贴动态。

我们又走过日照区。足球落地，囚犯们匆匆回到铁栅前面，看见我兴奋地问了不少问题，笑容几乎扭曲他们的脸。

“美国的监狱可以上网吗？”

“你能在牢房一个人待22个小时吗？”

“帮我们和奥巴马总统问好！”

他们活力旺盛，这攻势令我心里又是悲伤又是恐慌，忍不住打了几个哆嗦。人性在濒临崩溃疯狂的边缘还如此灿烂，这美景我前所未见。

“这里的囚犯没有工作，没有学业，没有得到任何辅导，就只是每天在牢房里面消磨22个钟头。”玛拉告诉我：“有些人已经待了好几年，真的很令人难过。”

他们尚未被彻底遗忘

卡坦杜瓦斯监狱与一般州立监狱不同，里面没有帮派暴力，甚至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半数牢房还空着。但囚犯承受着另一种苦痛，是心理上的屠杀。“极高比例的囚犯即便只是短期禁闭也会精神恍惚，几乎无法唤醒，还有一部分人变得极度暴力冲动，一部分人会自杀。即便没出现明显精神问题的人，行为纪律也没有改善，绝大多数个案的心智程度无法回归至有益社会的程度。”这是189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长期禁闭进行调查后得到的结论。

过了一个世纪，波士顿的精神医师斯图尔特·格拉希恩（Stuart Grassian）访问单人监禁的囚犯，研究发现三分之一出现严重精神疾病及幻觉，称之为单人监禁症候群，症状包括社会退缩、恐慌、非理性愤怒、无法控制冲动、被害妄想、急性或慢性忧郁、注意力或记忆力问题、认知扭曲。自残行为十分常见，遭禁闭的人有很多出现咬血管、切手指或睾丸的案例，自杀率也达一般的五倍之高。加州数据显示，自杀人数七成发生在禁闭牢房，如果遭到禁闭者是青少年，则自杀率为19倍。2009年《纽约客》杂志刊载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的文章，他描述单人牢房这个“地狱深渊”时文字栩栩如生：“犯人不停和自己讲话，无法克制踱步，不过6英尺距离，就这么来来回回好几小时。再过不久，他恐慌发作，大叫求救，后来出现幻觉，以为墙壁的颜色一直变换。之后什么声音都能惹怒他，例如整点时警卫开门查看、隔壁房间狱友的动作等等。大概过了一年，他听到电视机里有人对自己说话，于是只好将电视收到床底下，不怎么拿出来看了。”1995年也有一位法官指出，加州恶魔岛监狱的环境“人类近乎无法忍受”。

卡坦杜瓦斯这种单人牢房如同截肢手术般残忍，以为截去问题就达到威慑与惩罚，保障其余人平安。但我们怎能忘记所谓“问题”依旧是人类，他们最后仍然要回归社会，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无论对于囚犯或对于我们自己而言，逼疯一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更进一步来说，强迫人陷入疯狂，是否合乎道德伦理？

甚至不用考虑这么多，根本问题就是单独监禁没有效！ 2006年研究发现，经过3个月禁闭的囚犯，暴力犯罪的再犯率反而提高；2003年针对亚利桑那、伊利诺伊和明尼苏达三个州的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的调查也发现，囚犯的暴力行为没有明显变化。所以有些国家，例如英国，已经决定放弃又贵又没有成效还不人道的手段，结果是整个英国的单独监禁人口少于美国单一个缅因州的监禁人口。英国采取的做法是将最容易滋事的犯人放置在密切督导中心（Close Supervision Centre），这种小规模但环境稳定的空间最多容纳10人，囚犯接受心理治疗、教育辅导，表现良好才可以得到运动、打电话、接受探访或使用厨具的权利，设计理念是提高对囚犯的控制而不是放任。由于经过控制囚犯彼此羞辱或冲突的机会大为降低，专家认为那才是监狱内部暴力事件的根源。

一个警卫看守着一间小教室，里头10个穿着蓝色汗衫与拖鞋的学生坐在书桌前，和教师的讲桌之间竟也有铁栅分隔。我真无法想象面对铁栅教书是什么感受，这和是不是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已经无关。玛拉指着教师那侧，混凝土地板上有条红线，距离铁栅很近。

“之前有一次，囚犯查字典要找单词，”她解释，“他说找不到，于是老师靠过去想帮忙。这时候呢，警卫急急忙忙冲过来，枪口对准他们大吼，‘退后！你想对老师下手吗？’那个囚犯手发抖，气红了脸。总之，你还是别跨过红线。”

今天这堂课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小学五年级也有高中水平，上课的老师一头金色卷发，穿着实验室那种白袍，胸口绣了卡通人物。她向学生介绍我，我则稍微介绍美国的“监狱直升班”项目，说明教育的重要性。

然后好像鸣枪起跑，赛马奔驰，他们全都激动起来。

“没人给我们上课，我们当然会回到街头混啊！”前排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叫道。

“我51岁了，没什么指望，但他们不一样。”说话的人指着身旁肤色较浅的年轻人。“我这辈子没机会受教育，住的那个贫民区根本没学校。我生下来什么也没有，连出生证明也没办。”

我本来是想访问他们对于阅读矫治计划的想法，然而进来两天后，我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计划本身立意良善，而且可能是维系囚犯理智的最后一条浮木——问题是，想想这环境就知道一切荒谬可笑。文学在这么极端的单人囚禁以及整个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体系中有何意义？换取几天的减刑？原本刑期就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有人真心在乎吗？

当天早上和下午，那位老师离开以后，我被安排进入教室。“你去给他们上课吧！”于是我听见了他们颇为震撼的人生故事。

法比奥，40岁，母亲生他的时候才11岁，而且是遭人强暴。酗酒的父亲差点将他打成泥，所以法比奥6岁就逃家，在几十个孤儿院间游走，7岁开始犯罪，18岁入狱，26岁才隔着监狱铁栅再次见到母亲。

罗伯托，38岁，家里还有14个兄弟，为了养家混帮派贩毒，所以在州立监狱进进出出，反而因此钻研出更高深的犯罪技巧，但也不幸染上毒瘾。后来一次抢劫商家行动被发现，不慎开枪射杀了联邦警察，已经在禁闭室内待了5年。

学生们一个个低着头，气氛就好像有颗定时炸弹。

“Mi família”（葡萄牙语的“家人”）这个字出来以后，点燃了大家心中那把火。一个人关在牢房里面实在难受，不过真正的深渊在于与妻小父母相隔数千数万里不能相见。

囚犯们滔滔不绝，但安德烈已经体力不支，翻译跟不上以后索性暂停。不过我一直点头，而且也真的明白他们说些什么，就和我在美国、牙买加，尤其是在波尔斯穆尔那里听到的都一样。无论是贫民区、战区、南非街头或者这儿的法斐拉，都是类似情境。他们的人生不外乎两个力量在拉扯。

首先是种族。

罪犯、贫民区，乃至于这整座监狱，其实就是种族不平等的结果。当年非洲奴隶被带到巴西的人数是美国的10倍以上，而且苦难在这里维持到19世纪才结束——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度的巴西，在所有美洲国家中敬陪末座。即便废除黑奴，社会仍透过警察权、刑罚权压榨他们成为奴工，几十万名可怜黑人被逮捕，名义是行为不检，包括游荡、闹事、酗酒，甚至是跳卡波耶拉（一种传承自非洲的舞蹈，由于带有武术成分所以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解禁）。被捕的黑人沦为劳工，或者被迫加入军队，即便1988年巴西成立新联邦宪法，还是没有吸收黑奴后裔进入国家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政策。隔离充斥于社会各个层面，无论教育、就业、土地分配和居住，以及公共服务，于是到了2009年，黑人或混血儿仅17%真正进入教育系统，超过八成上学不满8年，近2/3非白人学生无法读完高中，能上大学的仅6.6%。巴西全国生活水平在贫穷线以下的公民超过七成为黑人或混血，工资比白人少了不只一半，预估寿命也短6年，主管职位有97%、经理职位83%都被白人占据。如果巴西的白人和非白人分裂成两个国家，白人巴西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到全球第44名，但非白人巴西却是第105名。

由此观之，巴西非白人族群犯下杀人案比例将近白人族群的2倍，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3倍，其实一点也不意外。非白人明明是全国人口1/2，却占了监狱囚犯的三分之二、入狱概率是白人的2倍，也一样并不奇怪。几百年下来累积的社会制度一直在荼毒他们。

“你之后会不再犯罪吗？”玛拉问一个囚犯，囚犯眼睛下面已经满是皱纹。

“要是回去还是没工作，你要我怎么办呢？”他看起来好像想要冲上前：“就算回去了，谁要给我工作？谁愿意帮我？”

他转向我，眼睛一亮：“美国的情况怎么样？政府会帮忙吗？会不会给工作？记得，有机会的话帮我报名，看看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可能正常上班。”

我一直看着红线，但还是将笔记本递到铁栅对面。

佩德罗·亨里克·普罗科皮奥，他写下自己的姓名，笔迹很秀气。“要记住哦。”他将本子还回来。

除了种族，另一个力量是阶级。美国已经注意到犯罪问题实际上就是贫穷和不平等的问题。所得分配不均达到1928年以来新高，排名前五分之一的家庭人口掌握了全国88.9%的财富。同样问题在巴西更极端，所得不均程度比起美国还高出25%。症结追溯到1870年到1890之间，当时巴西经济成长率近乎世界最高；到了20世纪50年代，看似要超越美国，于是2000万人移入大城市，可说是史上最大一次迁徙。然而，也就因为经济成长急速趋缓，数百万人陷入贫穷，1980年到1990年，最低工资下降46%，人均所得也滑落7.6%，同时期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却成长65%，穷困的那一半公民收入反而下降12%。GDP用于医疗预算仅3%，教育不到5%，但退休抚恤占了12%——这笔支出只有巴西社会顶端五分之一的人享受得到，活在地下经济体系的人口高达全国人口的40%，完全得不到保障。此外，居住权也是一大危机，三分之一家庭没有足够空间，全国统计起来还短少580万户居住单位。

贫穷如此普遍，社会服务如此缺乏，巴西政府却宁愿砸重金建造我身处的这所监狱。

为什么？我问他们，师生立场互换。

他们给我的总结是一句巴西俗谚：“做给英国人看。”

囚犯们表示，事实上，政府需要黑帮存在，因为贫民区和监狱需要人管理。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数字帮便是在同样背景下诞生。不过巴西政客们却又得定时作秀，表现自己努力打击犯罪，不然选举会失利。卡坦杜瓦斯监狱以及它四个兄弟是这国家一场大手笔的秀，尽管单独监禁根本是虐囚，尽管监狱根本没有解决犯罪、暴力、社会不公的问题，甚至对于帮派规模毫无影响，联邦政府还是设法将所有囚犯抹黑成危险人物，他们莫名成了黑道大哥，回到家乡臭名远播。尽管同样策略在美国根本失败了也无关紧要，戴维·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2014年的新书《黑社会的社会秩序》（*The Social Order of the Underworld*）就解释了这件事，他研究加州监狱内部的帮派以后，发现性质与巴西PCC类似，“最后提供了暴虐却有效的管理手段”。加州一开始也将同帮派的囚犯分散到相隔很远的不同监狱，以为这样可以削弱联系，没料到反而使势力扩展到其他州，触手伸入联邦系统内。

但事实已经没人在意。卡坦杜瓦斯监狱就是政治舞台上的精彩一幕，关在这里的条条人命演出得非常漂亮。

“媒体把我讲得禽兽不如，”法比奥说，“我才不是那样。真正禽兽不如的是创造出这种恐怖地方的人！”

眼前的铁栏杆模糊，我的头越来越痛，但还是尽量想些话出来勉励他们。我说自己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做柯克，他在美国的监狱里面认真读书，拿到大学文凭，后来还进入常春藤盟校，成为社工领域的博士，还有我在纽约的“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学生出狱以后都一定能入学。巴西囚犯们听完，眼神闪烁不已。

“让我们和你的学生分享一些想法吧，”他们说，“算是地球两端的囚犯相互交流一下。”

他们的分享充满希望，由人间炼狱全力窜出。

只有教育能释放我们。真正的牢笼在脑袋里，通过学习才能将它们拆掉。资本主义会毁灭我们，生命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成为怎样的人。好好学习。不要放弃。

“我代表巴西祝福你，”等我收东西要离开的时候，奥古斯都靠过来说，“谢谢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

谢谢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就还活着的人而言，这句话实在奇怪。但他们算是活着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单独监禁是“抽干一个人的生命养分，削减他的灵魂使其萎靡衰弱，然后高高捧起如干枯木乃伊，他们把已经失去心智的人，赞扬为改过自新的模范”。对他们来说，能被人看见，出现在笔下，已经是难得的重生，代表他们尚未被彻底遗忘。

过完这一天，我们随玛拉回到办公室，狱方人员围着一部计算机，个个露出笑容。他们转身让出画面给我看看，是谷歌翻译的一句话：“他们动（moved）了。”动了？去哪里？别的监狱？

“不是啦，”玛拉解释，“是说你亲自过来，讲了学生的故事，囚犯都很感动。”

我也很感动，但这份感动无法带来慰藉。

安德烈和我驱车前往机场，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讲话。他感到气愤，国家竟将钱用得如此荒谬。他以前就在卡坦杜瓦斯或州立监狱体系做志愿者，连他的未婚妻也一起帮忙，为女子监狱的囚犯提供法律

咨询。他们已经知道巴西监狱制度的黑暗，但亲眼见证还是太过震撼。至于我，沉默是因为不时啜泣，脸颊失去血色，情绪也暂时失去气力。

回到美国，过了几周，我对奥蒂斯维尔监狱的学生们提起巴西的囚犯，请他们写信过去，内容挺活泼有趣的。

“希望你身体安好，无论当初犯下什么错都已经吸取教训。”理查德的信上这么说：“我称你为兄弟，因为即使我们身处异地，你我仍旧是人，灵性永远相连。我也相信教育会是成功关键。对了，该介绍一下，我个性简单好相处，喜欢学习新知。”

罗贝多的回信写了不少：“我们肉体遭受囚禁，但无论国家机器怎么压迫，也不可能关住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保住心灵自由。我已经23岁了，打从16岁就住在监狱；一开始不知道教育多重要，所以走了很多冤枉路。后来我无意间翻开书，才发现自己原来能够那么‘自由’。虽然每天关在牢房里面23小时，不过一看书就会忘记时间。说这些，其实是因为听说你可以上学，希望你看了这封信以后更有动力走下去。”

他的回复令人动容，而且充满希望，只可惜这是我第一次进出监狱以后，心里感到彻底的绝望。首先，看似黑暗中的烛光，也就是他们的阅读矫治计划，相应于整个局势太过微不足道，甚至令人怀疑计划本身是否也只是政治舞台上的另一出戏。再者，虽说美国许多州政府已经开始思考单独监禁制度的优缺点，于是2014年有10个州着手改善相关环境，缩限独囚规模，避开青少年和精神已有状况的犯人，或将单独囚禁的囚犯重新送回一般囚犯之中。但卡坦杜瓦斯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美国撒下的种子又一次在异地结出迥然不同的果。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和单独监禁制度不仅是全球的现实，更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现实。这是一个世人陷溺其中，至今仍不愿清醒的美国噩梦。

6　民营监狱

澳大利亚

价值观的真正革新促使我们质疑过去，乃至今日的许多政策是否公平正义。我们必须扮演所谓的好撒马利亚人，而且这只是开始。总有一天我们得清除路上所有障碍，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上无须担心遭到殴打或掠夺。同情心不是给乞丐硬币，而是扭转创造乞丐的体制。

——马丁·路德·金

“你是否曾被起诉定罪？”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的时髦电子入境柜台前，屏幕闪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得到的欢迎。而我回想一下，才不过两天时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三度问我同样的问题。之前两次是还没上飞机，办理电子签证的流程就预先调查。

《绿野仙踪》的奥兹国(注)反复问别人是不是罪犯，一方面合情合理，另一方面非常讽刺。事实上，澳大利亚是建立在刑罚上的国家，时间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这里所有人大概都有前科。在监狱风行以前，欧洲各国喜欢以流放作为惩罚手段，殖民国家前前后后送出了约25万所谓“罪犯”（convict）到异乡，包括新加坡、法属圭亚那、直布罗陀、百慕大、毛里求斯等等。美国独立以后，澳大利亚也加入了流放地的名单，因为英国没办法再将不要的子民丢到北美。1788年到1868年间，共计16.6万人，男女老幼皆有，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1830年，这些外来者和其子嗣已经占殖民地人口的九成。

这已不只是惩罚。1833年废止奴隶交易，殖民地犯人就成为欧洲各国的劳动力，协助他们进行基础建设、振兴经济。即便之后不再输送囚犯，他们的经济价值并未因此衰减。以美国内战后为例，国家重建依靠着罪犯的劳动力，从铁路到耕地都靠他们辛劳付出，阿拉巴马州直到1928年才停止出租囚犯给联邦政府。

这是监狱这门生意的起源。法律、商业和政府利益的结合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数百年。

在万杜，我看见人性

我利用寒假期间前往澳大利亚蹚浑水：资本主义和“罪犯”在现代混合成为一门价值高达270亿美元的民营产业。故事回溯到1985年，肯塔基州马里昂县开设了第一间民营监狱，管理模型随着利润数字向外扩展，时至今日，美国最大的民营监狱公司“美国矫治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of America），资产总额达17亿美元。类似产业在10多个国家出现，如英国、法国、新西兰、加勒比海诸国，以及南非。

产业触角也伸到澳大利亚。即便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地理上如此遥远，就刑罚政策来看却是好兄弟。20世纪70年代起，澳大利亚援用美国社会对犯罪采取强硬态度的语言，据此制定惩罚手段，即使当地命案和抢劫案件明明很低：2011年命案率为10万人中1人、抢劫率为10万人中4人，而且过去20年里持续下探，可是监狱人口平均每年增长9%。目前澳大利亚民营监狱人口在全球比例最高，全国3.3万名囚犯，有19%囚禁在民营机构中。澳大利亚还有完全民营的移民收容系统，运营者为英国信佳（Serco）集团，该企业在澳大利亚西部有两所监狱，管理8000人。

“信佳？是什么，操作系统吗？还是《黑客帝国》里的母体注？”我对布莱恩打趣道。

布莱恩是我在泰国认识的犯罪学者，他提到自己通过澳大利亚珀斯市科廷大学进入监狱帮忙，聊着聊着我开始抨击民营监狱这个产业。

当然我和布莱恩意气相投。事实上，任何改革派都会视民营监狱为毒瘤，毕竟就本质来看，这种机构的存在是吸取纳税人的钱，并掌控着活生生的人命。更何况为了获利，运营方式自然包括政治上的游说和献金，花费数百万美元只为了让刑罚政策更紧缩。以美国矫治公司为例，1999年到2009年间就花费1800万美元游说联邦政府，与它保持密切关系的还有全美议会交流理事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这个组织持续推动更严格的移民法规和刑责，并向48个州提议，表示只要州政府保证监狱床位使用率在90%以上，他们就愿意收购州立监狱。

“这些我都知道。”布莱恩回答，“当时我还出面抗议，到市政厅前面站了好几天，反对监狱民营化。不过后来我发现背后的问题比我以为的更复杂。”

“真的？”我还很怀疑。

“你自己过来看看比较快。”他回答，于是几个月以后，我飞到了澳大利亚。

“看来和凤凰城很像啊。”飞机上坐我隔壁的美国同胞低头看着珀斯市说出这句话。

周六下午，外头摄氏44.4度的炎夏天气，不见任何人影。西澳大利亚首府宛如鬼城，我进饭店确认房间以后就上了免费的市区公交

车，先经过纯净的河滨公园，再开上纯净的地下道，最后来到纯净的海岸。喔，原来大家都在这儿。斯卡布罗海滩上人潮汹涌，肤色黝黑的金发美女送上免费柠檬水，更多金发美女在大浪上跳跃，像是想和云朵击掌庆祝。

坐在这座干净美丽的都市，被冲浪者和沙滩客包围，很难想象附近有座监狱。澳大利亚监狱人口在过去10年已经倍增，西澳大利亚的人均囚犯比例更是全国最高，其中近半数并非暴力犯罪；一如美国、巴西、南非，监狱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弱势。原住民占全澳大利亚人口仅2%，却占监狱人口的27.5%。西澳大利亚监狱原住民比例尤其高，比起美国监狱里的黑白比例还要夸张——澳大利亚原住民入狱率将近是平均的20倍，每24人就有一人坐牢，原住民年轻人也比澳大利亚其他所有族群更可能遭到拘留，概率高达50倍。

“欢迎来到奥兹！”布莱恩给我一个拥抱。隔天早上他来饭店接我，久别重逢自然开心，就算之后大半时间要一起在监狱中度过也无妨。先前泰国之旅我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一方面志趣相投，有共同使命，另一方面他的豁达乐观非常振奋人心。虽然我也保持积极正向，但能遇上理当不存在的同类，还是个经历过生命低谷的人，我内心得到了特别强大的激励。我喜欢与这种人交往，时时提醒自己希望不灭。

我们前往万杜社会再融入机构（Wandoo Reintegration Facility），那里戒备层级最低，收容18到24岁的男性。布莱恩解释那里过去是少年看护所，他参与幕后转型团队，将其改造为现在的样貌。机构锁定特定年龄层，在法律上已成年，但心智其实仍暴露于危险之中，容易受害和受到冲击。而这机构在2012年交给信佳集团管理。

“你应该看看转型前的情况，实在很惨。”布莱恩说，“连味道都很……不真实。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只有腐烂的垃圾才该摆进

去。”

抵达时我嗅到的气味是午餐。没有安全检查，我们直接走进用餐区，只不过我因为时差有点恍惚。

“忘记带证件吗？没关系，先拿些东西吃吧。”柜台后面的女子一脸微笑。

霎时我以为自己是不是进了电视广告：背景是绿色山丘和清凉微风，像是位于马里布市的矫治中心，名字叫做“航道”（Passages）、还是“希望”（Promises）[注]？接着，一阵恶心感袭来，每次闻到这种取餐区的气味，我就不自主地激发出糟糕的记忆。但这一回，身体的感受缓缓消散后，其实餐点的味道似乎还不错。

“囚犯在哪里？”我问。

“你是说这里的住户？”她往旁边一比。就是周围走来走去的这些人，没有谁套上制服，所以我根本分不出工作人员和囚犯。

“大部分在上班，要晚一点才会过来。”

“我不懂。”我坦承。

“很多转到这里来的孩子们一开始也不懂，”她笑道，“以为会是传统的惩罚机构，大家习惯以前的监狱制度了，所以很被动、压抑。但在这里，他们是主导者。”这位女士并非所谓矫治官员，在万杜不使用这种词汇。她只是服务人员，背景甚至与犯罪或司法无关，而是心理咨询，就职后，信佳集团还赞助她攻读博士。

“来杯茶？”她说着便端给我一杯。我轻轻喝了一口。

“温迪！”住户喊着我面前这位精神奕奕的苏格兰裔监督官——在这里她的职称叫做“约聘辅导员”。温迪带我们离开用餐区，进入会议室，壁纸上有色彩明亮的原住民艺术插画，整个建筑物通风良好。

“万杜的主要任务，”温迪送上柠檬戚风蛋糕后解说道：“是协助住户预备好获释之后的生活，所以要培养生活技能，提供教育训练与就业辅导。大男孩在这里最多待3年就得离开，之后我们持续进行密集的个案管理追踪，加强社会再融入。出去以后，他们也要参加药物和酒精戒断团体，毕竟他们的前科大半和药物或贫穷都脱不了干系。此外，这里会定期举办艺术或音乐的工作坊。其实他们自己可以说得比较清楚。是吧，小伙子们？”温迪朝同桌的三个年轻人挥挥手。

三个人点点头，面带微笑，神情自若，身上衣服像是足球队的，还是南非跳羚的颜色。

“我平常挺忙的。”19岁的詹姆斯说。他的头发呈姜黄色，绿色上衣沾了一点的颜料：“要跑计算机室、心肺训练室和图书馆，时间不够用。那是没上班的时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半之前，我在食物银行那边做事，也是我们回到社会之前的准备之一。”

温迪稍微打断，指出万杜这里采取修复式正义的原则，而她个人称之为“关系模型”。

“这边和学校挺像的。”接着说话的麦克穿着黄色T恤，他隶属于囚犯自治的相关部门：“如果起了什么争议，我们就开会解决，和一般地方政府差不多。各种基本运作也是我们自己处理。他们不会命令我们做什么，都是先征询大家的意见。”

“我记得我偶尔可以发号施令啊，”一个辅导人员在旁边听了大笑，“但是都挺人性化的吧？”

“我也一样到食物银行上班，”麦克继续说，“这里的住户每天都必须外出做社区服务，下班才回来。4个月之后我就可以回家，不过要定期回来演讲、探访，不是走了就算。教授，你们那里的监狱也这样做吗？”

我拿“监狱直升班”项目的例子回答。他们对于学习经验交流、监狱学生和一般学生的互动特别感兴趣。

“在食物银行上班的时候，顾客把我们当作一般人看待。那种感觉很好，觉得自己真的很正常。”麦克说。

他们三个不明白我开的课程为什么取那样的名字。那其实是个文字游戏，“监狱直升班”一开始是个讽刺的说法，暗喻美国有些学校的情况实在很糟，几乎成为罪犯养成中心，学生直升刑事司法系统。“在学校里面装设金属探测器？”三人复述我说的话，脸上露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学校直升监狱？”

“我常常出去冲浪，只要下班有空就去。”另一个人这么说，而他精壮的身材也的确像是个冲浪客，而且金发绿眼，手臂满是刺青。

准备离开万杜时，他们和我道再见，出去路上有个小插曲。几个住户和督导员围在小草丘上伸手指着什么东西。

“有蛇！”

“别紧张，”温迪说，“会有人去捉。”

看来野生的蛇是这里最危险的因子。

终于有一次，我走出监狱时忍不住喜极而泣。在万杜，我看见人性。

要注意的，是社会犯了什么错

可惜一想到纽约的那群学生，我的情绪又蒙上阴影。我很痛心地想象着，假如他们能在万杜这样的机构里待一待，或者美国也有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美国有两个州会将16、17岁的少年与成年犯人关在一起，纽约州便是其一。他们进入监狱多半只因为年少轻狂的小过错，或者来自不健全的家庭环境，结果失去人生中很宝贵的一段岁月，在脆弱的年纪便住进成人监狱，造成的心理创伤需要更多时间才可能平复。

“其实万杜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应该存在。”上车以后布莱恩却这么告诉我：“那些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可以留在外头不用每天回去。像我服刑时得到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就不用每天回去点名，也不会违反什么规定。其他狱友也一样。”

很有趣，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万杜，布莱恩却盼望万杜消失。改革果然也是个相对的概念。

“这些年轻人之所以不能回归社会、回到家庭，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整个社会都过度趋向避险。”布莱恩继续说：“实际上，永远不会有零风险的社会，每天晚上都会发生犯罪事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这个事实。风险是生命的一部分，受到恐惧控制的话便无法过生活，而监狱就是恐惧的产物。”

他说的当然没错。我不禁提起自己早上看到的报纸内容。

“基本上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和恐惧有关。鲨鱼、森林大火、酒吧斗殴、犯人逃狱。最后这一项我勉强可以理解。”信佳集团最近的媒体形象不大好，因为发生一连串囚犯在运送过程中逃脱的事件。“但其他的呢？珀斯已经是我看过最干净、安全又漂亮的地方了，为什么大家还是过得紧张兮兮的？”

“欢迎来到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媒体世界。”布莱恩闷哼一声。

啊，我忽然明白过来。我差点忘记福克斯电视和《纽约邮报》背后的媒体大亨是谁了。他最擅长耸动标题、炒作歇斯底里的氛围，而他的媒体帝国其实就从澳大利亚起家。在我看来，美国的大规模监禁风潮也与这个媒体帝国脱不了干系。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将罪犯形容为“人类社会的掠食者”，“本质最为残暴危险”以后，各地新闻就充斥犯罪报道，以恐惧吸引受众，就算犯罪率明明下降也是如此。1993年到1996年，美国的他杀案件降低20%，可是ABC、NBC、CBS三个媒体上关于命案的报道反而提高721%。大众焦虑恐慌，将罪犯想象得更加可怕，也将受害人塑造得更加无助。这种群体意识自然而然反映在更多的严刑峻法上。

回到酒店以后，我满脑子都在恐惧、改革、万杜上面打转，而且沉溺于自责中。

民营监狱并不邪恶。

原本应该如此，数据也指向这种结论。在奥兹这里，所有移民收容中心都是民营的，信佳集团从这些外包契约得到的收益已经累积到18亿美元。美国也一样，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每年业务预算高达19亿，充满开设大型收容中心的商机。进入收容中心的人很快转换为劳动力，近乎奴隶的劳动力。2013年美国全境内至少有6万名移民在联邦政府名下的收容中心工作，数字超越美国国内所有资方单位，而他们每小时工资只有13美分，甚至可以用糖果点心代替，每年节省至少4000万美元的人事成本。

我打开计算机找到信佳集团的网站，他们自称提供“国际服务”，企业目标也下得响亮：将服务带进生活。信佳在全球有超过10万名员工，资本额100亿美元，业务领域涵盖安全防护、医疗、交通，

已经和30多个国家有合作关系。我点到企业精神那一栏，看到了不少场面话，诸如为客户缔造真正的改变是他们的责任和机会。再看年度报告，里面就是一般企业都有的官腔及活动照片。这些宣传图文让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信佳集团涉足监狱事业。

我多找了些资料，感到更加困惑。信佳集团在监禁设施投入的营运成本看起来比政府主导的监狱还要节省，而且合约里面设有针对再犯率的条款。成本效益这部分我不太惊讶，民营化卖点即在此，可是美国的民营监狱形象不佳，时常由于通过减少教育训练、降低服务水平、削减员工福利来省钱而遭到控诉。可是我在万杜的亲身体验并非如此。信佳集团位于伦敦的智库团队也提出许多诱人的理念，认为人性化对待囚犯可以降低运营费用，民营监狱又比公营监狱更好，因为通过合约来规范卫生和教育的服务标准，企业如果不能达成就要付违约金。信佳认为民营监狱有更健全、注重效率管理加上弹性的实务手段，最终能降低成本。

所以必须要民营企业才能以人性化经营监狱？我自己都觉得矛盾了，但这说法几天以后我自然脱口而出。布莱恩带我去波罗尼亚释前过渡中心（Boronia Pre Release Center），这里收容82位五年内可出狱的女囚。与美国趋势相同，女性在澳大利亚的入狱率节节攀升，主要都是因为毒品和财产犯罪。

一开始我们先到布莱恩位于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的办公室，他顺便带我参观了原住民研究中心，介绍原住民艺术，我这才明白原来那些精致的点、勾、环被称作“言”（yarn）[注]，是一种记号，可以组合为复杂的故事内容。后来我们散步在覆满落叶的校园，看到学生们在自助餐厅享用蔬菜色拉或有机食材三明治，我们走到一间小砖屋前，门牌上写着——等等，我不是在学校吗，可是这里是监狱？外面没有刮刀铁丝网或金属探测器啊！里面的人也没有穿制服，

看不出身份，周围也找不到扩音器吼着叫人立刻去领信之类。大学和监狱融为一体，很难分辨界限。

穿着鲜红色套装的女人亲吻儿子，然后送他上出租车。她到底是囚犯，还是学生？户外有个摆满鲜花盆栽的平台，工作人员和访客都可以在这里享用水果和点心，前面草坪修剪整齐，周围的路灯设计得十分漂亮。这儿有花园、教育和健康中心、计算机室，参观途中到处可见一本色彩缤纷、叫做《葡萄藤》的刊物。

“用意在于尽可能模拟外界，”布莱恩解释，“培养自主性和责任感，避免消极被动。”而且和万杜一样，波罗尼亚的女囚早上有工作，下午上课。

“工作本身要有意义。”大嗓门的辅导主任这么说：“目的并不是从事劳动，所以我们会筛选雇主，愿意支持我们的才行。一开口就问‘这个人能做什么？’，恐怕就不适合。”

女囚放假回家探亲只有两个规定：不可以上网，不可以怀孕。这里的房间经过安排，每隔几周囚犯的孩子们可以过来同住一晚，而且成熟的亲子活动项目，保证亲子时间充实有意义，不会只是窝在电视机前面。

走进这里的超市，我随手拿起大厂牌的乳液，并注意到墙壁上挂着大大的食物金字塔图解，架上商品也都以颜色标示。绿色代表营养价值高，红色代表对身体不太好且价格较高。囚犯手中有预付卡，她们想买什么都可以，但如果没有根据图解上的原理来配置饮食，很快钱就用没了。

“一次买三罐植物性奶油？”辅导主任说：“买啊，反正不是我的钱！”

之后一位职称是“膳食督导”的男性辅导员操着法国口音说自己监督女囚的菜单，也开设烹饪课，因为她们有不少人需要照顾一家大小，却习惯靠麦当劳打发三餐。

“波罗尼亚的最大宗旨，就是敲开这些女性已经僵固的心态。她们要为自己着想才行。”辅导主任下了结语：“一般监狱要人排队领东西吃，衣服丢出去就有人会洗，结果呢？最后什么也不会。在这里，你自己不会煮就不要吃。起初很多人为此感到震惊，但其实这是重要的过程。”

她描绘的是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rization）的最好状态。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不进行制度化会怎么样？如果某人的整个矫治过程都是这样的，而不是在最后阶段才去制度化，即会怎么样呢？这样的模型可不可以复制到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里面？

“当然。”主任回答：“只是规模和管理能力的问题。安全级别是个假议题，我也待过高安全级别的监狱15年。”

“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没有。我看到的是社会犯了什么错，哪个策略行不通。波罗尼亚或许不能代表全澳大利亚的监狱，但朝着正确方向的一小步，就是通往目标的一大步，对吧？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滴水总能穿石。”

都是坏人，都应该关起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从不为谁停驻。完美的珀斯，完美的另一天，美好的阳光扫过晴朗无云的天空。某一天晚上，我想方设法要拍下月亮的照片，因为一定没有人相信它可以离得这么近。这个都市在

过去10年间经济发展不朝“又大又亮”靠拢，而是越来越环保。住在这样一个简单基因改造过的“优质城市”里面，对人会有什么影响？我距离一开始的监狱之旅越来越远：从波尔斯穆尔的小镇到乌干达的乌兹冲锋枪，再到了阳光美好过头而令人晕头转向的奥兹国。

这是另一天傍晚我对新认识的朋友克雷格提起的话题。他是当地原住民新闻网的记者，还兼职演出喜剧。我们通过Facebook上间接的人际关系搭上线，很快就成了好拍档，因为克雷格和我一样想要揭开覆盖着珀斯的面纱，他一针见血戳破了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

“珀斯的灿烂阳光照不到底下问题所在。”克雷格说。

保持着帝国风格的弗里曼特尔监狱（Fremantle Prison）充分显现了这一点。一天下午我过去参观，监狱本身是1850年代由囚犯劳工所建造，参考的是英国的本顿维尔监狱（Pentonville Prison），而本顿维尔监狱又参考美国的矫治机构——总之，在殖民地时代弗里曼特尔是本地最大的监狱，直至1991年才关闭并改为博物馆。

入口处就贴着“苦窑导览”的广告，我没理会就走进去了，光是监狱壁画、涂鸦就够我欣赏好几个小时。大半都是原住民艺术，因为那时候监狱里面住的都是原住民。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入狱比例比起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黑人还要高出5倍，而我也得知原来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模仿澳大利亚1905年的原住民法案，法案内容限制原住民住居、性行为，还有宵禁和其他许多规定。1841年的罗特尼斯岛（Rottnest Island）规划为专门囚禁原住民男性的监狱，结果到了1952年，岛上囚犯占全国囚犯总人数四成。所以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弱势族群沦落到贫民窟以后还要被打上烙印，然后就是大规模监禁。藉由监禁创造劳动力，牢房塞满以后，社会制度还是不肯松手。我内心那股愤怒又被点燃。

纪念品商店里挂着一个牌子写道：“大小犯人都喜欢”。卖的东西是围裙、马克杯、酒架之类，上面有个“囚鸟”的商标。一个店员走过来，“要不要买个犯人磁铁啊，很可爱哦，”她这么说。

比起在泰国所见到的监狱纪念品商店，弗里曼特尔带给我的冲击大得多，因为在这里他们兜售的是殖民时代的酷刑历史。其实一到澳大利亚我就意识到这个现象，有个周末我在悉尼观光，游客手册上竟也有一个专栏是“罪犯和文化”，跟着上面的指示会走到市区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见识这个国家如何奠基于囚犯重获新生的概念上。我没有特地在海德公园军营博物馆点一份“犯人早餐”，或者像手册推荐的一样，“在禁闭室内享用毕生难忘的晚餐滋味”，但博物馆里面的展出我倒是好好看过了。海德公园军营以前专门收容运送过来的人犯，据说在1822年之前这个“犯人和袋鼠的国度”十分宁静和平，结果一个英国来的商人知道以后，嚷嚷说这样的日子太安稳了。他指控当时派驻于此的麦夸里总督（Governor Macquarie），罪名现在看来也很眼熟：放纵罪犯。商人开始要求加强刑罚，于是取消了缓刑、假释，给囚犯上镣、逼他们做苦工，法律越严苛越好。

逛一趟馆内展览就可以理解当时囚犯的生活。“踏车”(注)已经算是很过分的刑具，而那年代只要态度傲慢一点就会被处以鞭刑。

孩童在博物馆里嘻嘻哈哈玩弄交互式展示，试穿囚服，他们似乎觉得路牌上的小老鼠很可爱。狭窄的房间是以前囚犯们睡觉的地方，吊床营造出奴隶船的气氛，三个小女孩坐上去开心地荡秋千。这里是个囚犯主题的迪士尼乐园，完全没有集中营的悲伤苦痛。

被送到这里的人是罪犯，并不是什么可悲的受害者。而我亲耳听见身边游客也这么对孩子解释，他们看着鞭子和铁链说：“因为这些犯人都很坏，所以是活该。”时至今日，我们不也这么说吗？都是坏人，都应该关起来。

问题是，这些所谓的“坏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奥兹国历史上这一群恶名昭彰的罪犯，其实很可能只是没钱买东西吃而偷了一条面包。18世纪时这样的小罪就有可能处以流放之刑——英文里面“流放”（banishment）和“消失”（vanishment）发音如此接近恐怕其来有自。以送到澳大利亚的罪犯而言，其中有83%平均年纪才26岁，罪名都是侵犯财物，而且绝大多数识字，有专长，完全符合劳动市场的需求，根本不像一般人以为的罪犯。只不过当他们被冠上罪犯的头衔，忽然间社会大众就觉得可以忽视、接受这些人受苦并沦为奴隶了。这种心态直至现代一样成立，只要被贴上“囚犯”“前科”“坐牢”这些标志，就代表无可救药，过得多惨都不值得同情。而且罪名也不再重要，从吸大麻到屠杀都叫做犯罪。事实上罪行的定义也常常模糊不清，例如“性犯罪”可能是最严重的强奸，也可能是在酒吧里面以不够合乎礼仪的方式触碰女性身体，而“暴力犯罪”可以是恫吓，也可以是杀人。

罪犯、违法者等等词汇都是方便的标签，贴上去以后那个人就被困在最恶劣的形象里，永远出不来；也就因为污名化力量太大，对于犯罪和刑罚的语言使用必须非常谨慎。澳大利亚在近十年才开始为早期移民平反，以前在族谱里面找到犯人是耻辱，现在却成了荣耀，而且有11个与已决犯相关的场所被列入本地世界遗产。但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据统计，澳大利亚每10人就有1人是罪犯的后代子孙，国家靠曾经住在监狱里的人建立。如今大家发现无法改变历史，就将历史变成商品。

奥兹国和美国在这个趋势上像是分隔世界两端的孪生兄弟。千禧年才刚开始，已经有560万美国人坐过牢，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在年满23岁前就遭到过逮捕，超过一亿的美国公民有前科记录，一些大都会区的年轻非裔公民前科比例高达80%。这种数字不就是当年流放地的翻版吗？国家熟练地制造大量标签，最后每个人都要与它沾上关系。

第三趟也是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趟行程，监狱的名字很有趣，叫做“金合欢”注（Acacia），感觉应该是作家寻找灵感的度假胜地，但事实上是信佳集团营运的机构之一。金合欢监狱很快就要成为澳大利亚第一，目前里面有1387名囚犯，就算以美国标准来说也算多。虽然是最后一个参观目的，但布莱恩得开车载我风尘仆仆穿越天鹅谷（Swan Valley），而一般观光客来这里多半是为了品酒。回想起来，无论泰国、乌干达，还是巴西，通往炼狱的道路总是景色秀丽。路旁也有些警告标语：慎防森林火灾！西澳大利亚采用颜色分级标示火灾风险，我想起“9·11”事件以后，美国也有了类似制度，只不过对象是恐怖份子。几乎所有新闻频道都会看见从橘色到红色的“威胁等级”，观众内心的焦虑一刻也放不下。

车子转弯驶近瓦卢农场（Warloo Farm），羊群游荡在金色田园上，接着忽然看见刮刀铁丝网，以及铁皮屋顶、混凝土砖组合而成的建筑物。与先前两所信佳集团经营的先进机构相比，金合欢看起来十足是传统监狱，甚至令我想起了故乡的奥蒂斯维尔。在访客中心，我看见以铁钉锁在地面的桌子，旁边有电话亭，穿着绿色制服的囚犯拿扫帚正在扫地。监狱里面设有栅栏包围的体育馆，牢房建材是混凝土和铁皮。这里的分区名称很有趣，有“布朗克斯”“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在布朗克斯区，我看到几十个身上有刺青的男子，有的抽烟，有的做伏地挺身。之后我们进入附设工厂，里面是完整的生产线，几百人每天领9美元薪资，工作内容是组装床架、壁炉、汽车零件等等。还有养鸡场和温室，穿上消毒鞋子以后我忍着肥料气味进去，看到一列列菠菜和芝麻菜。金合欢监狱里面所有劳动都要详细记录，转换为货币价值，而且注重组织效率和技能训练，囚犯可以在过程中得到专业证照，之后直接进入相关企业就职。我不停转着脑袋评量眼前所见，不得不承认生产力很高，而且有薪资又有职业训练，比起虚掷光阴绝对来得好。可是金合欢监狱就是一个囚禁工人的地方，它的存在证明了监禁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在我腰带上有一个“紧急按钮”。进入时一位德裔警卫为我做安检，然后将腰带给我，他说只要觉得有状况就按，会立刻有人过来协助。这倒是新鲜。这里一些看起来先进的小细节也挺不错，比方说随处可见的原住民艺术，有许多蛇、蜥蜴和月亮的图案，都是由囚犯或学生志愿者所设计。当然，砍了树木来盖楼，再将外头的街道以树为名是有点讽刺，但那份心意也值得赞许了。监狱的生活机能和一般宿舍差不多，每区都有厨房和公共空间给几头“小崽子”（此处对囚犯的昵称）合用——比较明显透露监狱气息的是卧室房门都加装铁栅，每天入夜后上锁。进入的主单元（self-cave units）的道路采用电子锁设计，甚至设计了指纹登入的系统，能彼此通讯、查看账户明细和安排行事历。

一棵错节盘根的老树底下是留给原住民囚犯的“言圈”（yarning circle），对他们而言就好比是议会厅一样的集会场所。其他的巧思和活动包括家庭日、绿化环境的园艺造景、生态墙、自然光疗法、修复式正义周、慈善健行等等。外头停着起重机，因为还要增建教育中心和表演空间，之后会有更多文艺项目。

“我希望能安排摇滚歌剧，还有表演工作坊或圆形剧场。”金合欢监狱的教育主任布兰特非常有干劲，这次参观就由他和执勤的心理师陪同；心理师是女性，前臂有时髦刺青，她和布兰特穿着剪裁利落的信佳集团制服，条纹纽扣衫加上一个粉红丝带别针，两个人看来都才30岁出头。

午餐时间，桌面光滑干净，有蔬菜卷和信佳集团自己的饮品。

“创新是就职时的工作描述之一。”布兰特递了一盘无籽西瓜过来：“来信佳工作之前，我在公立医院上班，那里繁文缛节太多，我没什么贡献。到这里以后，我才终于觉得自己真的在做事。现在有很多政府单位或文艺团体来谈合作。我每天都很兴奋，有好多计划要进行。”

下午我就亲眼见识了他口中的好多计划。在教室大楼里面来了16位教育部门的人员，通过他们我了解到这里提供多少课程，从商业会计证照到开矿，还有大学程度的远距离教学课程，甚至配置了原住民文化教室，里面主要以口耳传授，而不是传统的纸笔教学。

我所见到的教育部门人员多半和布兰特一样年轻有活力，年纪比起在其他地方的监狱所见到的都来得小。上台和他们说话时，我先介绍了自己负责的“监狱直升班”，他们发问时切入点非常精准，例如囚犯获释之后大学入学率有多少？我回答大约三分之一。学院方面是否担心招收被视为犯人的学生将影响学校声誉？对原住民学生有没有提供特殊场地？我说，纽约那边的原住民学生比例很低，与你们的原住民一样过度监禁，有冤屈的社群的是非裔和拉丁裔。他们听了张大眼睛猛点头，感觉得出对这个领域充满热情；后来请了四位“金合欢”的囚犯参与讨论，气氛更加热烈了。囚犯表示他们对于监狱未来走向期望很高，四人教育背景非常类似，或者因为无聊，或者因为经济因素，他们很早便辍学，也很后悔当初的决定。

“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其中一人说，“如果有学校就不用一直浪费时间。”

“我原本很想进修社会学或心理学，结果居然不合法。”另一人开口。布兰特和布莱恩向我解释，原来在澳大利亚有犯罪记录的人就不能接触特定的学术。

“这逻辑太奇怪了吧？”我脱口而出，“尤其心理学？亲身走过一遭的人，不是最适合协助受到刑事司法系统影响的人吗？”我跟他们说起我认识在监狱机构任教的同业，很多曾进过监狱，现在却拿到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接着又说到马丁，他是“监狱直升班”里面拿到法学院预科资格的学生，进法学院看来不是问题，但因为22岁就留下重案记录，所以大概无法取得律师资格。其实有过切身体验的人去担任辩护律师，对于司法体系应该最有帮助才对呀？

“我们也好想去上你的课。”囚犯们唉声叹气。

“我也很希望可以在这边上课。”我回答。

“那就上啊？”布兰特说。

还挺简单的。我获得许可，预计隔周回到金合欢监狱开一天的自传写作工作坊，也是深入了解这里并为囚犯们作些贡献的最佳机会。

出去的时候，布莱恩和我将附有紧急按钮的腰带交回去。我不免心想，若说“有状况”，其实一整天下来倒也不少，但那跟我个人的人身安全可没有关系。

“贝兹，你也看见了，情势很微妙。”布莱恩回想起我们最早的话题：“我绝对是世界上最厌恶监狱民营化的人之一，但眼前的现实是民营才有人监督，公立反而没有。你也看到他们提供的东西有多少。我自己坐牢的时候什么课程计划都碰过，每一个我都去，因为全部加起来也没多少啊。在民营监狱里面，至少有人要负责想出新点子。”

进了监狱，失去爱？

为下周课程做准备时，朋友克雷格好心替我搜集一些澳大利亚民营监狱的资料，结果很多内幕使我对民营化议题越来越摇摆不定，尤其如果将拘留所也考虑进来就更为难了。由于澳大利亚有非常严格的强制拘留法令，所以拘留所始终人满为患。拘留所全部民营，主要有两家企业，其一自然是信佳，合约收益已经超过7.56亿美元；而另外一间是杰富仕（G4S），他们主力在英国和丹麦，名字总让我以为是导弹工厂。

杰富仕有因为业务过失险些让人致命以及滥用单人禁闭的记录。2007年，该企业雇用的司机无视运输车后方遭拘留者的哭喊，因车厢内部过度闷热导致囚犯严重脱水，其中一人为求生存不得已喝下自己的尿液，后来杰富仕因不人道处置必须赔偿50万美元，但受害5人中有3人已被遣返。至于信佳也有问题需要处理，员工透过工会针对待遇和工作环境问题提出诉讼，同时近年来他们名下的收容所有多起暴动、火警、自杀抗议，全国累计起来损失已有数百万元，被拘留者自残的案例也比之前高出12倍，政府派员调查后发现问题在于拥挤、员工训练不足或错误、危机处理计划不完善、拘留人数超过限度时未及时增加员工。其中一所拘留所出现收容安置的问题，另一个内陆拘留所则在2002年因多次暴动和饥饿而起的罢工而关闭。西澳大利亚地方之前负责监狱监督业务的官员坦承：“这些全球企业在特定领域上的权力比政府还要大。”

美国类似事件一样多。得克萨斯州里夫斯县拘留所（Reeves County Detention Center）由民间企业GEO集团经营，2009年和2010年因为数名受拘留人在禁闭中死亡而引发暴动。然而，换个角度，虐待监禁人口是全球各地皆有的问题，换作公家营运也无法避免。举例来说，西澳大利亚这里之前唯一一家非民营的青少年拘留所也在一次大规模暴动后，将超过百名有心智问题的年轻人转送到成人监狱，每天关在牢房长达19个小时。克雷格提到澳大利亚的“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有一所公营监狱内完全只有原住民，环境恶劣，几乎毫无监督管理。于是我想问题并不在于公营或民营，而在于做法与责任。

我准备好自传写作课程的讲义，传给布兰特的时候心里有点担忧。马尔科姆·艾克斯是主管机关会同意的内容吗？教材来得及通过审核吗？奥蒂斯维尔那边有时候要花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确认我的东西能不能在课堂上使用。

后来我到天鹅河畔慢跑一圈，公园里很多人骑单车，有个雕像的地方还取名为和平林。没想到回去就收到布兰特的电子邮件，他说讲义不只得到批准，还已经打印完毕，就等着我发下去。

“美国女孩怎么会有个德国人的姓氏，加上一个巴伐利亚的名字？”“金合欢”监狱前门那个德裔警卫盯着我的证件，深蓝眼珠目光锐利。

“先生，这其实是匈牙利的姓氏。至于名字则是希伯来文，引自《圣经》。”

“希伯来？”他一阵自言自语后对我说：“不可能啊，教授，这是德文名字。‘Drei’是‘三’的意思，加上‘singer’就是‘三个歌者’，每年一月六日主显节唱歌的三个歌手。所以你这姓氏，‘卓辛格’（Dreisinger），就是上主显现的意思。”

“不过我曾祖父——”

他把附有紧急按钮的腰带塞给我就挥手要我进去。

进了教师休息室，有几个打扮时髦的老师拿出饼干分享，我们聊起在监狱教书的心得。其中一人开的是高中课程，内容是要囚犯们设计理想世界。布兰特过来带我进教室，我将座位重新调整为大圆圈；教室墙壁上没有挂着那些将人当作小孩看的精神口号，只贴了毕业照和相关新闻剪报。“教育可以让你多活好几年”，其中一张标题这么说。我桌上摆着一瓶信佳出品的饮用水。

学生们慢慢走进来。

“这边是商业管理课吗？”一个人探头进来问。我回答是隔壁。

上星期遇见的四名囚犯都来了，最后这班上除了一个斯里兰卡人以外都是白人。布兰特向我解释：他挑选适合进入大学程度班级的人，而原住民囚犯原本就处于严重教育弱势。我不为此感到惊讶。

于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尔科姆・艾克斯进入都是澳大利亚白人囚犯的教室。

与乌干达那班学生一样，他们没听过奴隶自述这种文类。不过差别在于经过大声朗读，这一班的学生明显受到感动。

“种族隔离现在还是存在啊。”弗里曼特尔来的萨姆开口发表意见，他手臂很粗壮，满是刺青：“澳大利亚还是地球上种族主义最盛行的国家。”

“有比美国严重吗？”同学质疑：“美国才是种族问题最多的地方吧，从奴隶制度到后来的各种现象。”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活在白人为主的社会，”萨姆反驳：“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之所以难以动摇，是因为大家甚至无法察觉。对于原住民来说，那是年复一年的心理煎熬。”

*我时常希望自己是野兽。什么野兽都好。因为野兽不需要思考！*弗雷德里克写下的学习读书的心路历程，又在班上激起一波波涟漪。

“我们也懂这种感受，”安德烈叹息。他圆圆胖胖的，平头黑发，聊开以后他提起自己是音乐家，母亲也是知名芭蕾舞者。

“你们愿意放弃思考吗？”我问：“无知真的是福吗？”

“怎么会？”萨姆质疑：“知识就是力量。”

“可是透过知识理解到自己受压迫却又无力改变，那种日子太痛苦了。”安德烈用力指着讲义上的内容：“就像作者说的，经过教育的人没办法继续为奴。”

有个穿信佳制服的男人拿着摄影机悄悄拍下几张照片以后溜走。安德烈继续说：“换作是我的话，也宁愿当野兽，而不是被关在牢房里面还会思考的人类。”

“可是这个马尔科姆·艾克斯就有不同的意见，”他的同学拿起讲义念诵。

> 我在监狱里发现，阅读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回想起来，我认为阅读能力唤醒了沉睡的渴望，心灵希望获得生命……不久以前，有一位英国作家从伦敦打电话给我，他问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你现在的归属是？”我说：“是书。”只要能空下来超过15分钟以上，你就会看到我在读书，对黑人有所帮助的书。

“比起弗雷德里克，他的态度更强硬。”一个50多岁、戴着圆眼镜的学生说：“像是逼着大家面对。例如最后一句，主词忽然变成‘你’，就是对读者的挑战。”

“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时代相距了一百年，但是世界没有太大改变。奴隶制度其实依旧存在，只是放在监狱里。”萨姆说：“而且铁栅越来越高，当然受不了。现在不是好声好气求人家给自由，而是大叫‘把属于我们的还回来’。”

“所以不是那个什么……你们那边怎么说的？”另一个学生开口：“好像是‘汤姆叔叔’注是不是？”

实在可谓奇迹，这个班级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事前安排绝对无法达到这种效果。学生们对于细节的注意、对种族议题的敏感度很高，他们沉浸教材不停笔记。下午立刻上了第二堂课，其实原本预定的计划并非如此，但是他们非常积极，于是布兰特从善如流协助安排。课堂上我们分析了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作品，故事是一名中产阶级的青少年跌跌撞撞，最后进了尼日利亚的监狱。即便故事中的非洲国家他们甚至没听说过，但很快就从故事里面找出种族、阶级及性别的影响，并且转化为道德标准或实用主义的讨论，也能与自己在监狱内学到的或还没学到的结合。教室里面回荡着自我质问：当社会腐败严重，个人过得安稳就好吗？人类是不是真的能摆脱所谓伪善呢？为了多数牺牲少数这种想法究竟对不对？

“金合欢监狱里面不也一样吗？我们是被所谓大众福祉牺牲掉的一群。拿我们杀鸡儆猴，做替罪羔羊。”萨姆说。

后来萨姆读了他的自传：“我今年28岁，但其实两年前才出生。”两年前，他进了监狱，失去家人的爱。“人生很有趣，有时候一瞬间决定一切。即使明明装满良善，明明还完整，只要一时不察，犯下一次过错，就连最亲近的人也觉得你是自甘堕落，自取灭亡，所以该进监狱。”

萨姆提起自己幸福的童年，那时哥哥姐姐还争执谁比较爱弟弟。时光一去不返。他继续念道：“我坐在牢房里，想象家人现在正在做什么。没办法，我想象到的就是他们聚在一起，说着谁最讨厌我，谁有先见之明，谁受到的打击最大、内心最受伤。讽刺的是，假如他们愿意和我保持联络，继续当我的本大哥、我的丽贝卡和盖布姐姐，一定会发现我仍旧是当初的小弟，仍旧对哥哥姐姐充满爱和期待，而且非常想念家人。现在我成为更好的朋友和更好的人，可以给予更多。要是我留在原本的生活没有进监狱，反而学不到这么多。”

其他人的作品和萨姆一样，不只文字流畅，内容也充满洞见。安德烈述说儿时在英国成长的经验，他还有17年刑期，入狱之前已经是个有名气的音响工程师，可惜误入歧途沾上海洛因。“大众并不知道要变成我们这样的人有多容易。”他这么写道。

另一个学生的自传提起因为情绪激动失手杀害挚友；还有一个人思念着在奥兹国金矿里工作的父亲。“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随处可见的典型矿工和铁道工人，”学生大声朗道，“骨架大，身子骨像铁打的，黑色头发总是抹上发油向后梳，平常没事就喝啤酒。”

念到这儿他没办法继续，因为止不住啜泣。“好难啊，”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满布刺青的手掌抹去脸上泪痕，“我很想念他。真的很想念他。”

大家都沉默了。

上周我问了那四个囚犯是否喜欢写作，只有一个人给予肯定答案。今天下课以后，他们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回来继续开课，也打算找时间将自传完成。

“我们很渴望有这机会。”安德烈说。

听到这句话，我想起在乌干达的经验，虽然都是监狱里的班级，可是学生的肤色极端反差，应该说卢济拉监狱和金合欢监狱本身就如同黑白一样对比分明。然而，学生对于写作的接纳程度一样热烈，因为他们都透过文字挖掘出埋藏内心的伤痛，于是也一样饥渴地希望能够在纸上进行更深地探索与表达，因为只有这一时半刻他们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气。

布兰特陪着我走出监狱，外头空气像烤箱一样。这是少数我走出监狱以后内心比较平稳的经验，由于金合欢监狱已经有足够的基础设

施，相信我作的这点贡献效果也能延续较久。布兰特更积极，他已经开始构思如何聘请更多大学教师，以今天这两堂课当作所谓大师课程注。

“这个应该送回图书馆吧。”他捡起掉在地上的一本《孙子兵法》，继续描绘对未来的规划：“预计一年之内就可以改造这里的高等教育系统，我会向你报告进度的。”

他说到做到。我回美国以后就收到电子邮件，布兰特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位讲者，还为我教过的那个大学程度班级取名为“监狱人才信托”（Prison Brain Trust）。

和万杜或波罗尼亚那种原本就带有疗愈作用与采取修复式正义的环境设计不同，金合欢监狱证明了，只要一个环节就可以在传统监狱引起变革，而那个环节是人。读着布兰特写来的信，我想起远在巴西的玛拉，她也致力改善单人监禁体制。在泰国时，一位狱警曾表示那里每千名囚犯才一名狱警，而且之前5个月就有两个同事遭犯人持利物刺伤。奥蒂斯维尔里面有一些管理人员快要退休了，数日子的方式和牢笼里面的人没两样。“还要蹲5年。”他们这样说。“狱警和囚犯一样受困。”这句话出自著名的斯坦福1971年监狱实验的参与者，实验中受试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管理者：“差别只是他们可以自由走动。但事实上，他们背后也有一扇打不开又过不去的门，换句话说，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体的，环境是大家一起创造的。”

后来几个月，布兰特持续通知我金合欢监狱起了什么变化，像是舞台活动、系列讲座、电影节等等。就算只是在伤口贴上绷带，却如同波罗尼亚的辅导主任所言，滴水总有一天会穿石。

回到纽约的我继续深思资本主义和罪犯之间的关系。监狱改革这一领域出现的新流行语是“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也就是政府针对特定人群设定一个清楚可量化的改革目标，然后委托外部组织着手进行——这个外部组织确实想要获利，但同时也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而只要它可以达成目标，政府就愿意给钱。由于是债券，所以投资者提供该组织需要的人事和服务成本，之后请第三方评估目标是否达成；计划成功时，政府付钱给该组织，组织再支付投资者利息，但若计划失败就没有公基金资助。

“社会效益债券”计划在我熟悉的纽约登上新闻头条，实行地点是世界上最大的罪犯居住地赖克斯岛（Riker's Island）。根据报道，纽约市政府决定与非营利也无党派的研究组织合作，目标是四年以内将犯人的再犯率降低至少10%；每年离开赖克斯岛的人数约有3000，大部分是年轻男性。为了达成目标，计划会寻求两个非营利服务单位的配合，还有高盛（Goldman Sachs）以贷款形式投资960万美元。改革理念和务实做法兼顾，令人非常期待。

此外，我在约翰·杰伊学院也遇见一位女士正在努力筹备“人生重设基金会”（Reset Foundation），组织目标是在加州和纽约推广类似澳大利亚万杜监狱那样的环境，服务对象为遭起诉的年轻人，采用模型类似公办教育内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注]。他们会将既有经费用在成立学校而非监狱，最终追求的成果是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终身所得并降低再犯率。

种种案例给我的启示是，即便同为资本主义也不代表意义相同。民营监狱很方便大家怪罪、丑化，而且事实上目前看来民营监狱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检讨。不过这不代表民营监狱一无是处，或许世界上还是能有兼顾良心的民营监狱，以矫治为目的，策略合乎道德也先进。我们可以设想看看，假如以《社会效益债券》形式寻求私人企业承揽业务，一方面阻绝它们干预政策，另一方面针对再犯率和犯人出狱后的生活水平设下高门槛，这么一来企业的评估就不会继续着重在床位使用率和如何节省经费了。这与最近出现的B型企业[注]风潮相互

呼应，即使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也可以兼顾社会责任。目前美国已经有超过一千家B型企业，例如销售时髦眼镜的瓦比·帕克（Warby Parker）就参与了捐赠免费眼镜到世界各地的活动。《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指出，B型企业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方案，首先由于社会使命感让企业可免于承受过多的投资压力，也因此能吸引到热血员工和忠实消费者。他说这种创业理念“提醒世人一件事：企业趋向结构精简和手段卑劣、以利润机器自居的现象，绝非资本主义或者人性之必然”。

最后我决定继续深入这团混乱寻找答案，也找到了一个在监狱和营利两方面数字都很高的国家，那是新加坡。

---

1. 由于“Australian”口语会称作“Aussie”，发音和《绿野仙踪》的“奥兹国”接近，加上以农牧矿为主和单纯质朴特性也类似故事中的奥兹国人民，因此澳大利亚获得奥兹国别称。——译者注
2. 电影《黑客帝国》里控制全人类的计算机系统就叫“母体”（Matrix）。——译者注
3. 此处指位于加州马里布市的两间毒瘾勒戒所，走高价时尚路线。——译者注
4. 在澳大利亚英语中“yarn”也代表了谈话和故事。——译者注
5. 原文“treadmill”，现在也指“跑步机”。——译者注
6. 金合欢为澳大利亚国花，国徽底部有其图案。——译者注
7. 形容逆来顺受的黑人。——译者注
8. 大师课程（masterclass）通常用于文艺领域，意指聘请该方面专家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的特殊课堂模式。——译者注
9. 政府提供经费但交由私人营运的学校，需要达成双方协议的教育目标，但因此不受一般教育法规限制，因此称之为特许学校。——译者注
10. 由BLab创立的认证机制，认证标准为企业是否对社会和环境负起责任并且公开透明。——译者注

7　社会复归

新加坡

> 枷锁落地。我捡了起来，想捧在手中最后一次看清楚，脑袋思索着前一分钟这玩意儿不是还在脚上吗？
>
> “上帝赐福，上帝赐福！”犯人们声嘶力竭的喊叫中有股喜悦。
>
> 是的，上帝赐福！自由，新生，死而复活……光辉灿烂的一刻！
>
>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大楼顶端有个像椭圆形飞船一样的物体，或者应该说是个巨大的冲浪板，还横跨三座闪耀的摩天大楼，上头长出的树木直指天际。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我脱口而出，但其实没人可以问。眼前是新加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世上最贵的建筑物。

刚抵达这国家，都市天际线令我惊奇。除了冲浪板似的建筑，还有像是巨型莲花的白色高塔、浮在水面的魔术方块及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标志，另一幢高楼像是巨型雏菊和机场塔台的融合——路人说那是有名的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在我看来，新加坡有点像迪士尼乐园。

不过是有死刑的迪士尼乐园，有个记者确实这么形容过新加坡，因为这国家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机场里面可以领到免费糖果，但其实是拐弯告知旅客一项毫无道理的规定：嚼食口香糖在本地属违法。我看了看入境卡，上面直接以粗体字印着“警告：在新加坡走私毒品者可判处死刑”。

抵达的第二天我去唐人街走走，路边贩卖的小饰品上面很多都写着“Singapore Is a Fine Country”注。在新加坡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开罚单，例如在Facebook上面说错话，或是带气味浓臭的榴莲上地铁。此外，有30种罪名可能遭处鞭刑，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涂鸦。1994年，到新加坡观光的美国年轻人迈克·菲（Michael Fay）因为损坏他人财物和窃盗而被处以鞭刑，这种激烈刑罚手段登上国际版面。我刚到这里的头几天，看到报上一些案件是青少年拿喷漆乱画、无故使用灭火器、非法闯入私人土地、窃盗和损坏财物。他们受到什么处罚呢？罚金，坐牢最多3年，还有鞭笞3到8下。另一个成年人被控抢劫、滥用药物且不接受药物检验，处罚则是10年刑期以及鞭笞12下。

服刑是等待时间流动

高度刑罚是我选择新加坡作为倒数第二站的原因之一，另一个理由则是我在泰国的时候曾上网研究监狱、公关及公主三者的关系，正好看见一段YouTube上面的广告。广告里面是一个神色踌躇的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要开始一天生活，画面很普通，可是背景一直有个听起来刺耳的摩擦声。主角搭乘拥挤的交通工具进公司、在会议桌上表现得战战兢兢、下班以后在超市推着购物车一脸茫然。而事实上，他每次转弯就被脚上的铁链和铁球给绊住。接着一行字出来了：“帮助犯人，给他们正常人生”，接着出现“SCORE”（Singapore Corporation of Rehabilitative Enterprises，新加坡康复企业管理

局）字样。我不禁暗忖，这谁呀？广告效果很棒，一直停在我脑海里，公关手法极其成功。

经过调查，我发现新加坡康复企业管理局是政府针对监狱作为犯罪对策的一个调整做法：之所以需要调整，是因为他们发现监狱只是“暂时”的犯罪对策。多数囚犯最终得离开监狱，社会要如何面对他们？这个过程叫做社会复归。自从2008年小布什总统通过第二次机会法案（Second Chance Act），社会复归就成为全美的政策方向，包括针对犯人回家以后的生活提供支持。各州为此设立了社会复归机关或召开委员会，以纽约州来说，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在2014年成立“社区复归与再融入委员会”（Council on Community Re-Entryand Reintegration），各地也有基金会赞助相关研究，大学设置专门的研究单位。我负责的“监狱直升班”是全美第一个明确以社会复归为根本目的的教育计划，同样名列在约翰·杰伊学院的囚犯社会复归所（Prisoner Reentry Institute）底下。

“社会复归”，听起来很单纯的四个字，仿佛一个人只是离家些许时日，回来时一切无缝接轨。事实上当然没这么容易，要回到原本的生活是个重大转变，想要重启人生需要巨大努力，也因此是个铺天盖地的危机。

想象一下，假如你已经被关在另一个世界里面5年、10年，甚至25年，所有规则都不同了。所谓服刑就是等待时间流动，但是时间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外头的社会却从不停伫。于是到了你重获自由的日子，你到底该去哪里呢？要住在哪里？如何适应这个突如其来的新世界，包括新的制度、新的科技？怎么找工作？怎么规划人生方向？将你关起来的政府，在你为过错付出代价以后，一定会好好辅导你吗？不，你和绝大多数离开监狱的人一样，都不符合社会福利的弱势资格，所以不能领粮票，不能申请社会住宅，而你可能也和美国八成的囚犯一样已经没有健康保险；别指望公家健保，就算入狱之前你申请

过，在入狱瞬间就已失去资格，而且政府不会主动为你重新申办。另外，老板大都不愿雇用出狱者，有人调查了四个大都会地区的就业市场，发现四成雇主公开声称自己不会聘雇有犯罪前科者。就算你运气好找到工作，恐怕薪水也比没前科的同事低了40%。想要反抗这种社会制度以及各种打压你的政策吗？那么你只有四个州可选，因为在别的地区你已经失去投票权；还有大约585万美国人与你作伴，占全国人口的7.2%，这是“重罪犯剥夺投票权”法规带来的影响。被剥夺投票权的人口中，有超过200万都是非裔，因此法学学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其2012年的畅销书《新吉姆·克劳》（*The New Jim Crow*）㊟中描述21世纪的新种族隔离时代：新的种族、阶级制度诞生于名为社会复归的惩罚中，“社会低阶将永远被主流社会排拒于法律和习俗外”，而她认为这个新制度是为了“囤放被视为可抛弃的人口”，言下之意也就是黑人或者拉丁裔，而这种体制自然只会加深社会不平等，不平等则造成更多犯罪。荒谬就在于“新吉姆·克劳”系统一开始明明就是为了缔造更安全的社会，可是却有那么多人在系统中进进出出，始终没得到能让他们获得不回监狱的经济、社会或政治资源。透过数据看结果，美国的再犯率一直在60%徘徊。

相对地，新加坡的再犯率约为25%。每年有9000人出狱，政府针对这股人口回流做了许多规划，我想看看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会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在旅程即将结束的时刻，关注焦点也应该慢慢朝着出狱移动。

与当地官员会面的第一个早上，我心里生出疑问，而且挥之不去。我来这里是为什么？就透明度而言，新加坡政府的名声不怎么好，不仅控制了媒体，对于司法系统也极度保护。不过最简单的答案，大概就是因为去年在一场刑事正义的研讨会上我认识了某人，而这个某人又介绍了另外一个某人，总而言之，身为约翰·杰伊学院的教授确实能多打开几扇门。但我还是怀疑新加坡政府是否愿意放行一

个看起来就会问东问西的外人？到了SCORE，也就是新加坡康复企业管理局的办公室以后，我的问题得到解答。

里面有个颇为壮观的图书室，还有一个自助式的健康中心，墙上贴了一张放大的2011年《海峡时报》报道，提到新加坡狱政署想要进行重大改革。标题写着“十年革新”，内文则说以前监狱是军营改建，往后要“因应个别需求打造”；而以往狱警不准与囚犯对话，因为“避免受到人犯操纵或贿赂”，但以后狱警都是经济、法律、科学或艺术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与囚犯谈话成为工作标准，因为狱警一定要“了解囚犯需求”。

自从1996年，新加坡狱政署兴起了新的流行语，也就是“康复”。他们忽然改弦易辙，指出监狱不应只是惩罚手段，并据此修正章程规范，促生新的监狱建设、新的用语词汇，有很多缩写不断出现，像是MAS（Mandatory Aftercare Scheme，狱后强制辅导）、CBS（Community Based Sentences，社区主题量刑）等等。新策略确实发挥功效，再犯率从2000年的40%掉到了2010年的23.6%。我之所以大大方方在这儿，也就是因为政府迫不及待想要展现政绩。

知道来龙去脉以后我更加好奇，除了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成效卓著，也因为这样的转变看来并非出于经济需求。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因为经费不足才开始研究如何改造监狱环境，简单来说就是没钱改善硬件，也没钱继续盖监狱了。反观新加坡有蓬勃的就业市场，政府效率高且资产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据说其主权财富基金超过5000亿美元，理论上不至于被监狱拖垮财政，而之前数十年也都以严惩为政策主张。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改变？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试管计划，而核心就是关于报复、改革及正义的理念。

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隔天我到了新加坡樟宜区，这里除了樟宜机场以外还有新加坡的14所监狱之一，由193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所设置，现在收容了12000名囚犯、配有2500位工作人员。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在此处设有平民拘留所，至于我要待上一整天的实拉让军营（Seralang Barracks）则监禁过最高5万名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不过除了二战兵营和一堵坍塌旧墙，其余建筑物都是近期才重建。

此处重生后成为实拉让公园小区监督中心（Seralang Park Community Supervision Center），刑期届满的囚犯可以来这里工作适应，出狱者也会过来和看护人会谈。我穿过刮刀刺网，所见景象以绿色铁皮为主。

新加坡过半数囚犯都知道这里，但多数是刑期结束以后才来，报到地点像是一般学校的活动中心，数百名出狱者在电子化柜台前登记以后就可以找位置坐下，之后看护人会过来了解他们出狱以后的生活状况，无论现在从事清洁工、电信销售，还是厨师。由于职业训练以及持续与人力资源部门合作，本地出狱者就业率高达99%，主要进入饮食、零售或观光产业，而且根据政府统计，经过“安置”的出狱者，获释之后留在工作岗位的概率高达59%。美国情况则大为不同，近半数出狱者获释后第一年完全没有得到雇用，调查显示资方不羞于展现自己对有犯罪记录者采取歧视态度，换作性别、年纪或种族这些项目时，他们就会稍作保留。

宿舍设计给最多120名男子入住，大部分是刑期最后几个月，也有少数人从头到尾留在这里。里面是灰色调，只看到金属置物柜、孩童尺寸的小床铺着卡通图案的被子，或许比起牢房那边的稻草垫好一些。墙壁上空无一物却写了“积极乐观”，囚犯不必穿制服，会被安排出去工作，还能请假回家或参与小区计划。

“没有太多问题，囚犯很守规矩，”一位狱警告诉我，“他们很珍惜机会，不会捣乱。”但如果捣乱了，大头照就会被公布在墙上。

我看看记录，有“生病未及时通知雇主”“为延后门禁而谎报理由”“捏造签到记录欺瞒雇用单位”等等。

这位狱警以前是工程师。“盖房子的。但是现在呢，来重建这些人。”他带我离开的时候这么说。

监外工作制度我在澳大利亚万杜也看过，其实是个万无一失的做法。明尼苏达州的一份研究显示，监外就职会降低囚犯再度犯罪的概率，而且大幅提高出狱之后的就业率、就业持续时间以及所得，并间接为州政府省下125万元。然而，因为美国社会太趋向避险，所以监外工作制度极其罕见，有许多人光是听到囚犯离开监狱就紧张得受不了。

参观了实拉让公园以后，我到当地有名的小贩中心[注]用晚餐。这里的商家都受政府督导，标榜是最安全的街头饮食摊位，提供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料理，也展现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有人说新加坡人光是透过饮食就达成族群融合。

回到旅馆，我收到了一封简讯。“贝兹！”语音留言听起来欣喜若狂：“是我，乔纳森！我回家了，有空打电话过来。”乔纳森是我的学生，今年23岁，被关了6年终于出狱。我也同样兴奋，立刻回拨。

“请问乔纳森在吗？我是他的教授。”

停顿了一会儿，彼端传来啜泣。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听见这样一句话。”接电话的是乔纳森的妹妹，我说了自己以他哥哥为荣，夸奖他的才华。后来话筒到了乔纳森手中。

“我等不及要去学校了，贝兹。”乔纳森叫道，那张笑脸在我脑海清晰可见。

挂上电话之后我努力忍住泪水。每次看到有人离开监狱回家，情绪都是这么强烈。听到学生出狱回家，对我而言是亦喜亦忧。每个获释的囚犯都被孩子似的乐观淹没，就像刚刚我在乔纳森的声音里听见的那样。另一个学生理查德在出狱前一周对班上所有人发表感言，他觉得自己成了小说中那位炼金术士，“因为我也可以转变”。靠着这份乐观积极，他们可以挺得过出狱以后还要持续不知多少小时的恼人程序：身份登记、会晤假释官、参加愤怒控制，以及其他很多课程，还得到许多我想不起来的单位报到。只有乐观积极才能够让他们愿意耐着性子安安静静学习和使用放逐期间问世的新科技。“嗨，贝兹，”一次学生出狱隔天就传短信给我，“我就是练习打打字而已。”还有学生问过我“为什么餐具都变得这么重啊？”那是13年以来他第一次拿到金属制的叉子。

但无论如何，乐观积极总有消耗殆尽的时候。蜜月期过了，自由褪下光鲜亮丽的表象，他们还是得面对新吉姆·克劳的残酷人生。工作机会很少，以前熟悉的生活圈反倒造成重重阻碍，多年分离以后家庭关系也瓦解，接着创伤发作。一个人可能17岁就进监狱，时间停在那一刻，即便生理年龄来到38，在人际关系、沟通技巧等各种方面都未必有进步。监狱里的经历、落空的期望一再造成伤痛，而社会没有提供相关支持与协助。监狱足以使某些人精神失常，否认自己犯过罪，这是人性机制，不压抑某些极端情绪难以生存。但出狱的人反复面对自己以前的过错，在回归人群的道路上接受一次又一次重击。

我见过许多学生蜜月期以后进入迷失期，有时半夜惊醒，担心会不会出事了，非要确认他们没被捉回监狱才放心。可是大半时候我也只能等他们自己振作，希望某一天重新相遇，他们已将破碎的希望捡回，缝缝补补拼拼贴贴，勉强做出新的人生。

“这边A区，那边B区。C区、D区还没有盖，因为囚犯没那么多，不需要。”代表SCORE接待我的费玲以前担任过狱警，她带着我走进樟

宜监狱较现代的区域，在新大楼入口处要做指纹扫描，然后我拿到一本新加坡狱政署发行的杂志，叫做《圆形监狱》（*Panopticon*）。

“A区在2009年建造完毕，B区则是2011年落成。上头的人呢，”费玲笑道，“似乎没什么命名的创意。”

监狱铁网外面工厂林立，同样都是橘色和蓝色、盒子形状的建筑物，加上整齐草坪。机场就在附近，这里的建筑物不能高过四层楼，换言之监狱有不少空间得延伸到地下，但也因此衍生出通风问题。

我们沿路前进，两旁的路树看起来像是干枯的手指。费玲解释说：A区多数为死刑犯或长期犯，但今天要去的B区则是候审者或毒品犯，这类的罪犯占总囚犯数的六至七成。

“贵宾室往这儿走。”狱警领我们进去，墙壁上夕阳与火鹤组合为一幅幅图画。

“是访客室。”费玲纠正。

不过我看了也觉得像是贵宾室，里面有大红色沙发、吧台、手足球和桌上曲棍球桌。房间中央有B区的模型，原来牢房还分为单人、四人、八人。费玲解释没有两人房是因为不希望出了问题没有第三人在场。

“想认识谁，你就要成为那个模样。”“有志者事竟成。”“从什么地方出发无关紧要。重点是你要往哪儿去。”还有亨利・福特、孔子、亚伯拉罕・林肯、戴尔・卡内基等人的励志金句，从休息室到目的地路上到处可见。

这里的环境还挺像一般住家，有金属栏杆、狭窄走廊，不过安静得好像废弃地。墙壁上有色彩鲜艳的鱼群与海星插画，另外一边则是

在心形剪纸上面写了更多格言，有一面壁画是新加坡的紫兰花——总之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监狱，包括气味在内，因为什么味道也闻不到。

后来我们搭了电梯，出去以后终于传来交谈声，一扇电动门和后面的蓝色闸门开启，里面的气氛如同监狱和幼儿园的融合。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

36名囚犯齐声欢迎，音量大得令人一震。他们穿着蓝色T恤，立正站好，所属的矫治小组是樟宜监狱释前中心一个为期10个月的计划。

“这是一个整合型犯罪控制计划，我们为即将出狱的囚犯提供治疗型环境。”今天为我导览的狱方人员是个堆满微笑、十分热情的先生。他说眼前是亚洲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同类型机构，取经于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参考对象包括我亲自去过的波罗尼亚释前过渡中心。“必须从这里就开始，不能等到他们走出去的那一天。”辅导主任简单扼要地说出了整个计划的中心思想。

343名男囚在这里分为10组。计划已经实施两年，之前530人里头只有30人再回到监狱。

“每次有人回监狱我们就会收到报告，感觉像是心上被插了一刀。”主任生动但诚挚地说：“数字是最明确的基准，我得设法降低再犯率。”

计划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增加犯人自主承担的责任。每个阶段都有一个颜色代号，比方说回复阶段的居住区代号是蓝色，双层结构，有共享的走廊和活动空间，十几个满身刺青的男子围在几张金属野餐桌旁边。牢房门口一双双黑布鞋摆放整齐，还有一个箱子专门回收意见表，表格说明以新加坡通用的四种文字呈现：英语、汉语、泰米尔语，以及马来语。走廊尽头有一部电话——新加坡其他监狱里面没有

电话，但这里例外，因为释前计划的重心之一是强化他们和家人的联系。

每个小组的成员都经过刻意筛选，包括不同年龄和种族。“他们必须学习包容彼此不同的习惯和性格。”主任如此解释。实际上，这个制度像小区，有自治委员会，通过选举决定领导人和生活公约，受过训练的辅导人员担任个案协调，进行监督并适时导入修复式活动。有人违规时，最重要的并非处罚，而是开会了解原因，一起协商补偿方案。

“以前我在最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工作，根本不能和狱友讲话，开课更是天方夜谭。”主任说。

墙壁上的名言警句绵延不绝。“我行，我行，我一定行。”

“就算囚犯中的模范生也很可能无法适应外界。”主任继续说：“他们很快就要回到社会环境，这计划就是协助他们回去以后的生活。首先必须放下在监狱或者更早之前养成的态度和习惯。”

他指着一幅以红色和蓝色为基调的画作：“这幅画叫做《冲破过往》，以海上的漩涡为象征，犯人就像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必须稳住自己，这与修复区的意义相呼应。”

穿过修复区以后，对面是新生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生命中没有不重要的日子。”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这边的囚犯穿着绿色制服。

“这一区的标志，”主任指着另一幅图画，“树木、双手，代表下一个阶段的成长。”

新生阶段最主要的目的是主动弃绝帮派活动。黑道在新加坡华人圈的渊源颇深，围绕以海洛因为主的毒品交易。根据狱方统计，有四成囚犯依旧与帮派分子往来，两成则呈半退休状态。主任特别期待反帮派同侪团体能发挥作用，活动中囚犯围成一圈，分享当初涉入贩毒、黑帮的心路历程。

“监狱就是一堆P[注]，”他这么说，“而这个计划比较特别，被大家叫做‘P的由来’。犯人一开始都不喜欢，他们排斥谈论人生，感觉比坐牢或鞭刑还不自在。要一个个大男人坐下来说出内心感受，居然搞得他们满身大汗，还跟我们讨精神科的药物吃。不过计划执行完毕以后有机会离开帮派的人，很多都选择不回去了。”

里面有个小市场，我看了一下颜色代码规定，货币则通过行为良好来取得，修复区的人只能购买基础商品，有米洛猴、奥利奥饼干、寄给家人的卡片，上面有绿色标签。新生区的人因为距离出狱更近一步，所以能买的东西多了牙刷和老花眼镜。最后是重启区，他们已经很靠近外面世界，所以能买瑜伽垫好适应往后的软床。

这一区的自治组长是印度裔，名字叫做尼扎姆，他双手扣在背后站得挺挺的。“你可以和他聊聊。”主任介绍过后说。但我有些犹豫，因为之前SCORE给的行程规划特别注明不得与囚犯交谈，是尼扎姆自己开了口，表示他已经坐牢7年，断断续续进出11次，再过5个月就可以回家。

“女士，我很感谢这个计划。我以前是混黑道的，不过这次出去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里的经验，我变得比较了解自己，回家以后会记住学到的责任感。”他一直低着头。

尼扎姆穿着重启区的黄色制服，属于他们的标志是夕阳下的山崖。所有人围在一部笔记本电脑旁，为了几天以后的毕业典礼做准备。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又是齐声洪亮的问候。

一个戴着眼镜的囚犯展示制作好的投影片，说他们为典礼预备两首歌。“一首是华语歌，一首是邦·乔维（Bon Jovi）的《活在祈祷中》（*Living on a Prayer*）。”

“当目标看来遥不可及，别改变目标，改变你的步伐。”

后来主任提起，原来贴在墙壁上的这些句子必须先经过委员会审核，其中很多也翻译成汉语和马来语，他们还举办格言大赛。

“汉语组的冠军就是这条。”他翻译了我们头顶上那一句。“爱是照亮家门的灯火。”

广场其实是个大体育馆，兼具小区中心的功能。附设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很多英语和汉语小说，及佛教、印度教经典。一些人坐在里面谈天，模样看来自在，栅栏上面贴着“责任”两字，是这里的五大核心价值之一。一些狱友正在玩五人足球，在别的监狱这运动会被禁止，因为会有身体接触。但在此地为了鼓励复归社会所以开放，反正出去一样可以玩。另一头有一排人正等待剪发，这是生活公约一部分，规定全部贴在墙上；修复区的成员是固定发型，重启区的人只要遵守短而干净的大原则即可。

走到这儿，我的参访结束了。费玲带我穿过长长走廊到达出口。

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恐惧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

那周后来我还在思考自己所见所闻，就顺便去做了一趟云端漫步。新加坡确实提供了观光客走在天空的机会，滨海湾花园有个区域叫做“云雾林”，景色之壮观前所未见。我一边闪躲正在自拍的韩国游客，一边暗忖：能够人工制造生态圈的国家，有能力打造零缺点的刑事司法系统好像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新加坡在这方面的需求不高，犯罪率近期又降低4.3%，为30年来的新低。晚上我走在昏暗但迷人的唐人街，感受到良好治安多么可贵，想起7年前第一次为研讨会短暂到访就留下深刻印象。那次我在购物中心里面付了20元钞票，可是店员以为是1元，所以没找钱。我提出以后，她问了联络电话，表示当天收款机结算后会通知我。哼，是吗？我内心那个愤世嫉俗的纽约人不怎么相信。

晚上11点1分，我的电话真的响了。

“女士，找到您的19元了。”听到话筒传来这句话，我当下呆掉，很难想象居住在大家如此守法的国家是什么感受。而这次我有机会和当地人聊天，他们的反应是新加坡像“有空调的国家”，大家被宠坏了，生活里只有第一世界的问题[注]。费玲也说新加坡人只要周末去马来西亚买个东西，回来就会觉得家乡真好。“不去外面看看，不知道治安和经济得来不易。”

也因此新加坡政府透过许多渠道宣扬国家成就是个奇迹。“一个海岛城邦如果平凡无奇就难以生存。”李光耀在1959年经选举就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总理，我在当地书店买了一本他的著作《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花了一个下午在海滩边仔细读完。“我们必须更团结、更有韧性，也更具适应力，事情做得比邻国更好但是更便宜，这样才能跟别人有所差异。”

当年局势对李光耀很不利，接连受到英国与马来西亚统治，刚独立的新加坡没有内需市场，人民教育水平低下，几乎完全倚靠英国补

助存活。岛国夹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两个相对大上许多的国家间，必须应付随之而起的种族融合问题——大约75%为华人、14%为马来人、还有7%印度人。1964年曾因种族问题起了暴动，但在李光耀领导下国内风气逐渐和平，人均GDP在1959年为400美元，到了2012年飞跃至52052美元。

李光耀的做法是规划基础建设，设立经济发展银行和产业园区吸引欧美投资，提高公务人员薪资，力求减少贪腐；融合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与社会主义的团结合作。拥有居住权的人会自认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新加坡政府提供公营住宅，价格合理，等候时间很少超过半年，还通过住居分配增进族群融合。李光耀不屑的不只是外国援助，还有社会福利机构，他选择以小区中心和便民服务为主轴，并且美化机场和市容，营造投资人眼中良好的第一印象，兴起绿化运动，政府设置团队专门整理花园、种植树木，后来除了禁绝香烟广告，还禁止口香糖，甚至推动人民戒除“第三世界恶习”，例如随地吐痰。

阅读李光耀的书，我发现自己几乎忘记了新加坡和旅程起点卢旺达的一个关联点：保罗·卡加梅总统公开表示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将效法殖民时代结束以后的新加坡，许多制度参考了李光耀的施政。所以卡加梅也以投资环境和防弊为重心，建立支持高科技的基础建设等等。无论新加坡公民还是卢旺达公民，都享有健康保险和受教育通道，国家追求效率和产能，两个国家也都在所处地理区域成为例外。

但我知道作为例外是得付出代价的，社会经济稳定的“绿洲”需要成本，比方说无论规模大小，总是会有限制社会自由的政策，卢旺达禁用塑料袋，新加坡禁嚼口香糖，政府插手媒体并控管言论自由。“就算成为‘保姆国家’[注]，”李光耀在书中响应批判，“我仍引以为傲。”

后来我看到一个本地网站讽刺新加坡政府的保姆心态，列出许多新加坡特色，第42条形容国家效率："只要看不到巴士、火车或通关需要等多久的告示就会生气。"其他几条却道出人民付出的代价，像第10条："失去批判高位者的能力，即便他们真的错了。"第55条："必须同意政府设定的个人生活习惯和形态，并因此决定你能分配到的住宅和付出的价格。"以及第27条："任何事情只要是'为了成为21世纪有竞争力的国家'就合理无误。"

最后这一条力量特别强大：为了成为一个美好的例外，公民必须忍受挥之不去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入邻国处境。因为战战兢兢，所以很多事情变得不必讨论：你们愿意遇上大屠杀吗？喜欢种族暴动？想要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刚果那样政治经济动荡不安？不要的话，就相信政府，别过问太多，免得好日子一夕翻盘。

晚上我在旅馆外面的沙嗲摊思考李光耀缔造的伟大社会体制，而且透过纽约的朋友认识了本地两位思想先进的法律系学生，他们正倡议废除死刑，之后还要倡议废除鞭刑。

"一个比一个难，"达米安说，"新加坡人对严刑峻法、特别是肉刑太过习以为常，觉得好像小孩子不乖就要管教那样，很少人仔细思考刑罚背后的真正意义。我们计划先释出照片。你有没有看过鞭刑？知不知道现场是真的会有肉末飞溅出来？"他露出恶心的表情摇摇头。

"而政府呢，会指着美国那边说，你们看看，有人冲进学校扫射，有人做了其他可怕的事情。你们要的难道是那种生活？美国就是民主过了头，假如大家不想遇上那些惨剧，不希望犯罪率一直提高，就乖乖闭嘴，知足常乐。"

恐惧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在卢旺达和新加坡如是，在澳大利亚以至于美国也一样——于是催生出大规模监禁。

然而，我还是必须说这样的安全、舒适和生活形态得来不易。例如在新加坡可从来不必像是在乌干达那样，每趟出租车都要花很大力气讨价还价，在这里出租车计费表全部死锁且受到管制。虽然听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实际上却大大影响生活质量。达米安听了点点头，也明白新加坡人确实面对两难。后来好一阵子我们只是默默用餐。

“我很惊讶他们居然会让你和囚犯对话。”要道别之前达米安才开口。

我回答：“事实上也不算是讲到话，毕竟监狱之旅到目前阶段，与囚犯互动最少的就是卢旺达和新加坡。想来并不奇怪，囚犯在最要求完美社会的国家中被化约为毒瘤，妨碍原本顺畅的政治机器运作，因此必须隔离、处罚、矫正，并且保持缄默。”

由于这次没机会和囚犯相处，我有一整个下午都花在电视的假犯人身上。那是电视广告，和我之前看见上班族被铁链和铁球绊住的那部影片一样，由名为“黄丝带计划”（Yellow Ribbon Project）的团体制作，他们的团体已经有10年历史，宗旨是通过公关宣传帮助出狱者也提供超过200万美元的奖助金，还有与3800多个雇主合作的人才库，小区伙伴更超过一千位。为增进主流大众对出狱人士的接纳，黄丝带计划发布广告影片，设置广告牌，定期举办活动，最密集的时间是在9月，他们定为“黄丝带月”。多年来黄丝带计划透过音乐和电影欣赏、时尚展演、出版诗集或音乐专辑、监狱艺术创作展览还有手机应用程序与社会互动，已经发出数百万枚黄丝带饰品给民众别在领口，象征对出狱人士的精神支持。

“我们倒也不是刻意要跟上丝带风潮，像是粉红丝带、红丝带之类的。”黄丝带的营销主任阿仁这么说。其实计划名称是大概十年前由新加坡矫治事业部的首席执行官所构思，他因为去了一趟卡拉OK而得到灵感。那时候托尼·奥兰多（Tony Orlando）演唱的老歌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

“现在我好比坐牢，钥匙在爱人手中，只要一条黄丝带，我就能重获自由。

“我写信回家，请她给老橡树系上黄丝带；已经过了三年，不知你是否仍在等待？”

歌词其实是描述打完仗回故乡的老兵，不过两者的相似度如此显著：退役老兵和获释囚犯都是创伤的存活者，重返平民生活的道路需要协助。

“每年9月我们都有新一波的宣传。”阿仁说。

“为什么不是全年推动？”我问。

“经费不允许，我们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啊。但广告停播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报道到媒体上。”我听了暗忖媒体受政府管控偶尔也有好处。

他播了几段广告影片，大部分角色是出狱者，从他们身上都是刺青就可以判断。作为犯罪历史的证据，刺青在囚犯和帮派份子中极其常见，却也因此成为新加坡老百姓眼中的一大污点。阿仁又播放另外三段广告，内容从不同立场观察一名出狱者的生活，角度有心高气傲的狱警、热忱服务的志愿者，以及一位满意的雇主。再次看到影片里面的铁链与铁球，我的思绪陷入演员那双充满哀愁的眼睛；我应该已经注视过那种目光不知道几十回了，全球各地监狱都是这种气氛。

“他已经坐过牢，为什么审判还没结束？”黄丝带计划的文宣印着大大标题，背景照片是一个人刚从监狱走出来。“只需要一点点机会，他可以不用回去。”这句话上面是个垂头丧气还在等待工作面试的男子。

“美国也该有这种企划。”我兴奋地脱口而出，告诉阿仁一些相关例子。黄丝带宣传使我联想到反烟团体“真相”（Truth）的快闪活动和针对年轻族群的时髦广告，还有“禁止查问运动”（Ban the Box）主张雇主在面试前不可调查求职者是否有前科记录。禁止查问运动十分成功，已经促成超过50个县市推动禁止查问法，一些大型连锁如沃尔玛和塔吉特也跟进，求职申请表上面不再询问相关信息。

“不过呢，在美国那里，”我不由自主进入教授模式，对阿仁滔滔不绝，“思想先进的人不会使用‘有前科’‘坐过牢’‘罪犯’之类的词汇来指称别人。以一个人最恶劣的那次行为来定义他们，太具攻击性。”他听了一脸茫然。

“语言的力量很大，可以改变大家的认知。”我解释：“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里面，最多就使用‘狱友’这个词。主观上我仍旧不喜欢，但至少只是根据监狱这个地点来形容，而不是给人格贴上标记。”

“那你要怎么称呼有前科的人呢？”阿仁问。

“就说‘曾入狱’（formerly incarcerated）啊。”

阿仁大笑：“曾入狱？在新加坡这样说大家会听不懂，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住城堡’（formerly in castle）。”

他播放下一段广告时还笑个不停。

法律归法律，但是你觉得公不公平？

“买家具吗？”早上出租车司机这么说：“很多不错的家具。”

“不是，是中途之家，”我重复一次，“援手中途之家。”注

“没错啊，那里卖家具，”他点点头重复一次，“犯人做家具。”

我倒不清楚这一点，只知道自己今天想去参观新加坡20所中途之家的其中之一，最初是基督教会机构，1987年转型为专门收容毒瘾者，后来开放所有宗教信仰以及各类受过监禁的人，隶属于新加坡小区、青年、运动部管辖的社会福利单位，因此具备公法人地位，换言之可以营利，结合慈善和资本主义。目前里面收容100人，有些人处于刑期最后6个月，有些人才刚出狱，也有根本没进过监狱的。

“那边的人还帮忙搬家。”司机继续说：“上次我搬家就找他们。一开始看到他们身上都是刺青，”司机捏捏自己前臂，“一大片一大片的刺青，我吓死啰。可是他们做得很好，而且我想想觉得这些人有工作才是好事，进过监狱出来还可以好好工作。”从市中心到目的地才15分钟左右，在新加坡我没有遇过大塞车。

“对外开放；我们身上有刺青，请见谅。”在看起来像一般公寓的三层楼房前面挂着这么一块塑料招牌，另一句是“全面五折（部分三折）”。空气里有桃花心木的香味，大停车场后面有一些穿着深红褐色T恤的男人，他们正拿着塑料膜包装华丽的大木箱、古董钟，以及漂流木雕刻出的长凳。屋里摆满晶莹剔透的花瓶和璀璨贝壳为座罩的蛋形灯泡饰品。这里的负责人以前是工程师，他解释说商品一部分出口到印度尼西亚，一部分内销，每年运营成本大概400万新加坡元，一半由政府提供，另一半是贩卖家居家饰和搬运服务的利润。

“之前我染上海洛因毒瘾，”经理理查德带我走上阶梯进去参观时淡淡说道：“进入中途之家接受戒断治疗，但一直戒不掉，进了监

狱，然后转过来这边，就留下来工作。”

“最后怎么戒掉的？”我问。

理查德转身：“你知道是什么让我不再碰毒品吗？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那算什么康复方案。

房间整齐干净，和实拉让公园之类的监外工作中心差不多。只有老旧电风扇对抗闷热潮湿的气候，八张小床铺了米老鼠图案的寝具，地毯上是加菲猫，最里面的床铺搭着一条有黄丝带计划标志的毛巾。幼儿化的装潢风格使我想起释前中心，各种细节传递出宛如家长面对孩童、将重返社会视为入学的意象。虽然立意良善，但免不了造成屈辱和自卑——帮助囚犯面对帮派或药物问题的同时，却又时时刻刻通过墙上口号督促他们努力不懈。

“不错。”我咕哝着。的确，环境卫生，安全无虞，已经比纽约那边大半学生的释前居住空间要来得好。2013年约翰·杰伊学院有位同事做了研究，发现所谓“七成五之家”的市场越来越大。“七成五之家”是私人为营利出租，未受法规管辖，但其实根本只是有床的小屋。调查显示这类机构大都违反住宅法规，有过度拥挤、无故驱逐和假借医疗补助名义收费的非法情况发生。

“房间是还可以。”理查德耸耸肩。他说住在这里的人必须工作，也要参加生活技能课程、毒品戒断及共同晚餐，不强迫信教但是极力推荐。许多人和理查德一样时间久了直接留在这里工作，所以有八成员工都是囚犯出身。

他指着窗户上的锡制百叶窗：“因为附近住户抱怨，我们只好装上这东西。不少人习惯打赤膊在窗户边乘凉，身上刺青被一览无余，

结果有人去跟相关单位申诉说这一区被流氓占据。后来我们规定5点以后所有人外出一定要穿上衣。”

外头公路上车辆喧嚣盖过其他声音。

“周围是怎样的小区？”我问。

“嗯，就一般人吧。我们说是中心地带。也有有钱人，不过和滨海湾或你们那边的比佛利山不是同一个等级。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低调。”

“美国那边会说‘NIMBY’，就是‘别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大家口口声声需要监狱、中途之家或游民收容所，但又没有人希望这些设施在自己住的地方出现。”

“的确很麻烦，”负责人开口就先叹气，“找不到愿意赞助的单位。如果是老人或孤儿反而简单。”他手往地面一比，“罪犯、有前科的人是最底层，亚洲文化并不主张帮助释囚康复。‘天助自助者’，大家会这样告诉我们，‘自立自强’。”我想到美国也有同样令人胆寒的保守派，他们完全不认为社会应当提供援助，觉得“拉自己一把”这种天真信念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参观之后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的会议室，四个穿红褐色制服的男子进来面谈，负责人提议让我们独处聊天。“我们不在，他们比较能打开话匣子吧。”然而，新加坡矫治事业部派遣的随行人员有其顾虑，还是坚持留下。

这四人都有毒品前科，一开始眼神充满不安。聊了以后我得知金兴已经出狱三周，但脸上表情和电视广告里的上班族一样焦虑落寞，而重获自由已经超过两个月的孙恭态度也没有比较开朗。他们两人还

显得战战兢兢，回话时都只有一两个字，显然希望这种官方安排的会谈能尽快结束。

另外两人是住久了以后留下来的，比较能敞开心胸说话。阿山坐了6年牢，在中途之家工作2年；加里前后进出监狱6次，但已经19年没再回去，前排门牙不见，头顶上也只剩下几根灰白头发。我提出一个在纽约也常问学生的问题：他们梦想中的工作是什么？

“梦想中的工作？”孙恭复述一遍，像是我无法理解一样：“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梦想不梦想，能不再碰毒品就够啦。”

“如果是自己当老板的话，做什么都好。”金兴回答得简单。阿山也点头道：“没想过这件事。梦想中的工作？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当老板吧……不知道。”他小声说。

加里呢？ “警察，或者去参选。”他忽然笑了起来：“不过这辈子别想了，有前科的人没办法当候选人。”

“你的政治主张是？”我追问。

加里盯着我。“新加坡最大的问题不是犯罪，”他回答，“是毒品。你们那边有毒瘾的人可以勒戒，我们只有中途之家和监狱两个选择。”随我来的公务员显得局促不安。

“我不是罪犯，”加里继续说：“我伤害的人只是自己，结果还是被隔绝。但是监狱无法解决问题。”

“没有外力帮助吗？”我问。

“没有，我们回家也没有公司愿意收，只剩下一些劳动工作，厨房之类的。”

“你觉得这个状况公平吗？”我转头问阿山。

“唔，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用了海洛因，那是违法的。”阿山双手相扣。

“法律归法律，但是你觉得公不公平？”

“法律就是法律。现在身份不一样，要是再进监狱就会被关7年到13年，所以我得小心。”

政府代表凑近我。“你何不问问他们为什么接触帮派和毒品呢？”他态度有点强硬。

“交了坏朋友。”阿山回答：“年纪很轻就受到其他人煽动加入帮派。”金兴和孙恭点头附和，也提到同侪压力和交友圈问题，但是听起来好像排练过的家庭访问。

最后加里按捺不住。“我为什么碰毒品？”他脱口而出，语气急躁：“因为毒品很好啊！你有用过吗？感觉飘飘欲仙。”

我等着看政府派来的人如何制止，不过加里还是大剌剌说出内心话：“我觉得干脆用药合法化就好啦！有何不可呢？反正在新加坡就是一场闹剧，就算进了监狱也没有勒戒治疗。会处罚，但是不帮你。‘拒绝毒品就是了’，里头的人只会这样告诉你。真好笑。美国就不用说了，连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有勒戒中心啊，为什么这里只有中途之家？谁也没帮到我，是我自己下定决心改变才终于摆脱毒瘾，但是太迟了，人生已经面目全非。”

他的怒吼是一股清流。新加坡的毒品法令比泰国还严苛，历史追溯到19世纪时殖民政府极力设法杜绝华人移民的“偏差行为”，也就是鸦片生意。时至今日，吸食毒品依旧初犯就会被处一年以上徒刑，携带极小分量，如30克大麻，即构成走私贩毒，一间房子里面若藏有

毒品，则全部持有钥匙的人都视为罪犯。只是待在吸毒者附近，警察就可以加以拘捕，警方认为“有嫌疑”的情况下无需搜索票就可以针对个人或房屋进行搜查并当场要求验尿。2012年才刚修法，仅负责运毒、愿意配合警方，及判定为精神问题的人不再处以死刑。

不过从加里的话语中能看到本地法律事实上有多么不公平。假如连治疗机构都不存在，为什么可以随意处罚？虽说就算在美国，毒品勒戒疗程有时没成效又价格高昂，但至少有个机会：数据看来，配合药物辅助的行为治疗有其作用，做法是协助成瘾者认识到处罚毒瘾的原因、毒瘾发作时的紧急处理、提供诱因或奖励使成瘾者不要越陷越深等等。在新加坡几乎没有戒毒这种事情，因为会直接被关进监狱，就算先寻求医师协助，法律也规定医师必须主动通报中央毒品管制局，之后毒瘾者还是被锁定监控，数年内随时可能被要求检验。在这种前提下，毒瘾者怎么愿意寻求专业治疗？情绪激动的加里和另外三人离开，我留在会议室内收拾笔记时，阿山偷偷摸摸回来，东张西望以后轻声说：“你知道吗，B区的状况其实比旧监狱糟糕很多。”他告诉我：“没空调就算了，连电灯都很少。我们为什么皮肤都很白，是因为根本不能到室外，连续5年，甚至10年。”

我问他有没有遭到鞭打。“很多次啦。”

“监狱和鞭刑，哪一个造成的阴影比较大？”我追问，而阿山也没有犹豫。

“监狱。监狱比鞭刑严重，因为是没完没了，加上后半辈子会进入黑名单，大家看我们眼光都不同。我快结婚了，要开始新生活，所以特别小心，不过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异样眼光。”他摇摇头，其实问题是别人的异样眼光。

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或者进过监狱的朋友。即便出狱好几年，有心人士还是能在网络上的“狱友查询系统”找到他们

的名字，如果罪名和性有关，处境会更惨，那种污名几乎彻底毁掉一个人的人生。我一个学生迈克是性侵犯，明明达成假释条件了，还是留在监狱里面长达一年，因为到处都有限制性侵前科者的规定，所以在外面找不到能居住的地区，就连一些条件恶劣的中途之家都不收容有性侵前科的人。迈克的际遇突显出污名化问题有多严重：社会大众并不认同目前的刑罚，否则应该相信罪犯经过矫治后会有所改变，怎么在人家出狱之后还要严密监管不放过？

理查德带我出去，花生酱香气盖过了木头家具的味道，对面自助餐厅已经开始供应午餐。

“这是帮助人的地方。”我离开时他说：“还要努力。”

惩罚的目的不是毁掉他们的人生

优秀的中途之家确实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几乎是全方位、密集且个人化的整体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家庭计划，以及职业训练，也有好的劳动环境和安全住居，管理人员能给予支持和相关辅导。很可惜在美国这种机构少之又少，因此2013年的研究发现，住在中途之家的出狱者居然再犯率更高。2014年《纽约客》杂志一篇辛辣报道揭露了释后机构内恶劣的劳动环境、性虐待与药物泛滥的问题，范围遍及全国。由于以营利为目的，这些机构不以降低再犯率为出发点，反而常见运营者为了佣金回扣强迫推销勒戒疗程，因此妨碍出狱者的教育与就业。我就有个学生出狱以后进入中途之家，结果因为毒瘾治疗反而丢掉好几个工作机会。他不参加就不能继续住，但事实上这学生根本没有毒瘾。

回到饭店以后我找出这篇报道，读了一次又一次，开始研究这股私营机构蓬勃发展的风潮，注意到已经有人称其为“社会复归产业复

合体”（Prisoner Reentry Industrial Complex）。其中利润庞大；数十万人因为未能缴纳停车费用这一类微罪而被判缓刑并进入这些私营机构，形成数百万元的商机。大型银行集团如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也从矫治系统获利：它们提供矫治系统使用的预付签账卡，也被称作出狱卡，囚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的积蓄转到这张卡上面，可是由于相关法规松散，导致这类型卡片的手续费、维护费十分夸张。而在新加坡，有援手中途之家，也有其他社会复归机构，总数相当多，但就像负责人所说：他们还要努力。

最终还是加里那番心声在我脑海回荡不已。他道出我在泰国就生出的疑惑。两个国家都对毒品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可是将原本不需要关起来的人关起来、对需要治疗的人施以惩罚，意义究竟是什么？就算建立极其出色的社会复归计划，结果里面都是无需离开社会的人，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察觉新加坡的刑罚政策处在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要严惩，另一方面又心软；仿佛通过法律制造罪犯，目的不是毁掉他们的人生（这种复仇思想已经过时），而是为了自以为是地使他们康复，并因此再度成就新加坡引以为傲的效率：看看我们多有效、多人道地实行社会复归。

症结点就在于想进行社会复归，必须先有罪犯。今天我见到了其中四位，纵使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代罪羔羊。

我将黄丝带系在白色衣领上。周围有大约50人也这么做，大家在一尘不染的监狱大厅四处走动交际，等着享用早午餐。

没错，就是早午餐。今天的活动叫做铁栅之后的盛宴，黄丝带计划每年固定会举办几次的募款餐会，也是我这趟新加坡之旅最后一个正式行程。

“巴士到了！”这是个讯号。众人鱼贯而出，上车以后穿过A区抵达光鲜亮丽的樟宜茶室；这里有独立出入口，所以几乎没看见刮刀铁

丝网就进来了。七个穿浅灰色牛津衫、头发剃得极短的囚犯在入口处奏乐迎接大家，里面座位铺着红桌巾，墙壁挂着囚犯创作的艺术品，可供竞标。有一幅画叫做《那时生命缓缓》，画的是新加坡尚未开发的年代，河上漂着几艘小渔船的宁静风景。后来建设新加坡的一大势力代表与我同桌，他是滨海湾金沙度假村的资深副总裁。

见宾客都就座，音乐更加喧哗，三个穿着亮紫色背心的歌手提着麦克风进门就朝台上走。

“在老橡树系上黄丝带。”他们边弹指边演唱，脸上笑容可掬，席间宾客个个摇头应和。或许旁人以为都这时候了，我该习惯监狱里面出现这种突兀的光景，但事实上，我永远不可能习惯。后来大家又排队去参观A区，能进真正的监狱我反而松一口气。尽管监狱参访感觉也几乎像是作秀。

“别叫我们狱警，”堆满笑脸的向导调整了名牌旁边的黄丝带，并且解释现在刑罚界的新名词：“我们是人生引路人。”

狱警带我们走进模范牢房，里面根本没有人，每件东西都附上标签：牙刷、制服，以及隔开淋浴间和就寝区的“遮丑墙”。当然，一定会有新加坡监狱最驰名的稻草垫。

“到底为什么不给他们床呢？不是有点狠心吗？”有人这么问。

“毕竟还是刑罚的一部分，”向导回应，“虽然是康复，但同时也是刑罚。我们不提供床垫给受刑罚的人，让他们睡在稻草上。”

这里的操场是个巨大的水泥洞穴，中间搭着排球网，没有自然光。我缠着狱警询问里面的作息安排，他后来终于愿意回答：刑期的前十分之一称为“震撼期”，每天待在牢房里面23小时“好好反省”。过了那个阶段，囚犯才可以参与牢房外面的活动。

有些什么活动？每天可以出去几小时？一天要待在牢房里面这么久，即便有室友陪伴，仍旧只是换了名字的禁闭。狱警说，有咨询、职业训练等等，然后就不想理我了。我追问细节，他只说有三成囚犯进行劳动工作，接着匆匆带队向前。

才三成？那其他人就整天闷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我们戴上口罩发网进入新加坡矫治事业部的烘焙坊，又是一样洪亮的问好声。有个配备耳挂式麦克风的囚犯出来为我们做介绍：这里制作的食品符合伊斯兰规范，也有欧式的面包糕点，一边是生产线，一边是侦测异物或瑕疵的紫外线灯。

烘焙坊里面非常热，加上炉子一直飘出诱人香气，他们到底怎么忍受得了？毕竟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辛苦做出来的点心自己没有机会吃。巧克力松饼、闪电泡芙、法国面包——这里制作的点心还供应给新加坡航空。

“烘焙坊有许多企业客户。另外，这所监狱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洗衣厂。”狱警大声解释：“医院有九成使用我们的服务，每年营业收入有4000万元。”他说囚犯会得到补贴，而且职业训练是无价的。

回到茶室继续享用餐饮，厅门很戏剧化地打开，音乐流出，歌手们有模有样地走进来，不过换上了条纹围裙和主厨帽，后面跟着一列狱警，还有穿西装打蝴蝶领结的一群囚犯。他们送上第一道菜，是奶油松露萝卜，接着是韭葱汤，再来是掺入鱼肉很可口的蛋奶酥。这些餐点是由当地知名大厨莱恩·洪监督制作，用餐过后他出来一鞠躬，并盛赞监狱里面的学徒。

与我同桌的人十分惊艳，情绪高亢。餐点确实都很美味，黄丝带计划的成果很丰硕，囚犯们都得到了谋生技能。

“企业终于不必找外劳了。”右侧传来这样一句话，我竖起耳朵。

于是我得知2013年新加坡发生第一次劳工暴动事件，主角是大约100万名技术水准较低的外国劳工。他们从事新加坡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劳务，但这不重要，外国人涌入是不对的，要由本地劳工接手！

我内心苦笑。原来伟大的新加坡政府想方设法协助囚犯就业，背后还是经济和政治因素，现实目的远大于道德层面。经济发达了，有许多低阶工作需要人力填补，加上排外的历史渊源，于是大家脑筋动到自己人身上，尽管是前科犯也无所谓。

随之而起的社会运动也很方便转化为劳动力。其实新加坡立国以来一直都以囚犯为建设主力。1825年到1867年间，15000名已决犯从印度、缅甸、斯里兰卡运送到这里，通常都进入了公共工程团队，伐林填沼，砌墙铺路，新加坡大部分有历史的建筑物都出自犯人的手，甚至连流浪狗、花园和墓园也都由他们照顾。虽然有歹毒鞭刑，新加坡囚犯的劳动状况还是比印度要好——工资只有自由人的三分之二，而且刑期结束后通常不离开，殖民地运作容易维系。

纵使我身处现代的新加坡监狱，本质没有多大改变。

“《和平》由第二桌的先生购得。”主任宣布。已经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活动，也就是囚犯画作的无声竞标。

“《纯真甜美》由第一桌的女士购得。”囚犯组成的乐团又开始演奏《在老橡树系上黄丝带》。

众所周知，全球各国都通过监狱来制造和管理劳动人口。史学家主张美国20世纪70年代监狱数量大爆发，正好呼应市场上低阶低技能

人力需求的剧减。社会忽然出现大量失业者时，解决的办法就是监狱，只要将他们排除在就业市场外就没事了。

然而，新加坡政府确实正在推动社会复归与再融入，那么动机是否还重要？美国还没有像黄丝带计划一样针对大规模监禁带来足够影响的公关力量，也欠缺如与我同桌这位副总裁一样愿意就监狱问题贡献心力的企业高层，更遑论要社会大众走进监狱了解状况、乐意雇用有前科的人。如果美国也有SCORE，我的学生出狱以后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可是加里说的话还在我心里回响。没有公司愿意收，就剩下一些劳动工作，厨房之类的。

这周前几天我见过另外一位囚犯杰登，他们两人的说法正好互相呼应。丹那美拉（Tanah Merah）原本是高安全级别监狱，2011年改制为监狱学校。参观那里以后我看到一样的新加坡：先进、高效率，但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管理囚犯。壁画是海星和灯塔，“象征监狱学校带给囚犯光明的未来，每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狱警照本宣科念给我听。这里的囚犯生活包括集合点名、早操、口琴课、晚操，教师是从一般学校体系物色，两年一聘。我还参观了多媒体中心，大电视屏幕上爬过一个机器人，囚犯戴着无线麦克风，以类似TED、排练已臻纯熟的风格介绍内部活动，同时制作一些节目，像是从囚犯观点制作给狱友的新闻。

很令人感动，即便丹那美拉只有182位学生，至少这是可以学习、创作、规划人生与追逐梦想的地方。不过后来我遇见杰登，他被派来接受访问，穿着红色T恤、匡威球鞋，看起来年纪应该25岁左右，已经出狱两年，但和中途之家的人一样浑身不安，需要旁人催促才愿意多开口。杰登拧着双手解释：“他从初中进入帮派，因为烟、强力胶、冰毒所以被当成罪犯。”

“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都是青少年问题。”我打断告诉他，但心里清楚杰登的行径确实符合青少年入狱标准，也因此现在得经历复归社会的历程，并且增添更多苦痛。

辅导员说杰登研习建筑工程，会去体育馆运动，他的努力值得我们骄傲。我点点头。只是下楼要出去的路上，我和杰登又聊了一会儿，气氛比较轻松了，他问起我在美国的班级。

“其实我很想当作家。”杰登忽然说。

“真的吗？那为什么不回去读书？”我问：“试试看发表作品？”

他真的大笑起来：“制服都穿不下了啦。”

这句话是一体两面，在新加坡这里只要辍学了就不能重返公立体系，只剩下私立学校可去，但能负担的人少之又少。正因如此，更显出丹那美拉的独特——它是难得的教育通道，学习目的不再限于就业，而是生涯，而且对囚犯和出狱者开放。回想起来，中途之家的人对于“梦想中的工作”毫无憧憬是理所当然。

与杰登聊过，然后参观了A区，我更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平等。制度将出狱者逼入特定劳动市场，像是烘焙、洗衣、零售，没有给予他们与一般公民相同的机会。同样问题在美国也能看见，如我设立的监狱教育课程数量极少，低技术劳动的职业训练却蓬勃发展，加上公立大学可以基于多年前的微罪或青少年时期的前科记录让申请者吃闭门羹。

种种现象传递出明确讯息：你们适合用手，不适合用脑。我曾经对学生何塞提议念博士班，他听见以后脸上的神情我一辈子忘不掉。

杰登也是同样的表情，那种反应诉说囚犯以及出狱者大半辈子活在怎样的观感下。梦想、学位、对生命的渴求，你们这种人不配。

“社会复归计划就像为癌症病患准备急诊室。”在社会运动方面给予诸多启发的“美国公正领导”（Just Leadership USA）组织成员格伦·马丁（Glenn Martin）曾这样告诉我。新加坡再度展现出一种为伤口止血的权宜之计，可惜纵使设计完善、值得学习，依旧只是创可贴程度，所以旅途要继续。

---

1. 一语双关，可解释为“新加坡是个好国家”，也可解释为“新加坡是个罚金国家”。——译者注
2. 《蹦跳的吉姆·克劳》是黑人喜剧作家托马斯·赖斯（Thomas D.Rice）在1828年创作的剧目，其中吉姆·克劳这个角色成为美国黑人的代名词（贬义），所以针对黑人的法案也被戏称为“吉姆·克劳法”。——译者注
3.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设置的户外、开放式饮食集中地，以东南亚的熟食饮品为主。——译者注
4. 监狱（prison）、囚犯（prisoner）、计划（program）。——译者注
5. first-world problem，字面上为第一世界先进国家的问题，通常意指无病呻吟、实际上无关痛痒的小事。——译者注
6. nannystate为英国保守党议员创造的词汇，形容国家针对人民推行过多保护政策。——译者注
7. 相对于“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为旅途一半，“七成五之家”（three-quarters house）指的是距离回归社会只剩下最后一段路。——译者注

8　什么是正义？

挪威

悲伤是必然，但人造的地狱不然。

——尼尔斯·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

爱是未完成的关系。因为未完成，所以没有界线，没有人知道自己会被爱带向何处。在这些面向上，爱是无边无尽的。但若经过考验，厘清、确认了界线，那么就得到完成、定型，也因而失去无限。

——托马斯·马蒂森（Thomas Mathiesen）

早上7点钟，我被起床铃叫醒，爬下床走到窗户边掀开帘子，一片黑暗。这时间到底是清晨还是夜晚？ 11月的挪威很难分辨两者，阳光少得每分每秒都像是处在幽冥中。浓重的云层像是绒毛毯遮掩所有颜色，时不时揭开一角露出些许金光仿佛挑逗。生命在此简化为三个调性：冰蓝、瓦灰，还有血液干了那样的红。

收拾好随身物品，我启程去搭电车。跟以前一样，没有人检查我是否买了票，这里的公共运输系统采用信任制。外头街灯有点暗，虽然奥斯陆是欧洲发展最快的首都，但并未大张旗鼓炫耀自身存在，幽静得令人心旷神怡，美丽又谦和。等车时我进车站书店看看，有一整柜犯罪小说，这个文类在当地很受欢迎。说来讽刺，忧郁暗淡的自然

环境仿佛为了犯罪打造，但犯罪并非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挪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也因此我来到这里。倘若地球上真有乌托邦，挪威大概是人类认知中最接近的地方。这个国家生产石油，社会福利极佳，几乎全国人民都享受最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和育婴服务，文化长期重视平等、安全以及社群主义。历史上挪威并非以农奴和采邑制为主，经济一直奠基在小村庄与民主的地方自治，200多年前已经完全废除贵族阶级，社会也不存在明显的阶层。由于气候和地理因素，移民较少，性质单一的人口更增进凝聚力。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决定拍摄纪录片《健保真要命》（*Sicko*）时，想要找出与美国相反的地方，也就是并非资本主义挂帅、并非人人自私自利地代表国家，一个社会体制和阶级平等的迪士尼童话般的梦幻国度，而他看上的正是挪威。

导演拍摄的一大重心是我今天要拜访的巴斯托伊监狱（Bastoy Prison）。监狱系统很能体现出挪威的先进，采用“常态原则”（Principle of Normality），其意义是剥夺自由权本身即为惩罚，囚犯的生活条件不应低于维持社会安全之必需。

犯罪学者约翰·普拉特（John Pratt）以“刑罚特例”描述北欧国家的低囚禁比例和监狱人道环境。本地监狱规模都不大，一般而言收容人数不超过50人，也有一只手数得完的例子。监狱设施遍布全国，所以囚犯可以留在与家人或所处小区接近的位置，设施内部也尽可能塑造得和外界一模一样。此外，原本小区依旧照顾囚犯囚禁期间的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项目，这被称为挪威式导入模型（Norwegian Import Model），宗旨是将囚犯涵盖在一般公民所属的社会福利单位下，形成所谓无缝服刑——入狱前、出狱后归属同一地方政府。刑期大都很短，平均只有8个月，美国则是3年；多数犯人不会服完刑期，通常1/3过后可以请假回家，刑期的一半时间在外面度过。

挪威如此人道的监狱系统，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看来成果非凡。当地犯罪率极低、再犯率也仅为20%。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作为我旅途的终点站？我明白自己，还有许多人都像教徒似的对挪威体制寄予厚望，但它究竟有多棒依旧是个问号。挪威是否真的能够完整、清晰地指引我走向追寻的目标，也就是正义？

将他们当做人来对待，他们就会像个人

“监狱？”下了车我走到渡口，上了小船以后朝两个船夫询问，想要确认是否会到达巴斯托伊岛。

“对。”其中一人回答，然后搓了搓手取暖。他打量我一阵，蓝色眼珠散发出一股傲气。“那是男人去的地方，”说完他改口大笑，“逗你的，这船没错。”

我望向桅杆顶端，竟然有一只完整的死天鹅卡在上头。

“好几年前看到的时候就被包裹在冰块里面。”另外一个船夫告诉我。他戴着黑色滑雪帽，容貌有点憔悴，但算是和蔼。

“很吓人。”我回答。

“真的吗？我们把它当作吉祥物呢。你怕罪犯吗？”他忽然这么问，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说了下去：“我们都是罪犯喔。”我望进他眼底，察觉一丝笑意。这是个玩笑吗？

“我们真的是罪犯。你怕吗？”

“为什么要怕？”我耸耸肩，仍旧不确定是不是寻我开心而已。

“我叫威戈，”他和我握手。原来威戈真的是罪犯，曾经被判处21年徒刑，这是挪威最高的刑期了，但他明年就可以出狱。

另一人叫做加托，由于犯罪意图而被判处一年半徒刑，不过他本人坚称无辜。加托和威戈带我走进船舱，墙上贴着每日行程。

“我们从早上6点值班到中午，”加托解释，“之后回监狱里面休息，做点运动，进房间放松。你要不要见船长？他不是囚犯，船上工作人员只有他不是。”

上了楼，身材健壮的船长也与我握手寒暄。

“你来访问囚犯？”他笑了，我渐渐体会为何每个人都拿罪犯很可怕这个刻板印象开玩笑。显然在这儿他们不值得害怕，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随着船只前进，我远眺巴斯托伊，松木成林，从灰茫海面朝灰茫天空伸展。船上有几个座位，加托坐在我隔壁，打开电视机转到历史频道。

“你有没有用Facebook？”他问我。

“你们可以用Facebook？可以上网？”我反问。

“在那边的话不行，”他指着松林，“出来就可以。”我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递给他，抵达挪威以后第一次有蓝色天光洒在我头上。

“有些人说巴斯托伊只是个夏令营。”我要下船时威戈走过来，讲话的神情仿佛想要责备我：“或许你也会那么想，不过那是错的。相信我，那里真的是监狱。我们的人生被暂停了，好像冻结起来。”

我指着天鹅：“和你们的吉祥物一样吗，就算小岛很漂亮，还是结成冰。”

威戈用力点点头。

“回大陆去！”他朝加托高呼，准备下一个航程。是现代卡戎[注]吗？我想象小船载着新灵魂进入幽冥世界。

然而，眼前所见并不幽冥晦暗。威戈说得没错，乍看之下真的会以为是夏令营。当然这季节过来看到的是冬日的风貌：斑驳落叶翩然落在骑单车的人身上，没错，他们都是囚犯，还有一辆马车从旁边缓缓驶过，地平线上是一栋一栋的姜饼屋，沉稳黄壁、绿色边框和红色屋顶，周围出现绵羊和乳牛，没有围篱或铁网。巴斯托伊是开放式监狱，这个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芬兰萌芽，已经遍及北欧各国。开放式监狱的囚犯可在服刑期间每日通勤上班，保住原本工作。目前挪威有三成监狱是开放式的，而巴斯托伊原本是男童教养院，1984年才改制监狱并成为典范。

一位笑容可掬的狱警开着黄色小巴载我到小屋。我进去要登记自己携带的移动电话，这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次隐约透露出“监狱”的氛围。督察名字叫汤姆（不是典狱长，不是辅导员，而是督察），他长得很像凯文·科斯纳，招待我一杯咖啡，然后双双在办公室坐下。办公室有花朵图案的布帘、芦荟盆栽，漂着淡淡清香，夹杂壁炉烤火后的余味，我依稀记得以前在新英格兰度假的旅馆也有过类似的时光。

“没用。会那么做是因为懒惰。”汤姆回答得一针见血，毫不客气批判了传统监狱制度，他之前在旧体系有22年的工作经验。窗户边有只苍蝇嗡嗡飞舞，他继续说下去。

“一开始我对新式监狱也有怀疑，但很快就放心了。应该尽量做开放式监狱才对，最好全部改过来。我们尽可能收人，可是空间不

够。”

挪威的囚犯在出狱前3年就可以申请转调到类似巴斯托伊的开放式监狱，岛上有115名人犯、73位管理人员，后补顺位排到30号。

“外头有种误解。‘啊，这是控管松散的监狱，其实住进去的还算是好人，就只是个夏令营。’这不是事实，我们的囚犯也……抱歉我借用法语的比喻，他们也曾摔进大便，药物、暴力一样不缺。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在其他监狱一直惹麻烦，到了我们这边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居然觉得这种乖宝宝很棘手？道理很简单，把他们当渣看，他们就会变成人渣，将他们当做人来对待，他们就会像个人。”

汤姆打开窗户放走苍蝇：“我们去散散步。”

穿越森林，路旁有马儿吃草，还有养鸟的区块、温室，以及囚犯做午餐的烤肉区。他们共享小木屋般的宿舍，烤火的香味四溢，我想起南非罗本岛；尽管都是小岛监狱，巴斯托伊并不黑暗阴沉，反而十分人道。

“不当作监狱经营，而是看成一个岛。”汤姆解释这里是自然保育区，1/4粮食为本地自产，多数车辆为电动车，所有物资都回收利用。

“农业是核心价值之一。我们追求人道同时也保护生态，动物具备社会功能，它们可以教导我们何谓同理心。所有生命都为这片土地效力。”

“你自己住在岛上吗？”我问。

“我每天搭船通勤，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比起开车去奥斯陆舒服多了。”他摇头：“一开始我到这里也是什么都不懂，我在都市长

大的。来了这里以后才觉得人生得到疗愈，是这种生活模式的影响。对囚犯他们也有同样效果。”

汤姆又带我到木屋教堂看看，里面有个铜质大烛台。“挪威不推广特定宗教，所以这里比较类似文艺空间，教士也不像传统神职，反而接近咨询人员。”再来是商品齐全的超级市场，找得到顶级纯巧克力和芦荟汁，一旁红色电话亭免费使用，但汤姆说他认为直接开放手机和网络更实际。

“有什么好怕？难道打电话、上网就可以杀人吗？”他说。

我问起污名化和社会复归方面的情况。

“在挪威只要出狱就是出狱了，”他回答，“没有太大的名声问题。我现在邻居就有一个坐过18年牢的老先生，没什么人在意啊，而且算是常见吧，我自己不少朋友也进过监狱。挪威人蛮包容的。”汤姆停顿一下才补充：“奇怪的是，历史上的挪威人不是这样子。”

这句话算是轻描淡写，古时候维京人可是出海打家劫舍的民族。之后某一天，我去参观了奥斯陆议会厅，外墙上仍留有华丽木雕诉说上古英雄传奇，内容充斥血腥暴力、妒恨复仇。然而，正因这样的过去，如今挪威和卢旺达一样翻转为强调和平宽恕的社会就更令人欣喜。

午餐时间，汤姆再度提出令我惊艳的先进思维。他说挪威的“保守派”放在其他国家或许都算是自由前卫，本地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原本对于矫治政策的大方向都有共识，然而由于近年移民涌入导致仇外情绪升高，保守政治势力渐渐想要动摇原本的进步主义策略和对犯罪宽容的立场。例如实际上是保守派的“进步党”（Progress Party）反对外来移民，企图消灭依靠福利补助的生活模式——这在当地称作“naving”，而NAV就是挪威劳动福利部的缩写。近年来本地报纸的报

道指出，八成挪威人希望刑罚加重，2010年的民调也显示多数人觉得现行罚则太轻。

“和你们那边的媒体也有关系。”汤姆露出泛黄的牙齿咬着全麦吐司：“美国的电视节目一直宣扬监狱警戒应该要很高，还要‘严惩犯罪’之类的，这里的观众也受影响。幸好风气渐渐转向，过去几年有关你们那边的新闻不少，本地人早就看透了。尤其是美国选举，那些造势演说引用一大堆《圣经》句子，你们真的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吗？还有像莎拉·佩林（Sarah Palin）[注]那种人？大家哭笑不得。那是我们想要效法的国家？”

我叹口气。成也媒体，败也媒体，还有基于恐惧的文化。我向他提起自己在澳大利亚的体验，以及默多克的媒体帝国。

“没错。”汤姆附和，“随便问问就会发现，明明数据说了不必担心，但有些呆子会钻牛角尖，认定社会上到处都是罪犯。”

我又提起德国一项研究发现开放囚犯回家，逃狱的比例才1%。

“对呀，”汤姆点点头，“的确有放出去又犯罪的例子，但其实少之又少，没道理要整个司法制度围绕在那一两个例外上。我常常和别人解释：每年都要放人出去，他们会变成邻居，那你希望这些人像是定时炸弹吗？你想要跟这种人住在一起？啊，对了，”他放下吐司，“你有没有看过那部讲阿提卡典狱长的电影？”

原来有一部芬兰纪录片才刚发行，主题是阿提卡监狱的前主管去了哈尔登（Halden）监狱参观，我之后也会过去看看。影片基调可说是以那位典狱长为笑柄，因为挪威官员认为是矫治的事情，在美国人眼中竟全是危机和风险。

“就连管理人员陪囚犯玩牌、闲话家常、用名字称呼彼此的时候，他脸上都是极其不屑的表情。‘太危险了’，他唠叨个不停。但是有什么数据可以证实他口中的危险？不和犯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要怎样将他们导回正途？这里每个人都认识我家孩子，还知道我的住址和一大堆个人资料。我应该吓破胆吗？”

我感觉仿佛被汤姆督察看穿了。

参观结束以后，我正在等那辆黄色小巴到码头，再搭船回奥斯陆，有个门牙断了的男子走近。

“你是美国人？”他问：“你应该觉得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吧？”

没等我回应，他自顾自说了下去：“可是把人当大便看，他们就真的会变成大便。美国人怎么就是搞不懂？好笑的是美国却又生出了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这么聪明的人。”他说的是心理学界大师，出版许多书籍影片，像是《释放内在力量》（*Unleash the Power Within*）。之后，男人似乎有点紧张地笑了笑。

“你在这儿做什么？”我问。对方身上那件蓝色大衣印着“工程”两个字，所以我直觉认为是要维修器材。

“我？就坐着。等会儿去看医生，可能得调到别的开放式监狱去，因为我好像对马毛过敏。”

唔，是囚犯，我还真没想到。

可是这种意料之外令人感慨，原本就该如此，他和我都是人。还有与威戈、加托的互动也一样，正常又自然，与多年来每次拜访监狱的经验形成强烈对比。在这里，“我们”和“他们”之间完全没有界线。回程船上，这位过敏男子说他以前从事石油相关产业，在世界各

地旅行，而现在即使能够请假回家，一年一年下来仍有渐行渐远的感觉。

“可是我还是充满希望。在监狱里面，囚犯可以仰望天空，也可以执着在地面的青苔。我决定抬头看。”

我也一样。刹时太阳戏剧性地从阴霾后面探头，灿烂光辉遍照大地，恍如万物重生。

人类全体一致，我们应当大过于我

哈尔登镇位于挪威东南与瑞典交界处。14世纪就建造的要塞气势雄伟，角楼俯瞰铺有卵石的街道。此地空气冰凉，我拍了堡垒的照片以后走到出租车停靠点，开着暖气的轿车送我进入山区。目的地同样是座要塞，不过封闭式监狱总是比较现代，外观特色是20英尺高的混凝土墙——但是没有刮刀刺网，只有围墙。墙面原本就不算特别阴森恐怖，加上外侧松林以及风吹雨打后磨圆的墙顶，若说看起来略带亲切感也不为过。我听说过这堵墙，也知道这里有个外号叫做“宜家”（IKEA）监狱，源于内部具时尚感的装潢，据说是模仿那间瑞典家具商的风格。监狱于2012年正式运作，目前收容259名囚犯与几乎一样多的管理人员，造价为2.52亿美元，被誉为“世界上最舒适的监狱”——这句话通常是嘲弄挪威居然让罪犯居住在五星级酒店的环境里。

不过如果政府负担得起，为何不营造最好的矫治环境给最需要的人？监狱的目的不是矫治吗？我看过哈尔登的照片和文字介绍，但能亲眼得见依旧兴奋。

为我导览的是拉塞·安德雷森（Lasse Endresen），他个子小但性情活泼，担任监狱的业务与小区关系监察员。他很骄傲地介绍了哈尔登监狱的制度，但看我没惊喜也没错愕似乎很失望。这里没有制

服，没有铁栅，囚犯共享的居住环境十分优异，有不锈钢的柜子、环形沙发、精致咖啡桌，为了最佳采光设计了长型窗户。操场一样时髦，请当地艺术家多尔克·朗德格伦（Dolk Lundgren）创作出涂鸦壁画。体育馆内不只整齐干净，还设置了攀岩训练场。合唱团里面每个人都亲切，正在练习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和平》。墙壁上以编织工艺呈现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和W·H·奥登（W.H.Auden）的诗。医疗团队也很完善，人员积极，药瘾应对方案齐全。图书馆馆藏丰富，我进去时读书会正热烈讨论某本挪威语小说。

装潢同样美观，而且注重隐私的访客室内备有大量保险套和润滑液，这令我刮目相看、大吃一惊。

“像你们那里的大型会客室其实不妥。”拉塞露出鄙视神情：“我在比利时看过，没有隐私，吵闹又拥挤的环境，家人怎么培养感情？”

这番话十分正确，监狱会客室有多么嘈杂和不自在我自己体验过很多次。拉塞指着角落的玩具：“我们也尽量为孩童设想。”他推开另一扇房门，说：“欢迎回家！”里面壁画是纽约的天际线轮廓。

我脑海闪过某一次进入纽约的监狱会客室，连拥抱告别都要申请许可，之后两人决定拍照留念就好。每个监狱会客室都有摄影区，负责摄影的囚犯拿着古董般的拍立得拍下照片，一张收取2美元，主角是你和遭囚禁的亲友，背景与其说是监狱，其实更像大学生舞会的场地，每周轮替不同主题，其中一幅因为看起来像以前奴隶主的院子，被我戏称是“假山水”，还有另一幅市区景观就叫做“都会夜色”。

“都会夜色”和我眼前哈尔登监狱的会客室壁画极为神似，可是我觉得眼前这景象极不合理，并非因为纽约和挪威距离遥远，而是这里人道气味太浓厚。如果我们出于无奈，非得分离囚犯以及最有机会“矫治”他们的人，也就是爱他们的人，那么至少是不是该给双方足

够的亲密时光？明尼苏达州研究显示这种安排对大家都有好处，以2003年到2007年出狱者为调查对象，发现亲友探访能大大降低再犯率。

而热情的教育监察员也进一步告知，哈尔登监狱对于人际关系的推动还延伸到管理人员和囚犯之间。

“关系，是我们这套体系的基础。”拉塞强调：“我做教育训练的时候会要求大家态度要坚定务实，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能帮助的问题，或者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不过我们自己一定要敞开心胸，愿意和囚犯互动。看新进人员遇上囚犯会不会紧张兮兮想盖住名牌，就能够判断他们是否适合。”

要进入这所监狱工作，首先得经过两年的特殊培训，课程包括犯罪学、法律、福利、应用伦理学，以及社工。前一天我去学院参观，对扎实的训练与人性的体现深感震撼。如何与囚犯建立关系，如何与他们沟通，如何看见犯罪行为底下更深层的问题，这些就是拉塞口中监狱管理训练的目标，而且管理人员在受训阶段就支付薪酬，社会地位也不低，接近护理师与教师，收入和福利都很好。事实上，这在挪威是颇受瞩目的职业，现阶段开出150到175个职缺，应征者却有1300人。我更进一步得知，挪威也为其他国家训练监狱人员，包括波兰、俄罗斯、索马里。后来我遇见这里的督察，他说自己刚出差从纳米比亚回来。这个趋势令我欣慰，在心里默默说了句：还好找上的是你们，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美国的不完善制度，那可就糟糕了。

“我认识一个在美国监狱工作过的护理师，”拉塞说，“她告诉我监狱里面关了1400人。我问她说：‘你怎么有办法照顾那么多囚犯？’结果她耸耸肩回答：‘我的职责只是不让他们死掉。’”

他盯着我问：“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害怕？挪威也渐渐有这种趋势，越来越多风险评估研究。可是其实挪威历史上监狱暴动的记录只

有那么一次，我们到底要评估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花大钱购买镇暴装备？”

“之前高层曾经打算建一个冰上曲棍球场，希望囚犯在冬季也能够运动。我说了句觉得危险。他们就回答：‘没错，说不定会拿冰刀互砍。’我说：‘互砍？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事？我说危险是指那个运动本身容易受伤！’”

看看时间，我告知他们虽然我很希望能一整天留在这里听他们阐述进步的制度，但很遗憾必须赶搭火车回去。

“别急，别急，”拉塞拦着我，“还有很多可以看，之后我载你过去，晚一点还有别班车。”这是第一次有监狱不让我出去，通常都是不给我进入。

太阳快掉到松林后头。拉塞塞给我一张监狱去年制作的音乐剧DVD，剧名是《自由》。他继续带我在哈尔登四处走动，感觉像是要我将每个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厨艺学校、“罪犯唱片公司”的豪华录音室、很厉害的风景摄影班将作品制成的精美月历。在纪念品商店我读到了他们出版的食谱，印刷工坊里面有大屏幕麦金托什计算机。

“觉得如何？”拉塞用手肘轻轻撞了我：“有什么感想？”感想，其实就是疲惫。有形和无形两方面都疲惫。在监狱看着囚犯们的处境令人疲惫，感受监狱这种空间的恐怖也令人疲惫。我没有说出这番心里话，只是问了热情的东道主：为什么挪威要花钱造出这样一座超高级监狱，尤其考虑到国内明明还有许多监狱追不上这样的水平？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是个尝试吧。”

我想这个尝试很成功。哈尔登监狱传递给全世界的讯息，也是拉塞试图传递给我的讯息：看看我们如何对待囚犯，你们做不到的话该

引以为耻。创造人间炼狱来威慑民众犯罪这项策略显而易见已经失败，于是挪威政府决定踏上相反道路，通过哈尔登监狱宣誓以矫治代替惩治并宣扬司法制度质量与文明程度成正比的理念。挪威人可以引以为荣。

“不过我们也未必维持得下去。”拉塞说。“你看，”他指着麦金托什计算机，“金属都生锈了，五年以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生锈没有影响啊。”我这样回答。锈痕恰好象征了物质表象。然而哈尔登，或者说挪威整个监狱体系，真正的创新之处却在于表象底下的人道精神。一如监察员所说，重点在于关系。

拉塞开车送我到车站，途中提起：“顺便去另一边看看吧。我之前在那边工作了26年才转过来。”他指着一个小村庄里的监狱，那里关了25人。

“那里和我住的村子很像，”拉塞解释，“小小的、很安静，连房子都长得一样。”

在转弯处，一辆车差点儿撞上我们。“这年头好多人飚车，”拉塞嗤之以鼻，开到车站前面停下来，“就是自私，只顾自己好。”

他的一句话悬在我心上。返回奥斯陆的两小时半车程，我望向窗外，迷失在景致和思绪间。挪威的美与我熟悉的热带风情截然不同，没有孔雀那样的绚烂夺目，而是冬季里轻飘飘的乐园，安宁且静谧。世界沉浸于黑与白，我赫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怀念缤纷色彩。或许应该说，这世界原本就不需要那样多颜色，相同并不一定令人窒息，有时候能够温柔地抚慰人心。

挪威的本质也许就存在于这片均匀平等的美丽中。我学会了挪威词汇“likhet”，意义既是“平等”，也是“相同”，可谓一体两面。这国家的司法制度围绕“likhet”来发展：所有人平等，所有人也相同，即使你没犯罪而另一个人犯了。

另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是“Jantelloven”。我初次听见是在奥斯陆时髦的酒店大厅，当时我正和一位妇人聊了起来。

她赞美酒店采用大胆独特、华丽张扬的路线，由于这个国家大部分人习惯了平均平等的风格，所以一般而言会避免出风头。接着她就说出“Jantelloven”，意思是对于独特性、对于个体的成就采取轻蔑态度。挪威人不鼓励大家自认特异或优越。

“这是很棒的概念啊！”我这么叫道，可是对方瞪大眼睛。

“好在哪儿？这种思想会妨碍成长。”

翌日我就去参观了监狱人员训练学院，与研究部门的主任贝莉特·约翰森（Berit Johnsen）聊起这件事。她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听得非常着迷，后来她还送我一本她的著作，《运动、男性气概和监狱内的权力关系》（*Sport，Masculinities and Power Relationsin Prison*），我稍微翻了翻颇为惊讶，内容引用了很多福柯的理论，还有深入的性别、伦理和政治分析评论。这样一本大作竟出自矫治官员？我在学院里面遇见的每个人都和她一样聪慧，于是话题也从证据和数据慢慢进入哲学层次。

“我懂那位女士的意思。”贝莉特说：“‘Jantelloven’有时候会被诠释为‘不得逾越’。”

“可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也正好反映出美国的个人主义过了头。资本主义下，大家太自私自利，不为他人着想。”

“从好的角度来看会得到这样的观察。”她附和：“在我们这里，穷人和有钱人确实都只能去一样的医院看病，教育经费也可以从公营银行贷款，所以每个人都能上学。另外有一个叫做‘dugnad’的制度，就类似义工、服务小区的传统。文化上我们就注重劳动，劳动工作是得到社会福利的方式，不工作的人会被孤立在社会外。所以我们这儿很少有女性找到有钱老公就不做事，每个人都觉得要有工作才归属于社会。”不过后来贝莉特提到挪威也面临令人忧心的文化变迁。

“新世代的年轻人开始想要出名，想要引领风骚，问题是不可能每个人都爬上去。否则清洁工作谁要做？学校老师谁去当？但现在挪威人想要坐办公室，以为这样代表自己很杰出。我们该给孩子的教育是告诉他们平凡人就很棒，每个人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适量的“Jantelloven”可以帮助挪威，也可以帮助全世界。大规模监禁现象不兼容于“Jantelloven”的概念，只有资本主义造就泛滥的个人主义才会拥戴监狱，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置于邻人之上，置于社会整体之上。如果一个人重视小区、社会多过于自我，便不会严刑苛待他人，出乎本能就意识到他即我、我即他，所有人实为一体。若我有所成就，也要归功于他，若他有何过失，也应究责于我。人类全体一致，我们应当大过于我。

过去的污点不该成为一生烙印

留在奥斯陆的最后一天，天空飘起雪了。我不在意天气湿冷，雪舞漫天也实在迷人，老旧房舍、阴暗街道因此面目一新。奥斯陆大学的研习室内坐了多位学者，挪威在批判犯罪学领域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而且与喜欢科学数据的美国学界不同，他们更加重视哲学面的探讨。巨擘之一是尼尔斯·克里斯蒂教授，收到我写信联络以后他传来

邀约，希望我可以对教职同仁发表一些感想。能有这个机会我十分雀跃，克里斯蒂教授是我在司法正义研究上的导师，我会前往卢旺达和南非都是因为读过他阐扬修复式正义的著作。教授也通过文艺作品的哲思和韵味引领读者深思社会公平的问题，同样给我很大启发。

“贝兹，说说看，”他递给我腌鲑鱼和鸡蛋三明治之后为我引导话题，“来参观以后有什么想法？或者在其他国家有什么见闻？”

我叙述了自己的监狱之旅，由广至深，一开始是针对如何定义报复、宽恕，以及矫治的大方向，后来进入实务层面的监狱经济问题，例如澳大利亚或新加坡的例子。结论是所有国家都呼应了曼德拉的想法，而他那句话也成为我旅程的滥觞：监狱是社会所创造，也如同镜子一样反映出社会的状态。

低头看着稿子，我感触很多，想说的很多。两年的全球旅程，亲身体验可以从三个面向来切入。

首先，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克里斯蒂教授在《对痛苦的限制》（*Limits to Pain*）一书中所提及：“施加的痛苦越少越好。”他感性指出人生已有太多哀痛，地狱般的环境实在不必要。

第二，是我们应当将焦点集中在社会体制而非个人行为。监狱制度从建立起初就是政治经济的工具，背后主导者是贪求金钱与权力的少数人，这一点我在不同国家看到了同样真相。南非、巴西、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人的生命选择受到社会力量、种族阶级、历史上的不公不义，甚至生理现实控制。因此我们必须发扬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提出的“理智双向观”（intellectual binocularity），也就是人类在认知自己主动的行为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兼具被动接受的角色，优劣成败有太多影响因素，绝非自己一人所决定。若理解了这点，面对人我的好与坏就能更加谦虚和仁慈，衍生出的就不是压迫，而是再造了。

第三，举证责任不应归于我方，而是对方。不是反对监禁制度的人必须提出如何抑制犯罪，而是支持监禁制度的人才应该面对问题，因为就逻辑来看，要是一个系统的失败率高达六成（这是指美国出狱者的再犯率，但全球多数国家的数据也没有比较好看），正常人应该会选择砍掉重来才对。所以对话主题不该是监禁以外有什么替代方案，监禁根本只能视为最后手段，所有办法都无效时才执行。美国学者迈克尔·唐里（Michael Tonry）曾经将监狱比喻为吃药，看似治好一个症状，却又因为副作用引起别的问题。还有指标性的学者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也提出“废除式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她认为如同当年解放黑奴不只是终结奴隶制度，也要建立新的体制取代，若要废除监狱，过程不只是拆，还要重建。“废除监狱，”她在著作中说，“前提是大众认清现行社会秩序存在错综难解的瑕疵，必须进行剧烈的变革。”而过程包括“制度、思想、策略的重整，只有创造新制度、新思想和新策略，才能够根除监狱”。

根据我在这些国家的体会，所谓“重整”或许可以分为三个大项，也就是狱前、狱中、狱后。狱前这部分最关键，刑罚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方案，每个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心力改善引发犯罪的环境根源，如此一来监狱自然派不上用场。比方说降低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数据已经显示人民所得严重不均的国家，命案比例相比于收入均等的国家超过四倍。挪威的国情与福利制度都是很好的参考，但同时美国其实也有新风潮，一半的州都已经施行，名为“司法再投资”（Justice Reinvestment），内容是将美国原本想用于监狱的540亿元挪到小区资源与基础建设上，弥补大规模监禁造成的破坏。

回归本质，其实和医疗保健一样，预防胜于治疗，强化小区功能和更能解决问题的政策才是正途，如牙买加、巴西、南非，以至于美国，采取压迫手段是不会生效的。尤其毒瘾者和精神问题者，必须有截然不同的思考才能搅动死水。废止强制刑期制度，终结“一体适用”的刑罚理念，不只是美国、新加坡或者泰国，即便在挪威，我也

遇见因吸食海洛因而被判处16年徒刑的年轻人。美国许多州已经展开行动，放宽最低刑期，对毒品犯罪实行更全面的司法裁量。

2011年，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内的许多世界领袖出席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s），他们公开宣布“全球对毒品宣战已告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度强调刑罚却不重视预防和治疗，还建议各国修改法律，以规范取代禁制。我们应当追随欧洲脚步，尤其从德国与荷兰借鉴。我的旅程没有包括这两地反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功举世皆知，政策着重降低毒品可能造成的伤害，深耕于医疗、预防、治疗，以及规范。至于精神疾病，重点自然也该放在医疗院所而不是监狱。以荷兰为例，法律规定被告应接受各领域专家咨询，包括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社工、行为治疗师、律师，以及法官。

其他犯罪行为则根本无需区隔“暴力”或“非暴力”，毕竟针对犯行加以处罚这件事本身就充满道德争议，目标应以修复为主。卢旺达和南非很具参考价值，再看看欧洲数据，仅少部分判决确定的罪犯真正进入监狱服刑（德国为6%，荷兰为10%）。他们以罚金、调解、社区服务取代，还有类似缓刑的延迟刑期制度。荷兰法律规定若法院要执行拘禁必须特别提出理由，否则平时应以“交易”或“劳罚”两种惩处形式为主。所谓交易就是犯罪者缴纳罚金给国库，达成一定的经济水平或者参与职业训练；而劳罚与卢旺达TIG公共服务营类似，犯罪者以为小区服务来赎罪。挪威也是采取相同态度，逐渐对刑期4个月以下的犯人采用电子监控而非坐牢。

即使经过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一定还是有人无法活在自由社会，因为他们对别人造成威胁；也有人必定得离开社会一段时间、接受矫治，然后回来做弥补。针对后面这个群体，我们无需使用现行的监狱，可以另外成立一种机构，姑且称之为干预体系吧。干预体系可以学习古时候最初期的监狱，是一个治愈心灵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让

受害者沉淀情绪、计算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让加害者自由受限之后可以好好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干预体系的目标是促使加害者面对自我以及自己做出的不良决定，过程可以纳入我在乌干达、牙买加、泰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地看见的疗愈性活动，包括戏剧和音乐、阅读与写作，还有修复式正义集会——简而言之，目标是真正的矫治和修复。克里斯蒂教授在其著作《适量的犯罪》（*A Suitable Amount of Crime*）中指出，“修复”（restoration）的字源来自古北欧语（Old Norse），意义是重新建造房屋的地基。

北欧人念念不忘的格言也很重要：“如何待人，人就会如何。”家人探视、犯人请假返家不但应当予以容许，还该多多鼓励，进入机构内的人享有充分自治也担负充分责任。干预机构必须接受系统性且统一标准的审查评分，保持公开透明，因为一旦脱离大众视野，机构就不再属于社会。与教育相同，规模以及工作人员数量是最重要的指标，机构应当小，尽量寻找最杰出的人来塑造最健康的环境，就像我在澳大利亚和挪威本地所见。

“只有像他（曼德拉）一样的人，才能做到释放的不只是囚犯，还包括狱卒。”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曼德拉葬礼上的致词。一如奴隶制度剥夺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的人性尊严，歹毒的监狱制度囚禁的不只是人犯，也禁锢了维系制度的人员。

干预体系不会将人留住太久。我们应当学习挪威，尽可能缩短刑期。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据显示重刑没有发挥吓阻犯罪的作用；2012年澳大利亚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矫治过程的效果反而相对快速，犯罪者也因此更快进入弥补阶段。

犯罪者获释后不该因为坐过牢而一辈子受折磨，否则等于否决了人性。比较挪威和美国，我们不应当在网络设置任何人都可以查询的

前科记录数据库，过去的污点不该成为一生烙印。犯罪记录仅限于司法单位调阅，不该对外开放。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努力提高离开干预体系以后的就业率。纽约州已经对配合政策的企业开出抵税奖励，而且额度不必局限在州政府目前规定的2400美元。美国部分州政府禁止雇主在文书资料或面试初期询问求职者的前科记录，这项政策应该全面实施。最重要的是通过广告、营销、公共论述，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扭转文化趋势，大众不应对危险过分恐慌，必须宽恕和凝聚小区共识。那样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曾为囚犯的俄国小说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为何写下："要是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要是真的在某个地方有一群坏人，所有恶毒罪孽都是他们干的，那么只要将这群人隔绝起来全部消灭就好了。但是善与恶的界线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心中，有谁愿意毁掉自己心智的一部分吗？"

一开始我想讲这么多。

不过最后我没有真的在研讨室内高谈阔论。亲眼见到精神导师以后我退却了，只平淡陈述了在挪威的见闻，觉得多么特别又与期望相符。

克里斯蒂教授浅浅一笑，仿佛隔空温柔地拍拍我的头。"之前我受邀去巴斯托伊监狱，同时对管理人员和囚犯发表演讲，"他开口缓缓说道，"那是个美丽的夏日，岛上风景漂亮极了。山、海、动物，巴斯托伊看起来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避暑胜地。演讲结束以后，我朝着囚犯抛出一个问题。我说：'假如刑期结束，各位可以继续住在巴斯托伊而且不收取房租，谁愿意留下来？'经过一阵迟疑，他们面面相觑，神情紧张看了看管理人员。最后终于有人大喊：'才不要！'"

"日后只要我开始以为挪威的监狱很人道，那句叫喊就会在我脑海重现，'才不要！'事实上，即便是挪威，囚犯依旧承受痛苦和污

名，而且因为这里表象比较令人安心，所以反而更难揭穿真相。因为好名声，结果更难推动人权。我们这儿并不是完美无缺。”

我点点头，其实原本我就有这样的认知，而且脑袋里冒出一些线索。相较其他国家，这里几乎没有种族议题，同为北欧民族的囚犯与具投票权的自由公民没有外貌分别，因此大众对囚犯产生认同感比较简单。

此外，我注意到真正留在监狱内的依旧是穷人和毒瘾者，本地再犯率很低有一个原因是如酒驾或意图犯罪这种微罪也可以判处徒刑，但那种罪名原本再犯概率就很低。然而，监狱里面其实有三成外来民族，多半是东欧人，这个族群的再犯数据可就不小，尤其他们被遣返出境后常常立刻再偷渡回来。

参观哈尔登监狱时，拉塞也曾面露歉意带我进入阴森的禁闭室。墙壁上散布抓痕，与我在巴西看到的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我得知禁闭一天会换算成刑期的一天半，不过挪威没有限制禁闭时间上限。另外，其实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个国家并非没有黑暗面，尽管不像欧洲其他国家有过殖民期，政府也曾经公开致歉，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主动将境内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受死。

后来我心里感觉比较踏实了，就和克里斯蒂教授提起在哈尔登访问过陶艺班，遇见几个囚犯，里头有一位好像不到19岁，右眼底下有三个刺青小点。

“这里很棒啊，”他的笑声有些许得意，“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大笑了。这是监狱，哈！”

隔壁的男子雕塑着陶土面具，造型模仿蒙克（Edward Munch）的经典画作《呐喊》，我之前才在挪威国家美术馆看到真迹。他听见这对话，忽然抬起头。

“真的？”男子闷哼：“我当初笑不出来，现在还是笑不出来。”撂下这句话，他又继续捏陶。

和克里斯蒂教授分享这个故事以后，我又提到纽约班上学生对于奥蒂斯维尔的第一印象。那里有翠绿山麓，到了秋天一片红褐色也很美。

“很漂亮的地方。”他们起初也发出赞叹声。

可是诚如水手威戈所言，监狱就是监狱，无论景色多美、平板电视多大都不能填补囚犯的寂寞隔阂，以及坐牢导致的人生停滞。我怀疑眼下有刺青的少年虽然脸上挂着笑容，内心深处却不断哭泣。我感觉得到他的逞强，或者说甘愿沉溺表象：总有人说“哈尔登监狱像是五星级酒店”，他听了许多次，于是说服自己相信。纵使他真的笑了，不也一样悲哀吗？假如监狱比外界还好，那么社会到底给了大众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你说得很对。”克里斯蒂教授点头。

我问教授对于新纳粹主义者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有何看法。2011年他犯下“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在奥斯陆公家机关大楼安装炸弹炸死8人，不久后又到于特岛工党夏令营地开枪扫射夺走69人性命，可谓挪威司法制度面对过的最大考验。

“他的确需要‘痛苦配送’（pain delivery）服务。”克里斯蒂喜欢以这名词取代监狱，《对痛苦的限制》书中解释因为它“听起来很像牛奶配送”，仿佛因此天然无害了。“‘痛苦配送’到了这个时代，演变为追求稳定、效率、卫生的业务，”他写道，“简直和配送流程一样。”

教授进一步回答他对挪威政府最后的做法深感骄傲。审判在修复式正义概念下进行，包括幸存者和死者家属在内所有受害人都可以直接在法庭发言，而且每一位都个别得到法律协助，于是总共出动174名律师。最后由5位代表组成的陪审团无异议通过处以21年徒刑。在挪威，除非是战争罪或种族屠杀，否则无论如何最高就只有21年刑期，换算起来每条人命不到100天。布雷维克待的监狱与哈尔登环境类似，可以通过函授课程上大学，生活条件与一般人无异，因为目标是矫治。当然，前提是他可以改变，大家都明白世界上有些人无法矫治成功。不过，民调显示挪威社会对于这个判决异常欣慰。

“最值得称许的一点是，”克里斯蒂说，“没有出现歇斯底里的反应，也没有酝酿出仇恨恐惧。”虽然布雷维克的罪行违反了爱、接纳、多元这些价值，大众却完整地把这些品质表现出来了。群众运动兴起，以玫瑰花象征宽恕精神，许多人将花束放在各地纪念碑前致哀，政府也暂时免除关税，让所有民众都能负担购花费用。

和卢旺达相同，一场悲剧转化为社会凝聚共识的机会，没有被报复和仇恨撕裂。可是“9·11”事件以后的美国并非如此，公共论述关心的是如何以牙还牙以及自我中心的爱国沙文主义，人民心灵受恐惧统治，政府也以宣战作为响应，冤冤相报永无宁日。安吉拉·戴维斯指出这种政策其实是对整个社会做情绪凌虐，并将之称为道德想象上的犯罪，因为人民被强迫切断连结他人苦痛的能力，等同于“抹煞公民的道德和情感”。她还质疑为何“在全世界都认同我们哀伤苦痛的时刻，我们自己却急着认定国家欠缺向心力”？

针对犯罪，我也想提出同样的疑问。如果当初能把握机会，将我们、他们这两个概念从对立（us-versus-them）转化为协同（us-and-them）会是怎样的光景？如果不加深隔阂，而是更深切体会到所有人紧密相连，每个个人的行为都能够影响到许多人，那该有多好？或许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同。

午后又降雪了，雪花在街灯下舞动。时间晚了，其他教授纷纷离去，克里斯蒂留下来继续与我分享想法。

“我们的职责就是缔造出人民最为睿智的社会，以及一般人都可以好好打理生活的体制。”他反对幼儿园，因为幼儿园将照顾发展之初的孩童转化为营利事业，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克里斯蒂反而认同小型村镇和少数民族区（ghetto），居民可以照顾、教育、保护彼此，而且各种改革只要全体集会就能推动，不需透过繁琐的议会和选举。他主张报纸和各种主流媒体都应该由教授等级的学者撰写，而且行文风格要直白易懂。关于毒品，他觉得真正危险来自于“大家觉得毒品太危险，所以连相关的教育都不该提供”。克里斯蒂也描述挪威的山中大会（Meeting in the Mountains），活动时受监禁的人、监狱管理人员，以及学者齐聚一堂，在度假地滑雪、对话，推动监狱内外的进步改革。

过程中我不断赞叹这位86岁老先生的择善固执，他至今仍能以孩童的纯真目光观察世界，不停质疑既存体制、结构，以及大部分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也因此成为司法上的真英雄。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司法的对立面并非犯罪或不公不义，而是故步自封。正是因为社会故步自封，我才选择踏上监狱之旅。于是我顿时明白为何以前每当对监狱似乎感觉自在些了，内心深处就涌出一股忧惧，原来并不只是害怕自己的理智陷入惰性，而是担心我失去追寻司法正义的热情。

接着我想起出狱进入约翰·杰伊学院就读的学生。我的课堂内容通常围绕两个主题，也就是种族和司法，好几周时间大家一起质疑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学生多半举手发问：“那答案到底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他们：“答案就是问题本身。”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现实生活里的种族和犯罪议题太过庞大，无法以美丽的词藻带过。人性本就复杂矛盾，要处理人性问题的系统必然得有对应的内涵。我们能做的是持续提出疑问，挑战成见和各种僵化信念。过去两

年我看见同样丑陋的结构扩展到全球各地，乌干达、巴西、澳大利亚，因此我们不得不警觉了。为何文明会停滞至此？人类怎可如此怠惰？我深信人类具有想象、革新与创造的力量，监狱是一个失败的想象，一个真正的悲剧。

“我并不认为这里的制度够好，一定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培训学院的贝莉特·约翰森也这么说过，这句话拨动我心弦，原来看似乌托邦的国度也还有努力空间。这条路通往我的追寻——司法的目标是精益求精。爱是行为，司法是动词，正义则是旅程。不应停滞，不可自满，绝对不能松懈。司法正义作为运动，必须动起来。

英勇将是普遍的人性，而不限于特定少数

旅程结束回家了，我自己也出现释后矛盾症状，感受到隔阂、孤单。然而，通过在监狱里面接触到的生命，我又获得无比深厚的连结。进入过集中营还侥幸生还的维克多·弗兰克（*Victor Frankl*）在《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书中解释这样的心理状态：“一个人越能忘记自我，越是将心力用在贡献或爱，人性就会越丰富，也越能实现自我。所谓自我实现不是达成某个具体的目标，一个人越是汲汲营营于自我实现，就越不可能自我实现，实现自我是在超越自我时连带发生的效应。”

在自己家乡的监狱世界里，我与“直升班”的两个学生失去联系。释放以后他们说要参观学校，结果人不见了，原本还提过要注册。查询网络上狱友名单也没看见他们的名字。还好，至少没有再回去坐牢。

接着我与世界各地的监狱通信。乔纳森从南非捎来消息，新一波的修复式正义工作坊已经展开，格斯温表现良好，一直记得和我的谈

话，不过人还在牢里，也需要支持扶助。

桑托斯写信告知卢旺达那边的监狱参观计划很顺利。他说起自己和其他青年朋友的学习心得，我读了心里一揪："永不放弃。努力使上一代明白唯有和解能够为国家带来恒久和平。彼此信赖。即使种族屠杀摧毁了人际关系，但要保持信心，我们可以修补裂痕。通过觉察他人达到宽恕，并营造宽恕的文化。年轻世代不必极端，思想应有弹性。我们无须成为残酷历史的奴隶。培养诉说真相的习惯，拥抱爱。"

巴西的玛拉与安德烈、澳大利亚的布兰特、泰国的娜帕蓬也都和我保持通信，他们都在各地不断进步。挪威的监狱读书会寄给我一大袋的信和诗，希望与奥蒂斯维尔的班级分享。最戏剧性的是乌干达，我离开那儿已经过了一年多，非洲监狱计划将一封信的扫描图文件传送过来，是之前教过的学生威尔逊所写："写作班的同学们很想念你，非常感谢你在创意写作方面的指导。大家都维持写作习惯，也许有一天你能读到作者是威尔逊的书……我的刑期快要结束了，请代我向那边监狱和大学班上的同学问好，转告有人爱着他们，为他们祷告。我诚挚希望那里的狱友们都能成为好公民。"

信件署名是"波玛区长巴法齐·威尔逊，监狱创意写作班班长"。

过了没几天，凌晨4点23分，我的电话忽然响了，显示来电者不明。

"贝兹！"竟是威尔逊。我没问他如何能从监狱打电话过来，但勉励了他："只剩半年就可以出狱了。"

几个月以后，就是我从巴西回美国那一次，又是早得离谱的一通电话。"贝兹！"威尔逊叫了起来，然后哭着说："我好高兴，贝

兹。3年2个月，我终于出来了。”

而且他找到新家。当初不明白为什么我对监狱很执着的年轻朋友阿尔替威尔逊先垫了一个月房租。等我从挪威回国，接到阿尔的电话，他表示正在筹备社会复归计划，在囚犯和外界工作机会之间搭起桥梁。我听了眼睛一酸冒出泪，果然改变会在人与人、心与心之间渲染——并非源自于我，一个外地人，而是发自大家内心。

来自各地的消息解释了为什么我总能乐观以对。旅途使我见识到世界上真的有地狱，那些体验留下不可磨灭的内心转变：现在的我是个更好的教师，能够将地图上司法问题的点串连成线，愤怒和悲哀都更深刻了，因为我见证了人类文化最黑暗的一面。

但同时，在各国的各个监狱，我看见人性最灿烂的光辉。纵使制度残缺不全，仍有许多人忍耐，跨越重重难关，许多有能力的人也试图扭转现状。黑暗越深沉，英雄们就越闪亮。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认为，虽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世人却应该追求平庸之勇，如此一来“英勇将是普遍的人性，而不局限于特定少数”。

基于平庸之勇的概念，每当有人问我：面对大规模监禁、大规模司法不公这类看似难以撼动的社会议题，除了捐款给相关组织以及参加造势活动之外，究竟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回答十分简单：保持觉知，了解问题，试图找出解决方案，将信息传递给所有愿意倾听的人。亲人朋友、公交车司机、街角邂逅的路人都无所谓。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成为教育家。在别人心中播种，也许就能萌芽成长，开花结果。阿尔是最好的例子，当时只是一起观光，一起欣赏雷鬼音乐，结果无心插柳柳却成荫。虽然现实环境的改变仰赖于政策改革，但是不要忘记政策改革又仰赖于大众心态的转变，这是所有人共同肩负的责任。

我在挪威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可是这短短时日中，我仍然看见世界正向发展的点点滴滴。纽约有三所大学同意未来入学申请书上不再询问前科记录，美国自由公民联盟收到成立以来最大一笔补助金，并用于降低监禁率。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数月之后任期届满，日前政府宣布奥巴马总统计划动用行政赦免权，数万名联邦监狱内的毒品犯可以受益，此外也对大规模监禁问题做出多项表态，呼吁寻求替代方案；同时前总统克林顿与一群官员谈话时也指出，“国内的重罪案件有极高比例其实只是少数人行为”，然而政府“好比拿出霰弹枪乱枪打鸟，要大家坐牢坐很久”。2014年美国选举时估计有585万人因为重罪记录失去投票权，后来加州通过47号提案，将例如入店行窃和持有毒品这种非暴力却列为重罪的行为改为轻罪，因此1万人将提早出狱。

种种迹象令我更有信心，监狱改革必定能够持续，毕竟如今连右翼也称基于成本考虑而加入反监狱行列。威廉·本尼特（William John Bennett）、杰布·布什（Jeb Bush）以及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都参与正确打击犯罪（Right on Crime）㊟这个保守派全国性运动，期盼司法制度能节省费用，实行高本益比的手法降低再犯率，并更加照顾受害者。2007年，共和党主导的得克萨斯州提出2012年之前必须在监狱增加1.7万个床位，预算高达20亿，但后来议会决定将钱用在以小区为主的替代方案，如缓刑、调解庭、戒毒疗程，成果是犯罪率降低25%，根本不需要多余床位。

依照趋势看来，我们可以期待监狱时代慢慢走向尾声。它们步入历史以后，会与颈首枷、断头台作伴，这些刑罚手段的残酷实验的退场时机不远了。

然而，事实上在制度面修修补补，东一点改变，西一点革新，恐怕无法达到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前一年慷慨激昂演说中所提及的“价值观的真正革新”。人类历史见证了种族主义者和阶级主义者紧

抓着社会结构不肯接受转变，吉姆·克劳这个形象重生于大规模监禁，差别只是“有色人种”换成“重罪犯”。经济考虑没办法和道德思想相提并论，即便做法正确，但若出发点错了，仍无法建立永续变革和崇高正义。

此外，眼光不能仅放在美国。虽然美国正试图除去自己的心魔，也别忘记美国文化养出了巨兽，触手牢牢攫住地球上许多地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操着不同语言却是本质相同的监狱。我们出口了一个不理性的系统，监狱史本身在疯狂和忧郁之间摆荡，前进、后退，再前进、又再后退。制度整体呈现出此种趋势，就像秋天开学了，每一个学生入学时，就有另一人即将被逮捕。跨出一步的同时又缩回一步。

所以关键在于不断迈步前行。司法正义本就无尽繁复，必须无穷尽提高自我标准，所以需要更多投入、更多社会运动，经过更多努力和更多失败，换来更多成功。完成使命、探求意义的航程，动力来自我从不离身的救生衣，它可保心灵永不陷溺。它名叫，希望。

---

1. Charon，希腊神话中的冥河船夫。——译者注
2. 共和党政治人物，曾任阿拉斯加州州长，共和党史上第一位获提名搭档参选副总统的女性，言行引来许多争议，特别是有人披露她知识贫乏，以为非洲是国家而非大陆，从阿拉斯加可以看得见俄罗斯等等。——译者注
3. 此名称一语双关，Right是“正确”、“精准”也是“右”翼之意。——译者注

致谢

世界上最美的两个字是："谢谢。"

在此感谢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对于本书和"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大力支持，以及研究发展办公室和英文系提供了至关紧要的旅游和研究经费，若没有补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谢谢系主任Allison Pease与Valerie Allen，以及院长Jeremy Travis和教务长Jane Bowers，各位的慷慨协助和热情鼓励令我感激不尽。

也谢谢约翰·杰伊学院的囚犯复归研究所（Prisoner Reentry Institute），也就是"监狱直升班"的主管单位。我很骄傲有一群非常棒的同事：Bianca Van Heydoorn、Ann Jacobs、Daonese Johnson Colon、Krystlelynn Caraballo、Maja Olesen，以及包括Kathleen Gerbing督察、Alicia Smith Roberts副督察在内的奥蒂斯维尔监狱管理人员。因为你们，"监狱直升班"项目才得以实现。

也借此机会向全球各地为了监狱改革不遗余力的所有运动人士致上敬意，我很荣幸能与你们合作，每天都能从中得到启发：Dukuzumuremyi Albert（外号桑托斯）、Eric Mahoro、Brent Bell、Jocemara Rodrigues da Silva、André Kehdi、Dr.Napaporn、Pastor Jonathan Clayton、Yvonne Lloyd、Carla Gulotta、Brian Steels、Nils Christie、Lasse Andresen、Tom Eberhardt。美国的伙伴则有：Bianca Van Heydoorn、Kirk James、Marlon Peterson、Jeff Aubry、Ali Knight、Debbie Mukamal、Khalil Cumberbatch、Glenn Martin、Vivian Nixon、Soffiyah Elijah、Todd Clear。

我拜访了九个国家，很感谢在监狱内接触到的各位愿意与我分享心情和故事。我给你们上了课，但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

感谢接待我以及协助我参访监狱的所有单位：“非洲监狱计划”、“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狱友希望牧师团队”、“康兰吉计划”、“黄丝带计划”、新加坡狱政署、新加坡矫治事业部、泰国司法部与司法事务署、科廷大学、巴西阅读矫治计划和国家狱政部、挪威矫治署。也向为我穿针引线的Gary Hill特别致谢。

谢谢工作表现杰出且毅力非常人能及的编辑Judith Gurewich从得知这本书的设想时就极力支持。还有精力无限的经纪人Sarah Levitt对本书计划的价值充满期许，并坚信我能够完成。

也感谢编辑Anjali Singh鹰一般的锐利目光与耐性十足的双手，将这本书改造得一次比一次好。

谢谢我的兄弟Malik Yoba和姐妹Beth Skipp，你们的爱是我每天必须的养分，我们的情谊比血缘更浓。

谢谢如姊如母、热切指引我和启发我、最聪明的Lynda Obst。

谢谢已经如同家人一样的朋友——你们是我灵魂的手足、战友，永远能够倚靠的肩膀和愿意倾听的耳朵，也是最能给我出主意的帮手：Lynn Joseph、Penny Vlagopoulos、Kirk James、Jeffrey OG Ogbar、Jeanille Bonterre、Jackie Simmons、Debbie Sonu、Monika Levy、Helene Sola、Vitoria Setta、Trish Perkins、Tommy Smith、Sanjay Ramanand、Richard Perez、Oscar Michelin、Ornella Schneider、Anya Ayoung Chee、Natasha Ali、Lisa Marie Stewart、Karibi Fubara、Joanne Kehl、Andy Kasrils、Jessie Ben Ami、Sean Field、Jama Adams、Hank Willis Thomas、Andre Honore、Anand Vaidya、Audrey Moore、Donna Augustin、Carleene

Samuels、Daniel Kramer、Edrick Browne、Nathaniel Quinn、Yadi Perez Hazel、Clinton Hazel、Jonathan Gray、Luigi Moxam。也特别感激Keith Sharman审阅草稿，时时为我加油打气。

感谢卓辛格家的姐妹：Tam、Naomi、Riv、Sa，以及我的双亲。父母养育我长大的过程中总是问我最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最后我要感激的是加勒比海岛国，尤其是牙买加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里的文化滋润了我的精神、灵魂和知识，也敞开了我本就应开放的心胸视野。